

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Li Daqun, a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der,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He is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jacket and has a serious expression.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landscape with a warm, orange-red glow, suggesting a sunset or sunrise. The portrait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cover.

纪念李大钊诞辰 100 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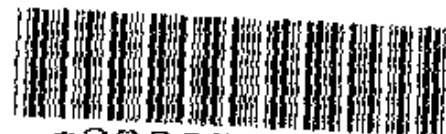
# 李大钊研究文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

K827.6

39

784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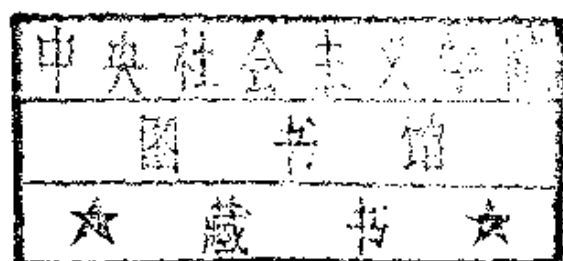


\*200257051\*

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

# 李大钊研究文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李大钊研究文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022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华新源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12.75印张 330千字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4300册

---

ISBN 7-80023-299-9/K·317

定 价：6.60元

## 目 录

- 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 江泽民( 1 )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 ..... 胡乔木( 7 )  
纪念李大钊 ..... 胡 绳( 17 )
- 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 ..... 朱乔森( 23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李大钊  
..... 丁守和 李义彬( 36 )
- 正确理解和评价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  
..... 朱成甲( 50 )
-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 ..... 张静如( 70 )
- 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先驱 ..... 王秀鑫( 82 )
- 李大钊是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 马模贞( 94 )
- 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大钊同志百年诞辰答  
客问 ..... 彭 明( 101 )
-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 ..... 杨树升( 114 )
- “宗彝”故训与“民彝”新论 ..... 刘桂生( 128 )
- 李大钊早期资产阶级制宪主张述评 ..... 王纯新( 136 )
- 早期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态度的演变 ..... 杨洪章( 148 )
- 论“五四”前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发展 ..... 萧超然( 163 )
- 李大钊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 ..... 谭双泉( 180 )
-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 ..... 王桧林( 192 )
-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特质探析 ..... 王 沛( 204 )



10013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李 楠(218)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向 青(228)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吴家林(243)

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张振寰(256)

李大钊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乌尼日(268)

李大钊与章士钊.....金淑琴(275)

李大钊的社会经济思想及其发展.....季 华(288)

李大钊论社会主义竞争.....杨纪元(304)

李大钊的文学思想.....董学文(309)

李大钊的宗教观.....胡顺哉(329)

李大钊的婚姻家庭观.....吴美华 刘星星(343)

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及其价值.....韩一德 姚维斗(355)

1924年李大钊逗留苏联期间若干史实概述.....李 玲(367)

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李玉贞(377)

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张静如 侯且岸(381)

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392)

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目录.....(394)

后 记.....(403)

# 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 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89年10月28日)

江 泽 民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70年前，他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展开积极活动。当时，一方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仁人志士为挽救祖国危亡进行的斗争，包括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先后遭到失败，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已经在实践中宣告破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一个壮大了的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革命营垒，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顺应时代的需要，率先在中国大地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中国昭示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中国革命的许多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同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一样，

他曾经一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实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政治，来治疗中国社会的痼疾。但是，他在实践中感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所宣传的理性王国，并不能保证正义、平等、人权的实现，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坚信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预言将来之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开始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英勇奋斗。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当封建军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洪水猛兽加以禁绝，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时侯，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抽象的学理和不变的教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而不应“偏于纸上空谈”，要“向实际的方面去作”。他指出，重要的是必须同人民群众的实践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绝不应当只是少数文人的笔墨运动，而应当是街市上、乡村里的群众运动。当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就主张“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指出知识青年必须到劳动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痛苦，研究他们痛苦的原因，寻找解脱他们痛苦的方法。这样，他也就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光辉的思想原则。

李大钊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他关于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必须依靠农民、必须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必须通过武装斗争达到革命目标

等一系列论述，对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最早的宝贵贡献。与此同时，他还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描绘。他指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同具有的最根本的特征，而且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将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也会有自己的特性。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民主”一词可直译为人民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只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的竞争，等等。这些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并能从中得到启发。李大钊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进行过研究，在这些领域中做出了开拓性的建树。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阐述，影响和教育了我国早期的一代共产党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对一些问题的论述，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然而，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不仅是渊博的学者，而且首先是杰出的战士，学者和战士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他一旦掌握了真理，就立即将它付诸行动。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并直接领导创建了北方的党组织。他还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在北方各省广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发展。他很重视培养革命干部，派遣许多干部去学习军事、开展军队工作，并对国民军的改造和参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还为在少数民族中开展革命活动，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他在自己短

哲的一生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李大钊的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共产主义者的伟大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共产主义具有无比坚定的信念。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他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殚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他作风质朴，“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他坚持真理，待人宽厚，团结同志，正如后人所赞誉的，“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当革命处于危难时刻，他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把个人收入的大部分用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接济同志，接济贫苦青年，而自己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酷刑的折磨，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维护党和革命的荣誉，直至舍生赴死，从容就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的伟大的人格，永远是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而献身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

同志们，朋友们！

李大钊当年曾经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如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他所憎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已经被人民革命所埋葬，他所殷切盼望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已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李大钊的思想理论遗产，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生活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上的敌对势力正在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企图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内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我们有必要重温李

大钊等先驱者为寻找中国富强之路所进行的艰难探索和做出的历史选择，进一步认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把先驱者用鲜血和生命开辟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切实坚持由李大钊同志初步提示，其后由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系统而深刻地加以阐明和完善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要坚决反对那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始终同实际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于它能够为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开辟道路。我们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了解当前的时代，认真研究我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科学概括各方面工作的新经验，努力汲取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并由此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干部，是不可能担当起他所面临的各种艰难、复杂的任务的。我们必须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应该具有较深厚的理论修养和较广阔的视野，密切联系群众，懂得中国国情，自觉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如果不提出并解决这个任务，我们的党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后备队，就不可能胜利地走向未来。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长久地坚持和发展下去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

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奋斗。为了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了造就社会主义事业

所需要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我们应当在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中，提倡学习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抵制和扫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精神垃圾，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论是在推翻旧世界的斗争还是在建设新世界的斗争中，保持和发扬这种政治上、思想上的优势，始终是我们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同志们，朋友们！

70年前，当李大钊在黑暗笼罩的中国最早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时候，我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只有很少几个人；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党的队伍中也只有几十名成员。但是，李大钊等先驱者确信自己的事业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着广阔的前途，是任何反动力量不能战胜的。实践证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必将胜利的坚定信念是完全有根据的，而党内那种遇到困难或挫折就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丧失信心的人，则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我们相信，只要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继承、发扬李大钊等先驱者的革命精神，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勇于开拓进取，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新的更大的胜利。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李大钊同志的光辉形象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李大钊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心中！

# 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 伟大先驱李大钊\*

(1989年10月29日)

胡 乔 木

今天是李大钊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北京大学等单位在这里联合举办李大钊学术讨论会，以纪念这位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探讨历史对他和他对历史的影响，学习他作为爱国家、革命家、教育家、学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坚定立场、热烈心肠、谨严态度和高风亮节，是很有意义的。我代表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热烈祝贺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并向到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表示亲切的问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最早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积极参加和指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教育团结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青年，引导他们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随后与陈独秀、毛泽东等一起发起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他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还很弱小，斗争环境非常艰苦。为了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李大钊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官兵、少数民族等各条战线上奋力开拓，卓著成效；并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在北方15个省市发展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作。他也继续在教育和学术的岗位上耕耘不辍，

\* 本文是胡乔木同志在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而以所得的收入来支持革命运动，资助穷苦学生。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北方的反动派对李恨入骨髓，主张处以极刑，背叛后的蒋介石也密电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这样，我们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终于在4月28日被处绞刑，牺牲时年距38周岁还少6个月。

从那时以来，6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李大钊等先驱播下的共产主义真理的种子，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开花和结果了。当然我们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毫无疑问，这是共产主义的起点，这对于我们和我们的敌人都是明白的。今天，我们虽然远离了他生活的时代，但依然感到他短促的生命的伟大，依然感到他的历史眼光的深远、思想价值的珍贵和革命道德的崇高。

自古以来，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就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传统。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李大钊是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的。他在十六七岁时，痛感日俄战争以中国领土为争夺对象和战场，国势危急，生民涂炭，发愤献身救国事业。他决定改名耆年为钊，改字寿昌为守常，就是自己对自己永恒鞭策，不求长寿，而求终身为奋斗不懈、坚持原则的志士仁人的表现。他在《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sup>①</sup>他的爱国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他对祖国的炽烈的爱是同他对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命运的真切关怀结合在一起的。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中，不少人以个性解放的思想来否定三纲五常这类伦理原则，他们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对广大人民的深广而久远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没有对群众的革命发动表示应有的期待。他们攻击旧制度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9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相当狭隘的。李大钊则不同。他对“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sup>①</sup>的黑暗现实感到哀痛和忧虑。他是以人民大众代言人的身份来揭发旧制度的祸害并投身于争取变革的斗争。他认定：“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sup>②</sup>他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抱有强烈的希望和坚定的信念。

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努力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也曾经是一个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的道路。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最早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并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新方向的呢？我想，这与他早期思想中的如下两个特点有直接的联系。其一，他在为中国选择道路时，是以它能否导致人民的幸福和解放为取舍标准的。他感到，辛亥以后所建立的民国，名实极不相符，“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sup>③</sup>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sup>④</sup>。这样，即使在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已经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采取某种怀疑和保留的态度了。他在1916年6月曾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sup>⑤</sup>这种怀疑论，正如列宁在评论赫尔岑时所指出的，乃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sup>⑥</sup>。其二，他的思想中较早地具有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他强调，人们的认识必须“据乎事实”，论事析理，“求其真实之境”<sup>⑦</sup>；他认为，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正是这

①②③④⑤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第140页；第4页；第565页；第168页；第446页。

⑥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种矛盾的斗争推动着事物的变化。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从不固执成见。他相信社会是前进的，新事物肯定会比旧事物优胜。他在对西方代议政治表示怀疑的同时，就确信起而代之者必定是更为优胜的制度。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独具慧眼，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这个革命的胜利乃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时代的潮流，认定它将带来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尽管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不是最早的，但他最早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成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一开始就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首先，他重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力求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握它的革命的实质和核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段斗争说和经济论，可以说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文章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的上述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sup>①</sup>由于当时的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进行革命，他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是很自然的。

其次，他初步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当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讲过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认为考虑中国的问题，是不能“置吾国情于不顾”<sup>②</sup>的。这里的国情，既是指“近今之国情”，也是指“往昔之国情”，即历史<sup>③</sup>。他认为，这个国情问题，不可求于外人，“不可与客卿谋”<sup>④</sup>。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他在揭露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相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相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sup>②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5页；第113页；第110页。

反地，他正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继承者。他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短长，建设世界的新文明，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而应是东西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sup>①</sup>。他曾著文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悲观主义，表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sup>②</sup>。他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俄罗斯文明，认为它“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这也正是他主张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sup>③</sup>，主张中国革命要走俄国人的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情况下的实际运用，这不仅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的正确理解，而且是他上述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sup>④</sup>。我们接受某一学者的学说时，“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sup>⑤</sup>。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sup>⑥</sup>。他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时就组织过“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并由他担任评判员；还开展过“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类实际性的专题研究。他认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当人们“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sup>⑦</sup>，即在运用中得到发展。应当说，这些思想，是相当精彩的。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他就提出这些思想，更属难能可贵。把这种宝贵的思想说成实用主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再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绝大功绩，就是指明“社会主义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71页；第562页；第574—575页。

④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第69页；第711页；第34页。

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sup>①</sup>。他不仅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先锋作用，直接从事工人运动；而且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斗争。在他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时，他就写过《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只有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中国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和泉源，因而号召革命的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等文中，更对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与革命者深入农村的必要性等作过相当深入的论述。他说过，革命者要关心水深火热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要“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sup>②</sup>。国外很有些学者据此认为李大钊和后来的毛泽东的思想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国内也有人响应这种观点。事实上，李大钊尽管曾经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但与俄国的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考虑到中国革命首先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正是农民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承认，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努力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

李大钊原本是一个学者。他是通过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的。当他成为一个革命者以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了革命斗争。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而且，在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几乎所有的战线上，都活跃着他的不知疲倦的身影，都留下了他的辉煌史册的业绩。从开始进行建党活动到最后牺牲，仅只七八年的时间。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他竟然为中国人民、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那么巨大的、多方面的贡献，这不能不令人惊叹和感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第877页。

佩。

但是，作为革命家的李大钊，仍然不失学者的本色。建党以后，他还一直担任北京大学的教授，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里进行着辛勤的劳作。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写过《史学要论》等一系列历史理论著作。在其它学科领域，他也作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他还是一个文学家，写了很好脍炙人口的诗文。他的文章风格挺拔，笔力雄健，议论纵横，充满激情。王森然在30年代写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便说，他编辑《新青年》杂志时，“以矫激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sup>①</sup>。他去世后，一部分遗文被李乐光等冒着生命危险收集并保存下来，周建人等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他的遗文的收集工作。作为一个拓荒者，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所进行的一些草创性工作自然不免粗糙，然而他在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和占领哲学、社会科学阵地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1933年，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中就说过，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集子，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然而“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sup>②</sup>。

李大钊的气节和操守是非常崇高的。在他的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的许多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一切更得到了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为人忠厚、谦和、质朴，为士林所公认。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危急关头，从不退避，总是挺身而出。在遭敌人通缉时，亲友们曾劝他离开北京，他为了工作，坚持留下。被捕以后，面

<sup>①</sup>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册第4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sup>②</sup>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对敌人的酷刑，他不仅严守党的秘密，而且独力承担全部责任，竭力掩护和解救同时被捕的青年。在狱20余日，绝口不提家事。他的牺牲是很壮烈的，真正是从容就义，视死如归。他一生自奉俭约，生活刻苦。他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至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人，以免他的家庭断炊。他“生时仅可供家食，死后则一贫若洗，棺槨衣衾，皆为友助”<sup>①</sup>。他确实处处可以为人之楷模。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同志、朋友还是敌人，对他的人品，没有不佩服的。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都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在五四时期，即有人写诗赞扬他与陈独秀是“双悬照古今”的“日月”<sup>②</sup>，毛泽东也说他们“两人都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最出色的领导人”<sup>③</sup>。他与孙中山接触后，孙中山说他“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钦佩和尊敬”<sup>④</sup>的人。一些同时代人也说他是“宅心长厚之良友”<sup>⑤</sup>，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sup>⑥</sup>。

李大钊曾亲笔书写过一幅对联送给友人，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幅对联的原作者是明朝的杨继盛，原文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sup>⑦</sup>。杨继盛也是河北人，嘉靖进士，曾任兵部员外郎，因弹劾奸相严嵩下狱，受尽酷刑后被杀，是明朝的著名志士。李大钊特地选择这幅对联，说明了他对杨继盛等古代仁人志士的景仰。他将原联中的“辣”字改为“妙”字，也使这幅对联别具韵味。这幅对联，可以说是李大钊一生的生动概括和真实写照。有人借这幅对联把李大钊称为“道德文章之楷模，”

---

①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上册第4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⑤ ⑥ 《回忆李大钊》第35、146页；第6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③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4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宋庆龄选集》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⑦ 贾芝：《铁肩担道义》195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他确是当之无愧。1933年，即在李大钊就义6年后，他的生前好友，北京大学教授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为公葬这位英烈募资立碑。刘复撰写的碑文称李大钊“理致谨严，思度宏远，见者称道”；“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这说明在学者当中，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何，都不能不承认李大钊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

我们今天纪念李大钊，要学习他的革命气概和高尚品质，学习他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大公无私，自强不息，继承和发展他的思想遗产，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同时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了与资本主义列强对我颠覆演变的野心坚决周旋到底，这是尤其重要的。

这里我想指出，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的名字是与北京大学分不开的。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北大的“红楼”、北大图书馆开始的。他在北大指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开始就得到了校长蔡元培的支持。被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定名的“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斋），就是蔡元培为研究会专门提供作为活动场所的两间房子。当时国内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革命青年，很多都是这个研究会的会员或通讯会员。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初成员，大多数也是北大学生和教师。可见，北京大学不仅有伟大的爱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蔡元培的传统，而且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家李大钊的传统，有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共产主义主要发祥地之一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曾发出过夺目的光辉。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方面都达到新的规模和水平。这之间也经历了一些令人痛心的曲折，无论如何，北京大学的光荣革命传统是不可动摇的。今天，北京大学



成为举办这次学术讨论会的发起单位之一，讨论会本身就在北京大学举行，是理所当然的。无论就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说，我相信，北京大学的师生今后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把蔡元培、李大钊等创立的革命传统坚守不渝，发扬光大。

像李大钊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历史本身，就是党的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应当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对他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客观的评价。我们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党史上的人物，越是如实地写出他们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就越是真实、生动，越是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近年来，史学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景象。我希望，这次学术讨论会将会把对李大钊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 纪念李大钊\*

(1989年10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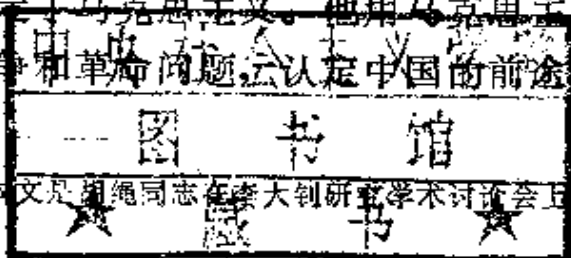
胡 绳

今天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100周年诞辰。中共中央在昨天举行纪念大会，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这样隆重地纪念李大钊同志，在他牺牲后60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李大钊同志生前曾经在北京大学工作和开展革命活动。到会的有全国各地理论界、教育界、史学界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们，并邀请苏联、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和日本的学者参加。以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来纪念李大钊，也是第一次。

李大钊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寻求国家出路的一个思想家、革命家。他是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当时整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中，李大钊也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之一。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是抱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国的实际和世界的实际使他怀疑和否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从西方传来的各种思想中终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思想武器认识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问题，认定中国的前途不可能是资本主义而只能



\* 本文是胡绳同志在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幕词。

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他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共产主义运动。

70年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志从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不过是李大钊和他的几个学生和同志。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所开创的事业的正义性和正确性，相信这个事业必能有广阔的前景。同时，他们也充分了解，在前进的道路上要通过无数的艰难困苦，要付出巨大的牺牲。李大钊自己在1927年英勇不屈地走上绞刑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与的伟大运动。在李大钊逝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破坏国共合作而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是这个革命运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战胜它。经过挫折和失败，它受到锻炼，更健康地发展起来。

在李大钊逝世22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阶段。在李大钊逝世60多年后，也就是现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经过了30多年的考验，牢牢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现在我们纪念李大钊，就好像是在一棵参天的大树前面怀念栽树人一样。我们不能不想到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功绩。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我们还要继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进。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讨论一下为什么在70年前李大钊和其他先驱者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主要介绍唯物史观的理

论，而尤其着重阶级斗争的学说。中国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是如此。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曾经说，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是不适合的。他们企图证明，好象中国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本来不会有，不应该有，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影响才发生的。这种说法当然是完全站不住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可能由一种学说“制造”出来。

中国历史上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那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主要发生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封建社会既遇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在内部发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新的阶级。中国社会关系复杂化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前，各派政论家在为解答中国革命问题而发表不同议论时，往往接触到阶级斗争问题。

可以首先举梁启超为例。他在1904年作《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上等社会之革命”和“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梁启超是反对孙中山一派所创导的革命运动的。他认为，中国今日要革命，就难免会把他所说的“下等社会”的力量鼓动起来，这其实就是说，会把农民大众鼓动起来。他认为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事。这里不来评论梁启超的主张，但应该说，他是在试图对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和当时的革命作出一种阶级的分析。

当时，主张革命的一派人也使用“上等社会”、“中等社会”、“下等社会”这些概念。他们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等社会”上。他们认为革命应该由“中等社会”主持、领导，也要发动“下等社会”的力量。例如杨笃生在1902年所著《新湖南》中说，“中等社会”的责任是破坏“上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1905年自杀的陈天华在遗书中说，一定要先使“中等社会”都知道革命主义，渐普及于“下等社会”。他们中还有人说：“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而“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中坚。同盟会

的朱执信是在那时已多少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他在1905年发表的论述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在中国应同时并进的论文中说：“革命者，阶级战争也”。我举出的这些材料可以表明，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已经反映在这些革命者的头脑里，他们感到，为了弄清楚怎样进行革命，依靠什么力量进行革命，需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过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所说的“中等社会”，大体上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所说的“下等社会”是指江湖会党、劳动人民和士兵。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等社会”主持和领导的。革命的结果却并没有实现革命派的预计，“中等社会”并没有成为国家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使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这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也不能不使人们，特别是先进的爱国的人们对问题进一步思考。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开始传入中国时，虽然是完全新的学说，但它所要解答的问题并不是在中国的思想界和实际生活中没有提出来的问题。相反的，这些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只是没有能给以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并且为解决问题指明了新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他部分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这样一种科学，它即使在中国为一些人所接受，也不可能广泛传播，并在千百万群众的斗争中起作用。

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李大钊和他同时的一些同志，最早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道路在中国已经走不通。他们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是初兴的、力量还不大的阶级，然而是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李大钊主张马克思主义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走到工人运动里去。无产阶级政党，即共产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李大钊也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人中的一个。和那些只看到农民的自发性的弱点的人不同，他主张积极地组织和教育农民，

引导农民运动走向正确的道路，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巨大力量。

中国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始时曾经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中国的现实任务，但不久，包括李大钊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懂得了，在中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首先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此，就要以工人阶级为首，发动农民大众，团结广大小资产阶级，并尽可能地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李大钊在生前为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后活动的时间还不到10年，他的理论与实践不免带有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不足之处。但是他在不到10年的短时期中为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他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方向和中国的前途已由历史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从李大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他既身体力行地如他自己所说，“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又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尽了开创者的使命。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工作。这个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在进行这工作时，当然我们要十分重视当前的实践，但我们同时也重视前人经验的积累。我们不但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中国最初栽下共产主义树苗的先驱者，而且还可以从他们的业绩中学到许多东西。

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李大钊给我们留下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为人，堪称共产主义者的模范。他的著作，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涉及哲学、政治学、史学、教育等方面。这是值得珍惜的思想财富。20年代末和30年代，一些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在白色恐怖下，冒着危险发表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的文章。李大钊的亲属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收集到他的一部分著作文稿，于1933年编成《守常全集》。鲁迅先生

写的序文中说，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本文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那时周建人等同志也默默地进行李大钊遗著的收集工作，费了10多年的时间，汇集遗文近300篇。40年代，在延安，一些同志研究和宣传李大钊的思想和革命业绩，激励党员和群众。

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李大钊的思想和实践，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1966年起的十年动乱中，研究工作因受到干扰而停顿。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李大钊的研究又在学术界内认真地开展起来。《李大钊文集》和他的传记、年谱等书相继出版。

这次学术讨论会筹备期间，收到论文近200篇，选送会议的论文69篇，内容比较广泛，不少论文提出一些新的选题和新的见解。会议期间，大家还会就各种问题从各种不同角度提出意见。我们相信，通过这种交流，对于促进学术界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是有益的。

预祝会议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 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

朱 乔 森

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们隆重地纪念他，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钊同志不但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 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 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李大钊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伟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70多年前，是他，在占世界人口近1/4的中国大地上，首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认定中国和世界最终必将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坚定地预言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①</sup>并立即高擎起这面旗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国情、同我国人民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展开了坚强不屈的斗争。从此，开始了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第一个硕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李大钊，深刻地论证了我国共产主义者“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的必要性，深刻地论证了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03页。



党”，“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才“有所附托”<sup>①</sup>，并最早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总之，是他首先发起并与陈独秀等一道，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中国有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坚强领导，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并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也才有了此后和我们今天的一切成就，中国人民才有了光辉灿烂的未来！

这一切，同作为创始人的李大钊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正因为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这种重要地位，纪念他也就不仅是肯定他本人，而且是肯定他所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

李大钊虽然由于过早牺牲，从事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对说来较短，但他的贡献是非常全面的。

例如在建党实践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相当确切地知道：从我国东北到陕甘、从内蒙古到河南的各省区，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乃至许多县份的农村，几乎半个中国的党组织。最初都是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或者由他派人去做工作，或者在他直接影响和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开创和领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方面，在培养、教育、训练党的大批干部以至创建我们党的第一所党校方面，我们现在也有更充分的材料说明，他做了大量工作，实行了正确的领导并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他是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卓越实践者，不仅是对首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的、关键性的贡献，他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军，对郭松龄以至吴佩孚、阎锡山等人做过许多工作。他对吴佩孚等人的工作，尽管党内曾经有过不同认识，但现在看来，在理论上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策略的原理的，在实践上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或北伐战争的胜利是起过有利作用的。李大钊也是我们党最早重视军事工作的领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44页。

领导人之一。他在1925年就强调我们党要抓军队，并派遣了许多干部去学军事，做军事工作。他还对国民军的改造及其军事行动提出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议，国民军采纳这些建议后，既在强敌面前巩固和发展了自己，又更好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大钊同志历来主张“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sup>①</sup>。这也是他本人工作态度的写照。党成立后，他一面遵照党的决定，继续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和社会声望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一面的确扎扎实实地做了令人吃惊的大量工作，不事喧哗地在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评价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时，必须注意到的。

在思想理论方面，现在，几乎对李大钊各方面的思想都有了专门的研究论文。例如他关于我国民主革命和未来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主张，他的社会经济思想、民主自由观、法律观、真理观、伦理道德观、宗教观、中西文化观、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思想、婚姻和妇女解放的思想、教育思想，乃至史学、文学、美学思想等等。综合各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正象有的同志所指出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教条主义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也曾有过一个认识过程，并非所有的介绍和论述都是很精确的，对个别原理也曾有过误解，但他从一开始抓住了其中最重要的东西，例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等，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结合当时的时代环境来加以研究、辨别和应用。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较早地提出我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当先锋，并认真付诸实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实际上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并较早地提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762页。

出农民是我国重要的革命动力，和组织贫雇农、依靠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主张。在上面提到的许多理论、思想领域，他也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过在我国可算是开创性的研究。总的来说，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我国民主革命作过宝贵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和其他许多方面也有过精采的论述。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有他一份宝贵的、开拓性的贡献。从这一角度来看，他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自应有其重要地位。

过去，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时候，不大可能实事求是地肯定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例如康生就曾把表现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用同描写或表现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对立起来，把后者说成是企图用别人来同毛泽东“分庭抗礼”，是有意贬低毛泽东的作用。更不用说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对李大钊的种种诋毁诬蔑了。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允许表现和肯定一个人，这不仅是一种违背历史的反科学的态度，对于坚持我们党和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并用这种传统来教育人民，也是十分有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上述禁区基本上不复存在了。但是，由于近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不少人对什么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思想，什么革命传统，什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理想和品德，不感兴趣，不屑一顾。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把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对立起来，似乎只有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才能“救中国”。这又给宣传李大钊、学习李大钊，也给实事求是地肯定李大钊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造成了新的困难。面对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面对几个月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暴乱，全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深感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不可丢，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优良传统还须大大发扬，其中包括用李大钊这样的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想、品德、事迹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教育青年。在当

前的政治形势下，根据已有的较充分的材料和研究成果，进一步肯定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先驱者的李大钊的重要历史地位，以便更好地宣传他、学习他，坚持他所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客观的需要。

## 李大钊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而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我们的启示

李大钊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正面临着被进一步瓜分的危险的年代。亡国灭种的危机，严重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卧榻之侧，有他人鼾睡之声；独立之邦，伏列强割据之迹。<sup>①</sup>”“国社为墟，种族随殄”的危险，使人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空山已无歌笑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sup>②</sup>李大钊的家乡，在交通比较便利、信息比较灵通的沿海，外出经商的人多，他从小就听到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中国人受洋人欺辱等痛心的历史故事，和乡亲们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种种议论。11岁那年，八国联军更侵至他的家乡附近，占据了昌黎、滦州等地，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蛮横侵略有了切身感受。学生时代，他又进一步了解了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的历史；尤其是在日本，他目睹对方把从中国掠夺去的物品，摆在某军事陈列馆中，“夸为国荣”；“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sup>③</sup>尖锐的屈辱，使他“不胜国家兴亡之慨”，深感必须“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争取民族的解放。到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更是“泣血陈辞”，“愿为国死”，“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16页；第123页；第122页。

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sup>①</sup>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反抗，尤其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即李大钊早年所说的“仁人义士”，“相率奔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言之者瘖口啞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量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无时不与此贼民之徒，相激战于黯黯冤愁之天地中”<sup>②</sup>，又给李大钊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他立志以这些先进分子为榜样，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己任。而在其开始，只能是向西方学习。他本来就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思想的系统教育，在青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曾经是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他还接触和研究过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几乎所有新思潮，受过达尔文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影响，受过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托尔斯泰非暴力论的影响，介绍过尼采的超人哲学和英雄主义，介绍过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介绍和批判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后来又受过多梦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曾经对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形式上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抱有很大的希望，期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采用资产阶级代议制来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军阀专制割据等痼疾。直到1917年4月，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他还痛感中国“无中心势力所可凭依”，导致“分崩离析，扰攘分裂”，而主张“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即中产阶级或我们后来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笔者注）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sup>③</sup>。总之，近几年被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些人视为“新潮”的不少主张，李大钊都曾经探索过，甚至试验过。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和世界劳工阶级战胜“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15页，第4页。

<sup>③</sup> 《李大钊》（上）第454、466页。

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将来必要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消灭极少数剥削者压迫大多数“劳工”的制度；这是“只可迎，不可拒”的客观真理。

李大钊从强烈的爱国主义出发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事实，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富有教益。因为这是我国一大批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具有代表性；也因为今天有人企图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而同“全盘西化”搅在一起，蛊惑和蒙蔽一部分对中国历史知之不多的青年。李大钊这一选择至少给我们如下启示：

首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确乎是救中国的真理。如前所述，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绝不是什么教条主义的结果，更不是什么盲目性的结果，也不是迎合中国或外国的某些势力。他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选择，是在多数人都还相信西方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结合时代环境，结合中国国情，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的结果。他历来主张人生的最高目的在求达于真理，认为“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sup>①</sup>他对真理的热爱，追求捍卫真理的热诚，不但丝毫不亚于那些自诩为追求真理，实则以追随西方文明为荣的人，而且具有真正严肃和科学的态度。他用这样的态度对多种学说、主义进行了反复观察、反复比较、反复探索，而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首先是因为，他从亲身体验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看到，要战胜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压迫、宰割和奴役，别的学说、主义都不行，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指引下实行社会革命，最终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要翻一翻《庶民的胜利》，《Bolshev-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

ism的胜利》等名著就不难知道：他的这一选择是同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大……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大……主义”，“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sup>①</sup>这当然也包括国内的专制主义，但首先是他所例举的“大欧罗巴主义”、“大美利坚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也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殖民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他首先从这一角度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唯一能救中国的真理，不是偶然的。这同他的强烈爱国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看来，这种选择的根据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如此，不断追求真理，“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李大钊，才会终其一生，坚定不移地捍卫和实践自己的这一信仰，真正做到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同样，我国一大批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的先进分子，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认定这是惟一能振兴中国的真理，也是历史的必然。李大钊的选择也正反映或代表了这种历史的必然。从世界范围看，正如有的同志所说，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如卢梭关于“人生而自由平等”等主张，到了19世纪，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行不通，已经受到一些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批判，他们转而强调法律和秩序。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进一步暴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祸害更使人们对它日益失望。而19世纪中叶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上述原因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从我国近代历史看，自鸦片战争起，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确经历了千辛万苦，其间包含着无数次理想破灭的辛酸，也包含着无数次失败的血泪和痛苦。但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了，资产阶级改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良派领导的戊戌维新也失败了。尤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最有胜利希望的一次革命。但也正是这次革命及其以后若干年的事实，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不中用，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一套在中国的破产和行不通。日本在这时提出的二十一条，更证明了先生要宰割学生，要勾结和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本心，使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的人们不得回过头来思考。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破灭了，人们一时又看不到出路在哪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就是毛泽东当时所说的：“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苏俄的建立，使中国看到了胜利的榜样，看到了新纪元的曙光，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锐利的武器。李大钊在辛亥革命后的辛酸阅历，在他进一步认清了时代和国情；他和我国一代先进分子在一起，总结了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逐步坚定地认识到：中国只有依据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走十月革命所指引的道路，来一次彻底的大变动，才是惟一的出路。而这场大变动所需要的新的力量已经有了，正在逐步兴起。这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因此他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他最早认清了这一历史的必然，走在了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就成了时代的巨人。充分说明这一历史的必然，帮助人民和青年认清我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当前，在李大钊的研究和宣传中，是十分必要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李大钊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后的实践，虽然时间较短，但也足以证明这种选择不是盲目的，而是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因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一经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焕然一新，就使中国出现了一股崭新的力量，一扫辛亥革命后那些年陈腐和绝望的空气。仅就李大钊个人来说，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所取得的工作上、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对祖国、对人民所作



出的伟大贡献，也是前此所根本无法相比的。这难道不正是由于方向选对了？直到今天，尽管中国革命和建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中国所已经取得的、谁都否定不了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成就，中国未来的无限希望，不也正是源于当初这种历史性的正确选择吗？

## 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我们要永远学习

恩格斯在评价法国唯物主义启蒙思想家时写过：“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sup>①</sup>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祖国和人民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作出了最大的个人牺牲，那末，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

大钊同志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投身革命事业，不是从个人的解放或个性解放出发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国家民族寻找出路为己任，进而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最后又以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他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和一切为国为民的思想，以及为了高尚理想而彻底献身的精神，作为他的思想道德品质最突出的特点，不论在他是民主主义者时也好，马克思主义者时也好，都充溢在他的文章的字里行间，表现在他的革命实践的各个方面，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这只要翻阅一下他那些热情洋溢的文章，就不难深切地感到。他经常以自己微薄的收入帮助学生、帮助青年，在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更以自己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以至蔡元培校长不得不把他家每月生活费扣下，而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他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地。为了革命，为了救中国，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同我国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真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的确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殚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这正是他能够从各种错综复杂的思想影响中，在中国首先找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真理的一个根本的“内因”。他能够在被敌人逮捕之后，在严刑逼供和生死考验面前，写出《狱中自述》那样的无产阶级正气歌，直到在绞刑台上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也绝不是偶然的。在他的身上，才真正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统一。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李大钊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宣传他的崇高理想和品德，使广大共产党员以及广大人民和青年更清楚地知道有这样一个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榜样，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不少接触过李大钊的人都回忆：他平时为人谦和、诚挚、在小事上，在涉及个人名利地位的事情上能忍让，从不跟别人闹个人意气，从无半点宗派气，因而能极好地团结朋友和同志。但在涉及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和革命利益的事情上却绝不退让。为此而不怕得罪权贵、老友甚至当时的整个上流社会。这从他同研究系的决裂，对胡适的批判，和跟白坚武的断交等，都不难看到。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两句，可作为他这方面高贵品格的写照。

最后，李大钊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对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对我们传统民族文化中精华和糟粕的态度，也是对我们极有启迪和教育意义的。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勇猛战将之一，确实是思想解放的先驱。他毫不留情地、深刻彻底地批判了对孔子等人的迷信，批判了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还批判了封建专制和割据，但他在彻底批判封建文化时，却绝不整个地否定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我们民族文化中那

些优秀的东西。他批判旧的“白首之中华”，但同时就鼓励人们满怀信心地去创造新的“青春之中华”。因此，阅读他这方面的文字，绝不会使人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相反地，只会受到他的“青春之气”的强烈感染，以更充沛的爱国主义精神去努力创造我们民族的未来。李大钊也曾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学习西方文明中那些进步的东西，但是他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輊于其间。”<sup>①</sup>他还引述一位美国教授的话说：如果将有一个民族能在世界最后的各民族中占一大部分的话，“其惟中国人乎？”因为，其数量之众，忍苦之强，爱重平和之切，人格品性之坚，智力之优，和适应最高道德观念的能力，都是成为世界最终民族的要素。当然，这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成功地适应世界的新时代、新环境。他的这种态度，既区别于那些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妄自尊大，主张闭关锁国的人，也区别于那些全盘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盲目自卑和崇洋，而主张“全盘西化”，把西方文明奉为包治中国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这种态度，才真正体现了五四文化革命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那些抱残守阙，抱着旧的封建文化不放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而那些认外国月亮比中国圆，迷信西方的人，更不可能成为爱国者。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民族意识新觉醒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我国一代又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不少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的爱国者，都从没有否定自己民族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相反的，对自己民族文化精华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对它的糟粕的摒弃，倒是他们深沉和执着的爱国思想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的爱国思想不可能是真正牢固的。那些在作品里、发言中、课堂上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尽其诋毁攻击之能事，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到唯其马首是瞻的人，有时也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

侈言“爱国”，但这种“爱国”，很可能是虚伪的，至少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不足为训的。

让我们用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来推动对于李大钊的进一步研究、宣传和学习，来回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蚀和挑战，来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00周年！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李大钊

丁守和 李义彬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锐利武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李大钊何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他在中国传播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什么影响，这就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 (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它诞生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出现70年后传入东方古老的中国，并在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更不是什么历史的误会，而是近代中外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大钊在1918年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其客观条件主要是：

第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1840年后，中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包括像太平天国、义和团那样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和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结果都失败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无数艰难曲折，在1911年发动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的成果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理人袁世凯窃夺，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时期。各派军阀在其外国主子支持下穷兵黩武，连年内战。人民的痛苦有增无已，民族的危亡日益严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军阀统治，但斗争一再受挫。近代中国历史表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均救不了中国。中国人必须重新学习，探讨新的革命理论和出路，因而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很自然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并不是从李大钊的介绍开始。在此以前，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就在报刊上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那时之所以没有对中国社会发生什么影响，主要原因是那时中国还不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罢工斗争逐年增多。中国工人阶级自身要完成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统治着中国思想界，孔子学说束缚着人民的灵魂。辛亥革命虽然从政治上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并未触及维持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着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力地冲击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的旧思想，激励了人们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要求。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扫除了思想障碍，提供了思想条件。

第四，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对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民族解放道路的历程，作了生动、具体地叙述，他说，自鸦片战争失败后，无数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找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学习西方的美梦，革命一再受挫，辛

亥革命以后国家的情况更坏，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他还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sup>①</sup>

上述情况表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近代中外历史的发展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总之，李大钊向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取得成效，获得成功，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已具备了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

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李大钊，而不是别人，例如在新文化运动中比他的影响和声名更大的陈独秀，这也不是偶然的。从李大钊的自身条件去考察，这对他已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

第一，李大钊具有强烈的民族革命思想和热诚的爱国精神。他出生在1889年，正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并企图瓜分中国的时候。他少年时代，中国燃起了义和团的反帝怒火，八国联军也践踏了他的家乡冀东。少年时代的李大钊，即“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sup>②</sup>他中学毕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1407—1408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38—889页。

业后，于1907年考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在6年学习期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sup>①</sup>所谓“再建中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随着袁世凯的窃取国柄、共和政治的破产，李大钊大失所望，他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所以他无限感慨地写道：“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所谓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sup>②</sup>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昔日李大钊眼中应是中国学习楷模的西方列强，为了争夺殖民地，展开了互相大厮杀。1915年8月李大钊在《欧洲战事谈》中写道：“自从去年七月底奥、塞两国开衅，接后九个国家陆续加入战争团体，杀气腾腾。这一个年头，就算天没有翻，地没有覆，银子花的同雪片一般不算，那战场上更是血流成河，尸积成山。”<sup>③</sup>血的事实，使这些西方国家的形象在李大钊头脑里有所改变。帝国主义并不是普济众生的菩萨，而是杀人的刽子手。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而告终。协约国则大力鼓噪这是“公理战胜强权”。中国人也充满了幻想，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国家主权，获得独立。事实又宣告了中国人民幻想的破灭。李大钊说：“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彩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888—889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4—6页；第141页。



小民族的自由、权力，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sup>①</sup>就在李大钊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入，学习西方的幻想步步破灭时，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这个新世界的出现，对李大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尽管他对十月革命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入，但他看清了这场革命根本区别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革命的先声。李大钊热情欢呼 and 衷心拥护十月革命，自然也就接受了这场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李大钊始终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认识到群众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力量。他出生在农民家庭，自幼即同情劳苦民众，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和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写的《可怜之人力车夫》和《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他有力地揭露了资本家和工头对唐山煤矿工人的残酷压榨，向全社会尖锐地指出“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sup>②</sup>对中国广大农民，李大钊寄予深切同情。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原因就是“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去鱼肉那些老百姓”。李大钊正确地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由于他对劳动人民有比较正确的认识，提出了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sup>③</sup>的正确结论。他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sup>④</sup>李大钊深切同情劳动人民，坚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始终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这就为他接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第三，李大钊思想里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在接受马克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659页；第648—649页；第651页。

思主义之前，他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都受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退化，也不是循环，是向前发展的。尤为可贵的是，李大钊还批判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达尔文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这些观点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口实。他接受和阐发的是进化论的核心即发展的观点。正是基于此，李大钊鼓励青年们“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sup>①</sup>由于李大钊具有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革命进取精神，当他察觉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已不能挽救中国时，从而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势所必然的。

此外，20世纪初，堺利彦、幸德秋水、河上肇等已开始在日本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的著述广为流传。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

以上，就是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不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也是他在中国最早完成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原因。

## (二)

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从认识十月革命开始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象一声春雷，惊醒了正在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使他们看到了世界文明的新曙光，增强了民族解放的信心。尽管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对十月革命极尽歪曲、诬蔑、攻击之能事，中国的先进分子仍十分关注着十月革命。经过观察与研究，他们终于冲破迷雾看清了十月革命的真相。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兴起，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落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05页。

和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起而代之，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必然奋起争取独立和解放。在中国，首先具有这种觉悟的是李大钊。

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李大钊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正因如此，他在中国传播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经历了一个由不系统到比较系统，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

李大钊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是中国第一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尽管对十月革命还有一些误解，如认为俄国十月革命体现的是人道主义精神，但它正确地指出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说：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性质自异”，“非可同日而语”，“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彩色者也。”李大钊还针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诬蔑、攻击所造成的认识混乱状况，告诫人们不要以“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而应“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sup>①</sup>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仅仅半年多时间，李大钊就有如此高的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1918年11月至12月间，李大钊又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文章里，李大钊着重宣传的主要观点有：一，正确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和性质，他说：“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阶级谋利益。”<sup>②</sup>但是，战争的结局不是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72—575页；第594页。

帝国主义的胜利，而“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李卜克内西的功业，马克思的功业。所以，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sup>①</sup>二，进一步宣传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李大钊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是“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sup>②</sup>实现劳工社会。三，热情歌颂了当时弥漫欧洲的革命高潮，“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李大钊指出，世界上“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sup>③</sup>四，充分估计了劳动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巨大威力，李大钊指出，20世纪的群众运动是“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并说“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sup>④</sup>五，宣告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要在全世界胜利。李大钊满怀信心地说：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⑤</sup>

从1918年末到1919年5月，李大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98—599页；第599页；第602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在上述文章中传播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1919年5月以后，他基本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

李大钊首先在《晨报》副刊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载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部分的摘译和《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文等。接着，他又利用分担编辑《新青年》六卷五号的机会编成了“马克思研究号”。这个专号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公开宣称：“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因此他要把“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介绍过来，使中国人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在这篇论文里，李大钊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他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和阶级关系，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学则阐明了“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原理观察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进行分析研究，预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然后又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强调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通过李大钊的这些介绍和宣传，中国人开始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

无庸讳言，李大钊当时在宣传中，也有一些误解和不确切的地方，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如他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孔德“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新理想主义“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sup>①</sup>等。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里，他也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看作是互相补充的。出现这些失误主要是理论准备不足造成的。那时还没有一本经典著作的全译本，他虽然可以从英、日文译本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得不从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中来了解马克思主义。“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十分活跃，各种思想纷至沓来，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等，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因此，先进分子受这样那样思想的影响，在宣传中出现一些失误或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大钊能够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以崇信的态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正表明他已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受到反动派的敌视和压制。反动政府诬蔑马克思主义是“过激主义”，咒骂共产主义是“洪水猛兽”、“共产共妻”，并下令“查禁”、“取缔”。但是，真理的声音是任何暴力也遏止不住的。李大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反动派的诬蔑和迫害，他表示任由反动派乱加罪名，进行迫害，我们还是相信自己的主义，“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胡适，也站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胡适的谬论，强调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67页。

改造，并号召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进行实际斗争，引导群众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实际上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之争，也是要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斗争。围绕着这场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分化：胡适等人坚持走改良主义道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争取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走革命的道路。

### (三)

李大钊转变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不仅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还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讨和正确的阐述。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可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毛泽东说，中国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的。李大钊就是最早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从经济关系入手剖析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他一针见血地揭穿日本高唱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它“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sup>①</sup>李大钊指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本质，“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sup>②</sup>李大钊系统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指出：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被那些帝国主义践踏摧凌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639页；第610页。

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还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就提出：我们不仅要反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和日本侵占山东，还要“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即要打倒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帝国主义标榜的“公理”、“正义”、“民族自决”等口号，李大钊说，这不过都是骗人的招牌，“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sup>①</sup>帝国主义貌似强大，实际是外强中干，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李大钊郑重宣告：“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sup>②</sup>李大钊强调把外国的帝国主义者与其工农群众分开，反对狭隘的排外仇洋思想，提出要教育群众把“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sup>③</sup>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早在“五四”前夕，李大钊就认识到中国是农业国，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教育和发动农民。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身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他们的革命性很高，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李大钊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sup>④</sup>李大钊把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他说，要解决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sup>⑤</sup>总之，

①②③④《李大钊文集》（下）第112页；第111页；第873页；第334页。

⑤《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



要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李大钊还对农民的组织 and 武装问题，作过不少论述。

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革命统一战线，这是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一个重要法宝。对此，李大钊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热情称赞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高度评价其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说他“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sup>①</sup>对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的行动更为称赞，说他把“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是何等的伟大！”“是何等的重要！”<sup>②</sup>李大钊同时也指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缺点很多，成份复杂，无组织无纪律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所以，对国民党我们要帮助他们，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李大钊说：“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sup>③</sup>

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能否掌握领导权。李大钊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最初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他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1923年8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sup>④</sup>1924年2月7日，他在广州的演说中说：“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48页；第778—779页。

<sup>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72页。

有无产阶级。”<sup>①</sup>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要争夺领导权的思想，他说：“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sup>②</sup>

总之，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使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探索，作出了精辟论述，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第780—781页。

# 正确理解和评价李大钊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

朱 成 甲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李大钊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人物，他首先使人们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伟大意义，从中找到自己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他首先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清只有依靠这个科学真理才能指引自己不断前进，去夺取最后胜利；他首先培育和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并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早联系起来，从而促使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日诞生。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李大钊不愧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

李大钊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打算就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贡献，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以纪念这位伟大历史人物诞生一百周年。

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李大钊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杰出的一个贡献，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李大钊最早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虽然谈论较多，而对于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却还研究很少。因此，有必要谈一谈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 一、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关系到革

命成败的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长期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通过历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在毛泽东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在和李大钊同时代人的比较当中，还是首推李大钊更正确一些。

在党成立之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居于党的最高职位，但他却并没有解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种种材料证明，陈独秀当时虽然比其他一些后辈年轻人多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从总体上看，他不但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也没有积极地倡导和推动人们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在陈独秀看来，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很容易的，系统不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很重要的。

1922年5月，陈独秀在广州的纪念马克思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就突出地暴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态度。他不但不鼓励和引导青年首先重视并下苦工夫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反而希望青年同志们“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他说：“凡能实际活动者才可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sup>①</sup>。

陈独秀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干革命运动割裂开来，认为“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反而可以“多干”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认为只要能从事于“实际活动”就能干革命，而不必多懂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引导方向，自然不可能形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浓厚空气，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也不可能较快地得到提高。很显然，陈独秀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庸俗的、轻率的，政治实用主义的及狭隘功利主义的。

在陈独秀的错误态度影响下，再加上中国社会本身就有滋生

<sup>①</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177—17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和泛滥陈独秀这种错误思想的深厚基础，以致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虽然迫切地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但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根本不被重视，使革命理论长期严重落后于革命实际运动。与此同时，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却随意拿起片言只句，无知狂妄地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大约在1923年以后，那种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气就逐步流行起来，而陈独秀远在1920年9月，就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sup>①</sup>。按照通行的理解，陈独秀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者”，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是共产主义者。其实，当时越是轻率地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越是并没有真正下苦工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称得上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不健康的风气，直到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以后，才得到根本的纠正。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倡导者。他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长期地、虚心地、刻苦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谁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尽毕生的精力。他说：“拚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只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sup>②</sup>他教导人们：“研究马克思的学说，须得先把他的重要著作《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起来。”<sup>③</sup>他希望人们在听自己的演讲之后，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引起点兴趣”，从而“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sup>④</sup>。他反复申明，自己谈马克思主义是“僭越得很”<sup>⑤</sup>，只“不过稍微知道一点”<sup>⑥</sup>。事实证明，李大钊直到他生命结束，从来也没有自我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复告诫人们，千万不要相信那种轻易宣布自己

① 陈独秀，《对于时局的我见》，《新青年》8卷1号。

②③④⑤⑥ 《李大钊文集》（下），第46页；第633页；第547页；第43页；第547页。

是懂得马克思主义的那种“骗子”论调与“欺人之谈”！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李大钊与陈独秀存在着多么重大的差别！与那些浅薄幼稚而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存在着多么重大的差别！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重视解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的是毛泽东，在全党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我们从毛泽东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怎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更高的水平上被继承和发扬光大。轻视和否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人总是借口实际活动的重要性而片面地轻视革命理论。从这种倾向出发，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评价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相反还会认为他太学者化，太书斋化了！其实，李大钊虽然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刻苦研究，却并不轻视也没有妨碍他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是党的历史上最早倡导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人，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人。从党的历史来看，轻视理论（按：“左”倾教条主义者虽然最爱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不表明他们真正尊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贬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的倾向，往往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中国丰富生动的、成功的革命实际运动长期不相称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走过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多的代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自然又是和中国的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客观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象李大钊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人，实在太少，而不是太多；相反，象陈独秀那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人又实在不是太少。因此，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就显得特别可贵。我们必须对他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评价。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相一致的，是建立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刻苦学习与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明显地有他个人的特点。认识和评价李大钊这种个人特点，是不容易的。本文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所以只能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以期引起读者进一步去思考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学说，它有自己“完备而严整的”（列宁语）的科学体系，在原本上有它的客观内容，是一种客观存在。但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又必然要通过人这个媒介，必然要通过人的各种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这样，经过各个人自己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完全同于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经过各个人的主观而带上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这种带上各种不同主观成分、带上不同时代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正在发展流动中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从学术观点看，从学术发展史的观点看，一种学说从文本到现实必然要经过这种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虽然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一种科学理论而出现的，但它又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而是具有很强的阶级性、政治性与实践性的理论，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社会运动、政治权力与组织制度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对它的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以及评价，就必然不能完全以学术观念为转移。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来说，学术上的科学性才是最主要的，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sup>①</sup>。所谓正确，自然是指反映一种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指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反映。但是，当人们判断一种活的马克

<sup>①</sup> 《列宁选集》（二）第441页。

思主义理论正确与不正确，是符合或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时，由于上述的特点和原因，政治的因素往往会起着主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性与科学性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就需要经过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在这两者之间要想解决好，历史证明是很不容易的。

原本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是世界统一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但各国不可能完全统一，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内，也会因时、因人而异。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选择、运用、阐释与评价，都大体上是照搬苏联的，是大体上移植了苏联共产党人在苏联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所理解、选择、运用与阐释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而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判断一切理论或事物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的是非标准。这种情况，直到确立毛泽东为全党的领袖之后，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所掌握之后，才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我们在理解和评价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之前，所必须首先明确的。

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第一，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尚未被泯灭的文化气氛（这种气氛基本泯灭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时期，在毛泽东领导全党后又逐步重新得到恢复和弘扬），而李大钊又是深受这种气氛浸染的人；第二，是由于在党成立的初期，党还没有建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当时迫切的现实需要，使有责任心、有条件、有创造精神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敢于并且能够做到不依傍，不等待，自己站出来去积极回答现实需要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离开以上所述的两个主客观的条件，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会出现。

正是由于以上这种情况和原因，李大钊理解宣传的那种马克



思主义使我们后来人在理解和评价上遇到困难。第一，它不同于当时照搬苏联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第二，它也不同于后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系统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他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当中，除去与上述两者在基本点上完全一致和相通（请注意：这是最主要的！）之外，还提出以上两者所没有的、所忽视的、甚至所排斥的某些观点和问题，并且把它们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或与马克思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地位，来加以比较、分析或批评。有的是他从特殊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系统地深层次地、远距离地去回答现实中某些问题。李大钊的这种做法，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因此，如果用一种简单的流行的现成标准去对他进行评价，就必然使人有一种似是而非、粗疏武断之感。因此，我们必须改进这种研究方法。

对于李大钊在当时条件下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在理解和评价的时候，我认为应该至少注意三点：第一，首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所谓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自然是指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忠于它的精神实质；第二，应客观地面对现实，立足于现实，对现实的需要作出深刻的本质的考察；第三，应对照已被实践所检验的党的历史经验。以上三者，应尽可能统一起来。

如果上述的三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有以下三点最值得我们重视，最能体现他个人的远见卓识与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和实事求是学风。

**（一）从一开始就注意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开一个好头**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首先表现出特别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即忠于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并力求面对中国的现实，从一开始，就使中国人民对于这一伟大学说有一个完整准确的了解，从而保持这一学说的科学性与神圣性，为马克思主义今后的

传播与胜利，开了好头。他1919年5月（按：这是指预定发表的时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作。

在李大钊以前，中国自然已早有人提到马克思及其某些理论主张，但是，中国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来宣传，却是从李大钊开始的。

1918年，李大钊先后写了关于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虽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理解密切相关，但这还不是他自觉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只有一篇直接提到这场革命“是奉德国社会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sup>①</sup>，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他却并没有着重去阐述。也可以说，李大钊在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尚未作出较深入较系统的研究与了解之前，他是不愿意轻率地或孤立片面地去大谈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理论的。而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面对一种新的时髦学说，采取这种轻率态度的人实在并不罕见。李大钊在他写欢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准备，才在适当的时机（五四运动的高潮中）、适当的场合（《新青年》马克思专号）以适当的内容形式（系统的专题研究论文），向中国人民极其庄重地介绍了这一代表世界新潮流适应人类争取彻底解放的崇高理想和新需要的新理论。必须认识到，李大钊这样做决不是随意的、偶然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审慎选择的。也就是说，李大钊是在自觉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一个好头，开一个好头，是在自觉地力求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完整地而不是孤立地、深入地而不是表面地、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去介绍马克思主义，是在自觉地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比较准确完整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给中国人民留下崇高、神圣、集中人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99页。

类高度智慧而又反映人类美好理想的印象。毫无疑问，李大钊的这种选择和这种做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翻开历史，在当时与李大钊齐名的陈独秀做得究竟怎样呢？我们稍加比较就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都比李大钊要晚一些。1920年9月，他发表的《谈政治》，应视为他转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陈独秀在这里并没有像李大钊那样首先重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应持的态度问题，并没有首先向人们介绍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什么，而是以谈政治为名孤立地谈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其中一部分，即关于政治或国家的某些观点，其集中目标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批判德国社会党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他的基本结论是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也就是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

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开始，按照党早年曾经流行的那种思维逻辑，自然是最最革命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以常见的那种流行的标准为依据，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和中国的客观现实为依据，那么，陈独秀的这种选择与李大钊相比，显然不能说更正确、更革命，而是他确实确实为革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帮了倒忙。

第一，马克思主义自然十分重视政治在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重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与常见的传统的政治学的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就是它决不孤立地谈政治，决不就政治谈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和思想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并不是政治，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孤立地谈政治，就政治谈政治，对于历史和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作出深刻的科学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也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选

择以此作为开头，正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浅薄。

第二，陈独秀所谈的内容与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当时的实际需要也是根本脱节的。中国人民当时所受的痛苦是什么，中国社会当时面临的障碍是什么，多数人依靠自己的切身经验和直观感受也可以说一个大致不差，而在此之前，陈独秀也未尝不知道（如他的一些文章中所表现的反对外来的侵略与反对军阀、官僚、政客等）。但是，他这时却突然一变；认为“世界各国（着重号引者加，下同）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劳的生产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陈独秀所说的“各国”，毫无疑问是把中国也包括在内（他其后的一些文章也可证明）。也就是说，陈独秀认为中国人民当时所受的最大的痛苦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所造成的，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是劳资矛盾，全面彻底地对资产阶级，搞无产阶级专政已是当时的“第一需要”。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强调在中国反对“马格斯修正派”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可以看出，陈独秀的这种“高论”，离当时中国的现实是多么遥远！同时也不难判断，象他这样的宣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印象究竟会起什么作用！

人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情况有利也有不利，最大的不利就是，人们一开始就以一种简单的模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流行着种种恐惧症和误解。1918年7月，李大钊就指出，中国人对俄国十月革命“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认为这是“非常之祸变”，表现出“惊骇”和“恐怖”<sup>①</sup>。面对这种客观情况，如何在中国宣传俄国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实在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72页。

是真正热爱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又思想作风纯正的人所不能不慎重对待的问题。我们只要了解这样一个前提背景，就不难理解李大钊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种的宣传是多么必要和难能可贵！而陈独秀的那种宣传，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来看，或从客观形势的需要来看、从无产阶级的主观力量与战略策略来看，都不能说是高明的，正确的。陈独秀为什么这样做？应该说不仅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关，而且主要地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学风与政治品格有关。

人们知道，陈独秀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时候，就表现出思想方法与学风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他往往喜欢用故作激烈和走极端的方法来显示自己的革命性。他喜欢发表超前性的言论以惊世骇俗，以显其急进。陈独秀的这种错误的思想方法与学风，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但没有改正，而且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作为旗号，进一步有所发展。他有意无意要把革命、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渲染成吓人的样子，他的《谈政治》就是这种倾向的最早表现。其实，他这种革命性真正是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而且又极容易走向反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这种带头和开头，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曾经起过很大的消极作用。

以上是从万事开头难、开头最重要这一角度来谈的，现在，再着重从内容上将李大钊与陈独秀作一对比，看看他是怎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一个良好的开端的！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完整地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陈独秀比较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则是他1922年7月1日发表的《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距已约三年。但是，两文需要回答的问题却是基本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需要从整体上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必要先来求

教于列宁，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观点和学说体系”。马克思的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列宁指出：“在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前，必须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简略地叙述一下”。列宁就是在以上的总体把握之下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精辟简要的介绍。这就是：（一）马克思的学说（包括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历史观、阶级斗争）；（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包括价值、剩余价值）；（三）社会主义；（四）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列宁所说的第一个内容是马克思的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这里列宁谈到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是，人们要想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及其他内容，却必须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

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介绍，应该说是最完整、最准确的。我们用列宁的这种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李大钊、陈独秀等的理解和宣传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差距。

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这篇文章中也试图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一是剩余价值；二是唯物史观；三是阶级斗争；四是劳工专政；而其中剩余价值一项占全文内容大约一半。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把握与列宁的思路是很不相同的。他不是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经济学说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放在第一位。陈独秀的这种介绍，和他平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内容也是一致的。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很有影响的。1921年2月11日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

唯物史观

阶级战争

无产阶级专政”。

又说：“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sup>①</sup>

蔡和森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少地方是生吞活剥的，混乱的。把自己标榜为“极端的马克思派”本身就妨碍他科学地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他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宣传，和陈独秀是最为一致的，而且互相配合和呼应，这在他主编的《向导》报上反映得最为突出。蔡和森这里虽然首先提出唯物史观的内容，但从实际上看，他还并不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因为他把阶级斗争放在唯物史观之外，把它作为一种单纯的政治观；因为他把唯物主义史观仅看作是“在历史上发明”，而不理解它是和马克思的一般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是这种世界观在历史领域的应用。这样，虽然蔡和森突出地提到了唯物史观，但实际上他却并不确切理解唯物史观。至于在蔡和森的著述中，则更很少进一步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和陈独秀、蔡和森比较，只有李大钊的文章更接近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论述。请注意，我说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把握，而不是指其中的个别论点。如人们所知道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不是他的成熟之作，所以他在接受国外研究成果时，还没有更多地体现自己深入研究的成果，并对一些观点作出更准确的判断。这篇著作在首先论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占若何地位”以后，随即着重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在唯物史观这部分，李大钊比较详细、准确地引述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基本原理，并且进而介绍论述与

<sup>①</sup> 《蔡和森文集》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各个部分“联络起来”。他强调这种唯物史观“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现”。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从整体上说是完整的、准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来面貌的。和李大钊的同时代人相比，还没有其他人能够在这方面达到和他同样的水平。

李大钊除去重点介绍论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外，还重点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的这种逻辑顺序和列宁也是一致的。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不但介绍了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而且介绍了平均利润率论、资本说以及资本集中论。并特别指出资本主义在高度发展之后，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按照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还有第三个大部分，即“社会主义运动论”与“政策论”，因为该文的篇幅所限，暂放下未谈。李大钊已经提出但未及论述的这部分，也就是列宁所说的那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的理论。

综观以上所述，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科学论述为标准，将李大钊与其他同时代人加以比较，就不能不承认还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更完整一些，更准确一些，与列宁的论述更为一致。李大钊其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基本上就是以上述的总体把握为基础的。

## （二）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宣传

对于马克思主义，人们不但切入点不同，而且学习的重点与宣传的重点也不同。以陈独秀和蔡和森为例，他们的重点更多是在直接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而李大钊则不同。李大钊自然也极为重视阶级斗争的理论，也发表过不少关于阶级斗争的文章，但比较来说，他的重点却不在这方面。他研究宣传的重点更多地是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方面，同时，也较多地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但相对来说谈得不深。这里着重谈他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与宣传。



唯物史观是李大钊研究与宣传的重点。很显然，这是与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解以及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需要的理解有关。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与重要性，李大钊是完全明白的。无论是阶级斗争，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社会主义，离开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都不能有深刻的、科学的理解与说明。因此，李大钊虽然也重视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宣传，但他更重视唯物史观这一最为基础的理论。从现实需要来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历史性大变动当中，怎样科学地理解这种变动，怎样认清变动的历史方向，怎样更有效地推动历史的革命变动，等等，都迫切需要唯物史观这样的理论武器。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思想武器回答如何科学地理解中国社会变动的第一篇重要著作，是他1920年1月发表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是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处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中的惶惶然的中国人民的最好的开导，同时更是对于千方百计地阻碍这种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的顽固派和保守派的有力回答。因为，从唯物史观看来，象中国这样落后的社会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要想静止、平定、不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sup>①</sup>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批判那些妄图阻止社会变动与思想变动、阻止社会前进的顽固派的战斗篇章。

李大钊通过唯物史观使人们认清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样一条客观规律。认清这条规律，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毫无疑问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84页。

是一切活动最重要的出发点。在唯物史观上，李大钊特别指出经济因素的极端重要。认为“历史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唯一的物质的要件”。<sup>①</sup>李大钊强调“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sup>②</sup>这种看法，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更能深刻说明社会历史变化的实质。这与有的论者强调唯物史观的其他侧面，并把它放在最突出的地位相比，更具有科学性。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为了从根本上论证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胜利的必然性，是为了扫除阻碍这种运动的各种代表性的思想障碍，是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人们参与这个运动的自觉性。李大钊并不象有的人那样把历史与现实分开。他认为人类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所以，历史观“亦为一种社会观”。因此，批判反动的历史观，也就是间接地批判反动的社会观。反动的历史观最流行、最常见、危害最大的有：“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等等。所有这些历史观，都属于唯心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sup>③</sup>非常清楚，这种历史观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多么大的反动作用！它把人民“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sup>④</sup>使“那些永据高位有权势的人”，“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沦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sup>⑤</sup>李大钊认为，通过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反动的唯心史观，就能大大武装人民的头脑。李大钊强调指出：“这种历史观，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

①②③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66页；第363页；第265页；第362页；第363页。

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的国情(历史与现状)，是从李大钊开始的。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开路人。他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他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研究有《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等。李大钊的这些研究是开创性的，这方面的成果为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扬。

### (三) 着重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但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经过社会主义。因此，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除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疑虑和误解，使社会主义成为人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

李大钊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发表了大量的演讲和文章。除去论述社会主义在中国有无实行的条件之外，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身的各种问题，如生产、分配、交换、政治制度、文学艺术、道德风尚，等等。其中尤其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与宣传用力最多。李大钊在这方面主要说明“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sup>②</sup>他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所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

---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764页；第507页。

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sup>①</sup>

李大钊认为“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这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极特殊的理解和提法。我们从陈独秀、蔡和森等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宣传家的文章中看到，他们一开始就是特别简单地强调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的不相容性的。同时，又把无产阶级专政片面地加以强调。这在马克思主义刚开始传播，人们对它还很不了解的情况下，极容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与误解。它既没有完整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内容，也没有面对中国的客观现实。而李大钊却力求更科学地并从客观现实的情况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李大钊从来没有忽视和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区别，也没有忽视工人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的本质区别。但李大钊的理解有他的特殊性：第一，他在看到事物本质的区别的同时，还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他最反对把历史割断。——这正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最起码条件。第二，他对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也有自己特殊的解释。第三，他是从现实的情况出发的，是从中国客观需要出发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照抄照搬。

关于对德谟克拉西概念的把握，李大钊认为：德谟克拉西通常被人们译为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唯民主义等等。他经过比较，认为还是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其他则不确切。因为，民本主义是日本译语，与他们的国体有关；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但要用它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它的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民治主义的“治”，按语源含有“统治”的意思，但“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所以，李大钊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74页。

认为：“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sup>①</sup>李大钊最后选用了它。由此我们看到，李大钊对于德谟克拉西的精神的理解与我们一般常用的提法并不相同。

另外，从现实状况出发，也是李大钊思考问题的最主要的出发点。在当时的中国和世界，德谟克拉西是否已成为历史之障碍物？是否已必须抛弃？李大钊从实际出发，认为不是。1923年他说：平民主义，“在现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碍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sup>②</sup>由此可见，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不但不是资本家的“护身符”和“专利品”，而且是反抗资本家的武器。他认为“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sup>③</sup>他这样理解，若从现实来考察，也不能不认为是确有根据的。平民主义在当时现实生活中既然具有这样大的客观影响，如果偏偏反而把它置于与社会主义绝对不相容的地位，这恐怕决不能被认为是高明的。

如前所述，李大钊并不忽视或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与必要性，但是他却认为这并不足以反映社会主义全部本质属性。他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段”，而不是永久的目的。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安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590页；第588页；第589页。

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实现”。所以，“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而且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真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sup>①</sup>。他认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sup>②</sup>。这样，“工人政治”虽与“平民主义”有精神渊源，却又是更高阶级的“平民主义”。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还没有全面正确了解的情况下，有的人不是全面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而是孤立片面地宣传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这实在是不利于树立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崇高美好的形象的。这种长期被认为最革命的做法，今天拿它与李大钊的做法进行对比加以重新审视，我们应该得出新的结论。李大钊关于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的宣传，其中虽有些提法未必完全妥当，但他注意纠正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宣传的片面性，更完整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消除人们由于反动派的造谣和这种片面宣传所造成的疑虑和误解，树立美好的理想，应该说是一个特殊的贡献。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08页。

#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

张 静 如

社会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它始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达到更高层次。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社会现代化过程自然需要更长的时间。中国就是如此，当前人们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虽早已开始，但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前，一直处于被动状态。这种被动的现代化过程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抵御的力量来自四面八方，既有不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外国侵略势力，也有害怕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封建势力，还有广大的小生产者势力。缓慢发展的被动现代化步履艰难，终究摆脱不了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因此，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于是，在近代中国掀起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毛泽东描绘这个过程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象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sup>①</sup>“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sup>②</sup>为什么呢？这里有个用什么思想作

<sup>①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406页；第1407页。

指导和走什么路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sup>①</sup>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sup>②</sup>这种思想上的主动，主要表现为先进的人们认识到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使人民当家作主，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中国革命的主题，正在于此。所以衡量现代中国历史人物的作用，应该考察其现代化意识之强弱，考察其对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的贡献之大小。

在著名的历史人物中，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应该说比较强，这可以从许多方面得到印证。

民主观念是现代化意识的重要表现。它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近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基本的国家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不断调整、改革统治形式，使民主制度逐步完备和系统化。中国先进人物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过程中，首先就把精力放在追求民主制度上。所以，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传播成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执著追求者，是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积极宣传者。他说：中国人对于民主政治的要求，“虽云较先进国民为微弱，此种政治意识觉醒之范围，亦较为狭小；而观于革命之风云，蓬勃飞腾之象，轩然方兴而未艾，则此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吾民宜固其秉彝之心田，冒万难以非去其摧凌，而后以渐渍之工夫，熏陶昌大其光采，乃吾民唯一之天职，吾侪唯一之主张矣。”<sup>③</sup>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认定：“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气

<sup>①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1498页；第1453页。

<sup>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58页。



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sup>①</sup> 1918年下半年，当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认识到“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一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sup>②</sup> 这种把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连接起来看的观点，确是真知灼见。因为本来作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民主就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从观念到制度都有继承关系，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李大钊指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sup>③</sup>。同时他又赞同把Democracy译为平民主义，以说明其广泛性。他说：“‘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sup>④</sup>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同法制紧密联系着的，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一般说来，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民主和法制的类型愈高，这种关系愈密切。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对法制问题有较多的论述。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并指出要追本溯源，消除迷信人治的根性。他还论证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强调法制要以民主为基础。李大钊说：“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sup>⑤</sup> “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sup>⑥</sup> 同时，李大钊认为，必须培养国民的法制观念，树立法制权威。他指出，中国人的毛病有两个：“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sup>⑦</sup> “是皆专制政

①②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441页；第624页；第157页；第168页；第333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71页；第569页。

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sup>①</sup>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懂得了法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制的阶级性，提高了认识，这些都说明，在法制观念方面，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不断得到加强。

同民主法制观念一样，自由观念也是现代化意识的重要表现。在李大钊的著作中，对自由的要求更强烈些，论述更多些。他把自由看作人的生存价值，并将其归结为人类历史进步的终极动力和本质内容。他说：“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价值。”“人类生活史上之一切努力，罔不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sup>②</sup>李大钊还进一步认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基石。只有自由精神发扬了，才可以说民主政治实现。他写道：“代议政治之施行，又非可徒揭櫫其名，而涣汗大号于国人之前，遂以收厥成功者。必于其群之精神植一坚固不拔之基”，“厥基为何？简而举之，自由是己。”<sup>③</sup>李大钊特别看重思想自由，认为它是一切自由的渊源。没有思想自由，社会就会僵化。他指出，在中国，要保障思想自由，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彻底肃清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的封建思想，一个是实行法治。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提高了对自由的认识，懂得了自由的阶级性。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因为它废除了私有制，废除了“统治与服属关系，”<sup>④</sup>充分发展个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李大钊说：“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分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34页；第244页；第159页。

<sup>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608页。

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的；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sup>①</sup>。李大钊从自由的角度把握社会主义制度，认识确实很深刻。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是扼杀自由的，那又有什么可追求的呢？社会愈是现代化，人的自由愈是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正是李大钊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李大钊的现代化意识表现在对封建的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态度上，显得更加突出。在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他猛烈地抨击孔子，指出其“为历代帝王制之护符”，其学说“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sup>②</sup>他认为，人应该为追求真理而生存，凡不符合真理的都可以抛弃。“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sup>③</sup>孔子的学说既然在今日已非真理。就要淘汰。“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sup>④</sup>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用唯物史观进行分析，指出社会经济的变动，必然引起思想的变动。“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化，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教堂，到处散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sup>⑤</sup>社会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一切封建的意识，迟早要彻底消失。这是历史前进的趋势，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李大钊坚信此点，正反映了他头脑中的现代化意识极其鲜明。

在李大钊对其他领域一些问题的认识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

<sup>①⑤</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38页；第183—184页。

<sup>②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第447页；第264页。

现代化意识。他在自然观方面，坚持辩证唯物论，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坚持唯物史观。李大钊强调，以往对社会历史的考察都是不科学的。只有依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理解历史。在人生观方面，李大钊反对怀古的厌世的人生观，倡导树立脚踏实地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他说：“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sup>①</sup>在恋爱、婚姻、家庭方面，李大钊提倡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他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sup>②</sup>如果家庭不建筑在两性之互爱的基础上，“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诟，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sup>③</sup>。对于家庭结构，李大钊主张小家庭制度。“吾人理想所组织之家庭，除夫妇及子女未婚嫁者，可以同住，子女已婚嫁者，亦宜别居。”<sup>④</sup>就是在这种家庭中，也一定要贯彻平等精神，即男女平等，大人与小孩平等。在李大钊长期从事的图书馆工作中，也体现了他的现代化意识。他立志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办成符合“新趋势”的图书馆，提出增加复本，实行开架式阅览。他认为，图书馆员一定要经过专业训练，主张在大学里办图书馆专业，培养更多的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图书馆日趋现代化，才能使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发挥得更好。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主张上所反映出来的现代化意识。因为它涉及如何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的道路问题，正是在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64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79页；第455页。

④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人们学习西方陷入困惑的时候。李大钊作出新的选择：引进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为使中国社会转向主动现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随后，他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一起，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艰苦战斗的历史进程。李大钊强调，要使中国社会现代化，不能靠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sup>①</sup>李大钊认为，要实现社会现代化，就必须先除掉政治上的障碍，这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说：“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所以，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sup>②</sup>李大钊坚信，中国的革命运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他说：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要依“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sup>③</sup>。正是在这个清除实现社会现代化障碍的伟大政治斗争中，李大钊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总之，李大钊对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虽然牺牲较早，未能在扫清政治障碍之后再作贡献。但却以自己的现代化意识培育出众多的革命精英，使之成为推动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骨干。

当考察李大钊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贡献时，不能不注意到在他的头脑中还存在着不少非现代化意识，不能不看到这些非现代化意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消极影响。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志，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一切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的现代化，都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之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55页；第776页；第711—712页。

上。所以，考察人们的现代化意识，必须注意其生产力观念的强弱。李大钊在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时候，就忽略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只着眼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似乎只要民众有了觉悟，建立起民主共和国制度，国家就可以独立、富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逐渐懂得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他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使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为主动。”“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sup>①</sup>这段话，虽有不确切之处，但基本上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的观点。它说明李大钊的认识确有很大提高，在以后分析问题时特别注意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问题是他对“生产力”这一“最高动因”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当单纯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一般都提到生产力的作用，但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往往就把它遗忘了。特别当思想界某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责难的时候，为了反驳的需要，不得不迴避有关“生产力”的问题。本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只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才有了微弱的现代工业，生产力极为低下；资产阶级力量很单薄，无产阶级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9页。

队伍人数甚少，质量亦不高。就革命阶段而言，民主革命的任务远未完成，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对此，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分析，可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可是参加这次论争的过程中，同当时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不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依据，建立在新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的基础上，而认定只要存在着剥削和压迫，就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无法回避之时，则把整个世界的条件当作依据来分析。李大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在此文中，他强调：“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sup>①</sup>间接的资本主义压迫，本来是中国应该进行反帝的民族革命的依据，却硬要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实在有点强词夺理。当然，李大钊在有的文章中，如《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也提到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综观其整体思想、生产力观念是比较淡薄的。忽略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出现的一定程度上走形的重要表现。这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过程，特别对夺取政权后逐步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能不产生消极的影响。

忽略生产力，就不能不使李大钊所追求的理想，带上空想的、感情的色彩。在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误解，要以互助论作为补充。于是，李大钊提出“少年中国”的理想。他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sup>②</sup>精神的改造，指的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使人人都把‘人’的面目拿出来对他的

---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5）第454页；第42页。

同胞；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动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物质的改造，指的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sup>①</sup>李大钊认为，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造运动，必须到山林村落里去。在那里，对农民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人道主义的信徒，变老村落为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sup>②</sup>显然，李大钊向往的不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平等”、“互助”的社会，这完全是一种空想。接着，李大钊同胡适等一起，支持工读互助运动。这是一种试图通过半工半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运动，是力求摆脱现实黑暗环境实现新生活的运动。李大钊认为，只要人人都“尊劳”，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什么痛苦。所以，知识分子应该边劳动边读书，不能只读书不劳动。“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sup>③</sup>对于这次运动的具体做法，李大钊仍坚持应该到农村去搞。在北京工读互助团趋于失败的时候，李大钊说：“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sup>④</sup>李大钊厌恶城市，偏爱农村的观念非常突出，这也正反映了他的非现代化意识。不久，北京工读互助团宣布解散，其他各城市的类似的组织也相继停止活动。工读互助运动的失败，恰恰证明它纯粹是一种空想。以后，李大钊明确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当作理想，并懂得只有“取革命的手段”夺得政权，才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过，他对社会主义的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43页；第44页；第44页；第212页。



说明，除有时讲到经济组织外，多侧重于自由、幸福等方面，用感情去理解，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他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sup>①</sup>在转入现实斗争后，李大钊的理想中仍没有能够完全清除空想的、感情的色彩，这不能不给后继者留下不良影响。

李大钊的非现代化意识，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不再枚举。问题是为什么在努力追求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最高的现代化意识的李大钊，还有许多非现代化的意识呢？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虽与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不同，受过民主主义的熏陶，一部分人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但他们毕竟生长在中国的土地上，难于逃脱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的影响。在旧中国，占主体的社会意识是封建和小生产者的意识。而两者又集中表现为农民意识，渗透在各阶层人民的意识之中，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李大钊生长在农村，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受农民意识的影响较大。他忽视生产力，易于陷于空想，恰恰是落后的、狭隘的小生产者意识的反映，是农民幻想改变现状而又要求不高、目光短浅的反映。这些意识隐藏在李大钊的头脑中，使他在接受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现代化意识时，不能完全从本意上理解，因而不可避免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走形，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不以李大钊的主观愿望为转移。这种意识上的缺陷，只有在实践中，在理论的学习中才能克服。事实上，李大钊在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实践中，不断克服着自己意识上的缺陷。不幸，他过早牺牲了，没有来得及达到意识再升华的境地。

李大钊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现代化意识的倡导者，是为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而奋斗的革命家，他的贡献后人要牢记，要纪念，要颂扬，以便使他提倡的而尚未实现的好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74页。

思想得以继承，但他意识中的缺陷，后人也应该弄清楚，这对提高认识，实现社会现代化是有益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 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先驱

王 秀 鑫

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虽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中国没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先进的中国人，曾经以为废除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救国救民的最佳方案。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李大钊是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

### (一)

中国历史发展到近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曾把资本主义看成理想王国。开始时一些中国人把注意力局限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主张在中国振兴企业、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以“富国强兵”，介绍一些自然科学知识，根本不触动中国封建专制的统治，结果失败了。到了19世纪末维新运动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书，并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和《救亡决论》等文，系统地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幻想依靠反动统治阶级变法维新，结果又失败了。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的著作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书，

都翻译成中文出版，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成为中国思想界要求革新的人士所关注的问题。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努力奋斗。辛亥革命是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28日，成立了以林森为议长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代行议会职权。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榜样，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国家的权力、政权组织形式和公民的权利等，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这时，许多人对它抱有很大的期望。李大钊对刚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也抱有很大希望，以为它可以“进于建设，隆我国运”<sup>①</sup>。

辛亥革命后，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出兵向革命党要挟议和，一面威胁孙中山让位，一面挟制清帝退位。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向袁世凯妥协让步。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袁世凯篡夺。这时，熟悉西方政治制度的宋教仁，迷信权威集中于国会，致力于选举运动。国民党在选举中果然取得国会的多数席位，他企图成立政党内阁，以制约袁世凯。可是，就在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刺死于上海。同年10月6日，由于袁世凯在国会中成立“公民党”，操纵选举，又当上了“正式大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竟公然解散国会。3月，袁世凯召开约法会议，另订新约法，于5月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仍然打着民国的招牌，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扩大总统权力，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页。

规定大总统不需经过国会即可处理外交事宜和任免官吏，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加强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人们气愤地说：“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李大钊在1913年写的《大哀篇》也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sup>①</sup>

袁世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13年9月，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赴德国，德皇威廉二世同他多次密谈，建议袁世凯“挟大总统之权威，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sup>②</sup>在国内，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公然散布中国“民俗重视家族，淡于政治”，“人民生计至艰，无参究政治之能力”<sup>③</sup>等论调，主张恢复君主专制政体。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换取外国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12日，他申令恢复帝制，承受帝位。12月31日，袁世凯宣布于1916年元旦废除民国纪元，改为“洪宪元年”。这年3月22日，由于全国反对，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袁世凯忧惧死去。然而代之而起的，却是大大小小的封建军阀的统治，他们各霸一方，大军阀以“武力统一”相号召，小军阀则以“保境安民”相对抗。不但民主共和国看不见，且政治更加险恶，列强入侵日益严重，各个军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争夺地盘不断发生战争。军阀间的连年混战，为害人民，国家的元气丧失殆尽。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忧国忧民的中国人，感到国家没有出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成了问题。一些人愁眉锁眼，悲观失望，个别人甚至走上愤世自杀的道路。但是，李大钊毫不灰心，重新探索中国的未来。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② 刘禹生：《世毅堂杂集》，《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111、112页。

他从研究中国的国情入手，于1914年11月发表《国情》一文，批评日本人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关于在中国实行总统内阁制和君主立宪制之说，他强调中国的国情，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认识，而不能依靠外国人。他指出“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sup>①</sup>，外国人所论的中国国情，只能是“皮相之见，不叶于实象”<sup>②</sup>，而且他们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李大钊初步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认为外国列强的入侵，是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的一个根本原因。他说，“中国海通而后，亦竟立于列国之林，财政用途之扩张，不惟不能独异，而以屡逢创挫，国力益微，养兵赔款，穷索编氓，继新以来，负担益重。”<sup>③</sup>

在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后，李大钊立即于1915年6月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必将使中国“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sup>④</sup>。同年，李大钊还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中国的矛盾和斗争必将更尖锐和激化，中国将处于国无宁日的境地。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呱呱堕地之中华民国，遂无安枕之日”<sup>⑤</sup>，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必将卷土重来，侵略中国，中华民国将“沦于万劫之深渊”。<sup>⑥</sup>

在袁世凯扼杀资产阶级共和国，公然复辟帝制的情况下，李大钊号召中国青年为创造青春中华努力奋斗。1916年3月，他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明确指出“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坚决主张把复辟君主专制之徒“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sup>⑦</sup>袁世凯垮台后，李大钊于1916年8月15日在《晨钟

①②③④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113页；第110页；第111页；第139页；第118页；第121页；第175页。

报》创刊号发表了《“晨钟”之使命》，指出袁世凯已被“护国义军穷迫以死”，强调“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sup>①</sup>。

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青春》一文，他指出：“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赧赧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sup>②</sup>1917年10月15日，李大钊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此日》一文，恳切地指出：“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为了创建青春中华，希望人们克服困难，奋发图强，“期于必达，勿稍息荒”<sup>③</sup>。

李大钊为创建青春中华的决心非常大，然而新的道路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踏上，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他还提不出解救中国的新方案。

## (二)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炮声，震动了全世界，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工农劳动人民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给处在迷途中的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从此以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已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而且有了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案。这场革命使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发生了动摇和怀疑的中国先进分子，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对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感到十分新鲜，从资产阶级革命方案的狭小圈子里跳了出来，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新世界的前景。

十月革命的胜利强烈地刺激了李大钊，他很快地把注意力转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从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中，探索解救中国的正确道路。从1918年7月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81页；第200页；第514页。

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论文，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他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轨迹。

第一、他从长达四年之久的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sup>①</sup>。基于这个认识，他看清了日、美两国的帝国主义面目。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高唱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sup>②</sup>又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所谓的“大美利坚主义”，也是“奋其全力以向外部发展”，“求逞一己之欲求，不恤以强压之势力，迫制他人，使之屈伏于其肘腋之下焉。”<sup>③</sup>可以看出，李大钊这时已把资本帝国主义看成是罪恶和侵略，不再看作是理想王国。李大钊鄙视、憎恨帝国主义强盗国家，是他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他对比18世纪的法国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革命之后，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李大钊说，“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sup>④</sup>，“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sup>⑤</sup>，“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sup>⑥</sup>

①②③④⑤⑥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第610页；第589页；第572页；第575页；第513页。



他还指出，那些对俄国十月革命“抱杞忧”的人，不懂得“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的道理：“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sup>①</sup>；“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sup>②</sup>

第三、他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李大钊说，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潮。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③</sup>他还强调，“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sup>④</sup>，“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sup>⑤</sup>

第四、他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是一种更新更先进的制度，但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必须经过许多艰难险阻。他说：“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

---

①②③④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572页；第575页；第602-603页；第595页；第608页。

不要逃避的。”<sup>①</sup>

第五，他认为中国人民应当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前进。李大钊指出，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潮流的到来，“是祇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sup>②</sup> 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应当“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实行民族自决主义”<sup>③</sup>。1919年元旦，他撰写的《新纪元》一文，发表在1月5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号上，明确提出：“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sup>④</sup>

上述情况表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已迎着风浪，迈开大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在这个时候，李大钊的决心还主要是建立在对世界新潮流认识的基础上。至于对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诸如革命的对象、革命如何进行等问题，在他的文章中论述还不够明确。后来随着中国革命风暴的到来，推动他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

### (三)

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在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李大钊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斗争中，对于中国革命怎样才能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他作了具体的回答。

第一、李大钊进一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弱小民族的本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611页；第608页。

质，提出中国人民必须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坚决地反对世界帝国主义。1919年5月18日和26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先后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太上政府》等文，明确指出，“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做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强盗政府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我们反对欧州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sup>①</sup>他强调，“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日本人要我们的山东，政府答应送给他……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sup>②</sup>“我如今才晓得东交民巷（按：当时帝国主义各国驻中国使馆的集聚处——引者）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sup>③</sup>他毅然决然地说：“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sup>④</sup>

第二、李大钊倡导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19年5月、11月，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辩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

---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第3页；第5页；第3页。

也不是决无裨益的事。”<sup>①</sup>这篇论文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此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北京大学的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社会主义与社会活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一帆风顺的。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反击胡适的进攻。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sup>②</sup>又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sup>③</sup>他还明确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sup>④</sup>这次争论实质上是中国革命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之争。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 第三、李大钊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思潮曾一度影响中国，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工读互助团”一类组织，参加者把个人劳动收入作为团体共有财产，个人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团体开支，先进青年把这样的组织视为创造新社会的开端。李大钊曾赞助过它，但很快看出，在不触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反动统治的情况下，这种

<sup>①②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6—47页；第32页；第35—36页；第34页。

无政府式的小团体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1920年4月，李大钊在《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一文中明确指出，工读团这类组织，不仅不能解救中国，且“精神上已不能团结，经济上也不能维持，看看有消灭的样子。”<sup>①</sup>各地工读团相继消失的实践证明，要使国家和民族得到解放，关键是要有一个能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核心力量。

1920年1月间，李大钊和陈独秀已经开始在北京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不久，陈独秀去上海，在南方开展筹建党的工作；李大钊在北方继续进行建党准备。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先在北京见到李大钊，经李大钊介绍，又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维经斯基向李大钊、陈独秀了解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他介绍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对李、陈筹建党的工作给予了帮助。1920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深入工人群众，创办通俗刊物，设立劳动补习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述革命道理，启发工人觉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紧密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说“各国的C派（按：指共产党人——引者）朋友，有团体组织的很多，方在跃跃欲试。更有第三国际为之中枢，将来活动的势力，必定一天比一天扩大，中国C派的朋友，那好不赶快组织一个大团体以与各国C派的朋友相呼应呢？”“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sup>②</sup>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212页；第444页。

综前所述，李大钊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抉择不是偶然的，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辛亥革命后，经历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的破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望见了救国救民的新曙光；五四运动后，坚定地走上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在纪念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重温他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将倍受教益。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李大钊是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马 模 贞

李大钊同志是一位殉难半个多世纪后仍然使人感到激动、敬仰和追怀的人物。每当谈到他的道德和文章时，便觉得斯人宛在，光鲜逾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忠贞的爱国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哀乐一生，对我国青年具有极大的影响和教育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大钊不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还因为他的精神和品德昭如日月。他对中国青年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热爱青年的拳拳之心，诲人不倦的诚挚态度，尤其是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崇高风范，都说明他确实是一位令人敬爱的、不可磨灭的楷模。

### (一)

李大钊对中国青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了高度评价，对青年的责任，作了明确的阐发。

十月革命前，作为一位真诚的爱国者，李大钊对民族的孱弱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危殆忧心如焚。他忧国之所忧，哀民之所哀，怀着炽烈的爱国激情，始终憧憬着祖国的未来，始终注视着从旧中国的瓦砾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命，始终把民族复兴、祖国富强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强调指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sup>①</sup>“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79页。

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sup>①</sup>他认为，青年的运命，就是中华民族的运命，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坚信“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sup>②</sup>呼吁广大青年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发奋为雄，再造神州。他反对青年因祖国的积贫积弱而沮丧精神，销沉意气，号召“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为“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sup>③</sup>对祖国、对时代应具有严肃的责任感。他不认为社会生活充满着重重叠叠的新与旧的矛盾，而“创新”正是青年的“特权”，是青年的责任。他热切盼望中国青年“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sup>④</sup>。李大钊这些寓意深刻的论述，对广大青年奋发向上、振兴中华，起了极大的鼓舞和促进作用。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对青年寄予更高、更殷切的期望。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从事精神改造的运动，而且要从物质改造的运动，即改造剥削阶级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我国青年奋斗的目标，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改造中国就是尽改造世界的一部分责任。据此，他强调中国青年不仅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应该和全亚洲、全世界的青年联合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全人类的解放。

李大钊对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写道：“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sup>⑤</sup>是全国学生反对卖国军阀的纪念日，是争自由求解放的纪念日。多次号召我国青年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发扬五四爱国精神，保卫国家的主权，洗雪民族的耻辱，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78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177页；第539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464页。



## (二)

李大钊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刻苦的钻研，逐步放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否定了唯心史观，接受了唯物史观。在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第一个激情满怀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①</sup>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它将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而马克思的学说，真正是拯救中国的导星。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惊世骇俗的进击之功，因而深深地吸引了对新思潮比较敏锐的一代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李大钊为帮助、引导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把该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北大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帮助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北大、女高师等校任教期间，利用合法讲坛，系统地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倘若青年学生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涌现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他最大的希望。

李大钊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经常勉励青年为国自重，为民自重，要知道怎样才能“饫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sup>②</sup>并鼓励有志的青年，离开家庭和父母，到社会实践中、到劳动群众中去锤炼自己，同时，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在他早期的文章里，初步表述了知识青年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多次鼓励青年到农村去，从事农民工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第194页。

作，开发农村，不要在都市中混日子，在官僚中讨生活，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恩惠。他恳切地指出：“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sup>①</sup>特别在他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期间，曾派遣青年党员到基层去，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运工作、统战工作、妇女工作、民族工作等，使他们受到很大锻炼，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

李大钊十分注意帮助青年树立革命的苦乐观，教导青年要认识一切物质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应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参加劳动。他说：“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sup>②</sup>，如果贪图安逸、怠惰悠闲，甚至只知吃喝玩乐，“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sup>③</sup>他还教导青年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认为“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sup>④</sup>他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sup>⑤</sup>可贵的是，李大钊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上述箴言。1927年，当他第一个走上敌人的绞刑架时，一腔正气，喷薄而出，神色未变，从容就义，用鲜血谱写了一曲音响嘹亮的生命之歌，一篇光华璀璨的生命礼赞。

李大钊一生勤于治学，勇于任事，既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勤奋的学者。他从事著述，仅有十几年的时间，却为后人留下了480多篇，皇皇百余万言。他才思敏捷，从不拘泥于旧有的结论，更不盲从而人云亦云。为了有所建树，总是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密切注视新情况，潜心研究新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掌握大量资料，力求得出新的结论。譬如，在国民革命的后期，他极为重视农民问题，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写出《土地与农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652页；第685页；第663页。

<sup>④⑤</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51页；第118页。

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著名论文。根据自己治学和工作的体验，他反复教导青年，必须具备求真的科学态度，强调指出，学知识，作工作，都应该扎扎实实，造成认真的习性，“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sup>①</sup>同时，他还鼓励青年要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应“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sup>②</sup>李大钊上述对青年的教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 (三)

李大钊毕生洁身远名，淡泊寡欲，廉洁克己，肝胆照人。他对青年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因此，人们觉得他可敬可亲。

他进入而立之年后，就身任高等学府的教授，又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同时，在国共两党中均身膺要职，是当时享有极高声誉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人才荟萃、学者云集的北京大学，连连被推举为决定学校大政方针的评议会的评议员，被校长蔡元培委以重任。但身居高位，名满域中的李大钊，从不居功自恃，在人际交往中，总是虚怀若谷，温良敦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1922年，当中共中央批评他参与签名的“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时，他立即承认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正确主张。他在几所高校任教，薪金本不算少，但为了给党提供活动的经费和接济穷苦的学生，始终自奉菲薄，艰苦朴素，不求享受，常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由于他经常为接济青年学生而预支工资，因此，有时一月的薪金

---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762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79页。

被扣得所剩无几，李夫人还要为柴米油盐的开支而发愁，以至校长蔡元培特别关照会计科，发工资时要为他扣出家庭生活费，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李大钊就义后，家中一贫如洗，丧葬费都出自朋友的捐助，连当时的反动报纸也不得不承认他“身后萧条，两袖清风”。他虽然事务纷忙，寝不安席，但经常急人所难，慷慨相助。如曾为毛泽东介绍工作，为实行半工半读的学生征集劳务，与胡适等一起为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一事辩白，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北京女高师学生李超的追悼会。此外，他诚挚热情，急公好义，还发起组织了一系列公益活动。如为家境困顿、因病逝世的朱蓬仙教授募集丧葬费，为陈独秀筹集讼费，为北方灾民募集赈灾款，筹组北大新知书社，参加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为涅瓦河两岸的灾民筹款，等等。李大钊的道德情操，受到所有人的赞扬和敬仰，甚至，包括他的政敌也认为他的品德是无懈可击的。唯其如此，在几代青年中，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始终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李大钊的高尚品德，决不是一种天生的心理状态，而是生活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他曾激烈地抨击过纲常名教、封建伦理，但并未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其言其行，继承并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爱民、不重名利、献身事业、坚持真理、刚正不阿等优良传统。他说：“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sup>①</sup>及至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和民族进行了整体性的思考，从而对人生价值、个人道德的认识，也升华到历史与哲学的高度。此后，即“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sup>②</sup>直至以铮铮铁骨，慷慨赴死，从容就义。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63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93页。

李大钊的一生是短促的，但也是饱满的，他是中国人民的良朋、忠仆和益友。他的遗篇永住，风范长存，将永远呵护和激励着我国青年“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把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

（作者单位：北京医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 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大钊同志百年诞辰答客问

彭 明

一、问：有人说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具体地说是受了河上肇的影响。这种说法被长期引用，并写进一些著作或教科书中。这种说法的确切性如何？应该如何估价李大钊的早期（十月革命前）政治思想？

答：确实有不少人的回忆录中讲过李大钊在日留学期间由河上肇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高一涵、于树德等都有过这样的回忆<sup>①</sup>。但这种说法并不确切。经查证：李大钊在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学学习是从1914年初到1916年初，而河上肇从1913年冬至1915年春去欧洲留学，不在日本，回国后担任的是国立帝国大学教授，也不是在私立的早稻田任教。特别应指出的是，那时河上肇并没有“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没有翻译过《资本论》（翻译是在很多年以后的事）。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在1918年他的著述中，“连一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子也看不到”，更“绝对找不出马克思经济学的影响”<sup>②</sup>。既然如此，那就很难说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因河上肇的影响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了。

至于李大钊早期（1918年前）的政治思想应如何估价，我和杨奎松同志在李大钊诞辰95周年时所写的论文——《李大钊政治思想演变的历史考察》中已作了分析，指出他在十月革命前是一

① 《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河上肇自传》（上）第106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带有改良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在这里，就不详谈了<sup>①</sup>。

二、问：如何估价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李大钊在1918年论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是否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李在当时已经是否马克思主义者？

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就联系来说，确实是有了“影响”，才促进了“传播”。以《共产党宣言》来说，在1919年《新潮》、《晨报》、《每周评论》等报刊上连续被人翻译、介绍、评述，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事。

我们再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引言来看：“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一九一八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sup>②</sup>。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由于十月革命的爆发，才使全世界对马克思主义另眼看待，因而在十月革命后的一年中，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介绍和传播；在这种介绍和传播中，中国人才得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sup>③</sup>。

以上说的是十月革命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传播两者之间的联

① 《近代中国人物》第二辑（《近代史研究》专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又见拙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十讲》附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新青年》第6卷第5号。

③ 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第6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系。现在再来说一说两者的区别。

“影响”和“传播”是不等同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人很多，但不等于说他们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邓颖超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五四运动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五四运动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sup>①</sup>以北大学生中的两大社团（《国民》社和《新潮》社）来说，其主要成员都普遍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他们在当时并不是都信奉马克思主义。

因此，毛泽东在论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时候，提出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概念。我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即由民主主义者（或其他什么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过渡。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称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我觉得有这样两条就可以了：第一，同情和拥护十月革命；第二，有一种“朦胧”的共产主义意识，即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这种“朦胧”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来自无政府主义或其他什么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这种意识更多地来自无政府主义，他们还不能严格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但只要有这种意识，就可以算作具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了。

李大钊在1918年论述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有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但是，这些文章，以至在1919年“五四”以前所发表的一些文章，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本身，并没有系统的介绍。因此，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至“五四”前，还是一个处于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马克

---

<sup>①</sup> 《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思主义者) 转变过程中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三、问：那么，李大钊在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呢？其标志是什么呢？

答：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应该以他在1919年5月《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标志。这一期的《新青年》为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出版时间为5月，但由于出版延期（可能由于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原因），实际出版日期在9月。但是应该估计到，刊中文章主要思想的形成，似应早于5月。所以用1919年5月左右作为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我认为是可以的。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篇文章，确实是受了河上肇的影响而写成的。日本思想界在1919年形成谈论社会主义的高潮，马克思主义的译著文章相继问世。河上肇在这时已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1919年1月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马克思学说的译著文章。中国思想界接受他的影响不小。从1919年至1922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河上肇的文章和译文达30篇次之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就是李大钊在读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之后写成的。其中，第2至第6节是把河上肇的文章“稍加整理”，“转介绍”给读者；第7节是他在初步研究了河上肇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学说后，所感觉到的几点“意见”。

李大钊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即高举这面旗帜，推动当时的舆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相继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

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

“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sup>①</sup>这一切说明，李大钊已经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四、问：有的著作和回忆录上说，李大钊在1918年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一事实的可靠性究竟如何？

答：这一史实，在我国学术界尚无定论。就我所知的一些说法介绍如下：

关于1918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文字记载，在50年代就较多地见于日文书籍。如1959年日本“中国研究所”出版的《中国现代事典》一书，说李大钊在1918年“创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见该书第717—718页）；在其附录的年表中，1918年栏内则注明：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1961年日本出版的7卷本《中国共产党史》就记载得更为详细一些，它说：“1918年，以北大教授（引者按：当时尚未兼任教授，仅是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为领导者，在该校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见该书第1卷第21—22页）。又说：李大钊“作为一个末等的教授，势力不大，但由于他默默埋头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终于同学生创立了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而仅知该会成立于1918年春，尚不能准确予以判定。”（同上书，第23页）

以上两条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如成立时间，一说在1918年，一说在1918年春，又说“不能准确予以判定”。特别是两说均未注明史料来源。因此，我国史学界对此两书的这条史料都不太重视，也多未加以引用。只有罗章龙在回忆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关于记述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中提到，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研究会)，该书附有年表，我认为它的论点是有根据的”<sup>①</sup>。

国内大陆的记载，多见于回忆录，引用较多的说法见之于高一涵的回忆，因高是《新青年》的同人，又在当时的北大任教，是李大钊的同代人。按他的说法是：“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sup>②</sup>这是高一涵在50年代的一段回忆。1964年春节前夕，笔者曾在江苏省政协（即南京前总统府所在地）访问过高，谈到李大钊的生平，他仍坚持上述说法。高于1968年1月23日辞世。据笔者所知，在生前，他并没有否定过这一说法。

持高一涵同一说法的是朱务善。朱在1960年6月20日的回忆中说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斯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sup>③</sup>据查，朱务善是在1919年进入北大学习的。1918年，他并不在北大。在另一篇回忆中，他也曾说：“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sup>④</sup>看来，朱务善的这段文字，是根

①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410页；第3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26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④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原载1957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又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3页。

据高一涵的回忆而写的。

除了大陆的一些人士回忆外，滞留港、台的一些人士也有过关于此事的回忆。如张国焘回忆说：“李先生（指李大钊）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sup>①</sup>。再如李璜也曾回忆说，李大钊在1918年11月的一次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义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上，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sup>②</sup>

张、李都是五四时期的人，对李大钊都有所了解，他们的回忆，对研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讲到在1918年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组织。比较明确地讲到有这个组织的是一篇回忆成舍我的文章，这篇文章并说成本人参加过这个组织的成立会议：“1918年冬季，李大钊和一些进步人士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第一次集会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举行的。成舍我也去参加了这一次集会，在天色傍晚时散会。他跑到第一宿舍（即沙滩北大东斋）把帽子一扔，对几个熟识的同学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今天开成立会了。这个主义是‘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主义，我可不赞成，此后他就没有去参加过。”<sup>③</sup>

成舍我，原名成勋，1898年生，湖南湘乡人。1916年任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1918年春，经陈独秀特许（因他无中学毕业学历）应北大文科考试，被录取入学。又经李大钊介绍，任北京益世报编辑。从此，他白天在北大国文门（系）听课，晚上在益世报编报。他经常用“舍我”的笔名发表文章。据考证，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86页。

②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第34页，台北版。

③ 吴范寰：《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日报〉》，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又见《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2辑《世界日报初创阶段》。

《每周评论》1919年4月6日刊登的《共产党的宣言》摘译，署名“舍”，也是他的笔名。

根据成舍我当时的情况，参加这个组织的成立会，是有可能的。可惜，这不是他本人的直接回忆，而是同学、友人的转述。不过，这位作者“同成舍我在小学和大学是同学，因他的关系，在世界日报任经理，前后达十五年之久”，应该说对成是相当了解的。而且作者本人当时也在北大理科就学，是亲自听成舍我讲的上面的一段话，应该说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在，成舍我先生仍然健在台湾，如果能看到他的直接回忆，当更有助于这一史实的核实。

根据以上各种材料来看，在1918年是否出现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组织这一问题，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除继续挖掘新的材料外，对现有材料也要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五、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李大钊在其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李大钊是中国人民的先驱和杰出代表，他的思想体现了这种深刻的变化：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进行了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下层劳动人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洋鬼子”可恶，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学西方”，但不了解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李大钊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时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

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sup>①</sup>又说：“布尔什维克‘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sup>②</sup>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sup>③</sup>应该说，在此以前，中国还没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样地阐述问题<sup>④</sup>。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sup>⑤</sup>

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sup>⑥</sup>。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第600页；第609—610页。

④ “帝国主义”这个词见诸报端可能很早，如1901年有一篇名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的文章，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强盗主义。又如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也提到过“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象李大钊这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地提出民族自决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5—266页。

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五四”前夕，李大钊撰写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sup>①</sup> 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sup>②</sup>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李大钊在1918年论述十月革命的论文中，便指出它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sup>③</sup> 1920年5月，他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中，希望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不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sup>④</sup>。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中国知识界中的大量先进分子，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革命实际斗争去。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的不同。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sup>⑤</sup>。接着，他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

---

①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第595页。

②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101页；第229页；第571页。

的一部分工作。”<sup>①</sup>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思想，和这些思想是相吻合的。

六、问：毛泽东曾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近年，又有的文章说，李大钊应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对这一问题，应如何看呢？

答：毛泽东确实不止一次地说过陈独秀是“总司令”。例如，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一次讲话中说：“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sup>②</sup>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又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sup>③</sup>

至于“总司令”，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是讲在当时知识界的主导作用，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主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李都应该说是当时知识界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主将，他们是“起了大作用的”。不过，他们又各具特点：

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较早，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起了大作用的”。在这方面，陈不如李，陈在1919年“五四”前后到1920年5月前后只能算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1920年下半年才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陈独秀的以下各点，又是很突出的：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77页。

② 《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第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③ 《“七大”工作方针》第10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一，他是《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又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著名教授，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新文化阵营。鲁迅一再称他是革命的“先驱者”，而把自己的小说称为“遵命文学”，即遵“先驱者”之命。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五四”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也不可能有后来那样规模宏伟的五四爱国运动。

第二，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对学生爱国运动起着实际的指导作用。根据学生运动的进程，陈独秀随时都有指导性的评论发表。

第三，6月10日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贼被免职后，陈独秀在6月11日亲自撰写《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对北京政权的“根本之改造”问题，把运动引向深入。陈不仅撰写、而且亲自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并因此被捕。

从以上思想、实践及其所起的作用来看，陈是很突出的。李大钊虽然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较早，在五四运动中也“起了大作用”，但从当时的社会地位、声望和影响来说，他是不如陈的。李大钊当时只是北大图书馆主任，尚未兼任教授（兼任教授是在1920年下半年）。

从李大钊当时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可说明一些问题。

陈被捕后，李到处奔走，积极营救。近年来发现的李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久不晤谈，至为想念。独秀被捕，每日设法营救，稍忙，然终未有结果。”

陈独秀被捕3个多月，始获释放。李大钊特写了一首《欢迎独秀出狱》的诗，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6号上。这时，《每周评论》虽已被封闭，但继起的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启蒙思想家们的辛勤劳动已开花结果，所以李在诗中说：“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象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在陈独秀影响下的一代青年，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李对陈的作用做了极高的评价。

出狱后的陈独秀，思想更加前进了，活动也更加积极了。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即和李大钊等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却仍然被大会选为中央局书记。

综合五四时期的全过程来看，陈独秀被称为“总司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这样说，丝毫不影响李大钊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可能更衬托出他的伟大。陈独秀建党时在党的名称问题上，也征求和尊重了李大钊的意见，不就是证明吗？而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脱险，更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

杨 树 升

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跨三个年头近两年半的留学生活，在李大钊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他“立始之始”<sup>①</sup>。

李大钊留学日本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可以说，从此他便与日本结下不解之缘。在他回国后写的文章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余曩居日本”、“余前岁居日本时”、“往者余居日本”、“往者愚在日本”、“我从前侨居日本的时候”等字眼。据粗略计算，李大钊文中引用日本的资料及谈及日本的地方，恐怕不下几百处，可见这种影响之大。因此，搞清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种种影响，对于深入开展李大钊的研究，是有所裨益的。

## 一、对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发展的影响

毫无疑问，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

在实践方面，主要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问题上。李大钊对袁世凯有一个认识过程，在留学前，他基本是站在拥袁的立场上。根本原因是：经过曾被李大钊热烈欢呼的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了，而袁世凯的真面目又尚未暴露，他出于爱国热忱希望加强以袁

---

<sup>①</sup> 《晨报》1927年4月30日。

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的统一，群策群力，“一力进于建设”，<sup>①</sup>尽快把中国建设成如同西方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有相当部分是从政制上探讨如何建立健全民主政治的。而且，他从1912年6月提出去“省私”，到1913年6月发表《裁都督横议》等文，说明他主要矛头是反地方、反“藩镇”，而不反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央。甚至他在文中一面指责革命党人势力较大的“皖、赣、湘、粤，傲岸自雄”，一面为袁世凯辩护：中央“非专制之局”，因而“跳梁造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实不在中央，而在地方”。当然，这一时期，他也感到国中“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非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sup>②</sup>甚至一时苦闷而产生出世思想，但总的来说，在他留学前，看不出他拥袁的立场有什么改变。

到日本留学后，首先，从位置上来看，可以说他站到了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上，眼界开阔，各方信息量大增，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加之他在日本所受到的影响，以及形势的发展等等，这就使他对袁世凯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

1914年11月发表的《国情》一文，是李大钊转变他拥袁立场的一个标志。从该文的整个内容来看，他还没有认清袁世凯与古德诺（美国人）、有贺长雄（日本人）这两个“客卿”的关系，但李大钊对他们的批判，自然是不利于袁世凯复辟阴谋的。同时，与留学前相比，李大钊的思想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在对人民群众的看法上，他在1913年4月的《大哀篇》中哀叹“吾民委无望矣”，在6月的《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也“叹悼吾民德之衰，民力之薄”，人民之患，“在无享权之能力”。而他1914年11月发表的《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一文则认为：“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历史上人物之势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页；第59页。

力，莫非群众意志之积累……群众意志有以成之，亦复有以倾之”。变化是如此明显。

1915年2月在反对“二十一条”的高潮中，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一致对外，这些文章的锋芒是针对日本的侵略阴谋的。日本学者富田升说：李大钊“是为同留日学生总会提倡的‘举国一致’口号保持一致，而慎重地避开了从正面对袁政府的批判”<sup>①</sup>。我国有学者认为：“对于袁世凯政府当时的作法，李大钊认为是出于迫不得已的”<sup>②</sup>。而他在6月发表的《国民之薪胆》一文中，便明确指出袁世凯有“复古之非，弃民之失”，这表明李大钊个人立场已转向反袁，从此展开对袁的批判，以至后来不惜一时中断在早稻田大学的学习，而全力投入反袁、讨袁斗争之中。

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在日本形成了他特有的“民彝”思想：民之所以形成民的那种根本属性，是固有的，持常不变的，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一切随它转移，顺之者存，违之者亡。他的民彝思想，显然是对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希图为建立民主制度找到最根本的依据、条件。简而言之，民彝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就使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具有浓重的启蒙色彩。无疑，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他早期思想的重大发展。

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形成在日本绝不是偶然的。比如：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日本进入了大正时代。这一时期，一方面工农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一方面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大正民主运动。曾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李大钊老师

---

① [日]富田升：《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代的事迹和背景》，译文载《齐鲁学刊》1985年第2期。

② 宋成甲：《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的吉野作造，从1914年4月在《中央公论》发表《论民众的示威运动》一文开始，便不断阐发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再有，李大钊就学的早稻田大学的学风，和与国家权力紧密结合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不同的，加之拥护宪政运动的发展，早大一些教师，如给李大钊任教的大山郁夫、美浓部达吉等，在讲台上宣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日本学者森正夫说：“处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呼声中，早稻田大学教员的讲义里，也倾注着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李大钊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以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sup>①</sup>当然，李大钊是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

另外，1914年5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月刊于东京。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并且“议论竟与甲寅沆瀣一气”<sup>②</sup>。再有，此时陈独秀亦在东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以文会友，陈、李二人相识。《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为即将到来的作为启蒙运动高潮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这些，看来对李大钊的思想都有影响。

## 二、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李大钊在留学前，发表了约二十篇文章，从这些文章中，理不出他有什么系统的哲学思想，但他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却发表了一批反映他早期哲学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有：《国民之新胆》、《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

<sup>①</sup> [日] 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sup>②</sup> 《李大钊史事综录》第9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新生命诞孕之努力》、《介绍哲人托尔斯泰》、《介绍哲人尼杰》、《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如此集中地出现，此时的李大钊与他留学前大不相同了。

他早期哲学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在日本所受的影响分不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本学者后藤延子认为，加藤弘之就是对李大钊早期哲学思想形成而给予了重要影响的人物之一，因为李大钊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就是以加藤弘之1912年发表的《自然与伦理》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两篇文章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当然，李大钊“虽说引用了加藤弘之的文章”，但他“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盲从和效仿，最终是基于李大钊的主体性而接受的”<sup>①</sup>。

关于李大钊的早期哲学思想，本文不在此赘述。应指出的是，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促进当时人民的觉醒和革命进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也为他在十月革命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如从《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我们可看出：他在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同时，也认为这种制度“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经过实践的检验，若它还不好，那也可以再加改变，自然，“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他的这种看法，显然高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民主主义者。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当十月革命成功后，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人也就决非偶然了。

---

<sup>①</sup> 【日】后藤延子，《三个影响李大钊思想的日本人》。

### 三、接触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它对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的影响

李大钊在日本是否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以前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是不准确的或不大确切的。较确切的事实是，李大钊在日本主要受到安部矶雄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其一，安部矶雄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学者，早在1901年5月，他就和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木下尚江、西川光次郎等六人创立了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社会民主党。李大钊在早大学习时，安部也正在该校任教授。“他在早稻田大学，以社会主义立场讲授经济学，并对有关的社会问题进行先驱性的研究”。<sup>①</sup>

其二，据查早稻田大学1914年至1916年政治经济学课程表<sup>②</sup>，安部矶雄曾给李大钊讲授过“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等课程。对此，早稻田大学为纪念建校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早稻田大学百年史》一书中这样写道：“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sup>③</sup>1918年，李大钊自己也回忆说：“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而从大山郁夫那里没有受到那样一种程度的影响。”<sup>④</sup>

其三，李大钊还注意阅读安部矶雄有关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请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6月18日的一则消息：“《捐

① [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② 该课程表复印件之一存中国李大钊研究会。

③ 《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见《北京日报》1982年6月28日。

④ [日]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



赠杂志》：本校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以大批旧杂志捐助本校图书馆。日本文者有太阳、支那、外交、雄辩、生活、向上、正论、新日本、洋及洲、东大陆、外交时报、经济论丛、六合杂志、东京评论、东方时论、中央公论、哲学杂志、日本浪人、东亚之光、国民评论、隔周杂志、洪水以后、第三帝国、日本评论、日本及日本人、世界之日本、伦理讲演集、国民经济杂志、国家学会、国家及国家学、社会及国家、和黎明会讲演等二百六十七册……刻已登录完竣，分存各阅览室云。”据查，这些当时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印章、注有“李守常先生捐助”字样的大量而种目繁多的日文杂志，北大图书馆至今仍保存着。其中，1914年至1916年上半年的部分，显然是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订阅的。在这些杂志中，就有安部矶雄介绍欧洲社会主义的文章。如在1914年11月1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第11月号上，便载有安部的《法兰西、比利时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介绍了第一、第二国际时期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关情况。如：文中谈到了法国工人党领导者儒尔·盖德，说他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的学说”，谈到了1879年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也谈到190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说在会议上倍倍尔同入阁派饶勒斯等展开激烈论战而最后取得胜利等等。

在1914年12月1日出版的《六合杂志》34卷12月号上，载有安部的《大战后的欧洲诸国》一文。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一期上还登有1915年第1号——新年号预告。预告说明这一期是“俄罗斯文化号”，所列十五篇文章目录中，有安部的《俄罗斯的社会主义》<sup>①</sup>。我们今天从研究的角度感到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李大钊当时没有把这一期《六合杂志》捐赠给北大

<sup>①</sup> 该文发表时，定名为《俄罗斯的社会运动》，见《六合杂志》35卷第2号广告栏。

图书馆，我们现在还无从知道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但既然是讲俄国的社会主义，想必会提到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

李大钊在留学日本前，虽然参加过中国社会党，但没有谈过社会主义，而留学归国后不到一年，便在《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而且，社会主义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将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接着，他又著文肯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二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与他留学日本所受到的这种影响有很大关系的。日本学者森正夫认为：李大钊“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sup>①</sup>。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最初“送来”的具体途径是怎样的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通过李大钊从日本转道而送到中国的。道理很简单，虽然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中国报纸就作了报道，但由于中外反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报纸的报道极为混乱，“真消息难以传出”，加之中俄交通一时中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马上从苏俄直接送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便瞩目于日本进步思想界，搜集一切能搜集到的资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研究，他开始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从而开始歌颂十月革命。1919年1月，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创办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月刊），介绍马克思学说。接着，日本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热<sup>②</sup>。现在已经搞清，李大钊“五四”后写作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以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

① [日] 森正夫，《李大钊》（早稻田之森），译文载《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

② 《晨报》1919年4月24日。

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为蓝本写作的。从文中可看出，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观对李大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稍后不久，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的（一）（二）（三）部分，就是以后来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堺利彦的《道德之动物的起源及其历史的变迁》、《宗教及哲学之物质的基础》两文为蓝本写作的<sup>①</sup>。这说明，李大钊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

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与共产国际代表的关系是人们很熟悉的。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与共产国际代表保持联系的同时，李大钊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也保持联系，十分注意他们建立组织方面的活动。1920年底或1921年初，李大钊加入了于1920年12月成立的日本共产党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并函购了五十册该同盟的宗旨书<sup>②</sup>可以看出，李大钊在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也很注意日本社会主义者建立组织方面的经验。

#### 四、注重对日本及中日关系的历史 与现状的研究

中日两国是近邻，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长期以来，中国是日本的先生，日本是中国的学生；而到了近代，这种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学生变成了先生，先生变成了学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李大钊正是为了探个究竟，为了祖国的富强，而去日本留学的。从他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乃至最后一篇《狱中自述》，都表明他注重对日本以及对中日两国的

<sup>①</sup> 【日】后藤延子：《三个影响李大钊思想的日本人》。

<sup>②</sup> 【日】山道健太郎：《巴黎公社一百年与日本》，载《图书》1971年8月号，岩波书店出版。

比较研究，并有很高的造诣。如他1925年发表的《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有个颇有意思之处：即在1838年以前，在年表上标明年代时，只附中国皇帝的年号，而从1838年开始，李大钊又附上了日本天皇的年号。如“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日天保九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实际上，我们可把年表1838年以后的部分，看作是近代中日两国的外交大事记、近代中日关系大事记。

李大钊尤为注意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的研究。1926年3月1日下午，李大钊应邀到女师大大礼堂作了题为《日本维新运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比较观》的演讲。他的演讲“极受听众之欢迎”<sup>①</sup>。可惜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这篇演讲纪录稿，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从他1925年8月在河南开封的一次演讲中可略知一二：“日本革命时，唱尊王攘夷复古三口号，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民族解放，百一十七年，费许多牺牲，当中曾换过十二次外交大臣，大隈并被炸伤，当时因帝国主义者正注重中国，故日本可乘机容易翻身。现日本已成帝国主义来侵略中国了，中国翻身将更要难，所以我们非全民觉醒不可。”<sup>②</sup>以后他也谈到：“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之政策”<sup>③</sup>。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今天看来仍是很精采的。

正是李大钊注重对日本的研究，因此，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诸方面分析得很透彻。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初，他已写文章呼吁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要警惕：“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它的危机一天一天的

① 《京报》1926年3月2日。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802—803页；第890页。

迫切。”“这未来的新帝国主义战争，要以中国及太平洋为战场。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sup>①</sup>7月，他更著文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满蒙侵略的急切性、优先性。因此他号召：“全中国民众尤其是北方民众啊……我们应该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日本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国民革命阵线及其侵略满蒙的阴谋和行动。”<sup>②</sup>事实上，在李大钊这些文章发表五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就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国学术界也一直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的意见。

## 五、积极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李大钊留学日本后，较之留学前，他对广大日本人民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加之他回国后不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就使他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1919年1月，他在《面包问题》一文中写道：“日本五口的人家，最小生活费，一年也要二千七十六元。有这样收入的，百户中不过二户，其余都是食不能充饥，衣不能御寒，老不能养贍，子弟不能教育”，而“一般武人，却是一日跋扈一日，压迫自国的平民，还在不算，更想和别国的武人勾结，害别国的平民。”<sup>③</sup>笔端流露出对日本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在五四运动中，他一方面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他又告诉中国人民，这次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sup>④</sup>，不可有狭隘地反对一切日本人的排外主义倾向。不仅如此，他更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一文中满怀深情地说：“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

①②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41—842页；第870页；第101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14页。

切。①”这样，他就在当时的中国与日本——被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划分了两大敌对的阵营：中日统治阶级集团、和中日人民，并勇敢地向日本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支持他们的斗争，沟通两国人民的思想，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18年12月，吉野作造等在和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团体的斗争中，成立了黎明会，开展了民主运动。李大钊得知后立即给吉野去信，并寄去了他刚创办的《每周评论》。吉野很快给李大钊回信，李大钊将回信登载在《每周评论》第五号上。吉野在信中感谢李大钊赠刊，并“希望彼此声援”②。从此，《每周评论》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声援日本民主运动的文章。

对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日本官方及众多报刊是一片诬蔑之声。而吉野却挺身而出，在《中央公论》等几种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诬蔑。同时，吉野给李大钊写了一封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李大钊将此信公开，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③。

1919年6月5日，吉野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大教授和学生访日的倡议，并给李大钊写了一信，李大钊热情地回了信，并希望吉野夏秋能来华访问。夏，吉野的弟子冈山守道来中国时，遵吉野之嘱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了吉野邀请北大教授、学生访日。李大钊当即对冈山表示：为实现访日做积极努力④。

1920年4月，在李大钊等多方努力下，北大组成了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黄日葵在内的五人访日团。出发前，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写了多封介绍信。5月5日，北大学生访日团一行到达东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214页。

② 《李大钊年谱》第7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参见《五四爱国运动》（上）411页。

④ 《李大钊年谱》第83、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京，立刻在日本引起轰动。访日期间，他们会见了吉野作造、今井嘉幸、宫崎滔天、大山郁夫、河上肇、与谢野晶子等许多日本著名人士，以及和许多大学、团体的学生、工人开展了多项活动，盛况空前<sup>①</sup>。正是由于李大钊、吉野作造等的精心安排，使这次访日活动取得很大成功。

8月，日本亚细亚学生会访华团到达北京。20日下午，“由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守常先生介绍与学生联合会接洽”，中日两国学生在北大举行了茶话会。在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见中，“彼此相谈甚欢”<sup>②</sup>，最后合影留念。

在从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中，李大钊以他坦诚的胸怀，亲切的态度，结交了不少日本友人，尤其是日本青年。他与伊藤武雄的关系堪称典型。1921年，25岁的伊藤作为满铁驻京办事处人员来到北京后，经介绍结识了李大钊。在四、五年的交往中，2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伊藤在谈到他由旧满铁官员转变为推动日中友好的战士的原因时说：20年代在北京结识李大钊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是他决心把后半生献给日中友好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sup>③</sup>。后来，伊藤与内山完造等发起建立了日中友好协会，先后担任常务理事、理事长、顾问，他还同中岛健藏等发起建立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一直担任常务理事。到晚年，他又创立了从事日中科技交流的日本东方科学技术协会，亲任会长，组织和动员退休的日本科技人员为协助中国的现代化献计献策。80年代初，八十六、七岁高龄的伊藤武雄先生最后一次来到中国，专程到北京西郊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墓凭吊。

李大钊留学归国后所从事的中日人民友好事业，在现代中日友好关系史上是应写上一笔的。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的影响，当然不限于以上所谈的几个方

<sup>①②</sup> 《晨报》1920年5月19日、6月15日、8月24日。

<sup>③</sup> 姜殿铭，《伊藤武雄忆李大钊》，见《中华英烈》1988年第4期。

面，如他亲身感受到的日本一些部门工作的高效率，日本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等等，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详述了。谨在此希望中日两国学者进一步加强合作，对“李大钊与日本”这一课题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 “宗彝”故训与“民彝”新诠

刘桂生

1916年李大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同时又将自己所主编的留日学生总会机关刊物取名《民彝》。“民彝”思想是他早期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对李大钊所说“民彝”一词的确切含义、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学术界的认识颇为纷纭。有的研究者认为，“‘民彝’的主要含义是人民的意志（心理）和要求”<sup>①</sup>。有的则认为“民彝”“就是人民的权利”<sup>②</sup>。有的认为“民彝”是“包括政治、宗教、伦理等观念在内的人民的认识”<sup>③</sup>。还有的认为李大钊笔下的“民彝”的含义是以“‘民主’‘自由’精神阐明”的<sup>④</sup>。以上四种见解，由于研究的角度、着眼点等等的不同，看法颇不一致。但是，众所周知，李大钊对“民彝”这个概念曾作过不少解释。正如朱成甲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所说：“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李大钊对‘民彝’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和运用。他既有总的解释，又有各别的、具体的解释；既有本义的诠训、考释，又有譬喻、引伸和发

① 戴鹿鸣：《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先驱》，胡华主编《五四时期的历史人物》第3页。

② 崔润：《反袁复辟斗争中的李大钊同志——学习〈民彝与政治〉》，1979年5月3日《天津日报》。

③ 卫真：《从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李大钊的世界观转变》，1979年5月5日《文汇报》。

④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李大钊传》第20页。

挥。①”显然，我们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民彝”的基本含义，应当，也必须以李大钊本人的这些解释作为指导和重要依据。

因此，我们认为研究“民彝”问题的首要之举是充分地确切地理解李大钊本人对“民彝”所作的解释。李大钊对“彝”字曾作过“训器”、“训常”、“训法”三项训诂，在这基础又作了一些考释、诠释。这是我们把握“民彝”基本含义最重要的依据。因此，只要把李大钊本人作过的这些训诂的内容透彻地搞清楚，也就能把“民彝”的含义和内容搞清楚，进而也就大有助于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从对这三条文字训诂的理解出发，谈谈我们的看法，希望能就此引起进一步的研讨。

## 一、关于“彝训器”

李大钊说：“诂‘彝’之义，古有殊训。一训器”。这是理解“民彝”之‘彝’字最关键的一条训诂。这条训诂的含义弄清楚，“民彝”这个概念的基本内容就不难把握。然而问题也常常出在这里，即有些作者把这个“器”字简单地理解为“器物”的“器”。其实，这里所说的器，非指一般器物，而指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政治、历史意义的“器”，即中国古代所谓“神器”的“器”，亦即“宗彝”，其上标载着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了它，才知道本民族的渊源与历史发展，失去了它，就意味着亡祖、亡宗、亡历史、亡文化。在古宗法社会时代，国家和民族有多种多样的“器”，如祭器、养器、藏器、征器、旌器、约剂器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宗庙之常器，即宗彝。因为在那个时代，“即祭即政。盖政莫始于宗庙，地莫严于宗庙，器亦莫重于宗彝也”。所以宗彝为重器（“称其重以概其余而为百器之总名”）。李大钊

① 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第295页。

引用龚自珍《说宗彝》一文中的话，指出古代“国家于冠、婚、丧、祭、征讨、聘盟、分封、赂献、旌功、平讼诸典，必以器从。”

“是‘器’乃为国家神明尊严之所托，有敢窥窃神器者，律以叛逆”。<sup>①</sup>这里说的神器或曰重器，便是宗彝。李大钊说，他作这样的考订，目的仅在于：“明古者政治上的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

由于古代的彝器上一般有刻词。如“旌器”上一般刻祖先的功绩，“约剂器”上一般刻祖先的讼事。前者为“功词”，可以“矜子孙”；后者为“讼词”，可以“传信子孙”（使子孙明白事理的是非曲直）。一件件彝器，一篇篇刻词就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记录了下来。正如李大钊所说，“三代以上，无文章之士，而有群史之官。群史之官之职，即在以文字刻之宗彝。是则宗彝至于有周，不啻文史、舆诵、箴规、典要之渊源。”<sup>②</sup>这就是说，宗彝不是别的，乃是我国古代文献之所在，书面文化的源头。正像罗马的十二铜表为嗣后欧洲法律的源头一样。所以，彝，既是一种实体的器，如周室宗庙中的十二鼎；更重要的是器上铭刻的文——种种的思想、精神、文化。宗彝，就既具有作为国家、民族权力与传统的象征意义；也具有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施治、施教的实践意义。相应地，李大钊提出：民彝是“悬于智照则为形上之道，应于事物则为形下之器，虚之则为心理之征，实之则为逻辑之用也。”它是精神的，也可以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或实体。但它不象宗彝是具体凝刻在某种器上（包括某种体制上），它只存在于人民的思想、精神、心理之中。所以李大钊指出，“宗彝可窃，而民彝不可窃也；宗彝可迁，而民彝不可迁也”。<sup>③</sup>

根据李大钊对彝训器的考释与阐发，并由宗彝而提出民彝的种种论述，我们可以认定，李大钊所说的民彝，是一个多层次的

---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154页，第165页。

概念，既包括历史、传统在人民心理、精神上凝聚起来的思想、文化心态；也包括从历史与现实生活出发提出来的人民的意志、要求和愿望以至智慧、才能、道德等等。对一个民族来说，“民彝”是神器，外来侵略者无法劫走或摧毁（除非毁灭整个民族）；内部统治者也许可以窃劫、屈郁之于一时，但终究无法违逆它而横行无已。人民要保护“民彝”，善于运用“民彝”；“民彝”则指引和保证着人民不断继承和发扬过去，创造未来。

## 二、关于“彝训法”

李大钊提出彝也训“法”，并在引证《书》：“永弼乃后于彝宪”一句之后<sup>①</sup>明确指出，“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

一些作者根据“彝训法”这一句，把“彝”的含义理解为“法律”，这样，当他们读到下一句：“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时，便觉得不好理解。因为，众所周知，宪法是一切法律的基础；而按李大钊上面的说法则变成法律是宪法的基础，这岂不是颠倒了吗？李大钊是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怎能出现这样的失误呢？不少研究者曾为此感到困惑。其实，李大钊的上述论述丝毫不错，也没有矛盾。问题的症结在于李大钊所说的法，是习惯法，而不是成文法，弄清这一点，困惑必然冰释。

习惯法是一切著名宪法的祖宗，可以说史有明文。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作了确切的说明。他以英国宪法为例，指出这部世称最完美之宪法，“非制造而成者，乃发育而成者，非空玄理论之果，乃英人固有本能之果也”。什么是英人的“固有本能”？李大钊直截了当地作了解释：“英人固有之本能，即英之民彝也。”什么是“固有本能之果”？李大钊说，就是顺从“民彝自然之演进”，“一循其常轨”，“积习成性”，从而形

<sup>①</sup> 《尚书·罔命》。

成的“不文之典”。这种“典”，不但“勿需编纂之劳”，而且还要“力避编纂之举，以柔其性，而宽其量也”。<sup>①</sup>由此可见，英国宪法所以被认为是当时最完美的宪法，就因为它是遵循英国的民彝自然演进的轨迹，自然形成的习惯法、不成文法、自然法的基础上形成的。

大家知道，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成文法，它们无一不是依据风俗、习惯来断案<sup>②</sup>或依原有案例断案为基础的，因而是地地道道约定俗成的东西。它们具有一定的效力或约束力，但并不需要什么官方的批准，立法机构的通过。在欧洲，不成文法也叫自然法（Natural Law）或积极法（Positive Law）。它一方面是从人民中间自然而然产生出来（“发育而成”）的，毋庸政府机构或团体人为地刻意制造（“编纂”）；另一方面它比起成文法来，更符合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更符合人民群众的习性、心理、道德伦理等等，也可以说是更顺乎“自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等等的形成和确立，必须有也必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包括特定的人民的心理、习性、意识等等与之相适应，其中有的就是上述的不成文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种生硬地建立或形成的政治体制、法律等等，不是没有力量、不能持久的形式，便是一纸空文。对这一切，受过多年资产阶级法学教育的李大钊是知之甚稔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民国建立以后的政治体制与宪法，缺乏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民风民俗，甚感忧虑。这就是说，李大钊为“彝训法”所作的诠释与阐述中所讲的“法”，便是他早年研究有素的“风俗”，或“不成文法”。弄清了这种含义，也就可以明白民彝是宪法的基础的道理。由此，也就更深入地了解了民彝的内容、含义及其作用。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57页。

### 三、关于“彝训常”

“常”怎样解释？

李大钊分析说：“《书·洪范》云：‘彝伦攸叙’。彝伦者，伦常也，又与夷通。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为径’。夷，平也。”由此可知，“彝”就是“常”或“平”的意思，而这里的“常”究竟指什么呢？只要我们把《洪范》一篇的基本内容稍加了解，就能明白，这里所指，不是别的，而是篇中所记周武王与箕子对话中谈到的那种能使臣民各安其业、和睦相处的根本大法。这种法的中心思想则是顺从民性以施政施教，与人民的大多数同样地过平常的生活，这样才能治国安民。李大钊认为：“为治之道，在因民彝而少加牖育之功，过此以往，即确信一己所持之术足以福利斯民，施之实际亦信足以昭其福利，极其越俎之害，必将侵及民彝自由之域，荒却民彝自然之能，较量轻重，正不足与其所被之福利相消，，则勿宁于牖育之余，守其无为之旨，听民之自器其材，自踏其常，自择其宜，自观其成，坦然以趋于至当之途之为愈也。”<sup>①</sup>同时，又强调：“为治之道不尚振奇幽远之理，但求平易近人，以布帛菽粟之常，与众共由。所谓以其易饱易暖者自过吾之身，以其同饱同暖者同过人之日，故能易简而得理，无为而成化也。”<sup>②</sup>

这既是李大钊对“彝训常”的理解，也是他借以阐发的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这是在为“彝训器”、“彝训法”作诠释的同时，所作的进一步的论述。由讲明“彝”是什么，进而讲到如何用“彝”，即如何施治。这是李大钊“民彝”思想的要旨所在。其内容简括地说来便是：为治，必须遵从“民彝”（即依据人民的文化素质、心理气质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志、要求等等），而且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53—154页；第155页。

要“如量”，既要能使人民“尽其心量”，又不能超越过度。否则就是“戾乎吾民好恶之常”，就是“伦纪宪章失其常”，这样，民众的“天赋之德”必然“暗然日亡”。

#### 四、几点认识

通过李大钊上述的三条文字训释及所作的阐发，我们感到李大钊所标举的“民彝”，确实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很难以一两个词或一两句话来概括。（如勉强用简单的术语来概括，则以“历史形成的人民的文化素质”、“风俗人心”等庶几近之，但并不相等。）在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述以前，我们认为应多多按照李大钊本人所曾用过的解释来理解它。下面谈几点我们自己的认识。

（一）“民彝”是一个民族的全体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其社会生活实践形成积累起来的全部智慧、才能、德性、等等的禀赋，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意志与愿望。一个民族所处的社会、历史与自然条件，全都对其“民彝”的内容有影响。一个民族的“民彝”可以说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包括其风俗、习惯等等，但又不止是静态的文化素质，还包括动态的，如保卫和发展自己的意志、愿望、要求等等，对这些也许可以概括为民族的气节、民族的风骨。

（二）它是发展变化的。从李大钊的文章可以看到，“民彝”不仅可以“本”、可以“用”、可以“悬”、可以“应”，而且可以“显”、可以“彰”、可以“信”、可以“伸”；它也可以被“夺”、被“蔽”、被“障”、被“迷”、被“惑”、被“荒”、被“屈”、被“背”、被“郁”。这就是说，“民彝”要伸张、扩展；但也可能被抑制、被障蔽。它深深植根于人民的精神与心理之中，因此，虽可被外力劫夺一时，但只要民族没有灭亡，我们对“民彝”就应不仅勇于“本”，而且善于“用”。

“民彝”本质上是精神的，是虚的；但可以物化，可以转化为实，如“彰”“显”之于典章制度。而典章制度一旦形成，反过来自会再影响人民的精神。由此可见善为治者，应当善于对“民彝”作虚实之用。

（三）“民彝”是一个民族的群体精神意识，但它的本性也尊重和强调个体“己”的自由发展。同时，它又突出强调要遵从庸众（普通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的庸言庸行和他们的生活常态。这种庸言庸行、生活常态，可以简言之谓为风俗。或者按“彝”训“常”的道理，可以称之为“民常”。就这个角度来说，“民彝”与风俗可以作为同义词来用。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说过：“大盗窃国……戕贼风俗之大本”。而风俗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一个地区的群众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等等的总和。它涵蕴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生活与心理活动的内容，比较深层地多方面地又自然体现一国一族或一区的人民群众的素质与特点。它通常便是上文说到的不成文法的重要内容。而不成文法又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基础，这在前面已说过了。风俗、不成文法，各国、各民族各有其特色。它较多地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殊素质，由此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宪法——如果健康地充分地以不成文法为基础，也必然具有独具的特色。

“民彝”思想还有许多方面与层次，在此不能尽述。仅由上述几点，已可概见李大钊提出“民彝”思想，虽然尚非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但他已把握住中国国情这个基本点，并以此作为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因此，这种“民彝”思想无论在当时以致在今天，都是很有启发与教育意义。李大钊何以能迅速地在中国率先转向马克思主义，我们从这里自可寻见许多轨迹。仅此，也足可表明，“民彝”问题，值得我们反复地深入探究。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 李大钊早期资产阶级制宪主张述评

王 纯 新

李大钊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在五四运动以前，他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资产阶级制宪主张，是李大钊早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结合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对李大钊在这一历史阶段有关制宪问题的论述做粗浅的探讨，希望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的全貌获得新的认识。

李大钊资产阶级性质的制宪主张，经过了形成、发展和基本被抛弃几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前到袁世凯复辟阴谋暴露前，其思想处在不成熟的形成阶段；从袁世凯复辟失败、皖系军阀北京政府重开国会到1917年制宪中断，是发展丰富阶段；从1917年制宪中断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是发生巨大变化，资产阶级制宪主张基本被抛弃的阶段。学术界一般把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前的李大钊的思想称为其早期思想，而他的资产阶级制宪主张从开始形成到被基本抛弃的过程，正是与其早期思想同始终的。

## 一、李大钊早期资产阶级制宪主张的初步形成

李大钊出生于清王朝加速走向灭亡的1889年。其家乡冀东，是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的焦点。少年时的李大钊学习刻苦、关心社会，试图寻找一条消灭专制，使民族摆脱危机的道路。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为李大钊日后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对制宪主张的形成起了直接的作用。1907年，19岁的李大钊为“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

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sup>①</sup>，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6年中，“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sup>②</sup>。毕业后，李大钊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就读，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法律诸方面深入研究日本社会状况和中国落后受制原因，尤其着力于法制问题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

李大钊对法制问题特别关注，还与当时正是辛亥革命激流汹涌，封建王朝大厦倾覆，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以及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学说涌入中国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处在这样大动荡的时代，身为法政专科学校学生的李大钊，不能不对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制宪活动十分关注。早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就曾参加了天津学界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斗争。辛亥革命爆发，李大钊目睹革命志士为推翻专制统治流血牺牲，特别是老师白亚雨的英勇就义，促使他开始选择革命的道路。1913年4月，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的李大钊，负责出版了《言治》月刊，并以此为阵地，陆续发表了数篇政论性文章。

李大钊在《言治》上所发表的文章，反映出他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国家，尽快结束内忧外患的迫切心情。辛亥革命后，李大钊始终关注着局势的发展，然而结果却使他失望：先前“一力进于建设”、隆国运、固金瓯的愿望未能实现，而感到“犹在惶恐滩中”；清廷虽被推翻，共和政府却面临着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和才难种种威胁，加以“党私”和“省私”之弊，民国建设任务极其艰巨。袁世凯篡权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官僚、政客结党营私，吸食百姓膏髓；军阀武夫拥兵自重，无视国法民权，一专制君主变为数十专制都督，且“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sup>③</sup>对此，年轻的李大钊虽也曾因“伤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888页；第888—889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

世痛俗”而“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sup>①</sup>，但终未消沉，而是以笔作武器，大声疾呼，投身到反对封建军阀、争取民主共和的时代大潮中。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前后，是李大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基本形成的时期。与同时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一样，他这时的思想并未超越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水平。一方面，他对军阀政客篡夺政权、葬送革命成果痛心疾首，但同时却又希望能通过制定一个有约束力的宪法来限制军阀的发展，达到民主共和。这在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仍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只能是空想。

这一阶段李大钊有关制宪的主张归纳起来有如下要点：

1. 主张国会实行一院制。李大钊虽推崇英美政体，但指出英伦二院制实为一院制，不可效其形式。这一主张意在限制“贵族”，增加“平民”参政机会。实际上，无论是一院制还是二院制，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国会只能是独裁政治的工具。

2. 重视国会选举制度，主张“国情先例，两相鉴衡”。李大钊详细考察和对比各国选举制度，认为其“适宜与否，其国治乱安危之枢也。”<sup>②</sup>他指出：选举制度形式及内容，标志一国立宪政治的状况；立宪政治确立，“选举权界赋之范围亦日益扩张以达于均普”。<sup>③</sup>反映出李大钊“平民政治”的思想。李大钊对西方选举制度的详细介绍，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关于宪法和法律<sup>④</sup>颁布程序的主张。

1913年，制宪国会成立后，在宪法草案拟定过程中，各党派间就孔教、地方制度和行政机关三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袁世凯提出的总统独裁制被否决。为实现独裁野心，袁不择手段地逼迫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第74页；第74页。

<sup>④</sup> 李大钊所用“法律”一词，其内涵基本上与今天所使用的“普通法律”一词相同，是相对于宪法性法律而言的。

国会于宪法制定以前先行选举他做了正式大总统。接着提出修改《临时约法》中对总统有所限制的条文，争夺对宪法制定过程的控制权和宪法公布权，意在凌驾于宪法和国会之上，其独裁野心暴露无遗。李大钊十分关注制宪中的争论，并援引西方立宪制度，从理论上驳斥了袁世凯及其在国会中的代表进步党人的提议。在《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一文中，他从宪法与法律、造法与立法、宪法团体与立法机关的区别，指出宪法会议是造法团体，理当拥有宪法公布权。在《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一文中，又进一步指出：即使对普通法律条文，大总统也只有公布权，而无最终否决权。

4. 主张裁撤都督。辛亥革命骤起，各省宣告独立，建立军政府，一批旧官僚、军阀窃据了都督之位。他们趁南北议和、政局动荡之机“秩乎法范，暴戾恣睢，飞扬跋扈……阴谋窃国”，以致国权不振，民权不伸。因此，是否裁撤都督自然成为制宪活动中的议题之一。李大钊认为裁撤都督是由“军法之治”过渡到“宪法之治”，真正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前提。他还对裁督的时机和具体办法提出了设想。当时军阀割据、都督专权的现象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非一纸宪法所能消除。地方制度之争的背后，既有北洋系中央统治集团与地方军阀之争，又有代表封建专制势力的袁世凯集团与代表国民党革命派势力的南方数省地方政权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在此情形下，裁督虽可抑制地方割据势力，但却会给把持着制宪工具的袁世凯独裁野心的实现提供更大的便利。李大钊裁都督之议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说明他当时对袁世凯控制下的制宪活动的本质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渴望在中国建成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对北京政府的制宪寄予热望，并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直至1914年1月赴日本前，李大钊除了在《言治》上发表了近10篇与制定宪法直接有关的文章

外，还以此为论坛，就法律用语的理解、议员俸给制度等一些具体法律和规定问题发表了看法。然而，这一系列理论和建议，基本上未被制宪者采纳。

1914年5月1日，《中华民国约法》出笼。该约法不仅取消了责任内阁制，从而实际上废除了资产阶级国会制，而且还公然规定了封建军阀专制的总统独裁制。年底，袁世凯又通过对大总统选举法的修正，实际上成为世袭终身大总统。之后，他又唆使亲信成立筹安会，鼓吹所谓“君主民主团体”，以政治威胁和金钱收买的手段，于1915年底推出了复辟称帝的丑剧。12月24日，袁世凯下令制订帝国宪法，原则及程序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如出一辙。只因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和护国运动兴起，该草案才未能出笼，袁本人也被迫撤消帝位，死在一片声讨声中。

## 二、李大钊资产阶级制宪主张的发展丰富

1914年1月，李大钊以神州破碎、无限伤感的心情踏上赴日留学之路。在早稻田大学，他在系统学习政治、经济、法律诸科，加深对资产阶级法制了解的同时，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积极参与反对袁氏独裁阴谋的斗争。

李大钊写于10月初的《国情》一文开了反袁称帝的先声。然而在深究法制难以实行的原因时，他却认为是由于没有一部“广被无偏，勿自限于一时一域，勿自专于一势一体”，并具备“有容”和“平衡”之机制的“柔性之宪法”。再究难成“平衡”之宪法的原因，他又认为是缺乏足以构成平衡之态的“政治对抗势力”。因此“政治对抗势力”之养成，便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养成政治对抗势力？当时颇多议论。在此基础上，李大钊提出4点希望：1、“希望有力者，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内，发生之异派势力，幸勿过事摧残，致政治新运，斩绝中途也”；2、“希望从前因甲派势力勃兴，专恣武断，遂致迎附乙派势力，以图抵制者，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

专断或暴乱之势力，舍迷途而趋正轨也”；3、“希望畴昔滥用其势力，致遭败覆，仍欲以零碎之血，快意气报恩仇者，至是当以绝痛之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速内其力于正轨，勿任狂奔横决，不知自反，以摧国命而躬蹈自杀也”；4、“希望社会各方人士，正义所在，勿受势位利禄权威之驱策，致为绝盛之势力所吸收，而盲心以从同也”<sup>①</sup>。他认为如果这些美好设想均能实现，则“平衡”、“柔性”之宪法当能出现，法制之国家亦可建成。然而逐条分析，这些设想却没有一条可以实现。试想，靠军队和投机起家，并一心只想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一类“有力者”，怎么可能听了几句劝告就“自节其无极之势力”，而不对革命党人“过事摧残”呢？那些视权如命、为金钱不要人格的政客们，怎么可能以“绝大之觉悟”放弃互相倾轧，“指导专断或暴乱之势力”呢？如果说李大钊前两点希望仅仅出于对军阀政客的本质认识不足的话，那么第三点中对革命党人的劝告，则不仅仅是认识不足，而似乎是处在一个超然于新旧两种势力之上作出的错误议论。李大钊把革命党人为推翻封建军阀所作出的流血牺牲，说成是“不能善用其锋，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所付出的无谓代价；把“国士俊才，头颅横断”说成是“感情相尚，血气相陵”，“滥用势力”。他引用俄人托尔斯泰的暴力革命过时论，证明暴力革命只会带来“以暴易暴”的后果；因而“必人各从良知而恶暴力”，以“政治平和竞争”才能实现“和平与善良之政治”。事实上，放弃暴力斗争，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从《政治对抗力之养成》这篇文章里反映出的，是李大钊在看到袁世凯复辟步骤步步推进，民主共和精神日遭践踏情况下的失望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与1913年他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前对制宪活动的极大热情相比，这里看到的似乎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的抒发，即使作者本人，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99—107页。

也未必真正相信文中的设想可以实现。不过，如果想到一年以前的李大钊还曾因失望而产生过出世思想的话，此时的思想似乎又进步得多了；更何况，在如何对待封建军阀，如何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问题上，当时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十分不成熟的。李大钊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能够不断追求真理，不断接受新思想、抛弃旧思想，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于8月1日重开旧国会，续议宪法草案。

皖系军阀废袁氏帝国宪草及伪约法而重开国会，使热衷于制宪的原国民党代表兴奋一时。他们以宪政商榷会为招牌，借助中华革命党影响，意在通过制宪削弱皖系中央权力。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大钊也发表文章，参与了这一活动。尽管他这时对军阀统治者仍抱幻想，且一度误入汤化龙的宪法研究会，但与前一阶级相比，其主张更为实际和系统，思想也更进步了。

由于目睹辛亥后民主与专制的反复斗争，系统研究和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李大钊对宪法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宪法者，国命之所托……其良也，固足以福民；其恶也，亦足以祸国。”<sup>①</sup>为了获得“福民之宪法”，并使之成为“自由之保证书”，“须以国民之血钤印，始生效力者”<sup>②</sup>。不难看出，李大钊对假共和真复辟倒行逆施的痛恨与对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视和希望。

对于宪法与“法外势力”的关系问题，李大钊在《制定宪法之注意》和《权》二文中强调：1. 制宪过程应具有独立性，即法大于权；2. 宪法必须具有使各派势力相互制约并调和于一处的性质，使之遵奉政理、相容相纳。他认为依靠“调和”和“平衡”之宪法，可以抑制“立宪政治之大忌”的专制和争斗。他的这一“相互对抗而又平衡”的制宪思想，由于过份强调了宪法对政治

---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15页；第218页。

斗争的反作用，因而现实意义不大。

李大钊还十分推崇西方国家宪法中对自由权利的规定，力主将这些权利写进宪法，认为“无宪法上之自由，则无立宪国民生存之价值”<sup>①</sup>。他不断撰文揭露和抨击北洋军阀及其在国会中的傀儡对言论、信仰和教授自由入宪的阻挠，认为国民能否享立宪国民之幸福，取决于是否有一部“善良之宪法”，而有没有“善良之宪法”，则又取决于对自由权利是否有充分保障。

在制宪原则问题上争论的同时，地方制度、孔教地位和政府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成为续议民国宪草的争论焦点；地方制度问题所引起的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实质是代表原国民党势力的商榷系与代表皖系中央的“进步党”之间削弱与反削弱的斗争。李大钊对地方制度的主张主要见于1916年11月10日发表在《宪法公言》上的《省制与宪法》一文。与以往论述方法不同，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不仅对省制与宪法作了横的比较，还做了历史的追溯。他认为：省制古已有之，地方分权是必然趋势。但古人所论之分权与今之分权立足点、着眼点、目的不同，客观条件、概念涵义不同，因而结果也不同。文章高度评价了南京临时约法和云南宣言，认为二者可做为宪法之渊源（精神依据）。李大钊甚至拟就了一个“省制规定宪法之大纲”，建议省为自治体，享有相应权利。文中还对省制入宪的具体程序提出了极具体的构想。这些主张和设想虽未实现，但丰富了法理的研究，在现代法制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争论的再一个焦点是“孔子之道”在宪法中占何地位。从新文化运动起，在民主和救亡思潮冲击下，孔教被作为封建思想的象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但将其捧为国粹，为其招魂者也大有人在。制宪中，军阀、旧势力拼命把孔子之道塞进宪法，以图将其作为复辟专制之护符。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44页。



李大钊积极撰文投入了这场已经超出了制宪问题的论战。他抨击宪草定孔道为“修身大本”是“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是死人的宪法<sup>①</sup>。他还从三个方面指出孔教与宪法不容的理由：1. 孔子是封建专制之护符，与保障国民自由之宪法不容；2. 孔子乃部分人之圣人，宪法则为全体国民之信条；3. “孔子之道”概念含混，而宪法中文字应有极明确之意义。对续议宪草中所提有信教自由之规定，他认为也应改为有不信教之自由。李大钊从法理角度所做的分析，有理有据、毫不含糊。对孔子，既没有完全否定他的历史作用，也没有强迫今人不可信奉，只是说不可将其塞进宪法，不可强迫国民信奉而已。这确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态度。

总之，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阶段李大钊的立宪主张中，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关注超过了对各国资产阶级制度形式上的追求，其主张本身也更系统、更实际和更成熟了。然而，由于他一直坚持着的调和的、平衡的理论的束缚，使他仍然未能找到一条实现其主张的现实的道路。在封建生产关系未被彻底打破，封建势力仍然把持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掌权的封建军阀根本不可能允许一部凌架在他们头上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存在。

对于制宪主张与现实可能之间存在的差距，李大钊并非没有察觉。但究其原因，他却归结于中国之国民缺乏“立宪国民之修养”，并具有两大弱点：依感情，不遵理性；搏腕力，不依法律。如何改变这些积习？李大钊寄希望于“上流社会，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而何为“立宪国民之修养”，他却只能勾画出一个中西掺杂的模式，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以自重而重人之人格，各人均以惕慎自恃，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而成立宪国绅士之风度。”<sup>②</sup>事实证明，在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尚未完成，资本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58页；第334页。

主义的足够强大的经济基础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期待封建军阀统治者“以克己之精神，养守法循礼之习惯”，只是梦想。即使有少数“上流阶级”之分子以身作则，也无法使广大生活在贫困和战火中的国民表现出“立宪国绅士之风度”。

李大钊在国民修养等问题上的论述，与其在辛亥革命前后对军阀政客的淋漓痛斥，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个反差所反映出的矛盾心态贯穿于他早期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等各方面思想之中。这种时而面对现实、忿世疾俗、直陈己见，时而又脱离实际、随意推理、沉浸于美好理想的表现，反映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内外特殊矛盾状态下，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矛盾心态。他们迫切要求改造社会，却找不到社会症结的根源和消除症结的方法，内心往往十分苦恼。尽管如此，他们对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学说的介绍，以及不屈不挠的探索精神和斗争经历，都对一个时代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从斗争挫折和教训中走了出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立宪制度的幻想，转变为初步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 三、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放弃资产阶级制宪主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以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促使李大钊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大战进行中，李大钊十分关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变化，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是战争的根源。他断定：民主主义必定因战争而“觉醒”、“发达”，大战的结果必将是社会主义的蓬勃兴起。李大钊在1917年4月发表的《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中首次提到社会主义，即宣告它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过渡。

世界观的转变，使李大钊对原来的制宪主张也有了重新认

识。他已经看清：要实现民主主义，不能仅满足于一个没有君主的团体，因为“君主虽退，一派的军阀一样跋扈”。“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若已获得，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Democracy中的一个过程。”<sup>①</sup>这里，李大钊明确提出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也就是“工人政治”的理想。李大钊还热情地赞扬布尔什维克的战争“是阶级的战争，是全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sup>②</sup>。是使“庶民们”获得真正民主权利的战争。

在“庶民们”获得真正民主权利后，将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呢？李大钊参照刚刚诞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国家形式，满腔热情地做出了一番设想：布尔什维克“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sup>③</sup>李大钊还号召“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开辟一个新纪元<sup>④</sup>。

以今天眼光衡量，这些理解未免有些幼稚。然而在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刚刚在俄国成功，无产阶级政权尚未成熟，能有如此水平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的。况且当时国内对俄国所发生的事情还所知甚少，军阀统治者又视无产阶级革命为洪水猛兽，敢于在报刊上公开报道和评论，并对其前途作出积极预见，其勇气和

---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04页。“Democracy”可译作民主主义、平民主义、平民政治等。但按照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见《李大钊文集》（下）第569页）中的表述，在这里应为“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为与前面各义区别，他认为应改为“Ergatocracy”，即“工人政治”一词。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00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

智识就更加使人敬佩了。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之后，再回过头来反思自己的制宪主张，李大钊终于得出了这样几个结论：1. 在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决不可能制定出一部代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2. 即使建立了一个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也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获得民主权利；3. 无产者阶级民主权利的获得，不能靠反动统治者的施舍，而要靠社会主义革命去夺取；4. 未来的世界将是无产者阶级的世界，将是赤旗插遍的世界。至此，李大钊已经基本放弃了原来的资产阶级制宪主张。

（作者单位：中北共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 早期李大钊对 改良派和革命派态度的演变

杨 洪 章

早期李大钊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洋军阀、改良派和革命派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时代。了解李大钊对这三大政治势力的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有助于认识他早期政治思想的特点。本文仅就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演变及其原因加以考察，以请教于史学界。

### (一)

民国初期，李大钊把北洋军阀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加以维护，所以，他反对与政府对立的各派政党。首先，李大钊把民初各派政党，看成是“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的“乌合之众”。他认为：“所谓稳健者，狡狴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sup>①</sup>其次，他把各派政党要人，看成是只顾榨取民脂民膏、争权夺利，而不顾“民生疾苦、国势陆危”<sup>②</sup>的寄生虫。他揭露道：这些政党的党魁，“华衣美食”，“酒地花天”，挥霍的都是人民的“脂膏”；他们“坐拥千金”，“贿买选票”，耗费的都是人民的“骨髓”。他们口口声声向老百姓说：“吾为尔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页；第42页。

作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其实是以此为幌子而相互倾轧，争权夺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这些政党的“党纲”看来，“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但是，“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基于这种认识，他断定“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是“敲吾骨吸吾髓”的寄生虫，“此辈肥而吾民瘠矣”<sup>①</sup>。再次，李大钊把民初各派政党，看成是亡国祸根。他说，我国“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这种现象叫做“党私”。他认为：“私心党见之足以祸国”<sup>②</sup>。因为有这种“党私”作祟，往往使各党在观人论事时，“具同党神圣、异党盗贼之眼光，挟顺我者生、逆我者死之气焰”<sup>③</sup>。这势必会引起政治动荡甚至军事暴乱。因为有些政党“多假军势以自固”，所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sup>④</sup>。他说，这是民初政党诞生不久，就使人“警之、惕之、箴之、戒之、诋之、祺之，甚至虑为亡国之媒”<sup>⑤</sup>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对所谓“暴党”即国民党尤为反感。他对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民国建立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共和已经实现，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改良和完善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因此，他反对坚持用暴力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国民党人。他认为，从前真正赤诚救国的同盟会的仁人志士，要么牺牲了，要么隐退了，现在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不为武断蛮野之军人，则为豪横骄喧之暴党”<sup>⑥</sup>。他们“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声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sup>⑦</sup>。其实，如让他们得势，“政权不入于军人，则入于暴党，其为少数柄政、暴民专制一也”<sup>⑧</sup>，那里谈得上共和幸福。由于对国民党有这种不好的看法，所以，当二次革命爆发后，他首先责怪“皖赣湘粤，岸傲自雄，不待宋案发生，借款事

①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5页；第1—2页；第41页；第4页。

②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2页。

③⑧ 《李大钊文集》（上）第42页。

起，始有离异之迹”<sup>①</sup>。当然，他也不赞成袁世凯滥用暴力，但是，他更“恐泰半之豪暴，或且烈于专制之一人也”<sup>②</sup>。

李大钊对进步党的态度颇为复杂。如前所述，他反对包括进步党在内的所有政党。但是，因为进步党是拥护北洋军阀政府的，在这点上李大钊的主张倾向于进步党。所以，他有些政治主张与进步党相同而与国民党相异。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进步党站在北洋军阀政府一边，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分权；国民党的主张与进步党的主张恰恰相反；而李大钊则明确主张中央收回军政实权，裁撤地方都督，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地方割据。在中央政权问题上，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偏重的是总统，进步党偏重的是内阁政府，国民党偏重的是国会。而李大钊却偏袒总统政府，弹劾国会。他颇为不平地说：“防总统政府专制者，吾闻之矣；防议会专制者，未之闻也。虑中央集权，启政府专制之患者，吾闻之矣；虑地方分权，召国家分崩之祸者，未之闻也。”难道只有“总统政府易于为恶，议会独不能为恶乎？”<sup>③</sup>

## (二)

袁世凯称帝时期，李大钊改变了过去反对所有政党的态度，在袁称帝公开化以前，他劝告国进两党共同合作，在“政治正轨”内与袁世凯的专制势力作斗争；反对进步党拥袁抑孙的作法，而对坚持反袁的国民党持同情态度；但他依然不赞同国民党的暴力革命主张。袁称帝公开化以后，国进两党共同合作，发动了武力讨袁的护国战争。李大钊积极支持两党的行为，并准备亲自参加护国战争。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先是强迫解散国民党，接着又把

---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35页；第42页；第41—42页。

进步党弃置一旁，而一味醉心于称帝自为的阴谋活动。李大钊对袁世凯的阴谋有一定的觉察。他改变了拥护北京政府、反对各派政党的态度，转而主张进步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组成强大的“政治对抗力”<sup>①</sup>，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袁世凯的专制势力相抗衡。为此，他分别向进步党和国民党提出了劝告和希望。

李大钊希望一贯拥袁抑孙的进步党，“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即国民党——笔者注）之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以指导专断或暴乱之势力”<sup>②</sup>。他认为，进步党与国民党虽然在手段上有缓急之分，但却是“殊途同归”，都以建立民主立宪国家为目标。所以，两党要携手合作。他回顾了过去两党分裂与合作的历史，指出：辛亥革命前，由于“党派分流，势力削弱，所谋遂巨数年而各无所成。”而当“激进派”在武昌揭竿而起后，“温和政社，相率奔驰运动”，“共和遂以告成”。他反问道：“设非二派同心协力，仍相背弛，则革命之成否”？所以，他希望进步党要从历史经验中“觉悟”过来，不要再与国民党“互相水火，与人以渔夫之利”<sup>③</sup>。李大钊告诫进步党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只要专制，不要开明，所以，应该放弃依靠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之迷梦”<sup>④</sup>。

李大钊对继续坚持反袁立场的国民党颇为同情。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仍“乘凯旋之余威，大张统一九服之功”，以维护“长治久安”为名，对国民党“益矜除异务尽”而后快<sup>⑤</sup>。李大钊公开抨击袁世凯的暴行，为国民党鸣不平。他说，秦朝短命、满清灭亡、沙俄暴乱、墨西哥革命，都是由于统治者滥用暴力造成的。既然北洋军阀政府不给国民党合法存在的权利，势必迫使它“铤而走险”，诉诸暴力革命。如果袁世凯不改弦更张，

①③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97页；第102页；第99页。

②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104页



转变对国民党的镇压政策，势必重蹈亡清的复辙。他警告袁世凯要“自节其无极之势力”，不要对“异派势力”“过事摧残”。

同时，李大钊也希望国民党放弃“以暴易暴”的立场，“与当局相见于政治平和竞争之轨”，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袁世凯进行合法的政治斗争。李大钊赞同在中国实行英国式的革命，而反对法国式的革命，认为“英无法之惨剧，而获得之政治，什倍于法”。他对国民党说：“当局者凭一时之势力，以图除尽异己之根株，吾人已叹其误。反之，民党各派之弗循正轨，而欲以暴止暴，吾人亦惜其妄而悯其愚。”他非常赞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之虚无党，则停止运动；德之社会党，则宣言救国；英之爱尔兰自治案，则暂泯争议”的作法。希望国民党以它们为榜样，为了民族利益，放弃暴力革命立场，与政府妥协。他劝告说：“若犹执迷不悔，仍欲以杀召杀，以暴止暴，此曰除恶务尽，彼曰与汝偕亡，冲突愈烈，恶感愈深”，以致于“忘怀家国以快恩仇，外力乘之，收为虎伥”<sup>①</sup>，岂不令人伤心！

李大钊的上述观点，与国民党温和派——欧事研究会的主张很相似。1914年8月，留居日本的一些国民党右翼，成立了一个独立于中华革命党之外的“欧事研究会”。袁世凯秘密进行称帝活动时，他们有与进步党共同合法反袁的要求。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后，他们曾两次发出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停止暴力行为，在合法范围内与政府作斗争。起草者为章士钊<sup>②</sup>。欧事研究会的行为，恰似李大钊列举的一些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作法。当时，李大钊正在日本留学，并在章士钊主办的欧事研究会的喉舌《甲寅》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政治观点，受到章的很大影响，与欧事研究会的政治主张基本雷同。

<sup>①</sup> 以上引文见《李大钊文集》（上）第106—107页。

<sup>②</sup>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15—217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915年8月，筹安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已经公开化。这使许多人彻底认清了袁的反动本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坚决反对袁复辟帝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人，也慨然反悔，毅然由拥袁转变为反袁，并率先发动了讨袁护国战争。李大钊也一改过去那种反对“以暴易暴”的态度，积极支持国进两党武力讨袁的正义举动。他积极参加反袁的留日学生总会，进行讨袁的宣传活动，并为讨袁护国军捐款。为了实现“横刀跃马，效命疆场”<sup>①</sup>，与袁血战到底的誓言，他于1916年初毅然弃学回国，准备参加讨袁护国战争。由于护国战争主要是进步党发动和领导的，所以李大钊这时对进步党的看法特别好。他曾经出席过宪法研究会的第一次集会，并担任过汤化龙的私人秘书，主编汤化龙创办的《晨钟报》。而他对于国民党，则没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 (三)

袁世凯败亡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在张勋复辟以前，李大钊一度把段祺瑞政府又当成了死而复活的民主共和政府。因此，他又反对与政府对立的任何政党。

当时，围绕着省制与宪法问题、对德外交问题和府院之争问题，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李大钊参加了这些问题的争论。他的观点明显地反映出袒护政府，反对各派政党的思想倾向。在宪法问题上，他不同意改组现政府，实行“联立内阁”或“政党内阁”。因为在他看来，我国“素具基础之大政党”，其“智验德能，均不足以语调和容愜之精神”<sup>②</sup>，不具备实行政党政治的条件。在对德外交问题上，他支持段政府对德绝交的外交政策，反对任何党派借外交问题攻击政府或争权夺利。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50页；第296—297页；

他指出：在民族危亡、千钧一发之际，“国人不惟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攻诘政府之具，同时亦不可以外交问题为攘夺政权之具”<sup>①</sup>，国难当头，不允许有“政府反对党存立之余地”<sup>②</sup>。在府院之争问题上，国会中的国民党激进派站在总统一边，研究系站在段祺瑞一边，而李大钊则采取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他热切盼望“吾仁明之总统及刚直之总理，均宜以国家体面为重，速谋转圜之道，而利外交之进行”<sup>③</sup>。同时，他劝告“在野之各政团”，“幸勿借题发挥，施其挑拨之伎俩，以图乘时攘权而快私意”<sup>④</sup>。

研究系是拥护段祺瑞政府的，在这点上李大钊与它没有根本分歧。但李大钊对研究系重演以段制孙的故伎表示厌恶和失望。他愤然脱离了与研究系领袖汤化龙等人的密切关系。1916年9月5日，他辞去了《晨钟报》编辑主任的职务。他“临别赠言”，发表《别泪》一文，“尚托辞寓意以为讽劝”<sup>⑤</sup>。在这篇文章里，他称研究系“专好结交官僚豪霸子弟”，“浸染恶习甚深”。他以少女和未婚夫对话的口气暗示：自己曾因长期受到汤化龙等人的优待照顾而“以身许”之，但他对他们“助异姓之豪强，以倾轧同辈”的作法很不赞同。如果他们仍执迷不悟，而自己又无力“干预”，那就只好“决然去而之他”<sup>⑥</sup>。不过，这篇文章的基本格调是劝告研究系悬崖勒马，而不是对其反戈一击，彻底决裂。这时，李大钊对研究系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赞成服从，也不“干预”反对，而是厌而远之，大失所望。

同样，李大钊对国民党也感到失望。他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认为，国民党激进派和北洋军阀、研究系一样，“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为了挽救危局，他希望“别造一种新势力以代之”，即“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李大钊这种不满于现状、探索求新的精神，是同辈知识

①②③④⑤⑥ 《李大钊文集》（上）第304页；第328页；第330页；第331页，第511页；第213—214页。

分子中无与伦比的。但是，他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无产阶级这个“新中心势力”，他所说的“新中心势力”仍然是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李大钊看来，可以以介于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之间的其他政团为基础，“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所以，他这时的政治观点，还是倾向于章士钊为代表的调和派的主张，其政治立场是游移于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之间，处于调和的地位。

在宪法问题上，研究系主张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国民党激进派主张民权主义，地方分权；而章士钊则把两种对立的主张调和在一块，认为“惟行联邦之制国家主义始得孕育适当”，“联邦政治实乃发达国家主义最直最稳之途”<sup>①</sup>，同样，惟在国家主义下实行联邦之制，才是真正的联邦自治。李大钊也认为，“政理”和“物理”一样，“相杀而相生，相反而相成”，“中央地方权限分配之际亦宜遵奉此律”<sup>②</sup>，既不能内重外轻，也不能外重内轻，应“内外相维以持其平”<sup>③</sup>。

在省制问题上，研究系主张省制不入宪法，以普通法律定之；国民党激进派则主张省制大纲应在宪法上规定好，并坚持省长民选<sup>④</sup>。李大钊也倾向于“省制似宜规定于宪法”，并且亲自草拟了在宪法上规定的省制大纲。但他又认为，也可以先用普通法律规定省制，“然后摘其纲领入于宪法”，或“先将宪法其他部分完全制定，而后议省制之部分”<sup>⑤</sup>。

在对德外交问题上，研究系主张对德绝交，国民党激进派反对对德绝交。章士钊为了调和两派的矛盾，主张在国务院中增设不管部的国务员，将在野各派的领袖吸收进来，共同讨论当局的对外政策，以便统一对外的意见<sup>⑥</sup>。此时，李大钊正受章士钊之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238页；第236页。

③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236页；第240—242页。

④⑥ 李剑农：《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59页；第262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约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sup>①</sup>。他在该刊上发表了《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三）、（九）》两篇文章，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他对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增设不管部及其阁员的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认为这一制度弥补了“代议政治”“不适于军政”战时状态的缺点，“为世界立宪政治开一新纪元”<sup>②</sup>。虽然他再三声明对于在中国能否实施这种制度“未敢妄谈”，但他实际上是赞成实行这一制度的。

然而，高一涵在《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一文中谈到当时他与李大钊同章士钊的关系时说：

“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那时，十月革命已经胜利。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们便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刊》。”<sup>③</sup>

这个回忆材料似与事实不符。其一，当时李大钊和章士钊一样，都把段祺瑞政府当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来维护，并且都站在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中间，处于调和地位；并不是李大钊“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则“维护他们”。在这方面两人无意见分歧。其二，张勋复辟前，十月革命并未爆发，李大钊也不可能因为介绍十月革命而与章士钊发生意见分歧。其三，迄今为止，尚没有发现李大钊和高一涵“登报申明”“脱离了《甲寅日刊》”的文字材料。可见，上述三点都不是李大钊脱离《甲寅》日刊的原因。据章士钊回忆，李大钊是在《甲寅》日刊停办后自然离去的。他说：“此刊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未几，彼此都觉厌倦，因将日刊停止。”<sup>④</sup>

① 《李大钊年谱》第3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342页。

③④ 《回忆李大钊》第165、14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材料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其一，《甲寅》日刊的政治倾向确实是站在调和折衷的立场上纠正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的“政治偏向”，不偏不倚，不一边倒。其二，张勋复辟后，李大钊由北京逃到了上海，自然与《甲寅》日刊脱离了关系。章士钊也感到“厌倦”，遂将该刊停办。经过一段沉默和反思后，李大钊和章士钊、李剑农、高一涵等人毅然改变了过去的中间立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他们在《太平洋》等刊物上发表许多文章，共同反对梁启超的“伪调和论”，宣扬他们的所谓真“调和论”。

#### (四)

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新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公开践踏民主共和制度，反动本质彻底暴露。研究系仍死心踏地拥护段祺瑞，完全成了北京政府的御用党。国民党革命派发动和领导了护法战争，继续进行武力反段斗争。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李大钊的思想情绪一度非常悲观。但他很快振作起来，对自己过去斗争的经历作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对研究系和国民党革命派有了新的认识，从而转变了以往那种自居于两者之间的游移立场。

李大钊公开批判了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彻底与研究系实行决裂。他揭露了研究系的“伪调和论”的实质。梁启超等人为了拥段抑孙，极力兜售一种调和理论，即主张国民党要以自我牺牲、自我毁灭的精神，来调和与北洋军阀政府的矛盾；而他则以居间调停者的身份出现，暗地里干着助纣为虐的勾当。李大钊尖锐地指出，这种理论是“伪调和”论，这种政治团体和个人是“伪调和派”<sup>①</sup>。他认为，真正的调和是以“自存共存”为宗旨，由对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11页。

立双方“直接”调和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以“自毁自灭”为宗旨，由对立双方之外的第三者“间接”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sup>①</sup>。他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北洋军阀、缓进派和急进派相互角逐的过程，指出以调和者角色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缓进派，其实质是拥护“特殊势力”——北洋军阀，排斥急进派，而达害人利己的目的。其结果是，“敌党之势力方尽，己党之生死亦操诸强有力者之手”<sup>②</sup>，“缓进派亦遭屏绝”<sup>③</sup>。这就是伪调和者的下场。

李大钊明确指出，以中间人自居的缓进派与北洋军阀一样，都是“旧势力”的代表。他说：“缓进派时时在特殊势力卵翼之中”，“特殊势力时时在缓进派指导之下”<sup>④</sup>，它们都属于“旧势力”。李大钊回顾了民国建立以来新旧势力斗争的过程，指出“短兵相接，首当其冲”的，往往“不在急进派与特殊势力或官僚之间，而转在急进派与缓进派之间。”<sup>⑤</sup>所以，他说：“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挤，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挤；旧势力与新势力有时相安，即可认为缓进派与急进派之相安。故愚不认缓进派而外尚有旧势力之别树一帜，有之，真政治信念亦必与缓进派所持者相近而可一类视之也。”<sup>⑥</sup>

在与研究系实行彻底决裂的同时，李大钊也根本清算了自己过去那种游移于新旧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指出，在研究系和革命党之外的其他政治团体，“盖不居于新之半，即居于旧之半”<sup>⑦</sup>，绝“无纯为第三之政治信念可以游移于二者之间者”<sup>⑧</sup>。他认为，最危险的处境是：“自别于新，而又自别于旧，不甘于旧而又不肯居新，宅不新不旧之地位，挟非新非旧之势力”<sup>⑨</sup>。有了这种认识之后，李大钊以新势力的一员的精神面貌出现，毅

①②④⑤⑦⑧⑨ 《李大钊文集》（上）第498—500页；第511页；第505页；第509页；第500页；第503页；553页。

③⑥ 《李大钊文集》（上）第506页。

然站在同情国民党的立场上，同旧势力的代表——北洋军阀和研究系展开了斗争。

这场斗争主要表现在他在暴力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与梁启超的论争。李大钊认为，革命是由统治者滥用暴力施行暴政引起的。他在论述革命与暴力的关系时说：“革命恒为暴力之结果，暴力实为革命之造因”；“革命固不能产出良政治，而恶政之结果则必召革命。故反对革命者当先反对暴力，当先排斥恃强为暴之政治。”<sup>①</sup>他警告说：统治者滥施暴力，“不啻为承认善良公民有革命权利之表示”<sup>②</sup>，因为“民意之受迫而求伸也，不能以径达，必求以曲达；不能以常达，必求以变达；不能以缓达，必求以激达；不能以理达，必求以力达。由是曲、变、激、力之道，小则出于暗杀，大则出于革命”<sup>③</sup>。梁启超的口号是“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而不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李大钊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因果颠倒。针对“梁先生既反对革命，而独不反对暴力，有时且与暴力相依为命”的立场，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无论何时皆反对暴力”的政治主张<sup>④</sup>。

这种主张，明显地反映了李大钊反段反梁、同情国民党的思想倾向。但他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暴力，也说明他依然不赞成国民党“以暴易暴”的作法。按说，既然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是新势力的代表，而自己又不愿像过去那样居于“不新不旧之地位”，决定站在新势力一边，他应该赞成国民党的暴力革命主张。但是，辛亥革命以来，国民党的革命行动一败再败，使李大钊感到失望。这种情绪早在《中心势力创造论》中就有所反映。这时，他愈加认识到所谓的中华民国，与其他“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相比，“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sup>⑤</sup>。就是国民党也担负不起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这使他对国民党更加失望，对暴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525—526页。

⑤ 张静如、马模贞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第43页。



力革命能否成功愈加怀疑。

怀疑的过程，也是探索新的道路的过程。李大钊仍想寻找一种新的中心势力，建立一种新的组织，作为救国救民的中坚力量。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因素，所以，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很快找到了工人阶级这个伟大的力量，积极投身于建立一个与“政客组织的政党”和“中产阶级的民主党”根本不同的“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sup>①</sup>的活动，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五)

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和认识，总起来讲，是不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化的。但却有很大的反复性和曲折性。这是民国建立以来动荡不定的政局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在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反映。其原因极其复杂。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从客观上讲，各派政党都有自己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从党员素质和成份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进步党（研究系），都有许多封建官僚、投机政客和军阀武人混杂其中。并且，由甲派变为乙派，或由乙派变为甲派，或既为甲派又为乙派的党员比比皆是。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这往往使人真伪难辨，善恶难分。而政治阅历尚浅的李大钊，则更难以分清谁是谁非。从两党的政纲看，清朝被推翻后，君主立宪失去了依托，反清排满达到了目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失掉了原来的奋斗目标。虽然两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但在党纲上却几乎看不出它们的差别和矛盾。到了段祺瑞统治时期，甚至连一个党纲的招牌都没有了。这种现象，往往使人对它们的印象是“只争意见不争政见”，只顾争权夺利，不管国难民生。所以，李大钊对它们均无好感：要么一概反对，要么站在两者中间处于调和地位，很难诚心拥护那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444页。

一派，更谈不上加入那一派。

第二，从主观上讲，李大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和认识有一个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这就决定了他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和认识也有一个反复曲折的变化过程。袁世凯统治初期，他把北京政府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加以维护，因此，反对与政府对立的任何党派，特别是国民党。袁世凯称帝时期，他反对北京政府，因此，主张两党合作，同情坚持反袁的国民党，而对拥袁抑孙的进步党表示厌恶；当进步党转而发动讨袁护国战争时，他又表示支持进步党。段祺瑞统治初期，他又把北京政府当成了死而复活的民主共和国加以维护，因此，重新回到了反对与政府对立的任何政党的立场，对国民党、研究系均表失望。段祺瑞统治后期，他转而反对北京政府，因此，与北京政府的御用党——研究系彻底决裂，而对国民党持同情的态度。总之，当他拥护北洋军阀政府的时候，往往倾向于进步党（研究系），厌恶国民党；当他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时候，往往同情国民党，抨击进步党（研究系）。

第三，章士钊等人的影响。章是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辛亥革命后，他创立了一套调和主义的理论，主张进步党（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相互调和矛盾，相容相抗，相提相携，在法律允许的合法范围内与北洋军阀势力作政治斗争，引导北洋军阀逐渐走上民主立宪的轨道<sup>①</sup>。从1914年到1917年，章先后在日本东京和北京创办《甲寅》杂志和《甲寅》日刊，宣传他的调和论主张。经常在上面发表雷同主张的还有张东荪、高一涵、李剑农等人，李大钊也是其中之一。李大钊受这些人的影响颇大，其政治立场，基本上与章等人一样，是站在进步党（研究系）和国民党激进派之间，处于游移、调和的地位。这是他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反复无常、曲折多变的原因之一。

<sup>①</sup> 参见秋桐：《调和立国论上》，载《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

通过考察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态度变化过程，可以看出，他既不同于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也不同于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政治立场是游移于改良派和革命派中间，处于调和折衷的地位。但他并不是站在与改良派和革命派等距离的中间立场，而是站在越来越倾向于革命派、背离于改良派的中间立场，这表明，他的早期政治思想中虽然既有民主主义的成份又有改良主义的因素，但民主主义的成份远远大于改良主义的因素，并不是各占一半。因此，笔者认为，早期李大钊确实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个改良色彩较浓的温和的民主主义者。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师范专科学校政治系）

# 论“五四”前后李大钊文化思想的发展

萧 超 然

李大钊是我国现代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他在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率先迈进一步，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领先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

## (一)

李大钊年轻时受学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当时，法专大多数学生都属于改良派。李大钊在以后的十多年里，迭经武昌起义前夜及新文化运动初期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基本未曾放弃改良主义的思想信仰。<sup>①</sup>

在近现代中国思想舞台上，改良主义者基于非暴力的政治立场和比较渊博的知识背景，从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便形成了重视文化变革问题的思想传统。李大钊承袭了这个传统，民族文化心理改造成为他所关心的一个中心问题。就其早期发展阶段而言，李大钊文化思想中最具价值处莫过于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分析与批判。

早在《言治》时期，李大钊根据“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

---

<sup>①</sup>国内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把所有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前史千篇一律地定性为激进的革命主义。其原因或是出自拔高历史人物的政治考虑，或是限于形而上学的史识模式，然而在相当一个程度上不符合历史真实是共同的。

民力”<sup>①</sup>的思想，即对民德之衰落以及可能出现的民权之旁落表示了担忧。1913年底赴日留学后，他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与袁世凯复辟事件的反思，进一步认识到：上述事件的出现有着相当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不能仅仅归结为袁氏一人或北洋一派的罪恶。在《风俗》、《民彝与政治》等重要文章中，李大钊结合袁世凯窃夺国柄的沉痛教训，从政治认识、政治感情及政治评价意向三个角度出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索和分析。

首先，李大钊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认识的非主体性特征及其弊害。

“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都在专制统治的压制之下，除了最困苦的时候，不能不起来反对压制外，平常是谈不到对政治有什么意思能够表示的。”<sup>②</sup>即便是在反抗压制、亲手推翻了一个皇帝之后，他们所表达出来的政治意见仍然是推戴一个新皇帝治理国家，自己则重新恢复到默默无言的地位。所以，除了在王朝更替战争中作炮灰和在王朝安定时作顺民外，中国的民众几乎意识不到自己对国家政治体系可能施加的影响以及应该享有的权利义务。这种非主体性的政治认识，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其次，李大钊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感情的非规范性特征及其弊害。

宋元两朝，理学家以理学禁锢人心于内，统治者以斧钺屠戮人命于外，逼使中国人把自己的政治感情变成了一个难以捉摸的未知数。其特征为，如对某一对象产生了比较确定的政治认识后，人们的感情反映却可能相差甚远，相当缺乏规范化。

《言治》时期，李大钊就指出，有明以降，“士风偷惰，志节荡

---

①《李大钊文集》（上）第41页。

②李剑农：《戊戌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版。

然”<sup>①</sup>，满清暴政苟延末运二百余年，民国初年，此况更烈，中国几成“群德堕丧之国”。在李大钊看来，这种群德的堕丧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政治道德和政治行为规范的极度贫乏。而健全的政治生活应当建立在规范化的政治道德与政治行为准则之上。只有这样，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实现。

最后，李大钊分析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评价意向的排它性特征及其弊害。

李大钊指出，由于中国专制积习深重，按“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荒唐逻辑引伸推演之，结果将异端等同于邪说。民国初年，由于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满清专制制度的覆灭，民间持论的外在自由条件有所改善，然其内在自由依然为零。其时，国内主要舆论机关几乎都充当了袁世凯骗取民意、扼杀自由的工具。针对这一教训，李大钊要求对于各种思想学说要有包容的态度。具体而言之，即为“但察其是，勿拒其非，纵喜其同，莫禁其异，务使一群秉彝之所好，皆得相当之分，反复辩论，获其中庸之理”<sup>②</sup>。他认为只有这样，其是非曲直获决于天下公论之中，于是，“健全之舆论成，而美满之宪政就矣”<sup>③</sup>。

政治认识的非主体性、政治感情的非规范性以及政治评价意向的排它性，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个显著特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专制制度机制的不断修复和袁世凯之流层出不穷的政治文化背景。借助于此，袁世凯之流每逢社会动荡变迁之际，总能为自己的得逞找到社会基础、活动时机及所谓“民意”。古德诺等帝国主义分子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把传统政治文化的上述弱点归结为中国人民的自然性格，进而制造了封建专制的理论依据“国情论”。对此，李大钊严正指出：“此非吾民族秉彝之性，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0页。

<sup>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72页。

只以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遂成此不自然之态耳”<sup>①</sup>。所以，它们是可以改造的。当时的李大钊认为，改造的基本方式是，首先来一场托尔斯泰式的革命即通过全民族的自我解剖和忏悔，彻底根除民族性格中传统文化的糟粕性遗存，而后继之以“培根固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以期全体人民“自觉近世公民之新精神”<sup>②</sup>。为民主政治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上述就是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应当强调指出：李大钊早期文化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从社会角度考察，二次革命至护国战争前后，国内思想界一片萧索。老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等，或“投笔从政”终日奔走于权贵之间，或保守倒退不惜在“筹安会”里讨生活；新起之秀蔡元培、鲁迅、胡适等，或远赴欧美啃书本，或藏身老屋钞古碑。只有陈独秀间或还写些文章，但在《新青年》以前，为文亦多含“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也”等悲怆消极之意<sup>③</sup>。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思想恰如黑暗中的晨星，显得更加耀眼夺目，给人一线新的生机和希望。

从个人角度考察，李大钊早期对文化问题之研究为其文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下列有利条件：其一，诱发了他注重文化研究的心理偏好和思想定势；其二，提供了雄厚的知识积累的思想准备；其三，为他赢得了必要的社会影响和声望。所有这些，对于他日后思想光华的充分展现，对于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健将，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 (二)

1915年前后，中国近代化的客观进程开始出现重大转折。——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75页；第149页。

<sup>③</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68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场决定华夏文明命运的伟大思想风暴就要来临了。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正式揭开了伟大思想风暴的序幕。1916年7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到北京，出任《晨钟报》第一任主编，迅即投进了这场伟大的思想风暴。他在发刊辞《〈晨钟〉之使命》一文中，立足于“青春中华之创造”的爱国主义立场，发出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呼唤，作出了“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的规律性总结。并对这场正在兴起的、直接关系到民族命运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一，“取由来之历史，一举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sup>①</sup>，彻底与封建文化传统决裂；其二，全面引进西方文化并加以改造，“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sup>②</sup>。这两条原则，勾勒了本时期李大钊文化思想活动的大致轨迹。

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次攻坚战，也是本时期李大钊文化思想活动的第一个兴奋点。同陈独秀等人相比，李大钊的一个特点是，他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孔与国民性解剖结合起来，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批判。

针对民初思想界几度沉渣泛起的尊孔逆流，李大钊首先予以迎头痛击。根据思想变迁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进化论观点，李大钊分析道：“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sup>③</sup>。所以，孔子及其学说实质上是“专制政治之灵魂”，有着强烈的反动性。其次由于时代的变化，孔子及其学说已完全适应不了现代社会之需要，实际上只是一堆“残骸枯骨”，有着极端的落后性。对于这样一具反动落后的思想僵尸，李大钊严正指出，决不能听之任之让其自然灭亡，而必须加以“人为淘汰”，早日把他送进历史博物馆。

---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81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为了肃清封建传统文化的糟粕性遗存，李大钊在严厉批孔的同时，还把他的思想锋芒深入到民族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层面，对蔑却理性、泯灭自我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剖析与批判。

李大钊认为：“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是“国民第一弱点”<sup>①</sup>。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由于任情随性所发，国人思想转换与行为调适往往一哄而起，一哄而收，变幻无常。基于上述认识，李大钊对五四前后的社会心理变幻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势力进一步强大，社会思想与实际生活呈现五光十色，动荡环境下往往变易无常的国民性开始了一种异样表现。守旧派纷纷变换旗号或混充牌号，一个思想者长期震颤才能完成的思想转化，他们可以一夜之间便毫无痛苦地完成了。结果以至最先反赤化的安福俱乐部也在一夜之间改唱起了社会主义。对于这种信仰转换，李大钊深刻地指出：“中国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甚至把时代思潮、文化运动、社会心理，都看作主考一样。所说的话、作的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sup>②</sup>。所以，这种貌似进步的应考遗传性，实质上恰恰是蔑却理性与自我之国民性的一大表现。

输入引进近代西方文化，“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是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基本内容。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亲自作了许多介绍西方思潮的工作。但作为思想家，他们更重要的工作则在于通过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彻底肃清社会上中土文明高于西方文明、中体西用之类的论调，为人们顺利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33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105页。

地传播和接受西方文化扫除思想障碍。1915年底陈独秀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明确地把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洋文明定为“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的“古之遗”，认为只有“欧罗巴文明”，亦即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的“近世文明”<sup>①</sup>。次年10月，《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发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一文，热烈礼赞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引发了影响巨大的东西文化论战。

自1917年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一系列文章，加入了论战。从数量上看，李大钊关于这一论战的文字同陈独秀、杜亚泉等人相比，并不算很多。但在内容上，他的思想和论述却多有独到之处。

第一，运用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整体方法，对东西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全面比较。

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新文化运动自其兴起之时便带上了理论色彩淡漠的胎记。东西文化论战的情况也不例外。《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两文，堪称论战初期双方的代表作。撇开论点不谈，陈、杜2人对于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就所见者杂举之”，结果双方之论析均缺乏足够的理论性和逻辑性。在这一方面，李大钊超出了他们。李大钊出身政治学本科，又专攻历史哲学，对孟德斯鸠及圣西门等人的思想学说较为熟悉。受地理史观和经济史观的影响很大。按照地理学派与经济学派的观点，李大钊以欧亚交接处为界，把世界文明分为南北两系。他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不能不转徙移动，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

<sup>①</sup>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住的”<sup>①</sup>。在此基础之上，李大钊依次从生活习俗、思想意识、宗教信仰、伦理观念和政治制度等五个角度，对东西文化的各自特征进行分析比较，表现较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

第二，正确肯定西方文化的历史进步性，驳斥了保守派的传统文化优越论。

杜亚泉认为，西方与中国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其性质之异主要在于：西方是动的社会，中国为静的社会；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尽管杜亚泉表面上承认两种文明各有流弊，但他的最后结论则是，西方动的文明弊害更大，而且必须靠中国静的文明来救治；至于中国固有的静的文明，非但无须效法西方文明，而且当此世界潮流逆转之时，尤为人类文明的方向。李大钊同意杜氏关于东西文明的特征分别为“静的”、“动的”之说，然而他们关于两种文明之命运的最后结论则是截然相反的。基于多方位的分析和比较，李大钊认为，“今日立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反之，“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sup>②</sup>。根据这一对比，李大钊明确指出：“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故甚希望吾沈毅有为坚忍不挠之青年，出而肩此重任。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sup>③</sup>。对于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李大钊的上述论断不啻是迎头棒喝。

第三，通过对文化建设中民族本位意识和民族使命感的论述，客观上为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情绪敲了警钟。

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人士愤于传统文化误国之深，加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58页；第562页；第440页。

之过于强烈的世界主义意识，表现出比较严重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情绪。李大钊没有苟同。他认为：“中国于人类进步，已尝有伟大之贡献。其古代文明，扩延及于高丽，乃至日本，影响于人类者甚大”<sup>①</sup>。尽管今日中国文明衰颓于静止之中，然而西方亦疲命于物质之下，同样是诸多弊端。今后唯有调和兼济东西文明的“第三新文明”才是人类的未来，只要我们虚怀若谷以迎接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那么不仅中国的文明可以复活，而且必能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第二次大贡献。为此，他谆谆“希望为亚洲文化中心之吾民族，对于此等世界的责任，有所觉悟、有所努力”<sup>②</sup>。从客观上说，李大钊这就为激进派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情绪敲了警钟。

批判传统文化替新文化开辟道路，引进西方文化为新文化奠定基础，而后“变‘人’之文明为‘我’之文明”，这就是李大钊心目中新文化建设的三部曲。其中一个“变”字，清晰地反映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必须是创造，而不是简单移植或模仿，这是问题的核心。当时的李大钊认为，这一最大难题应当通过调和东西方文明的方式予以解决。兴许是“调和”一词听起来不那么革命，国内学术界为尊者讳的好心人不愿触及这个问题。然而鉴于它是李大钊思想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有必要对其基本内容及特点作一分析。

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包括两方面内容。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世界文化发展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调和问题。李大钊认为，“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首先需以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为基础。所谓觉醒的内涵则为“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sup>③</sup>。其次，“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并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61页；第571页；第580—581页。

有之”<sup>①</sup>；日本作为“无固有文明之国”<sup>②</sup>和“能综合异派文明兼容并收之民族，固于异派文明之调和易于介绍疏通之助”<sup>③</sup>。因而李大钊认为，它们在东西方文化调和中可以充当疏通媒介。最后，苏俄、日本等国虽可为疏通媒介，但调和大业本身之完成，必有赖于处在两大文化中心的民族。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中国文化建设意义上的中西新旧调和问题。李大钊认为，“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sup>④</sup>。新旧不调和必然引起矛盾。近代中国的生活同样是新旧矛盾的生活。其解决方法依旧是调和。但究竟怎样调和呢？李大钊正确认识到，“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然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sup>⑤</sup>。也就是说，新的逐渐取代旧的。鉴于中国现实矛盾生活的病因在于“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sup>⑥</sup>，李大钊认为调和这一矛盾生活的办法只能是：“固新文明新生活之地位，以与旧文明、旧生活分对等之势力，而深养其锋，以迫旧文明、旧生活与新文明新生活相妥协、相调和，否则征服之而已矣”<sup>⑦</sup>。

如果不拘泥于字眼，而是深入考察其本质内容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李大钊的文化调和论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进步性。它不是和稀泥，它的实质在于调适，在于把中国传统文化调适到近代西方文化之高度。其实现方法则为，在一个统一体内，积极为新鲜事物的发展创造条件，促使其壮大，最后通过新陈代谢逐渐消灭旧事物。由于这一种进步性，李大钊与章士钊等人新旧杂糅其表、斥新护旧其里的调和论表现了本质差异。笔者认为，李大钊的这种调和论，实际上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主义”有异曲同工

---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页；第254页；第571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537页。

⑥⑦ 《李大钊文集》（上）第539页；第254页。

之妙。如果我们承认后者价值的话，自然不应该菲薄前者。

应当强调一下，李大钊文化调和论的更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和文化进化论一起，直接诱发了李大钊对苏俄文化的关注，进而促使他首开中国接受研究社会主义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之先河，成为了把新文明之火引入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 (三)

1918年底，李大钊文化思想活动的兴奋点转向了社会主义性质的苏俄文化。从思想发生学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李大钊的思想转变具有深刻背景，并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表明了包括西方近代文明在内的各种原有文明的深刻危机，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作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李大钊亦深受震撼。尽管他当时仍在为传播西方文化奔走呼唤，但心灵深处已对其发生了失望和动摇。早于回国之初，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sup>①</sup>。这一段话里，表明了李大钊对东西方现存文明的态度以及对新文明的朦胧向往。

第三文明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经过较长时间的思索，李大钊认为，它至少应当具备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根据文化进化论观点，它应当是发展较迟的新兴文明。李大钊指出，某些文明由于发展较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分别导致了曾经灿烂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和近代西方文明或亡或衰，“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所以，鉴于“新兴羸陈腐、青春胜白首的天演公例”，第三文明必须是发展较迟的新兴文明。第二，根据文化调和论观点，它应当是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文明。与此相关，由于地理史观

<sup>①</sup>《李大钊文集》（上）第184页。

的影响，李大钊认为这种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的新文明，应当由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的民族创造之。

按照自己对新文明的期望特征，李大钊对符合具备第二点特征的俄国社会及其文化给予了较多注意。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后，李大钊连撰数文，认为“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可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sup>①</sup>，“益显世界民主政治之光辉”<sup>②</sup>。对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题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重要文章，把生机勃勃的俄国十月革命称作为“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影响呢？文章作了下列分析。首先“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盛畅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英若法，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已臻于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和它们相比，“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但“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sup>③</sup>。其次“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所以，“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sup>④</sup>。基于这种认识，文章分析预测了苏俄文明之崛起与人类文明新潮流之间的内在民族联系及其重大影响，明确指出俄国十月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之显兆”<sup>⑤</sup>，因而它必将摧发20世纪人类文明的绝大变动。

李大钊的这种卓识，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初，人们还普遍缺乏认识的情况下，不仅识见非凡，其影响亦不异于空谷足音。但也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第362页；第574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应当看到，由于前述期望特征以及认知结构的影响，李大钊对苏俄文明之生命力的把握，依然局限于发展较迟、有独特地理条件两个外在特征上。其次在苏俄文明性质问题上，他还是将其看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调和物，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根本不同于现存文明的新型文明。此外，尽管该文提及了20世纪人类新文明将萌生于苏维埃文明之中，但就在同时发表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里却又以为后者是东西方文化调和的一种“媒介”，反映了李大钊对苏俄文化之作用的矛盾认识。所有这些都表现出，李大钊此时对苏维埃文明的认识还停留在表层的感性认识阶段。

但是到1918年底，随着导致同盟国败降与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性革命风暴，随着苏维埃文明的精神汹涌磅礴地扑面而来，在我国卷起了一场真正的思想飓风。在它的推动下，李大钊对苏俄文化的认识迅速升华。其间，他先后发表了《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这些文章正确指出：苏维埃文明的崛起，是俄、德等国劳工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和列宁、李卜克内西等人领导下胜利奋斗的结果。这一结果开辟了截然不同于战前世界的人类新纪元；在这个新纪元，英、法、美等国的统治者“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所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①</sup>。这些论述意味着，李大钊基本认识到了苏维埃文明的内在本质。

李大钊文化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换，是沿着汲取新知与扬弃旧识两条线索同时进行的。

1919年7月，李大钊在《阶级竞争和互助》一文中，最早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人类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文化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9月间，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比较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的学说。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03页。



对于这一学说，李大钊专门称之为“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sup>①</sup>，表明他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观。加之哲学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化地连带影响，李大钊很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与此同时，他对原先的文化思想进行了清理和扬弃。在《新纪元》一文中，李大钊第一次对他一直奉为思想圭臬的社会进化论表示了怀疑，认为社会进化不是靠竞争，而是靠互助。随后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他进一步把“人类应该相爱互助，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称作是“确信不疑”的道理。上述变化表明，李大钊已放弃主张生存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转向了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应当指出，李大钊是把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来看待的，所以这一转变依然反映了他向真理的逼近。其次，李大钊1919年底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时代是最有力的调和者，从而放弃了文化调和论。他说：“时代不仁，演出新旧，惹得主张调和的人天天忙，天天担忧，天天夹在新旧之间，受些闲气，结果还是两不讨好。我劝主张调和的人歇歇罢！那进行不息的时代，才有调和的真本领呢！”<sup>②</sup>这实际意味着，李大钊已从调和完善现有东西方文化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的思想圈子里跳出来，把新文化建设的希望完全投到了时代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文化之上。

随着思想转换的逐渐完成和思想本身的基本成熟，李大钊于1919年初撰写并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文。在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介绍并创造性地阐述了下列基本思想。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则。文章指出，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物质的经济构造则是这些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却不能限制物质和经济的变化。所以，“凡一时代，经济上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9页；第114页。

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第二，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变动根本动因。文章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立国，所以作为农业经济组织形式的大家族制度特别发达，成为二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基础构造。由于孔子学说是建立在这一基础构造之上的表层构造，有着深厚的经济基础，所以能够支配中国人心达二千余年之久。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工业资本侵入中国，严重压迫了国内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同样，由于西方经济势力的扩展和国内现代经济的兴起，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劳工神圣”的新伦理等，也就随之而产生了。第三，关于新思潮胜利的必然性。“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文章最后正告顽固保守势力：他们如若不能把现代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欧洲文明完全扫除而回复到古代封闭静止的生活，则他们钳制新思想的企图便必然归于失败。就主要内容而言，这两篇文章不仅最早在中国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原理，而且是李大钊文化思想转换过程基本完成的标志，意义是重大的。

尤为值得提出的是，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思想家，李大钊并未把思想的成就束之于讲坛，而是把它运用于火热的实践中，进而形成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新主张和新准则。第一，关于文化运动的力量基础和基本方向。李大钊以前以为，国民文化心理的改造“惟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sup>①</sup>。为此他还专门提出过“以中级社会为中枢”的中心势力创造论。通过对十月革命的感知和参加五四运动的实践，他深深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鉴于“知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34页。

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sup>①</sup>，他表示很盼望“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sup>②</sup>李大钊明确指出：

“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sup>③</sup>。为此他号召知识青年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深入工厂农村，为广大工农群众传授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的道理。这样，他就摆脱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专在知识界作文章、脱离民众的弱点，为中国现代文化运动的实践指示了新的方向。第二，关于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据新的文化观，李大钊开始认识到新文化运动局限于国民心理改造的缺陷，改而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他明确表示“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具体而言之，前者“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后者“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sup>④</sup>。同时，他再次号召知识青年“不该常常漂泊在这种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sup>⑤</sup>，而应当身体力行，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实践于社会，尤其是实践于农村之中。显而易见，上述主张依旧含有互助进化论等较多非马克思主义成份。但尽管如此，这些注重群众、注重实践的文化建设主张，对于克服新文化运动初期空谈理性、忽略民众与实践的消极传统，对于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运动的实际进程都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概略地叙述了1919年至1920年间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之后，我们应为如何之评价呢？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前后的两三年里，国内正处于民主主义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206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43页。

与社会主义两种时代精神交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有些人由于固步自封落到时代精神的对立面，有些人陷入了迷茫与彷徨。在芸芸杂杂之中，李大钊昂然屹立着，率先把新文明之火迎到了中国。他不愧为伟大的人，他的作品同样不愧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精神作品之一。无庸讳言，过渡转折时期的过于短暂和匆促，使得李大钊的新文化观不能不混杂上一些其他的颜色，带有未及臻于圆熟之境的烙印，但是这远远遮不住它的基本光泽。

李大钊关于文化建设应坚持开放性、民族性、人民性和高度理性的原则论述，以及他研究与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原理。如果把它比喻为一棵树的话，它已结出了许多果实，从某种意义上说，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文化思想都受过它的滋润。本文作者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培育，这株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智慧之树将会结出更多的果实。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 李大钊与“五四” 前后东西文化论战

谭 双 泉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从1915年到1927年延续10余年，参加者数百人，发表文章近千篇，专著数十种，是近代中国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高潮，关系到中国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方向。李大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发表直接参加讨论的文章并不很多，但他提出了不少十分深刻的观点，成为论战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因此，对他在论战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若干探讨，是不无现实意义的。

## (一)

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是继中国近代史上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而起的，但又与这些论争的思想内容有所不同。它不仅要求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政治制度，而且要求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即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以“改造国民性”。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终于失败，就因为缺少这样一场文化思想上的革命。如陈独秀就说：“盖论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按：指制度）学术（按：指技艺），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争也。”<sup>①</sup>于

<sup>①</sup>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是，他们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着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猛烈轰击，要求人们从沿袭几千年的孔夫子宗教教条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就拉开了五四时期东西文化论战的序幕。

如果说，在前此关于文化问题的论争中，对外来的西方文化，守旧派往往采取骄矜唾骂、深闭固拒的态度，到了“五四”前夜，这种简单的排外主义办法已没有多少市场，坚持这样做的人固然还有辜鸿铭、林琴南等，但更多的守旧人士却改变了策略，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持平公允，实际上则是封建文化卫道士的花样翻新。当时《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用佗父的笔名，发表了如《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迷乱之现代人心》等多篇文章。他毫不讳言道：当时若“仅仅效从顽固党之所为，竭力防遏西洋学说之输入，不但势有所不能、抑亦无济于事”。问题是怎样去评价东西文明的优劣并实行相互的“取长补短”。他认为：“精神文明之优劣，不能以富强与否为标准”，西洋人于“物质上虽获成功”，但“其精神上之烦闷殊甚”<sup>①</sup>。相反地，中国社会在物质上抱“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精神上“确信”我国“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正者”<sup>②</sup>。换言之，即“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这两种文明的优劣若何？他认为，大“凡社会之中，不可不以静为基础”，故西洋“动”的文明需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救弊。只有用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中国和“全世界之救济亦在于是”<sup>③</sup>。这种复古派的言论，不能不激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猛力反击。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等文章，对上述论点展开了系统的抨击。他首先从三方面阐述了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和优劣：第一，西洋民族以战争

①② 佗父：《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15卷4号，1918年4月。

③ 佗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4号，1917年4月。

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所以成为“雍容文雅之劣等”民族。第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宗法制度造成“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第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sup>①</sup>。应当怎样来判断这两种文明的优劣？陈独秀提出一个简单的道理质问道：“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呢？从《东方》杂志记者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穿衣吃饭问题的被重视，这岂非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相冲突<sup>②</sup>？因此，西方文明肯定要比东方文明先进，中国文化“若是决计荣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sup>③</sup>。这些，表明陈独秀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不可调和性。同时，也反映了他的不问国情、要求一切西化的倾向。

1917年4月，李大钊刊布《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1918年7月又发表了《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首先，在怎样认识东西文明的区分及其优劣的问题上，李大钊固然也把两种文明概括为“静”与“动”的区别，即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动的文明”。但是，他认为造成这两种文明区分的根源固然是复杂的，不仅有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其最要之点，则在东西民族之祖先，其生活之依据不同”<sup>④</sup>。东方生计“以农业为主”，西方生计“以工商为主”。由于这两种经济生活的区别，由此从思想、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方面推演出几十项关于两种文明的具体差异。这两种文明进化到了今天，我

①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4号，1915年12月。

② 《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

③ 《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439页。

国“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从处于屈败之势”，西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实属优越之域”。整个社会绝不是“以静为基础”，而是出现了“动”的潮流。“例如火车轮船之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之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之不能不要求，代议政治之不能不采行。凡此种种，要足以证吾人生活之领域，确为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之潮流所延注，其势滔滔，殆不可遏”。在这“动”的潮流面前，若“守静的态度，持静的观念，以临动的生活，必至人身与器物，国家与制度，都归粉碎”。他形象地指出，“盖以半死带活之人，驾飞行艇，使发昏带醉之徒，御摩托车，人固死于艇车之下，艇车亦毁于其人之手”。换句话说，当今不是西洋“动”的文明依靠中国“静”的文明以济穷救弊，而是须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sup>①</sup>。

李大钊要求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是不讲国情、主张一切西化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洋文明本身虽已开始走下坡路，但比我国文明优越，仍值得学习：“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以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sup>②</sup>。同时，学习西方文化，不要求一切“取法西洋”，只以自身之短学别人之长，坚决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

李大钊主张中国应当吸取西洋先进文明的特长，以济我固有文明的穷困，这不是说中国固有文明一无是处。李大钊对复古派如何崇拜儒家孔学，作了系统的剖析。在他看来：（一）孔子生于春秋末期，“自不能不以当时的政治制度立说”。但由于时代于变迁，适应于当时条件下产生的一套伦理学说，已经无法适应于现代生活，故“孔子之于今日之吾人，非残骸枯骨而何也”？（二）孔子已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改铸为专制君主的“护符”，成为保护君主政治的“偶像”，“故余之挤击孔子，非挤击孔子之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62页。



本身，乃揶揄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揶揄专制政治之灵魂”<sup>①</sup>。（三）孔子学说自然不尽是封建性的糟粕：“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四）如何继承和发扬孔学中的“真价”？“惟取孔子之说以助益其自我之修养”，而不是“奉其自我以贡献于孔子偶像之前”<sup>②</sup>。后来，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阐明了孔子学说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最后“归于消灭”的历史必然性。

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来，李大钊认为，绝不是以中国儒学来统整世界文明，而必须是东西两种文明各“以异派之所长补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采、发育完成之一日”<sup>③</sup>，也正是以俄罗斯文明为“媒介”的“第三新文明之崛起”<sup>④</sup>。就是说，这种“第三新文明”乃是继承了东西两派文化互相“取长补短”的优秀成果的结晶。这个观点，不只是有力地抨击了复古派的谬论，就是在当时新文化界说来，也非同凡响！

## （二）

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固有文明”受到猛烈冲击，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人心，守旧派既不能正面诋毁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亦不便公开鼓吹类似“中体西用”的观点，于是揭橥“新旧调和”论的旗号。1919年11月章士钊在《东方杂志》第16卷11号发表《新时代之青年》，则是有代表性的。他说：保存国粹固然不妥，抄拾欧化亦未必行当，正确的态度应是“一面开新”，“一面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只有促使新旧调和，把东西文化“熔铸一炉”，庶几做到“国粹不灭，欧化亦成”。这种新旧折衷的议论，表面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第245页；第571页；第560页。

看来不偏不倚，实际上仍是要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中”<sup>①</sup>。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不能不从理论上予以解剖。

陈独秀对调和论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新旧杂糅、调和、缓进，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不是人们的主观主张。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的命题是错误的，因为包括西洋在内的一切不良社会现象都是旧道德造成的，都应革除。他有时甚至把西洋社会的旧道德同“私有制度”联系起来，接近于唯物史观的论点。但在总体上他对旧道德的批判，主要是为了改造国民性。他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而不是放在经济基础的改造上。

李大钊在“五四”以前也明确主张中西文化的调和，反对以一种文化征服另一种文化。但是，李大钊的调和中西文化的主张，与章士钊等人在文化方面的调和论是有本质区别的。章士钊认为，调和是“新旧杂糅”，是在保存旧的基础上进行，结果是复旧<sup>②</sup>；李大钊主张，新旧调和是“对抗”与统一并存，是在吸收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是“创新”<sup>③</sup>。为了阐明他关于思想文化领域新旧调和、融会的主张，李大钊曾极力赞赏这样形象的观点：“孔子与牛肉，释迦与鸡肉，基督与虾，乃至穆罕默德与蟹，其为吾人之资养品等也。吾人食牛肉、鸡肉，在使之变为我之肉也。吃虾蟹等物，在使之变为我之物也。”<sup>④</sup>接着，他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文，对于章士钊提出的“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具体调和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指出，道德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才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

① 伦父：《新旧思想之折衷》，《东方杂志》第16卷9号，1919年9月。

② 章行严：《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11号，1919年11月。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563页；第246页。

造。物质常有变动，精神构造也随着变动，“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而“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sup>①</sup>。

李大钊初次用唯物史观对封建旧道德的批判未免也有缺陷，如他讲道德“是社会的本能”，而这种社会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等观点，显然包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余，但是从总体上看，他对封建旧道德这一复杂问题的剖析，在当时新文化论坛上却高人一筹，象陈独秀、吴虞、鲁迅等对封建旧道德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但都仍未能揭露封建道德和封建基础的关系。李大钊对封建旧道德的解剖，也表明他基本完成了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的思想转变，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 (三)

五四运动过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浪潮日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样东西文化的论争又重新掀起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

1920年春天开始，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他以自己经历的见闻，说明西方文明已经“破产”，即是“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是抢面包吃”，还是要东方文明去“超拔”它。他原是西方文化的崇奉者，现在却竖起反对西方文化的旗帜，同守旧派握手言欢。同年8月，梁漱溟在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从文化渊源、人生哲学的角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总清算。他得出结论说，人类文化要发生“由西洋态度变为中国态度”的“根本改革”，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前期虽然不是拥护旧文化的主要代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46页。

表，但在守旧派的主张被打得丢盔卸甲时，他自告奋勇起来应战了。二梁的观点在思想舆论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东方文明”的拥护者的喧嚷一时甚嚣尘上。

梁漱溟为了复兴东方封建主义文化，不仅求助于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力论，把孔子描绘成为生命主义者，而且求助于罗素“冲动论”，说什么“孔子是全力照注在人类情志方面……西洋人向不留意在此，现在留意到了，乃稍稍望见孔子之门矣！”<sup>①</sup>很明显，梁漱溟是在用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作注脚。这实际上是伧父早在1917年提出的任务<sup>②</sup>，现在由他来完成。邓中夏说得好：“梁漱溟一系，底子上虽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国思想，面子却说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sup>③</sup>正因为如此，当时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观点，虽然也受到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批判，但论战并没有真正展开，双方的胜负也不很明显。1923年又发生较大规模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也称“科学与玄学之争”），虽然是哲学方面的争论，就其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倾向来说，亦可视为东西文化论战的继续。如陈独秀所说：这次论战双方的主要代表也只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sup>④</sup>，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营垒中的一场混战。可见，这次东西文化论战的后期，人们所关注的中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新旧文化的关系，而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关系，历史重新提出了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时，矗立在新文化运动论坛的中流砥柱，是李大钊、陈独

①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70—171页，商务出版社1926年版。

② 伧父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4号，1917年4月）一文中提到：“近日美国贝西琴博士在北京教育联合会演说，谓中国须‘将固有之经史，借西国最新之学理及最新之心理学，重新讲译’。盖深得我心者也。”

③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④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新青年》（季刊）第2期。

秀、瞿秋白等人。李大钊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不象从前那样以直接参加东西文化论战的形式出现，但他所阐述的思想观点，都是为了解答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深刻见解，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的新成就和新水平。

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论述东西文明的差异时曾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世界“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sup>①</sup>。如果说那时还没有看清楚这种既非封建主义又非资本主义的第三新文明是何性质的话，那么经过多年的东西文化的论争，现在就可以得出“第三新文明”乃是社会主义文明的伟大结论了。他在20年代初期所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等大量著述，正是这一伟大结论的科学阐释。

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他除了继续驳斥各方面对西方输入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诬蔑和攻击，如所谓“外来进口主义无用论”、“过激主义危险论”等等之外，主要就以下三方面论证了中国必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一，从时代特点看，十月革命后世界已出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对立的体系，“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sup>②</sup>。第二，从世界革命发展的进程看，“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sup>③</sup>。就是说，要绕过资本主

---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66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455页。

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兼程并力”地前进。第三，从中国“发展实业”的需要看，他说：“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在“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sup>①</sup>？同时，他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同种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在“五四”以前，李大钊曾提出：“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sup>②</sup>，必须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sup>③</sup>，那末到现在，他已经开始探索把社会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具体道路。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李大钊这大量的思想观点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在新文化论坛上的出现，标志着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论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革命者开始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 (四)

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具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在文化问题上，他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又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李大钊在批判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赞扬社会主义文化时，并没有忘记着眼于它所处的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既看到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曾经起过的进步作用，又揭示了它们当前的“穷弊”；既说明中国社会需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紧迫性，又懂得这种学习的艰苦性，“不可不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445—446页；第36页；第34页。

以强毅之气力赴之”<sup>①</sup>。在学习的问题上，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和创新；等等。尽管他这样做是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经历了由朴素辩证法到唯物辩证法的转变，但从总体上看，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相比，他注意力求避免和减少形而上学和绝对化的毛病。

第二，李大钊重视对文化现象的历史主义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统一。例如，他认定孔子的学说在我国春秋时代“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不愧为那个时期的“中枢”和“圣哲”；但是要看到孔学“对于劳动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sup>②</sup>。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无产阶级所要提倡的是“大同的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共和制、代议制的分析，都贯彻了这种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统一。

第三，将文化作为社会现象来认识，十分注意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问题。李大钊曾强调学习西方文化，需要从当前本土民族的特点出发，如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虽已过时，但对于我们后进的民族，“则实居优越之域”，值得吸取。又如尼杰（Nietzsche）的学说，“倡言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赞美力之享受，高唱人格之权威，宣传战争之福音，而欲导现代文明于新理想主义之域”，这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有它反动的一面，但是，从当时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特点的需要看，又不无借鉴意义。因为“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最拘形式，重因袭，因循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sup>③</sup>。当然，这个意见的本身，也可深入探讨，但他重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则是可取的。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突出强调了文化的时代性，以及指出在文化心理方面应该

<sup>①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63页；第189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83页。

树立批判的精神，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呼唤出了一个新时代，但由于“五四”人物不注意文化还有民族性这一面，也就使运动存在重大缺陷。关于这一点，在李大钊的著作里似乎给予了必要的重视。

第四，归根结蒂说来，李大钊在论战中是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论战的发展，守旧派势力在不同的阶段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迂回作战。但李大钊既英勇顽强，又机智灵活，不是处处同他们“短兵相接”，甚至运用了对方所提出的概念如“动”、“静”、“调和”等，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便于在思想体系上针锋相对。他把这种斗争艺术完全置于科学基础，即进化论和历史唯物论之上，所以他能够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潮流前进。

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中，由于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有上述一些特色，终于和其他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一起，把近代中国古今中西的文化论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即革命者开始向西方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并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以指导我国新文化建设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长期以来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孕育和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由于极左路线的推行，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毒素嗜痂若癖，另一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排斥，造成了文化思想的混乱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迟滞，经过多年的拨乱反正，才有所好转。随着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执行，“全盘西化”和提倡中国“国粹”论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以不同的形式和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滋生。可见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大胆吸收东西方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又能防止和克服其消极因素，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重要课题。我们重温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在解决这一课题中，具有切近的参考意义。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政教系）



#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与 “工人政治”

王 桢 林

按照列宁的说法，“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sup>①</sup>。李大钊是既承认阶级斗争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他是公认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关于“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关于“工人政治”，以及关于二者关系的论述，表达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尽管这些看法有不完备、不准确的地方。

李大钊所说的“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是Democracy的意译。这在五四时期是通常的用词，但李大钊对平民主义做了比当时一般人更全面的论述，发表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有的见解。

他所说的“工人政治”是Ergatocracy的意译。这是他借用了西方政治学者的名词，意思是工人的统治。工人的统治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在文章中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少，用工人政治的时候多。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是相同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解是一致的。

<sup>①</sup>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9页。

关于民主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恩格斯曾有一种原则性的说法：“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sup>①</sup>。恩格斯在这里阐述了两个意思：一是“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二是“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并做了发挥，他说：“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述了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时，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在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sup>②</sup>。列宁阐发了恩格斯的第二种含义，即民主共和国为无产阶级开展阶级斗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提供了条件。这种解释成了列宁主义的经典解释。但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种含义，也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从广阔的范围探讨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政治的关系的提示。李大钊政治理论著作的一个突出的内容是考察了民主政治和工人政治的关系。从广义上去理解，这可以看作对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发挥。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是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他所阐述的阶级斗争理论同他论述的“平民主义”、“工人政治”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很多论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231页。

例如恩格斯说：“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sup>①</sup>；又说：“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sup>②</sup>。列宁也说：“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的意向同另一部分人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此外还有革命时期和反动时期、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停滞时期和迅速发展时期或衰落时期的不断更换，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sup>③</sup>

李大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sup>④</sup>李大钊肯定了阶级斗争学说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李大钊着重从“改造社会”的观点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改造社会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重大讨论课题。李大钊的论述表现了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现实的联系。他说：“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60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587页。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sup>①</sup>

李大钊多次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明“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充分估计了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巨大作用，他说，阶级斗争是“改造社会、消灭阶级的最后手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他认为阶级斗争和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有密切关系。他试图用阶级斗争学说来解决中国的改造问题，而中国的改造不止是解决现在的问题，也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景的问题。他的用阶级竞争“改造社会组织”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达到高度民主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实现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将来的社会主义。

李大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十分明确的，不过他在多数场合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而称为“工人政治”。他说：“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希腊语Ergates，意即‘工人’（Worker）；与cracy（Rule）相缀，训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种政治，的确含有统治（Rule）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sup>②</sup>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17—1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698页。

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的统治，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所必经的阶段，是以工人阶级的政权替代资产阶级的政权。他所说的“工人政治”是包括阶级没有彻底消灭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全然消灭”后的政治的。

平民主义、平民政治、民主或德谟克拉西是五四时期非常流行的名词。民主是“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讨论的主题，报刊上阐述民主的文章非常之多。李大钊关于平民主义的论述，和其他人比较起来内容更为丰富和深刻。和本文论旨关系密切的，可举出以下几点：

（一）平民主义是世界的潮流、时代的精神。李大钊说：“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sup>①</sup> 在他看来，平民主义是社会政治前进的巨大动力，将来的世界是平民主义的世界，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它的力量是无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潮流是民主，时代精神是民主，是进步思想界的共同看法。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反对强权、反对专制、解放工农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归入民主潮流之内的。李大钊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他说，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sup>②</sup>。这后一个结果，也就是社会主义胜利。他又说：这次大战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58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页。

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sup>①</sup>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新潮流”中是包括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正是因为这样，他用同样的语言歌颂赞扬布尔什维主义和平民主义。他说：“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sup>②</sup>又说：“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sup>③</sup>。

（二）平民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人生哲学。李大钊说：“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我们如想限其飞翔的羽翮于一个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我们不能得一正当的‘平民主义’的概念。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谢勒和惠特曼抃扶摇而上腾九霄。”<sup>④</sup>李大钊认为，平民主义有极其广泛的内含，它不只是政治制度，而且是人生哲学。它不只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有人类生活规范的意义。它不只是人们理智的追求、意志的动力，而且是感情的需要。

但在李大钊看来，作为具体政治制度的平民主义和理解的产物的平民主义，是一个已经明确无需多说的问題。他着重指出的是，不要把平民主义限制在“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他非常注意的是平民主义者所具有的那种思想境界，感情境界，和平民主义作为人生哲学的意义。这是李大钊阐述平民主义的特异之处。

（三）平民主义的真精神是“自由政治”。李大钊说：“我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98—599页；第603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88页；第588—589页。

尝说过，‘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公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sup>①</sup>

他又说：“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物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sup>②</sup>李大钊所说的平民主义政治的真精神，在于使所有公民“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事务的工具”的观点，是非常卓越的思想。

（四）工人政治是“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李大钊说：“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sup>③</sup>。他又说：“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594页；第592页；第571页。

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sup>①</sup>。这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所要达到的理想政治境界。

这种理想政治境界，恩格斯早就阐述过，他说：当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不再需要以后，“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sup>②</sup>“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sup>③</sup>。李大钊所说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的。

以上所说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政治，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他是就平民主义政治的根本精神立论的，是从民主政治的普遍原理立论的。他的着眼点不在评价世界上现行的民主政治。第二，他所说的平民主义政治往往是一种理想的最完善的政治，是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组织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那种高级“程级”的政治。掌握李大钊文章中本来具有的这两点，对评价他的平民主义政治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平民主义、平民政治或德谟克拉西，与工人政治有什么关系呢？李大钊的论述大概有两点，下面分别来谈：

（一）“社会主义与德谟克拉西有同一的源流”，“伊尔格图克拉西亦是德谟克拉西的一种”<sup>④</sup>。李大钊说：“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609页。

<sup>②③</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8页；第443页。

<sup>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03—504页。



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sup>①</sup>他又说：“‘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的区别。后来又在‘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可见‘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sup>②</sup>

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有本质的区别，在国家政权归哪个阶级掌握的问题上，在专政施之于哪些人的问题上，是绝不相同的。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不持批评态度的，从人类历史发展前程上看没有不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否定的是民主的资产阶级性，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不充分性，而不是反对民主的基本原则。列宁在批驳谢德曼、考茨基等人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用“‘一个阶级的专政’代替‘全民的’、‘纯粹的’民主”时说：“这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以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形式伪装起来的专政）。这是用穷人的民主代替富人的民主。这是用大多数居民即劳动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代替少数剥削者的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民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大扩大，是假民主变为真民主，是人类摆脱资本的桎梏，因为资本歪曲和缩小了一切民主，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制的资产阶级民主。这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74页；第608页。

是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种代替是使国家根本消亡的唯一道路”。<sup>①</sup>又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sup>②</sup>。还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在世界上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sup>③</sup>

上面的话很清楚，列宁反对的不是民主，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假借民主之名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不是非民主，而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而无产阶级专政即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之不同在于它们的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主是缩小了的民主，是假民主；而无产阶级民主是民主的“大大扩大”，是代替假民主的“真民主”。苏维埃政权远远胜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因为这种政权的民主比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更民主。李大钊所说的“‘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就是根据这种道理来说的。

（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纯正的平民政治”。李大钊说，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意思就是“工人的统治”，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接着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种政治，的确含有统治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那Ergatocracy一语中的要素(cracy)的意义，将生一广大的变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故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

①②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713页；634页；第723页。

便自然的实现。那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因为除去老幼废疾者外，人人都是做事的工人。这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sup>①</sup>“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sup>②</sup>。这种政治，“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这种政治，就是“纯正的‘平民主义’”。

李大钊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达到阶级的消灭，那时，工人政治将“以事务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这就实现了他所说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他所说的“工人政治”，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和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所达到的“真正的工人政治”，即“纯正的平民主义”。

李大钊关于“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的论述，试图把传统民主理论的优秀部分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这种事中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做过。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唤起了中国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不仅具有崇高的革命情操而且具有崇高的个人道德品质。在他38岁的一生中，不仅建树了伟大的事功，而且留下了100多万字的著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他的恰当写照。

李大钊在学术上在政治理论上留下的宝贵遗产，学术界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还很多。李大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阐述，在他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有些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从更广阔视野去观察马克思主义，以更深厚的知识基础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方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608页，第571页。

面更广，理解的也较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研究者认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纯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确有他思想上不尽正确或表述不清的地方，也有的不在他本人，而是由于研究者受狭隘的教条思想所拘束的缘故。

我们这里，对平民主义作了一些客观的论述，谈不上研究，不过是想把60多年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一桩事实介绍出来罢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特质探析

王 沛

李大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十分宝贵的。其中，感人至深并将永远被一切革命者奉为光辉典范的，是他为在中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达到这种无产阶级的也是人类的崇高精神境界，是李大钊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是他经过曲折的道路，上下求索而后实现的思想的升华。

纪念李大钊，对他的筚路蓝缕之劳，大辂椎轮之功，我们怀着深深的思念和无限景仰之情。学习李大钊，对他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我们有必要再做认真的研究和思考。

100年前，当李大钊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从甲午对日战争失败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由风雨晦冥到曙光初现的重大变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的青年李大钊，与时俱进。随着思想界由冷寂荒漠到榛芜纷拏而诸说竞起的激剧变幻，他经过痛苦深沉的思索，反复的比较推求，最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拯救中国的真理；随着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前进的步伐，他最早实现了从爱国主义到民主主义又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李大钊的思想发展道路，开拓和代表了老一代革命家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发展道路。

先驱者的思想经历值得后人深思。象李大钊这样的自幼受着封建主义的思思文化教育、在成长过程中又受过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思想以及新村主义等较深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终于选定了共产主义的方向，并且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李大钊及其后继者所走过的道路表明：爱国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阶梯。本文拟就李大钊为什么会由爱国主义者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试作一些探讨。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敌人和困难，团结奋进、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巨大的凝聚力，也是一切共产主义者必须首先具备的思想和品德。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特点，但必须是最忠诚、最坚定、最卓越的爱国者。李大钊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由主观的和客观的多种条件决定的，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操。这是他走向共产主义的起点。

出生于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环境，孤苦伶仃的身世，破落的家境，耳濡目染农民群众的反抗和呻吟，是使得李大钊自少年起养成勤学向上，发愤救国和敦信笃行的优良品格的始初客观条件。注意从郑成功、朱舜水、义和团及其老师白亚雨（辛亥革命烈士）等爱国志士的事迹中汲取精神营养，是使李大钊的爱国情感不断加深、日益炽烈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青年时代的李大钊，目睹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国家危亡的局势日益严重，社会黑暗的状况日甚一日，从而大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而献身。这时，李大钊已经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矢志致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sup>①</sup>，为一般的爱国者所不及。

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即使在同一历史条件下，具有同样性质和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93页。

们（如五四以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爱国者），由于他们是否能随着时代而前进的情况不同，发展的结果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历史的情况表明，和李大钊同时代的爱国知识分子，有些人在这段时间内表现得那样言辞激烈，愤世若狂，但时过不久，有的陷入迷惘、彷徨，有的颓唐、绝望，有的甚至走向了反面，并不是所有的有爱国热情的人都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末，决定李大钊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主观因素是什么？或者说，作为爱国主义者时的李大钊有哪些思想特质和成长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记取？现有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起码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思考的：

**一、执著地研究国情立足国情，使李大钊的爱国思想具有坚实的基础并不断深化。**

强烈的爱国热情促使李大钊关心国事，注意对国情的观察与思考。从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中我们看到，他不仅在1914年专门写了《国情》一文，而且在其他绝大多数的文章中都很注重对中国国情的研究，都是由分析国情而引出见解的。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评论、纪事、文电、通信乃至诗歌等，或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或抨击了时政，或感时伤事、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内容集中于揭露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暴露军阀祸国殃民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以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激发苦难的民众奋起救国。从研究国情入手，唤起民众，寻求救国之策；立论植根于中国的国情，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这是李大钊爱国思想和品格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使他能够踏踏实实逐步前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逐步深入地研究国情，又推动李大钊的爱国思想随着时代和国情的发展而发展，逐步深刻成熟。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李大钊对国内的混乱局势担忧，于1912年6月写下《隐忧篇》。由于这时李大钊对袁世凯封建军阀政权的本质及其带来的严重灾难还缺乏认识，在这篇时论中，他说明所忧者在“党私”、“省私”

和“匪氛”三端，并断定“党争”必引起“兵争”，“省私”将导致中国分裂；他寄希望于能有“君子”献出“嘉谋嘉猷”，以“弭于未然”<sup>①</sup>。随着时局的发展，李大钊的认识在加深，他对国事的“隐忧”变成“大哀”。时过不足10个月，1913年4月他写出了《大哀篇》。这时，他以大量的笔墨揭露社会政治的黑暗，描写民众生活的痛苦。他写道，时下各地为政者“各竖一帜”，结党营私，“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购买选票”，皆“敲吾骨吸吾髓耳”；武人柄政，都督各霸一方，如数十君主，以致“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sup>②</sup>。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共和”已徒具其名，实际是“以暴易暴”，少数“豪暴者”当政。此辈“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假“共和”之名以欺骗民众。他沉痛地说：“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可见这时李大钊的认识较之10个月前已深刻得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李大钊的认识继续加深。1913年冬，他到日本留学后，一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中国局势的发展，一面注意观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动向。1915年1月，日本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李大钊不仅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而且先后写出《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新胆》等极其深痛感人的爱国篇章，“泣血陈辞”，表达他“不胜国家兴亡之慨”。他历述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我国的侵略，指出国际上“列强如争食之饿虎”，久欲“瓜分中国”，日本乘“世界之变局”、“欧人不暇东顾”之机，“作瓜分之戎首，逞吞并之野心”。他强烈表示痛恨“朝野上下之忘仇寡耻，徒事内争”，“操戈同室，时机坐误”。他大声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3页；第4-7页。



疾呼：国人“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誓死抵抗强暴，保卫“锦绣之江山”！这样，就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表明李大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很早就提出了中国的国情要靠中国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解决的重要思想。早在1913年，针对日本人中岛端在其所著《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中所谓中国“乱国”与“亡国”、“统一”与“分割”之“谜”要由日本人来“解”的狂言，李大钊就明确地提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口号，认定要解中国之“谜”，“亦惟中国人能之”<sup>①</sup>。接着，在袁世凯加紧准备称帝的过程中，袁氏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新约法论》等论文，妄谈中国的“国情”，鼓吹中国在共和的名义下，国家可以是帝国其质，元首可以终身其任，为袁世凯当皇帝制造“理论”根据；袁氏另一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侈谈中国“国情民情”，为袁氏称帝张目。李大钊在《国情》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不仅有力地驳斥了这两位美国人和日本人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制等种种谬论，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国国情，亦非吾之纯确国情也。”<sup>②</sup>这是多么深刻的见解！

尽管李大钊当时心目中所存的还只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制”方案，但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在涉及民族利益、国家尊严的原则问题上，目光犀利，言中肯綮。所谓“宗于美”、“比于日”，不仅仅是说以美、日的国情来比附、评论中国，而且更蕴含着：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谋士之论中国国情，是站在该国的

---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28页；第110页。

立场上、基于该国的利益（或者说以该国人的“价值观”），来左右中国的政局。在李大钊看来，“以客卿论国情”不但“扞格之处恒多”，而且简直是误国，害国。

李大钊还进一步指出，要了解国情必须懂得历史，把今日之国情与历史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说：“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sup>①</sup>。李大钊认为，外国人不深谙中国的历史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谈论中国的国情。因此，他说：“呜呼！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sup>②</sup>李大钊十分重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对青年们进行历史的教育。从他的许多著作中我们看到，他很注意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激励青年，通过讲述近代中国历史让青年们懂得中国何以会贫穷落后，使他们正确认识国情，掌握历史的发展规律，不幻想，不动摇，努力改造中国。这些，在李大钊前后期著作中相续相承，屡屡可见，启人深思。

着力研究和分析国情，使李大钊的爱国主义的论著时时触及人们所关心的中国问题，能够发挥实际的社会作用。对中国国情的逐步深入认识，使他的思想由一般的爱国主义逐步发展为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深刻内容，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坚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使他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重视并且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逐步地结合起来，从而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优良学风。

二、同情民众疾苦、与人民共命运，使李大钊的爱国思想随着人民斗争的发展和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发展。

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的进步分子和广大人民所共有的思想品德。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在本质上是爱本国人民，也爱各国的人民，及本民族和世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13页。

界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与发明创造。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但是，从李大钊当时所写的许多著作和他的实践活动看，他在关心人民的疾苦、重视民众的作用方面，比起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要鲜明得多。这是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植根深厚、日益坚定并逐步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基因。

由于同情人民，李大钊不仅很早就注意了解民众的疾苦，而且能以人民群众的境况来观察时局、衡量是非。他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指出：各地当政者“贱视其治下之民，微若蚊蚋，淫威肆虐，惟所欲为”<sup>①</sup>；他们口称“吾拥护民权也”，实际是“坐拥重兵”，以“胁人民”<sup>②</sup>。李大钊正是依据事实断定：“共和”已非共和，必须寻找救国之路。由于重视民众的疾苦和呼声，李大钊进而十分赞同“真正之舆论在乡间”这样的论断。他在一次通信中述说了自己的一段观察和体验：民国初建之时，一般人“以为数千年帝制，由兹推倒，不能复萌矣”；然而，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见闻却是“乡间父老独以为未安，谓不久将有皇帝出现”；不久，“袁氏果称皇帝”。袁世凯称帝后，他又回乡。当他告那些农民父老说，你们所说的皇帝，现在真的出现了，并说出这皇帝的名字是袁世凯时，农民们则“愀然蹙额，交口怨骂”，“多灰冷失望矣”。“于是乡间舆论遂一转其盼皇帝、盼真主之心理，而归于骂袁氏，骂袁氏，万口同音，谓袁氏皇帝之迷梦必不能显诸事实也。无何，袁氏果自毙。”李大钊从这类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较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火焰所驱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直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sup>③</sup>李大钊所举这些事例和当时所作的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33页；第5—6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454—495页。

分析未必完全恰当，但是，他重视“基础社会之心理”，聆听群众声音的经历，却跃然纸上。他所作出的基础社会之心理“持真正舆论之权威”的论断，推动他听取民众的呼声，遵循民众的意志探索前进。

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李大钊虽然还未能象后来那样自觉地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但他已经开始注意观察了解民心动向。当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他注意到：“噩耗既布，义电交驰。军士变色于疆场，学子愤慨于岸序，商贾喧噪于廛市，农夫激怒于阡陌。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忠义之民，愿为国死。”<sup>①</sup>由此，他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sup>②</sup>。对于袁世凯政权统治下的人民强烈不满情绪，他观察到：“社会郁塞，人心愤慨，至于此极”<sup>③</sup>！他从研究历史到观察现实，深深感到民众要求民主、反抗专制的意志是不可阻遏的，民“死且不惧”，“图圉压迫钳制之道”更有何效？从而断定：民众要求民主的愿望，“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sup>④</sup>，是必定要实现的。人民群众的意志推动李大钊的思想不断发展。

李大钊在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之后，对英雄人物与群众的关系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轶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sup>⑤</sup>英雄是离不开群众的。因此，他认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这样的概括，是“精辟绝伦”的。他批评当时有人鼓吹的“新英雄主义”政治，认为“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主张“今后取人之准，宜取自用以效于民之人”<sup>⑥</sup>。李大钊在当时能达到上述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从同情民

①②③④⑤⑥ 《李大钊文集》（上）第115页；第123页；第47页；第164页；第167页；第158页。

众到重视民众的作用，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使他从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三、为救国救民而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使李大钊的思想由爱国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

李大钊小时入私塾，读的是四书经史。抚养他的祖父一心盼望他通过应试科举，升官发财，显亲扬名，走封建士大夫的道路。这是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的心目中最理想的“价值取向”和积极追求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学”传入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后，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逐渐转向热衷于资产阶级文化；其中不乏怀着“科学救国”愿望的爱国者，但他们又不能不受着为个人而奋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严重羁绊。李大钊的思想不能超然于时代和环境，但是，他的可贵之处是，强烈的爱国精神使他把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同情人民疾苦、与人民共命运，推动他为救国救民而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在他的心目中，“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sup>①</sup>；为追求、实现真理，必“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瘁精殚力以成之”。这是他逐步向共产主义真理迈进的重要条件。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当他在永平府中学肄业后，有三种学校可供选择：一是北洋军医学校，一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一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银行专修所我亦被考取，但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终生鄙视孜孜于功名利禄、追求金钱和权力之辈。他以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和格言谆谆教导青年们：“黄金和权力”“不足福人”；如“赴利禄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

之途也，如蚁之就羶，蛾之投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sup>①</sup>李大钊的一生，为“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他在选择报考学校时，就做出了这样的人生选择。

李大钊于1907年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为了担起“挽救民族”的重任，勤奋刻苦学习，“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sup>②</sup>。然而，在此期间国势如“荆天棘地”，他深叹“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辛亥革命兴起后，他“慷慨思投笔”，急于投入救国救民的斗争。忧国忧民的深情，促使他一面思考现实问题，一面加紧钻研知识，“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sup>③</sup>。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这是李大钊去日本留学时心境的自白。他抱着为力挽“破碎神州”、“再造中国”而学知识、求真理的愿望，东渡日本后，“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sup>④</sup>。在日本期间，他进一步学习了一些近代世界的科学知识，初步接触到当时日本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加紧、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他更加感到我国人民须“痛自振励”，自己也必须尽快找到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sup>⑤</sup>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的途中写下的诗句，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

研究国情、体察民意又苦读苦思，使李大钊在不断探求中逐步向真理之途迈进。

中国亟需变。李大钊在1916年写下的《〈晨钟〉之使命》、《青春》等著作中，用辩证法的观点论证了“方死方生、方毁方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203—204页；第114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83—889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912—913页。

成”的中国必定变、必将新生。为了论证“白首中华”内“胚孕”着“青春中华”，“青春之中华”必将代替“白首之中华”，他反复阐述了宇宙间万物“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的变化发展规律。当李大钊把中国古代的《周易》的思想同西方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等揉合起来，强烈地表达其“再造中华”和“青春中华”必实现的爱国主义信念时，他已经在运用着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思想。循此前进，就将跨入辩证唯物主义真理的门槛。

要变“白首之中华”为“青春之中华”，必须经过斗争。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1915年）、《民彝与政治》（1916年）等著作中，不仅歌颂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争取民主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而且在期待着、呼唤着：“山林草野之间，一夫狂呼，应者四起”的“激变”<sup>①</sup>。他号召青年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sup>②</sup>。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表现出的战斗精神继续发扬，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了思想准备。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过程时说：“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sup>③</sup>作为忠诚的爱国主义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时的李大钊，仇恨中国专横政治的情感也是很强烈的。他在激烈批评军阀暴政之时，所能构想的虽然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方案，但是同时对这种制度也抱有怀疑。他说，代议制“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将来取代它的“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sup>④</sup>。这种更

①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164页；第168—169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200、204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93页。

好的制度是什么？为“解民于倒悬”的李大钊在继续寻找、探求。当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看到这种理论在俄国的实践中显示出的优越性时，立即表示赞成和拥护它，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不是为个人而奋斗，是为了救国救民而寻求真理，使李大钊在前进的道路上不畏险阻，不辞艰辛，一步一步地向真理走去。

他所寻求的是救国救民的真理。哪一种理论、学说真的能救国救民，他必然就信仰之，坚持之，实践之。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这正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科学和武器。因此，经过痛苦寻找的李大钊，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一经得到它并看到它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其欣喜和兴奋之情，自不难理解。

四、相信中华民族有能力光复旧物、再造神州，使李大钊的爱国思想坚定而深沉。

当李大钊等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苦苦跋涉的时候，中国知识界中相当多的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断言中国或亡于外国或只能爬行于西方国家之后；还有一些人逃避现实，凌虚蹈空，醉心于脱离中国国情民意的“人生哲理”的玄妙的探究和宣传；又有少数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虽怀爱国之心，但面对外侮内患的黑暗现实，对中国前途悲观绝望，有的甚至认为中国不如被强国所亡，有的走上自杀的道路。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此期间也说过一些激愤的话。1914年冬，陈独秀在《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中，曾说：象中国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爱之也何居”，“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也”<sup>①</sup>。李大钊就此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在善意批评陈独秀的错误观点的同时，集中地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

<sup>①</sup> 《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



李大钊说，今日之中国，外遇日本侵略，内则“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然而，此时“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辩论什么“国家善恶”的哲理问题，“太涉邈交，非本篇所欲问”；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唤起民众的“自觉心”，行动起来救国。而“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sup>①</sup>。他严肃地指出，无论是精神的自杀，还是躯体的自杀，都是绝对不可取的。李大钊听到“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的消息，心情极为沉重。他说，这些少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当此急需“聪颖优秀者”奋起救国之时，“或以精神，或以躯干，纷纷以向自杀之途，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国真万万无救矣”<sup>②</sup>。自杀实际上等于助敌亡国。

针对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的“我不是不想爱国，而是中国太不可爱”的论调，李大钊语重心长地说道：“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李大钊进一步说明：“自古无不亡之国，国苟未亡，亦无不可爱之国”；“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觉力，龟勉奋进，以向所志，何时得达，不遑问也”<sup>③</sup>。这是多么可贵的忠贞爱国之情，警策人心之语！

有些青年人说，我若是生长在英、美那样富强的国家，就一定十分爱国。李大钊就此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永盛永衰，英美等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富强，而是靠那些国家的人民齐心协力建设而成的。假如那些国家初创之时，国民们也以国家不富强作“理

①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146—147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49页。

由”而不爱自己的国家和为建设国家出力，那些国家还会有今天这样吗？

李大钊针对那些“中国不如被强国占领，会促进国民觉悟，发展得快些”的谬论，以朝鲜被日本吞并、土耳其被分割等事例，说明国家一旦被外国控制或瓜分将会怎样命运悲惨。由此，他质问那些以我国“坐以待亡，听人宰割”、“惟强者之威命是听”方为得计的人：“斯而可乐，人间更有何事足为畏怖？”他深为愤慨地说：“愚不识斯时果有何幸福加于国家尚存残体之时，并不识斯时自甘居亡国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于吾侪者。”<sup>①</sup>

面对那些数典忘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外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李大钊说道：“他人之国，既依其奋力而造成，其问智勇，本不甚悬……必谓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则此特别之民，当隶于特别之国，治以特别之政，此种论调，客卿尝以之惑吾当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他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哲理，激励国人：“惟国民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衡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前途正自辽远。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sup>②</sup>。这是李大钊对中华儿女殷殷期待之情的集中表露；而他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掬尽忠贞，去腐生新，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这是李大钊的品格的写照。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之强烈、之深沉，在他同时代的伟大人物中，惟鲁迅差堪与之相埒。

“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李大钊的这句名言，用来概括他的一生，当是十分确当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47页；第140页。

#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李 越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产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起了重大的作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 (一)

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看到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辛亥革命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李大钊对这场革命本来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袁世凯很快攫取政权，“无数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李大钊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开始新的探索。1913年李大钊到日本留学，在那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他先后组织反袁秘密团体中华学会和神州学会，立志“改造神州，拯救祖国。”1916年春回国后，他投身于反日反袁的斗争和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这时，李大钊回顾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局，看到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依附于北洋军阀，同时也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认为他们根本无力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势力。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敏锐地看到一条新的出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他长期求索的“理想的中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

导下，依靠工人阶级，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为现实。他在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先表现。从这时起，李大钊的思想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他在讲坛上、报刊上和通信中，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帮助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培育众多的青年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怀着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崇高目的寻找革命真理的，他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偏于纸上空谈，”强调“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他主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他的实境”。

“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①

1920年以前，他能够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不多的，他在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思想比较庞杂，但是，他力求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并且本着主义进行实际斗争。

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时，十分重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推翻了沙皇统治。李大钊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写道：“考此次革命之战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当俄京骚动之际，其各大都会，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会民主工党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热烈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这个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34—35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476页。

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sup>①</sup>他从俄国革命的胜利实践中，开始认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

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是为了把它运用到中国，他在《战后的世界潮流》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向往。他说：“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sup>②</sup>这时，他在和朋友们谈话中曾明确提出中国革命要学习俄国共产党。据李璜回忆：“在（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们的联餐席上，开始称道俄国的共产革命，认为要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要有意得多。因为在俄共主张上，还有精神照顾到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而中国革命的前途，要采取西方的策略时，则最好去学俄国共产党。”<sup>③</sup>

李大钊不仅认真地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同时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从1919年、1920年李大钊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中可以看到，他介绍得最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共产党宣言》。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和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中，都着力宣传《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且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它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指马克思—引者）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sup>④</sup>。在这篇论文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99页；第627—629页。

<sup>③</sup>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

<sup>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0页。

中，他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在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第16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最后几段的译文，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我们从李大钊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中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这部共产党人“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对他的思想起过无比巨大的影响。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能够看到的列宁著作是不多的。据他在《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说，看过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英文译本。这些文章加深了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性质和任务的理解。

李大钊潜心研究俄国革命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有着明确的目的，这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后，他逐渐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首先必须象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充当革命的领导和组织者。建立这样的党，除了必须具备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外，还需要有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中国，李大钊第一个自觉地担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 (二)

早在五四运动以前，李大钊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就十分注意工人问题。1917年2月，李大钊写过一篇反映北京人力车夫苦难生活的文章，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是：“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sup>①</sup>1919年3月，在《每周评论》上他又发表了《唐山煤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81页。

矿的工人生活》一文，深刻揭露在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下，矿工们劳动生活的悲惨情景。李大钊指出：“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sup>①</sup>他认为工人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悲惨处境，第一步就要组织起来，成立工人自己的团体，为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而斗争。1919年5月1日，他发表了《五一节杂感》，殷切地呼唤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李大钊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开始有了可能。五四运动以后，他号召、组织先进青年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1月，北京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到人力车工人的居住区作调查。工人们贫穷的状况，使学生们大为震惊。北京《晨报》报道说：“调查回来，大家相顾失色，太息不止，都现出一种极伤心和不平的样子。”“4月邓中夏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讲演，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锻炼，学生们学会用通俗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受到工人们的欢迎。这项活动，为开辟长辛店这个早期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据点打下基础。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星期评论》、《晨报》等都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五一运动史》，详细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欧美各国工人自己的节日里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情况，李大钊向中国工人呼吁：“起！起！！起！！！ 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觉醒的日子了。”<sup>②</sup>五一劳动节这一天，上海、北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5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231页。

京、广州等城市的工人隆重集会，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这次五一节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践。从此，那个曾被外国舆论称为“不入中国人清梦的五月一日”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显示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新觉醒。

这时，李大钊已开始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传》中有这样的记载：“1920年初，大钊同志就曾与中夏同志等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1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陈独秀走后，大钊同志曾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到特别一区（即旧俄租界）会见某苏俄友人，相互交谈了些对革命的意见。”<sup>①</sup>

关于李大钊、陈独秀酝酿建党的情况，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份史料是，1927年5月24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事略，他说：“（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sup>②</sup>后来高一涵又回忆说：“1919年6月，我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主张推翻段祺瑞政府，并宣布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死刑。守常与陈独秀都去散发。当场陈独秀被捕，三个月左右，释出，仍受监视。守常设法送他逃走。他们扮作商人，带了帐簿，套一辆骡车，守常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sup>③</sup>

据章志回忆：“李大钊把陈独秀送走后，在天津曾与少年中

<sup>①</sup> 《李大钊传》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sup>②</sup> 《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01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③</sup> 《五四运动回忆录》第34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国学会会员章志等到苏俄领事馆同一苏俄朋友取得联系，相互交谈对革命的意见。这次会见被敌探发觉，翌日即在天津《益世报》上发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李大钊立即通知与会诸人注意防范，他也立即返回北京。”<sup>①</sup>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逐渐广泛的宣传，新的思想运动、群众运动的深入发展，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周围，团结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他们中的骨干。李大钊不仅在北京大学联系着一批爱国学生，也指导着校内外许多团体、报刊的活动，他在与进步青年的广泛接触中，开始了准备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生活。

陈独秀到上海、李大钊回北京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准备建党的第一个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步骤。这两个研究会不仅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建党作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而且培养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建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也是后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朱务善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形势已经高涨，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已成为现实的需要。大钊同志认为领导研究很有必要，就开始大量写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当时有不少革命青年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尚未组织研究机构。到1920年初，研究会就有了雏形了，但还未登报。”“这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结合，企图建立共产党。”“192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党的组织时，就叫共产党。参加党的人就是组织研究会的发起人，但发起人中后来不都是共产党员。”<sup>②</sup>朱务善曾经说过：“我认识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

<sup>①</sup> 《章志致张鸿藻、董振修的信》（未刊稿）。

<sup>②</sup> 《朱务善1960年谈话记录》（未刊稿）。

到1925年末我出国以前，我们几乎朝夕未离。”<sup>①</sup>他的这段回忆，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前后的情况，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目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关系讲得比较清楚。

李大钊、陈独秀分别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为建党的准备。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为准备建党所采取的步骤，方法是一致的，当然这不会是不谋而合，而是互相商定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 (三)

正当李大钊、陈独秀准备建党的时候，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的俄共党员小组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帮助和促进的作用。又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0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在1920年秋到1921年初，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相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当时这些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他们都是1921年7月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

1920年12月，由李大钊发起在北京大学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宗旨是“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sup>②</sup>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

<sup>①</sup> 《回忆守常同志》（1957年）。

<sup>②</sup> 《共产主义小组》（上）第27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向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阐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使小组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1921年1月，李大钊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正确阐述了个人和社会、纪律和自由的关系。3月，发表《社会主义下的实业》、《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两文，批判那些以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明确指出：“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sup>①</sup>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是思想建党的重要内容。

在开展工人运动方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劳动音》和《工人周刊》，在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钊曾亲临指导。通过工人刊物和劳动补习学校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1000多人举行大会，宣布成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是党领导的最早的工会之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455页。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出现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被压迫的状况，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开始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党的一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成立的过程。这种结合是一个客观的、有规律的过程，李大钊则是推动这个历史进程、在中国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是他最早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主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树立把理想的主义应用于实境的优良学风；是他最早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重要性和建党的必要条件；是他最早在实践中自觉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因此，他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是具有高尚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他的道德文章值得永世景仰，他留给中国人民的最宝贵、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他参与缔造的中国共产党。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

## 向 青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象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在李大钊寻求同俄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同时，苏俄、共产国际也在设法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开始在中国“访贤”。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这时，正值“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联系的建立，使得中国建党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后，李大钊开始联合吴佩孚，而后联合孙中山，这种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策略变化是同苏俄和共产国际策略相联系的。国民党改组后，李大钊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一方面坚持了统一战线，同时也坚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李大钊回国，参与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推动了北方的革命运动。

### 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建党，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和在共产国际帮助下进行的，因此，他著文欢呼、拥戴、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这实际上是为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作准备。这也是从组织上同俄国革命者、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和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序幕。因此，李大钊不仅是思想上、政治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在组织上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力图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第一人。

早在1918年11月15日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就把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sup>①</sup>与此同时，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说布尔什维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sup>②</sup>。这时，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是向往俄国革命的，他痛恨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和痛苦的专制制度。李大钊由于痛恨专制制度而更向往俄国革命，又由于向往俄国革命而更加痛恨专制制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都促使李大钊去联系俄国革命者以及由于俄国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共产国际。

李大钊很早就期待世界革命经由俄国传播至中国。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李大钊所著《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看出。李大钊说：“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Paul S. Reinsch）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于是，李大钊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sup>③</sup>

1919年1月，经过列宁的努力，揭开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序幕，发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号召成立共产国际：“签署此邀请书的各党派和组织认为，召开新的革命国际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第600页。

<sup>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575页。

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实属必要。在战争和革命期间终于看清，不仅旧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以及第二国际已经彻底破产，不仅旧的社会民主党的骑墙派（所谓中派）已不能进行积极的革命行动，而且真正革命的国际目前已十分清晰地展现出轮廓。”<sup>①</sup>

在这时，中国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列宁领导的国际中心远离千山万水，而且苏俄处于14国武装包围之中，俄国亚洲地带完全被高尔察克、谢米诺夫、霍尔瓦特等匪帮占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未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的思想觉悟、组织程度还不具备响应《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要求和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的条件。但是，《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有所反响。例如1919年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说：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团与俄国过激党之主义而成者……”这个消息公布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几乎完全没有反响。而李大钊则不同，他虽然没有提出（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却明确地支持共产国际的成立。在那时，明确支持成立共产国际的也只有李大钊。李大钊认为“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他说：“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并说：“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sup>②</sup>

根据苏联学者提供的材料说：在苏联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与中国的进步力量进行接触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但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共产党人

<sup>①</sup> 原载1919年1月24日苏联《真理报》。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621、第625页。

以及旅华俄侨左翼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做了了解中国情况和与中国社会先进阶层代表建立联系的工作。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该局的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同他们交换情报，组织口头和书面宣传……”<sup>①</sup> 1919年6月18日，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的一位负责人Ф.Н.加蓬写了一个专门报告，说区委下面应设立一个必须有远东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的代表参加的东方局。他认为，这样东方局才有“可能立即明确地、广泛地开展工作的”，并且能够更好地完成其促进东方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加蓬的计划包括与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和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7月至8月在伊尔库茨克组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下设的东方人民处时，考虑了加蓬的建议。1921年1月，以东方人民处为基础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因此，1920年春天之前，俄共（布）的代表与中国同志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

上述事实说明：1920年春天之前，李大钊已经在寻求同俄国革命者以及共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而俄国革命者和共产国际组织，也在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来自苏联方面的材料说：1919年夏天，在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伯特曼会见了李大钊。<sup>②</sup>但中国学者从未提到过这一事实。中国方面有章志回忆及据此提供的李大钊会见苏俄友人的事实。说：“陈独秀走后，大钊同志曾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到特别一区（即天津原来的旧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相互交谈了些对革命的意见。”<sup>③</sup>这个材料也还有待

<sup>①</sup> 佩尔西茨：《旅俄的东方国际主义者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若干问题（1918年—1920年7月）》，《共产国际与东方》第64页—65页。

<sup>②</sup> 穆勒尔：《在革命烈火中》第144—145页，伊尔库茨克，1957年版。

<sup>③</sup> 《李大钊传》第8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于进一步证实。

## 二、李大钊会见维经斯基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李大钊在建党中的贡献之一是经他同维经斯基的会见，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从此以后，北方李大钊和南方陈独秀通力合作共同建党。在建党这一伟大的事件中，李大钊会见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李大钊会见维经斯基，这是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寻求同俄国革命者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结果；也是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地区东方人民处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的结果。但李大钊在北京会见维经斯基取得成功，主要借助于有利的国际形势，即苏俄红军进军西伯利亚取得成功，打败了白匪和武装干涉者，1920年2月7日高尔察克连同他的几个亲密的同伙在伊尔库茨克被枪决，英、美、法干涉军纷纷撤退，日本人则返回滨海省、库页岛。于是中国北京政府转变了态度，退出了武装干涉者的行列，开始同苏俄谋求外交联系，这就使得中国先进分子有了较多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也使苏俄人士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至于李大钊成为共产国际使者寻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先驱。

维经斯基到北京后，李大钊得以会见他，主要经过柏烈伟的介绍。柏烈伟是北大俄文教授。参加这次会见的除了维经斯基本人外，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夫妇，翻译杨明斋等。会见的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从有关的回忆和记载说明，李大钊同维经斯基会见后，有一段共同研究、接触过程，而决不仅仅是一次会见。其中重要的一项是彼此交换意见。这正如李达回忆中所说的：“当时李大钊同志等很诚恳地和这位好朋友（维经斯基）交换了意见。”交换意见的重要内容是建党问题，这正如《李大钊传》所附《李大钊同志生平活动简表》所说：“他们讨论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同维经斯基见面后的又一项内容，是谈了俄国对华

政策。维经斯基来华和《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是有密切关联的，而且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时间为1920年3月24日<sup>①</sup>。宣言称：

“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得的特权，都返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sup>②</sup>所以，这时维经斯基及时地宣传了《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李达回忆说：“因为苏联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的宣言（即废弃帝俄政府与中国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才传到了中国，中国很多的社会团体，都表示过热烈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别高兴。”于是，在李大钊的支持下，维经斯基多次举行座谈会，报告了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实际情况及其对华政策。维经斯基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李大钊和维经斯基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共同活动之后，维经斯基便把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形成这次转移的因素之一是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大产业中心，上海是大产业中心，在那里聚集着人口众多的产业工人。另一因素是李大钊推荐陈独秀担任建党的最高领导人。这就形成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新局面。据罗章龙回忆，在维经斯基离开北京赴上海之前，召开了一次会议，维经斯基在会上讲了话。李大钊也在会上简明致词，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sup>③</sup>。之后，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勇敢地承担起了建党的重任。

### 三、苏俄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和李大钊实践共产党人

①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洋政府档案中的苏联远东外交委员会抄送苏联第一次对华友好宣言译电。

② 《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载1920年5月1日《新青年》。

③ 罗章龙：《椿园载记》第77页。

## 加入国民党的策略

从1920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建立联系开始，中经二七惨案，后至西湖会议，中国共产主义者经历了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演变过程。二七惨案之后，一般人认为联合吴佩孚是个政治错误。如邓中夏曾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简单地把建党时期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归结为陈独秀、李大钊的政治策略上有机遇主义倾向。这样说是不全面的，应当说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他们在政治上是受了苏俄对华外交政策的影响。

苏俄对华外交政策有一个发展过程。1918年8月1日《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表明苏俄对中国北京政府采取敌对态度，他们把中国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者加以并列<sup>①</sup>。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表明苏俄改为同时团结中国北方和南方政府。1920年9月27日《关于苏中协定条款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致中国政府》，苏俄对华外交已经把主要团结对象集中于中国北京政府<sup>②</sup>。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建立以后，苏俄同北京政府关系日益密切。1920年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率兵北上，推翻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政权，成为中国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他采取了一些接近苏俄的措施：一是支持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使团来北京；二是驱逐沙俄在北京的代表库达谢夫；三是表示支持中国工人运动。这样，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就对吴佩孚抱有较大的期望，从而采取了联合吴佩孚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团结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久，苏俄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便在苏俄《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吴佩孚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苏俄期待中国出现“吴佩孚将军的俄国方针”<sup>③</sup>。

<sup>①</sup> 《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1918年8月1日，见1919年3月9日苏俄《消息报》。

<sup>②</sup> V.A.亚克扬托夫：《俄国和苏联在远东》。

<sup>③</sup> 苏俄《消息报》，1920年10月9日。

后来吴佩孚越来越反动，威廉斯基还说吴佩孚是“最好的军阀”<sup>①</sup>。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过高地评价吴佩孚。《国际通讯》称吴佩孚为“中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领袖”<sup>②</sup>。

上述事实说明：李大钊联合吴佩孚的想法并非出自其本人，而是受到苏俄对华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而且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并不是仅仅有害而无益的，它也推动了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李大钊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并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四大政治主张”。之后，李大钊又向吴佩孚御用内阁交通部总长高恩洪建议每路派一密查员，得其允许，京汉、京秦、京绥、陇海、正太、津浦六条铁路都有一个李大钊派去的共产党员做密查员。这样一来，共产党员和任何同志都可以免票来往坐车不用花钱；六个密查员每人都有百元以上的薪水，除一部分用作生活费外，其余归党；密查员是各路职员最害怕的人，因为，共产党员有“护身符”，不仅不怕人而且使人怕；这六个密查员，实际上就是职工运动的特派员，主要在各路工人中活动，帮助工人组织俱乐部和进行斗争。

李大钊从联合吴佩孚到联合孙中山的转变也是受到苏俄和共产国际影响的。1920年到1922年间，远东共和国优林使团、苏俄斐克斯使团、越飞使团同吴佩孚北京政府在中东路、外蒙古等问题上发生纠纷，同时，吴佩孚支持反对苏俄的列强华盛顿会议。所有这些促使苏俄、共产国际改变了联合吴佩孚的政策，转而趋向联合孙中山。1922年8月，李大钊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湖会议，会议通过共产国际书记拉狄克起草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组织中援助民族主义运动”，<sup>③</sup>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遵从这一决议，积极做孙中山的工作。他本来是从事

① 威廉斯基：《中国共产党》，载《新东方》1922年第2期。

② 《国际通讯》1921年10月17日。

③ 马林档案第5113号。

北方党的工作的，这时他去上海会见孙中山，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有一次，他们专门就振兴中国问题畅谈了好几个小时。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他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当即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党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sup>①</sup>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孙中山的政策，日益受到吴佩孚的仇视。于是他在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后不久，一手策划了二七大屠杀。从此，联合吴佩孚的政策彻底宣告结束。二七惨案后，李大钊按照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为改组国民党作出了贡献。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是孙中山指定的代表之一，是5人主席团成员、宣言审查委员和组织章程委员。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内有人反对，也受到国民党内右派的指责。为此，1924年1月28日，李大钊特发表声明，声明说：“我们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努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退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一部分同志建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党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

<sup>①</sup> 尚明轩：《孙中山传》第250页，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不能因为加入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李大钊的声明是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强有力回击。

#### 四、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李大钊积极地推动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但他并没有忽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召开，这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着重点仍是巩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策略，而李大钊在会上的发言则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国民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共中央接到1924年5月共产国际发出的《第三国际致中国共产党函》，即召开共产国际五大的通知后，决定派李大钊、王荷波、姚佐唐、刘清杨等4人为代表（彭述之以旅俄支部书记身份参加了会议）。李大钊是在五峰山接到中央通知，委派他为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首席代表的。于是他化装成商人返回北京。6月11日后，李大钊前往哈尔滨，到哈尔滨后，他找到了他的堂兄李祥年，由李祥年介绍住在哈尔滨道外太石街“宏昌茂”杂货铺，住了3天，白天出去办事，并曾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会晤<sup>①</sup>。李大钊在莫斯科住在卢克斯大旅馆三楼，每天应接来客，草拟文电，为国际报刊写文章和通讯，从清晨到深夜，十分繁忙。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显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影响还没有受到共产国际的足够重视，因此，会议虽然成立了若干专门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妇女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等，但李大钊没有参加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等重要的委员会，只有王荷波参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姚

<sup>①</sup> 王芳田：《李大钊在哈尔滨》，《回忆李大钊》第185页。

佐唐参加了青年委员会，刘清扬参加了妇女委员会<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也还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某种分歧。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在他的报告中，也谈到了中国问题。他说，国民党正向左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报告回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对待国民党这个问题上的分歧<sup>②</sup>。1924年6月30日，共产国际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意斯基作报告，他在中国问题上，继续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说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我们知道，在这个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推动了它走上了同国际帝国主义更坚决斗争的道路。”但曼努意斯基又一次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他说：“但同时我们知道，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加入国民党的同志们的活动被当作‘阶级调和’受到严厉批评。”<sup>③</sup>

1924年7月1日共产国际五大第21、22次会议上讨论了曼努意斯基的报告。在第22次会议上李大钊（化名琴华）没有被安排作大会发言，而只作了书面发言。会议执行主席盖什克说“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曾想作报告，但是他不能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1924年7月11日李大钊的发言以《中国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发表于《真理报》上。李大钊没有直接回答曼努意斯基的批评，他的发言宗旨是防止国共合作问题上右的和“左”的片面性，发言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李大钊说：“我们在国民党中间工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2部分）》第225、224、252、253页。

② 珍妮·德格拉斯选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中译本第139页。

③ 《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1924年6月17日—7月8日）（速记记录第1部分）》第593页。

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翼拉到我们一边，因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派而极为困难，但是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革命先锋队。”<sup>①</sup>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李大钊继续留在共产国际，他多次发表谈话，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924年9月13日，他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琴华同志对（汇人莫斯科报）记者的谈话》。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说：“南方孙中山的政策至今还不够明确。他本人尚未找到真正的依靠力量。”“最近发生的事件彻底暴露了外国资本的全部阴谋，而且必定会帮助孙中山本人在工农群众中找到踏实牢固的基础。”1924年9月22日，他发表了《在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要求世界无产阶级援助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不能发展。只有无产阶级能起到革命领导者的作用。”1924年10月，他又发表了《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谈话，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已经开始懂得谁是他们遭受苦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国民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他们懂得，为了世界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要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建立牢固的组织，并且成为革命的核心。”<sup>②</sup>不久，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开始了，急需李大钊回国做大量的工作，因此，李大钊只好改变了在苏联

<sup>①</sup> 共产国际五大速记稿第1部分第668—672页。

<sup>②</sup> 苏联《远东问题》1985年第1期。



多走走、看看的计划，离开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

## 五、李大钊参与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李大钊的被捕与牺牲

李大钊、加拉罕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是从援助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开始的。加拉罕是以苏联方面的大使身份出现的，李大钊则以胡景翼将军的军官代表团成员身份出现。1924年12月底，胡景翼派了一个军官代表团同加拉罕谈判。苏联大使馆武官格克尔写道：“今年（1924年）1月29日，国民军第二军司令胡景翼将军的代表刘将军，及其驻北京代表于将军，以及北京大学李教授（共产党员）来到我这里。将军的代表宣称，来访的目的是谈判援助革命军问题……他们打算请求我们给军队提供教育。”<sup>①</sup>李大钊参加胡景翼的军官代表团有力地推动了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工作。据屈武回忆，李大钊到达开封的时间为1924年12月27或28日。胡景翼一见李大钊非常高兴。李大钊在开封住了6、7天，与胡景翼进行了多次会谈<sup>②</sup>。4月份胡景翼去世，继胡之后，冯玉祥提出了援助他的要求。

1925年4月至6月正当五卅运动处于高潮时期，李大钊和加拉罕、鲍罗廷共同从事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在冯玉祥同加拉罕、鲍罗廷谈判中，李大钊又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了国民军一军代表团。1925年5月初，一个庞大的苏联顾问组来到了张家口，到国民军第一军工作。顾问组的负责人是红军的一个有能力的指挥员、军长维托夫特·卡季米罗维奇·普特纳（普特纳中文名任德江）<sup>③</sup>。顾问组到张家口后，李大钊便以国民党员身份向顾问组提出建议，共同劝说指挥部，使冯玉祥确信在军队里应进行政治工作。李大钊建议，俱乐部应成为政治工作的基础，要

① [苏] 维·马·普里马克夫，《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译本第4—5页。

② 屈武，《李大钊同志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陕西纪念胡景翼逝世60周年大会印，1985年4月）。

③ A. B.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中译本第47—48页。

在俱乐部周围建立各种政治与文化教育组织，在俱乐部里开设研究政治经济学小组和孙文主义小组，并提出成立10个俱乐部。冯玉祥经过犹豫之后，批准了李大钊的建议，但提出在初期只成立两个俱乐部，并委托李大钊、徐谦领导政治工作。不久，冯玉祥下野，三一八惨案发生。接着，张作霖军队在涅恰耶夫白军和吴佩孚军的支持下，进攻北京，国民军被迫放弃北京、天津。在国民军退出北京前，加拉罕便遭到了张作霖的驱逐。同时，反动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1926年3月19日《临时执政令》说：“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要求全国“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并提出北京内外要“一体严拿，尽法惩办”<sup>①</sup>。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兵营。他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革命组织保持了密切的联系，这种隐蔽生活长达一年之久。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6天，1927年4月6日，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搜抄了苏联驻华使馆。张作霖此举的实质是查抄苏联大使馆档案，寻找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证据，从而把苏联支持中国革命活动污蔑为“阴谋”、“颠覆”，同时从苏联大使馆逮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人当即被捕。李大钊被捕后遭受严刑逼供，但他英勇不屈。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壮烈牺牲。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英勇牺牲后，苏联、共产国际对此十分重视。苏联《真理报》于1927年5月1日发表《被杀害的英雄》一文。文章指出：在监狱里杀害战士、学者和人道主义者李大钊及其许多同志的真正罪魁，与其说是奉天傀儡，不如说是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分子。”1927年5月8日，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著文《悼李大钊同志》。1927年5月10日，共产国际专

<sup>①</sup> 《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42页，北京出版社出版。

门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若干中国共产党人被处决的抗议书》，抗议“世界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中国的血腥的刽子手”残酷杀害中国共产党奠基人的暴行。

上面的事实使我们看出：第一，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是共产国际建立和发展的时代，共产国际是兴盛的，它对于中国革命具有历史功绩。第二，与共产国际密切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大钊赞助俄国革命、走俄国革命道路、建党、与共产国际使者协同工作、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同孙中山建立统一战线、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等等，所有这些都说明密切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是李大钊一生中所从事的重要事业。第三，李大钊同共产国际密切联系，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他的努力推动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使苏联、共产国际在东方找到了朋友和支持力量，所以，这对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支持苏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重要作用。第四，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所从事的事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李大钊在处理同苏联、共产国际关系方面，也有遵从得过多，分析得不够的缺点。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

吴家林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对于当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曾提出过精当的策略主张，从而对当时北伐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北伐战争中，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的身份统筹全局，动员北方人民，支援南北革命军，特别是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帮助，派遣大批中共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协助国民军制定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并对北方群众自发的武装斗争给以道义和人力上的支援，这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势力，加速了北伐战争的进程，使南北革命军迅速会师中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

## (一)

北伐战争攻击的直接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事集团——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有三支主要军事势力：一、直系军阀吴佩孚，他掌握着20多万军队，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等大块中原地带以及陕西、河北的一些市县，控制着京汉铁路。二、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他拥兵20万，盘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三、奉系张作霖，他统率军队30万以上，霸占着东北各省和天津、北京及津浦铁路北段，是北洋军阀中最强的一个。除上述三支较大的军事势力之外，还有山东的张宗昌鲁军，山西阎锡山晋军等等，都是北洋军阀系统的。另外还有西南各省的小军阀，也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在北方还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国民军（又称西北军），原属直系军阀系统，由冯玉祥率领。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乘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机，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北洋军阀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将参加北京政变的部队组建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及孙岳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这支军队的统辖范围包括京、津、河北、绥远、察哈尔、甘肃、宁夏、河南、陕西等地。由于国民军同情人民，倾向国民革命，招致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中外反动派组成中国反赤大同盟，首先在北方打击国民军。

1926年3、4月间，吴佩孚、张作霖组成奉直联军，将国民军驱出京、津地区。同年6月，各军阀在北京协商，确定了联合进攻计划，具体部署是：在北方，由直、奉联合继续围攻和消灭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部，然后联合西南各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江西，孙传芳布署邓琢如部和在福建的周荫人部，伺机偷袭广东革命根据地。

从革命力量方面来说，至北伐前国民军共有7个军30万人。从敌我的力量看，军阀的势力较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力量要大得多，而且各派军阀都有帝国主义在军火和物资方面的支持。

为将革命推向全国，铲除各地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对革命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决心支持和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和主要干部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sup>①</sup>因此，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1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在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要求北方党组织不能坐等北伐，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对于北方国民军问题，会议还作了专门决定，通过了《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决定指出：自五卅以后，中国的政治潮流已由宣传和组织群众时期发展到开始准备武装群众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军阀逐渐分化出“一部分左倾的武装势力”，“如直系军阀中分化出来之国民军”，还有奉系军阀分化出来的郭松龄及魏益三部。虽然他们“不是革命的人民武力”，但是“在近数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给与人民以相当的自由”。当帝国主义武装军阀军队并加紧进攻国民军的时候，北方的军事工作，是帮助国民军，使“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的武装，并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sup>①</sup>

在帮助和改造国民军的工作中，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党组织特别注意两条原则：第一，“帮助国民军不应使之从新造成新的军阀系统”；而要使国民军成为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第二，帮助国民军须经过国民党或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影响国民军，“渐近于能指导国民军”<sup>②</sup>。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国民军的进步，使之向革命化的方向发展，造成北伐战争的有利形势。

## (二)

对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出现，中国共产党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次政变“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表

<sup>①②</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二）第34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现军阀势力之崩溃；一是表现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开始形成”。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党委以及共产国际、苏联政府对北方政局的这一变化非常重视，决定采取联合国民军的策略，以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北京政变和国民军成立不久，李大钊就亲自到冯玉祥京郊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而亲切地交谈，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冯玉祥对李大钊的谈话十分感激，他说：“先生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很快会晤冯玉祥，了解到冯玉祥倾向革命而不同于一般军阀后，苏联政府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援的态度。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5月初，一个30多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派到张家口。经过谈判，苏联答应给予国民军无偿的军事援助，大量的武器、药品从内蒙运到张家口、平地泉。国民二军胡景翼在政变后处境困难，邀请李大钊到河南会晤，并请李大钊作为二军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不久，苏联政府又派一个4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到达河南开封，在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队工作。

为了帮助、改造国民军，李大钊先后派遣宣侠父、钱清泉、陶梁、濂卿等10多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到国民军一军工作。宣侠父等到张家口以后，利用办俱乐部、图书室、训练班等形式，上课、讲演、教唱革命歌曲，广泛接触广大官兵，向他们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时还邀请国民党要人如徐谦、孙科、于右任等向广大官兵演说。

李大钊本人在百忙中也深入国民军中，对官兵们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军的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日记中写着：“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质大镜框的眼镜”，“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政治俱乐部。他使冯玉祥同意通过政治俱乐部在军队里宣传

国民党纲领。在这里，他与元帅（指冯玉祥）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sup>①</sup>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还写道：“他（即李大钊）知道我和埃凡斯在国民军里供职以后，给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情报……更加明确了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估计。因而，我们决定不仅要进行军事工作，而且要在军队里进行革命的宣传。”<sup>②</sup>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对干部的需要，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帮助国民军开办干部学校，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

1925年，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很快影响到北方，张家口等地的工人、学生、市民、军人举行了反帝示威游行，京、津的许多大中學生，纷纷投奔到冯玉祥的部队。在李大钊、徐谦的建议下，冯玉祥决定在张家口开办西北军干部学校，将投奔国民军的700多名学生编成5个中队，对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培训。冯玉祥委任陈琢如为校长，张之江为参谋，派宣侠父到校工作。

为提高国民军二军的军政素质，加强其战斗力，李大钊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国民军联军成立以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的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及有文化的士兵入学，培养国民军的军事、政治人材。西安解围后，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又称“第二黄埔”，是专门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此外，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也由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经常到校讲课。通过创办干部学校，为国民军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此外，李大钊指示刘伯坚，将西北军的机关报《西包头报》改为《中山日报》，由中共北方区委派来的贾丽南和刘贯一分别

<sup>①②</sup>（苏）维·马·普里马科夫：《冯玉祥与国民军》第47—48页。



担任社长和记者，使该报成为西北军的党员和北方区党委联系的纽带，并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指示在北方地区的执行情况。

李大钊还通过国民党左派领袖如冯玉祥的高级顾问徐谦、于右任等来做冯玉祥及国民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冯玉祥去苏联考察期间，徐谦不辞劳累地陪伴他。1926年3月24日至4月27日，冯玉祥在库伦（今乌兰巴托）暂住期间，徐谦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sup>①</sup>。冯玉祥在苏联时，曾邀请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朱务善等给他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史。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从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结合介绍俄国革命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冯玉祥进行深入的思想诱导。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还为冯玉祥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冯认为刘伯坚的介绍使他收益不小，特邀请刘伯坚一同回国，帮助他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在五原誓师前“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sup>②</sup>，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特派警卫团长持亲笔信和刘伯坚的信，前往北京见李大钊，请求派遣干部帮助工作。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转给党中央。不久，从上海党中央、北方区委及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派了200名党员及进步青年去国民军中工作。至此，北方区委及党中央派到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近400名。

随着国民军中中共党员人数的增加，政工队伍的扩大和政治工作的开展，李大钊和北方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强调了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必须注意国民军中的基础政治工作；第二、党的系统和军事系统应分开，政治工作应直属总

<sup>①</sup>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sup>②</sup> 《中共北方区对于三特区西北军中工作的意见》（1926年10月18日）。

司令部；第三、不要限制冯玉祥的职权。<sup>①</sup>同时，提出了不设党代表制度，各级政治部（处）主任应由冯玉祥自己委任。李大钊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对于派到国民军的人员要“集中使用”，“使冯及其部下将领得以睹其成效”，并要求中央提醒刘伯坚注意冯的思想倾向，搞好同冯及其周围人员的关系。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在策应北伐战争中，虽然缺少衣食枪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能不畏艰苦，行程数千里，打败了几倍于己的敌人，对北伐战争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有些师、旅成立起“军支”。一些国民军军官思想逐步左倾，例如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等，他们有的在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所有这些，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 （三）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而奉系东北军的势力大大扩展，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要报复冯玉祥的倒戈之仇，便与奉系军阀勾结，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计划首先消灭在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为保全国民军的实力，使直奉军阀失去进攻的借口，冯玉祥采取了个人引退的办法，于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然后去苏联考察，国民军暂由张之江统率。但直奉军阀并未取消消灭国民军的计划。

1926年初，军阀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组成直鲁联军，发

<sup>①</sup> 《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1926年11月）。

动了直隶地区国民军的进攻。后来，阎锡山的晋军也加入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这时奉军有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约50万人。国民军在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困难。

3月19日，李大钊通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向国民军将领建议：“4月以前，至迟4月中旬以前，国民军应退出北京，撤到南口山口，在那里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要在军队撤退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国民军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于3月20日布置了有计划有秩序地撤退。3月24日，国民军一夜之间撤出了天津，顺利地开往京郊山区。4月15日，国民军又撤出北京，各主力部队沿京绥铁路线退往南口附近，京郊地区的部队退往顺义、延庆一带；京西地区部队退往斋堂和蔚县。国民军二、三军的一部则经南口退至怀来、涿县一带。

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冯玉祥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的部队于4月9日包围了执政府，准备逮捕段祺瑞，并将前总统曹锟从狱中放出来。而段祺瑞已于事先避入东交民巷某使馆。国民军放弃这个城市的目的，是把北京交给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军阀，使二虎相争，激起军阀内部的矛盾。

国民军退守南口以后，即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处要隘。4月下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向南口国民军发动了进攻，阎锡山的晋军在大同及晋北地区与国民军展开激战。另外，吴佩孚任命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从4月中旬开始对陕西国民军进攻。他还任命张兆铎、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于5月中旬进攻甘肃国民军。

南口战役和晋北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顽强抵抗，奉、直、鲁、晋各军遭到很大损失。直系将领田维勤部陈鼎甲旅，过去属国民军二军，后归田氏改编为第三十九旅，担任讨赤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右翼。在田氏进攻怀来时，陈旅按兵不动，故意逗留。7月12日，三十九旅军官许权中（中共党员）在李大钊的策划下于

京西妙峰山率2000人投奔国民军。7月20日，田部第四十旅两个团，又在清水涧向国民军投降。

国民军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几个战场抗拒了奉、直、鲁、晋的联合进攻，把军阀80%的军队拖在南口战场，减轻了对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从5月北伐军先遣部队在湖南作战开始，到7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以迅猛的姿态向北进军，7月中旬，北伐军攻克长沙、宁乡，接着占领平江，直系军阀在南方作战失利，而吴佩孚在7月15日还在北京长辛店指挥军队与国民军作战。直系将领一再打电报催吴佩孚南下，吴回电表示：“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此时，吴佩孚已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处境。

7月19日以后，北方军阀对国民军的进攻完全由奉鲁军担任，奉军与国民军在南口的战斗更为激烈，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由于张之江指挥有误，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驻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及时将战况电告北京苏联使馆，并转告李大钊。李大钊见此形势，于7、8两个月内，先后三次电告于右任，要他催促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催促下，于1926年8月从苏联启程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国民军诸将领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当天下午，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五、弓富魁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会上，冯玉祥、刘伯坚等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当场举行易旗仪式，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进攻方向问题，国民军将领中存有兩種不同意见：一种意见是部队回原路收复南口，占领北京，再沿

京汉路南下；另一种意见是从五原挥师西征，占领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正当冯玉祥举棋不定的时候，李大钊派人送来密件。密件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李大钊9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了解，报告中有：“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sup>①</sup>。冯玉祥接密件后，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9月下旬，冯玉祥派出七路“援陕军”去解西安之围。此时南方北伐军已经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吴佩孚、孙传芳大战于武胜关和江西。11月23日，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攻克咸阳城，接着以方振五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部为中路直攻西安，西安城已被镇嵩军围困8个月之久，城内是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及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兵力不及5000人，而围城之敌军有8万多人，城内军民吃食无着，饿死者狼籍街巷。11月下旬，国民军赶到城下，恰巧孙连仲、刘汝明部也相继赶到，26日，国民军开始全线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包抄镇嵩军成功，敌全线动摇，开始向潼关败退，这时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11月27日，国民军解围西安城。

南北革命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的反动军队仍在7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北伐军和国民军的兵力。这时李大钊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说：“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78—879页。

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张合作。”<sup>①</sup>

关于第一策，是利用张宗昌与孙传芳、张作霖的矛盾，鼓励张宗昌去夺取孙传芳驻兵的江苏地盘。早在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联系杨度去济南为张宗昌献策，建议张乘虚夺取孙传芳所据守的南京，以报过去兵败之仇。在杨度的鼓励下，张宗昌曾表示愿意归附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突然到达济南，看出破绽，使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策是针对直系军阀驻河南的新云鹏、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部，他们中有些人原是国民军二、三军的旧部，李大钊给中央写信，希望“去函汉口推进此事”。结果，促成靳云鹏等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大大减少了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阻力。

第三策是联络阎锡山，使之不与奉军合作。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在战场上，总是以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转移，他看到直奉联合势力大大超过国民军，就追随直奉，加入“讨赤联军”。到了1926年秋冬，北伐军直驱湘鄂，政治形势出现有利于南北革命军的时机，阎锡山对冯玉祥的态度有了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和“四省”（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李大钊在使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变为联冯反奉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中有详细的说明：“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sup>②</sup>

李大钊做工作以后，晋阎和奉张的关系呈若即若离状态。张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84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885页。

作霖压迫阎锡山，令其合攻国民军，提出要阎“将绥包一带之冯部驱除净尽”，或“向甘陕进击冯军”，皆为阎锡山所拒绝。但是阎锡山与冯玉祥之间，过去曾有不愉快之事，阎锡山见冯军崛起，心有疑虑。因此阎的驻京代表又托人告诉李大钊说：“冯在包头大张旗鼓的作起来，颇令晋方为难。党对此有何善策？”李大钊帮冯玉祥解释说：“冯在包头知公为难，刻已旌麾西指，赴平凉督战矣！他希望阎、冯双方不念旧恶，共同抗奉。之后，李大钊又托人带信给阎锡山，向他宣传当前的大好革命形势，要他权衡利弊，作出自己的选择：“晋阎自第一次革命即督山西，于今十五年矣。革命以来，历督一省而始终未遭更动以迄今日者，百川而外宁复几人？然百川之苦心孤诣历尽，事齐事楚之艰难，而不惜卑身屈节以保此位置者，岂仅为身家一己之尊荣乎？抑将守此以有待，而为吾国家民族完成革命之大事业乎？如使为一己，则吾于百川复有何言，如为民族革命之大事业者，则百川今日所处之境，真所谓千载一时之良机，不容或失者矣。现在革命军之势力已足控制长江，国民军亦且雄视西北，倘来岁春深反奉战起，百川果能率其十数万健儿加入我革军方面作战，则榆关以内胡骑全清，易如反掌耳。”<sup>①</sup>李大钊的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摆明形势，又说清利害，使阎锡山深为感动。阎复信表示决心与国民党合作。由于晋阎态度的变化，奉军不敢进击包头和穷追国民军，从而消除了国民军绥甘后方之忧。

1927年春，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出长安会师郑州”的建议，于5月1日在西安举行国民军联军东征誓师大会，接着，冯玉祥赴潼关指挥战争。5月26日大败奉军，占领洛阳。5月底攻占郑州，与北伐军唐生智部在郑州胜利会师。至此，李大钊关于北方国民军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战略计划得以完满实现。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85—386页。

此外，在北伐期间，北方广大农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影响下，有组织地开展了抗税抗捐、反对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这些斗争对牵制军阀军队，配合革命军北伐也起了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张 振 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奠基人。他是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理论家和实践家，他不仅重视在工人中建党，而且重视在农民、少数民族和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sup>①</sup>建立了各地的党组织。

在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共产党。他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sup>②</sup>而要彻底改造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必须建立一个象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党。李大钊关于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在北方建党做了准备。同年10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吸收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等人加入小组，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不

<sup>①</sup> 见《李大钊文集》（上）《李大钊烈士碑文》。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2页。

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改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为主要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多次派遣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北京党组织成员到北方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共产党组织。

## 李大钊与河北工人中党组织的建立

当时的河北产业工人（包括北京、天津）在数量上，除上海以外，比任何一个省份都多。李大钊非常重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920年春天至1921年春天，李大钊多次派遣罗章龙等人到唐山进行社会调查，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以下简称南厂）先进工人邓培经罗章龙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李大钊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北大旁听生李树彝到唐山帮助邓培开展革命活动。1922年3月，邓培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从苏联回国以后，根据中共北京地委关于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指示，在南厂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工人骨干中发展了阮章、王麟书、许作彬、李华添、刘玉堂等人入党，在此基础上，1922年4月，建立了中共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支部，由邓培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北京地委<sup>①</sup>。党的二大以后，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邓培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从此以后，唐山成为京奉铁路和京东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非常关心在铁路工人中建立党组织。1920年，他就派遣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到铁路工人集中的张家口、石家庄等地

<sup>①</sup> 见王树信、刘建才：《马克思主义在唐山的传播与党团组织的建立》，《河北党史资料》第7辑。

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团员。1922年，李大钊利用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矛盾，经北京政府交通总长高恩洪允许，派遣张昆弟、安体城、陈为人、何孟雄、包惠僧、袁子贞等6名共产党员到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津浦等铁路以密查员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春，何孟雄以京绥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达张家口，他和共产党员张隐韬等一起在铁路工人中组织了没有员司参加的“车务工人同人会”，并介绍先进工人李泽入党。6月份又发展了康庄车站工人李连生、周振声入党，建立了张家的第一个党小组，称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10月，又发展张树珊、张小珊、魏华池、付国忠4人入党，小组改名为“中共张家口铁路工人小组”。到1923年初，已在张家的铁路系统中建立了3个党员小组。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何孟雄根据李大钊的指示，采取“隐蔽斗争、秘密联络”的方针，使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924年春，建立了中共京绥铁路支部，书记何孟雄，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了贯彻党的三届一中全会决议，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派遣王仲一、江浩、张良翰等共产党员到张家口，他们在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1925年初，王仲一、江浩等人根据李大钊的指示，为了统一张家口地区的党组织，建立了中共张家口特别支部，由王仲一任书记。李大钊认为，张垣乃西北一带的枢纽与关键，急需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于是，又派出肖子暉（肖三）、杨洪涛等人到张家口。他们与原特支领导人王仲一、江浩等人一起开始筹备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在筹备过程中，李大钊亲自与他们谈话，布置任务。1925年10月，中共张家口地方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肖子暉（后由王仲一、丁孜孜担任），地委秘密代号“章迪芳”，对外公开用国民党察哈尔

特别行政区党部的名义。党内刊物《西北响导》<sup>①</sup>。

石家庄的党组织是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0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朱务善率领“平民教育演讲团”到石家庄铁路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冬，经罗章龙介绍，石家庄铁路机厂先进工人孙云鹏在北大西斋入党。1922年8月，李大钊派遣张昆弟以正太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到石家庄开展工人运动。1922年12月，在成立正太铁路总工会的同时，成立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党团，由张昆弟任书记。李大钊很重视石家庄的工作，他认为石家庄有现代纺织工业，又系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很重要。这些地区的工作应加以重视<sup>②</sup>。根据李大钊的意见，1925年12月6日，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在石家庄建立党的特支，并派共产党员王光宇（王斐然）到石家庄负责筹备工作。1926年1月，王光宇与先期由全国铁总派到石家庄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王警昆（王鹤寿）、傅茂公（彭真）一起建立了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由王光宇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sup>③</sup>。

## 李大钊与北方农村党组织的建立

早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就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提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在“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sup>④</sup>”。李大钊在北方工人中创建党组织的同时，也很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中共北方区委建立以后，李大钊曾亲自领导农委工作。根据李大钊关于在农村中建党的思想，中共北京党组织派出党员

① 以上参见《中共张家口市委组织史资料》。

② 以上参见《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史资料》。

③ 《石家庄党组织建立和发展概况》，《河北党史资料》第7辑。

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

到各地农村开展建党活动。

中国北方农村最早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河北安平县。1923年3月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安平县台城村人）入党。同年8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弓仲韬回到原籍开展革命活动，发展了农民弓凤洲、弓成山入党。1923年10月，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台城特支，由弓仲韬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李锡九系安平县任庄村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国会议员，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北京结识李大钊。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入党。1923年4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李锡九回安平一带开展建党工作。1924年初，李锡九介绍安平县北关高小校长李少楼和李振庭、李汉晖等人入党。2月份建立了中共安平县北关高小支部，书记李少楼，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1924年春，弓仲韬与李少楼取得了联系，他们共同介绍教育界知名人士张麟阁入党，3月建立了中共安平县敬思村支部，书记张麟阁，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为加强对安平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4年8月15日，在敬思村召开了中共安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安平县委员会，书记弓仲韬，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

1924年春，李大钊寄书李锡九。希望他发展在饶阳县影响较大的进步知识分子韩子木入党。韩子木是李锡九的好友，曾任直隶省议会议员。韩子木入党以后，很快地在饶阳县发展一批新党员，韩成为在饶阳建党的中坚力量。在党组织发展的基础上，1925年10月，安平县委与饶阳县党组织合并，建立了中共安饶联合县委，书记弓仲韬。1926年7月，建立了中共安饶深中心县委。书记刘金玉（后弓仲韬），下属组织有10个党支部。

乐亭县是李大钊的故乡。乐亭县党组织是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3年9月，直隶省教育厅决定在乐亭县立高小的基础上成立乐亭中学。李大钊利用他在乐亭社会上的影响，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岑伯（乐亭王滩村人）任乐亭中学校长。1924年1月，李大钊又派遣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共

产党员王德周以英语教员的身份到乐亭中学从事革命活动。王岑伯和王德周通过教学改革，向学生传播新思想。1924年冬，王德周根据中共北京区委的指示，将徐凌汉、贾坤普、葛玉田、王成奎等4名年满18岁的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乐亭县支部，书记王德周。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中共乐亭支部建立以后，便向周围农村发展党员。1925年，建立了中共乐亭地方委员会，书记王德周，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sup>①</sup>。

玉田县的第一名共产党员江浩是1921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1925年夏，作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的江浩根据李大钊和中共天津地委的要求，利用关系和在县教育局开办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的机会，成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并介绍国民党中的优秀分子李立元、张明远、肖志斋、王佩青等4人加入共产党。1926年5月，为了加强对玉田反捐抗税斗争的领导，共产党员肖志斋、李立元、王佩青曾在县教育局内成立中共玉田支部。因遭反动当局破坏，8月停止活动。1926年9月，李大钊派遣从广州农讲所学习回来的张明远和在开滦煤矿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杨春林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到玉田县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党的组织。10月底，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农委的指示，召开全体党员会议，成立了中共玉田县特支，书记张明远，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1927年1月，张明远代表中共玉田特支到北京向中共北方区委汇报工作时，李大钊表扬了玉田特支的工作，认为反抗“旗地变民”的斗争对于推动整个北方农民运动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告诫张明远，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战争的成败极为重要。他要求玉田党组织要提高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把农民组织起来，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他还

<sup>①</sup> 以上参见《乐亭党组织的创建发展及其主要活动》，《河北党史资料》第7辑。

批准了玉田特支建立县委的请求，指定张明远任书记<sup>①</sup>。

此外，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还通过中共天津地委派共产党员刘格平在津南的沧县、献县、吴桥县、故城县、庆云县、盐城等县的农村建立了党组织，派北京党组织成员王子清在磁县农村建立了党组织，派何资深、杨洪涛等共产党员在张家口郊区的孤石村和东湾子察哈尔农林试验场建立了党组织。到1927年春天，已在河北的大部分农村建立了党组织。

## 李大钊与天津党组织的建立

天津的党组织是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19年9月，李大钊应觉悟社的邀请赴天津讲学，1920年8月，他亲自参加觉悟社在陶然亭的集会并发言。1920年在他的指导下，新生社改组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在天津建团的基础。1920年11月，李大钊派遣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太雷去天津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建立天津的第一个团小组。1921年1月，张太雷赴苏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团小组停止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指导于方舟、韩麟符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青年团进行整顿的指示，1921年11月，在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在此基础上，在李大钊的培育下，在天津的青年团员中发展一批党员，从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亲自介绍马骏、安体诚、于树德、韩麟符等人入党，在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后，在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和天津的党团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由于方舟、江浩、李锡九在天津建立地方党组织。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4年3月，于方舟等在

<sup>①</sup> 以上参见《玉田早期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天津文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2期。

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召开青年团成立大会，于方舟在会上传达了中央通告，说明了团组织在天津的活动范围、方法。会议选举于方舟、邓颖超等十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委员会，由于方舟任委员长<sup>①</sup>，并召开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于方舟任书记，江浩任组织委员，李锡九任宣传委员，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中共天津地委建立以后，派党员到工人聚居的地区开办平民学校，开展工人运动，并逐步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工会组织。

## 李大钊与内蒙古党组织的建立

李大钊非常重视和关心民族问题，他亲自主持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小组，他曾指出，应该把研究民族问题当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他认为，蒙古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李大钊在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同时，即着手在内蒙古地区的建党工作。当时，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内蒙古封建王公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使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1923年夏，一批蒙古族有志青年来到北洋军阀政府开办的北京蒙藏学校学习，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关心和重视蒙藏学校的工作，为了培养蒙古族干部，李大钊和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等人多次到蒙藏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蒙藏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使他们逐渐懂得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认识到了内蒙古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民族解放斗争的一致性。1924年4月，在蒙藏学校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到1924年底，该校的进步学生多松年、张良翰、吉雅泰、云泽（乌兰夫）等38人加入了共产党。在革命

<sup>①</sup> 窦爱芝、刘玉芝：《于方舟》，《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了开展内蒙古地区党的工作，李大钊派遣张良翰、多松年等回到绥远、察哈尔地区，他们在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同时，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在李大钊影响下的热河进步青年韩麟符、陈镜湖、郑丕烈、杜真生等人先后加入共产党，李大钊把他们派回热河（因位于内蒙古东部，有东部内蒙之称）开展建党工作。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进驻张家口以后，李大钊认为在内蒙古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便决定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包头一起建立中共工作委员会，由吉雅泰任中共绥远工委书记，张良翰（后多松年）任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陈印潭（后杜真生）任中共热河工委书记，翌年又派李裕智去包头建立了中共包头工委并任书记。以上人员，除陈印潭、杜真生以外，均系蒙藏学校学生。

1925年10月12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它是内蒙古地区坚持反帝反封建纲领，代表内蒙古劳动人民利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成立以前，李大钊曾亲自向吉雅泰作了重要指示，并指派江浩、王仲一作为中共北方区委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江浩以首席代表的身份讲了话。吉雅泰、乌兰夫等人被选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候补执委。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对于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王公的特权制度，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 李大钊与晋豫陕甘和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

山西党组织是李大钊派遣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高尚德到太原建立起来的。1921年4月，高尚德被李大钊派回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在太原成立了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1924年5月，高尚德受中共北京区委和李大钊的指派，再次回到太原开展建党活动，建立了山西的第一个党小组。在此基础

上，于同年秋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隶属于中共北京区委。

河南早期的党组织是在李大钊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1921年，河南的第一名党员赵子健在郑州从事革命活动期间，经常得到李大钊的指导。河南第一个党小组的负责人游天祥和在河南建党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刘天章，都是由李大钊亲自介绍入党的。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后，李大钊通过与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统战关系，派刘天章到驻守在河南开封的国民二军创办学生军并担任学员队大队长。刘天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学员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党团员近百名。与此同时，刘天章还时冯昌毅等共产党员一起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三中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中发展一批党团员，并建立开封团地委<sup>①</sup>。在此期间，李大钊多次听取河南党组织的汇报并作出指示。在李大钊的关怀下，1925年10月，成立中共豫陕区委，促进了河南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

陕西的党组织是李大钊派遣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创立的。魏野畴于1923年初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4年春至1926年春，魏野畴在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和第三中学任教期间，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魏野畴与吴化之等共产党员一起整顿了西安的团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西安特别支部，由吴化之任书记，魏野畴和雷晋笙任委员。1926年初，经中共豫陕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安地方委员会<sup>②</sup>。从此以后，陕西的革命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甘肃省的建党工作是在李大钊的直接关怀下，通过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的共产党员进行的。1925年1月，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李大钊针对这一有利革命形势，决定把统一战线工作的

<sup>①</sup> 梁星亮等，《刘天章》，《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sup>②</sup> 张守宪等，《魏野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重点放在张家口，做争取冯玉祥国民军的工作。李大钊与徐谦一起到张家口与冯玉祥长谈，对冯玉祥的思想转变打下了基础。在李大钊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先后由中央机关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1925年5月，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王一飞、张兆丰、孙荃萱、郝久亭等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国民军三军三旅军校支部。五卅运动以后，根据李大钊和徐谦的建议，冯玉祥收容700多名由全国各地奔赴张家口的青年学生，成立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我党在军校学员中发展一批党员，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共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支部。在1926年9月国民军五原誓师以后，我党还发展了蒲化人、南汉宸、刘仲华等国民军高级军官入党。由于我党的工作，对于国民军进军甘陕，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起了重要作用。

1925年春，中共中央派遣宣侠父等九名共产党员到达北京。经李大钊推荐，他们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宣侠父被任命为宣传员。1925年10月，国民军二师师长刘郁芬被冯玉祥任命为甘肃省代理督办，宣侠父随二师西征到达兰州后，与共产党员钱清泉一起在二师秘密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25年冬，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宣侠父、钱清泉和在兰州的共产党员张一吾一起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sup>①</sup>，从而使甘肃的工农革命运动有较大的发展。

李大钊对东北地区复杂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视，1922年2月，中共北京地委派遣马骏到哈尔滨，利用《晨光报》开展革命活动，并在他的家乡吉林省宁安县建立起东北的第一个党小组。1923年，中共北京区委曾派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吴丽石由李大钊推荐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秋，吴丽石从苏联回国以后，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到哈尔滨从事

<sup>①</sup> 金戈等：《宣侠父》，《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建党工作。他到三十六棚中东路总厂机务段以小工的身份从事工人运动。并发展先进青年工人张有仁、姜文洲等人入党。成立了三十六棚党支部。并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创办《哈尔滨日报》。1925年11月，成立了以吴丽石为书记的中共哈尔滨特支。1926年初，成立了中共北满地方委员会，由吴丽石任书记<sup>①</sup>。五卅运动以后，李大钊派遣共产党员任国祯回原籍奉天（沈阳）开展建党工作。任国祯和吴晓天一起利用开办暑期同学会的机会，发展一批党团员，建立了党小组。同年8月，成立了中共奉天（沈阳）支部。1926年中共北方区委又派邓如皋等人到大连建立了党组织。到1927年春天，已在奉天、大连、哈尔滨、吉林、长春、牡丹江、双城、北宁路、台安等地建立了党、团组织<sup>②</sup>。另外，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与山东济南的王烬美、邓恩铭取得了联系，并派吴慧铭、陈为人到济南向他们介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帮助他们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组织。

综上所述，从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李大钊通过北京党组织派遣共产党员先后到北方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到1927年春天，除北京以外，已在河北、天津、内蒙古、热河、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对于开展工农革命运动，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起了重要的作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北方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不少地区的党组织在极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继续坚持斗争，不仅保存了革命火种，而且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作者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① 罗占元、许庆昌：《吴丽石》，《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齐文华：《任国祯》，《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8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李大钊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

乌 尼 日

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之际，笔者就李大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在西北地区积极进行争取冯玉祥及西北军，并以冯玉祥控制的西北重镇张家口为中心，发动各民族人民共同推翻北洋军阀反动统治的革命活动作一阐述，以缅怀他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

## 一、李大钊与冯玉祥

1924年，首都革命之后，冯玉祥因段祺瑞篡夺革命果实而异常气愤，于11月初，到北京门头沟庙天台山出家了。此时，他虽然消极避世，但仍有许多人去看望他，劝他振作，特别是李大钊通过驻冯玉祥部的徐谦来做他的工作。后来，段祺瑞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他便下山了。

1925年1月13日，西北边防督办署在张家口成立，将国民军改编为西北边防军，司令部设在桥东土尔沟街“新村”。当时的张家口是西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虽离京津较近，却是反动派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由于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新村”就成为当时许多政治活动的中心，1925年间，李大钊来张家口活动时，就曾住在这里。

国共合作之后，国共两党的共同敌人就是北洋军阀，由于冯玉祥的政治倾向，我党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就成为当时一项很重要的任务。这项工作的开展就是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领导下

进行的。

1924年11月，李大钊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立即召开了由赵世炎、彭建华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李大钊谈了如何争取冯玉祥的问题。他说：“西北军冯玉祥想让我们帮助他仿照黄埔军校办所军校，聘请苏联军事顾问，遣派政工人员。当然，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主意，这些工作我们都要派同志去作，来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sup>①</sup>为了争取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在1925年数次频临张家口，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25年初，徐谦向冯玉祥介绍他与李大钊曾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几次同苏联大使加拉罕交换过意见，苏联可以通过外蒙到张家口的路线给西北军以无偿的援助，冯玉祥欣然接受。2月下旬，冯玉祥派毛以亨以秘书的名义去北京向李大钊、徐谦商谈此事。两天后，李大钊、徐谦在毛以亨的陪同下，来到张家口的“新村”举行会谈。4月，苏联驻广州革命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驻华武官格克尔来张家口访问冯玉祥，顺利地达成了关于苏联向冯玉祥提供援助的协议。5月3日，苏联顾问团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说：“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因此我请他们二位介绍，从苏联来三、四十位顾问，步骑炮工等各项专门人才皆备，分在我们训练中任教。两方均无条件，只为帮助我们完成国民革命”。从此，苏联军事顾问和军械源源不断地支援西北军。

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苏联大使馆军事参赞沃罗宁的住宅召开了扩大执行委员会，在会议通过的议决案中指出：“最近一

<sup>①</sup> 《1924年秋，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五大后对北方区工作的部署》，《党史资料》1983年第一辑。

年来，中国发现所谓国民军，他们与国内解放运动发生关系，一方面可见他们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别方面他们为民众运动所推引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运动，产生了军队力量对于革命运动的新作用。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sup>①</sup> 1925年10月，李大钊以国民党驻华北特派员的身份第4次来到张家口，他通过拜访上层人物，起草文件和对组织机构等的协商，正式成立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连牌子也即时挂上了。

由于李大钊的艰苦努力，1925年10月至11月，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李大钊抓住有利时机于1925年11月底，第5次来到张家口，亲自参加并主持了“西北农工兵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党北方区的代表赵世炎、谭平山、罗章龙、韩麟符、陈乔年、刘伯庄、王仲一、江浩；国民党的代表，李烈钧、徐谦等；还有工人、农民、牧民、士兵的代表共200人。他们来自察绥热三特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李大钊为大会作了重要讲话。他“介绍了苏联工农兵政权的情况，在分析全国革命形势和任务时，特别强调坚持革命统一战线和蒙汉各族人民团结起来翻身解放的重要意义。”<sup>②</sup> 会议提出“农工兵大联合！”、“拥护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等政治口号。大会最后通过了《国民革命的任务》、《和冯玉祥合作的关系》等决议。会后，帮助国民党建立了察、绥两特区；察绥、内蒙两地区和张垣（张家口）、归绥（呼和浩特）两市的6个党部。会上李大钊被选为农工兵大同盟的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为副书记。这次会议对推动农工兵革命运动的开展，团结西北各民族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0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建立及其活动》，《张家口地区党史资料》第7期。

1926年3月至8月冯玉祥出访苏联的愿望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得以实现。8月份，北伐战争刚刚开始，由于西北军在南口失败，北方战局十分危急，处于群龙无首的西北军急需冯玉祥回来坐阵。李大钊为促使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加强北方的力量，制定了“进军西北，策应北伐”的战略方针。为此，约请国民党左派领袖于右任带着翻译马文彦前往苏联做冯玉祥的工作，在半个月内，李大钊接连三次发出电报，敦促冯玉祥迅速回国。<sup>①</sup>这时张家口也来人报告：西北军正在南口与张作霖、吴佩孚等联军激战，阎锡山晋军又从大同切断了西北军的后路，这就更加速了冯玉祥的回国。他同第三国际多次商谈，请苏联接济弹药和选派军事顾问。共产国际研究决定，派乌斯马诺夫为顾问，中共党员刘伯坚为政治部部长，随同冯玉祥一道回国。冯玉祥等人先到蒙古库伦，由于交通不便在蒙古逗留一个多月。9月10日从库伦动身，9月15日抵达五原县。9月16日冯玉祥发表宣言，全体军官、战士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17日冯玉祥统率国民联军接受党旗，宣誓就职。而后，将部队带到包头整训。他曾设想：若全军开赴包头，沿京绥线向京津反攻，南口天险尽在敌手，就是拼死一战闯过去，牺牲必多，与北伐军会师有困难；若是分为两路，包头一路，秦陇一路，则分散主力，势单力薄。正当举棋不定之时，李大钊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冯玉祥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我们加以研究，乃决定采用李先生计划。当定方针为‘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个字”。<sup>②</sup>西北军开出长安，首战告捷，经过半年多的苦战，于1927年5月30日占领郑州，与北伐军会师。

正在会师期间，冯玉祥听到李大钊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于1927年5月9日写了《吊李大钊等二十位同志》，诗中以诚挚的

<sup>①</sup> 《李大钊、邓小平与冯玉祥》，《党史通讯》1985年第4期。

<sup>②</sup> 冯玉祥：《我的生活》（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感情，表达了对李大钊及其他革命同志的深切悼念。为了纪念这位良师益友，冯玉祥下令全军戴孝，树碑纪念。

1925年至1926年，李大钊为争取冯玉祥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李大钊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西北地区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打击了张作霖在北方的嚣张气焰，为前期北伐战争的南北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二、李大钊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1925年前后，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是和全国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能在冯玉祥控制的西北重镇张家口举行，并且是在冯玉祥的住地土尔沟街召开，这是李大钊艰苦努力积极争取冯玉祥的结果。

1925年7月，金永昌、乐景涛、李凤岗根据白云梯的指示，从驻北京的苏联使馆得到2万元的活动经费，来到张家口。月底，白云梯到张，开始筹备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由于冯玉祥和李大钊近一年的接触，思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对这次会议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日本人野津彰在《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一文中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赤俄傀儡冯玉祥控制下的张家口召开时，他们之间具有一种象同志一样的关系，所以援助他们就更不用说了。”<sup>①</sup>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经共产国际的同意，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蒙古问题议决案》，议决案中指出：“中国边境农工群众中的工作，对于我们的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注意内蒙古的工作……我们认为应当组织内蒙古国民革命党，这是内蒙古人民的民族上政治

<sup>①</sup> 野津彰，《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1辑。

上的职任，可是内蒙古国民革命党和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工作应当密切的联络，这是中蒙农民中的革命工作能够有成效的一种保证”。<sup>①</sup>

在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前，白云梯和李大钊就有过接触。1924年1月，在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白云梯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sup>②</sup>（一说是候补执行委员）<sup>③</sup>在这次会上，李大钊是孙中山先生指定的北京代表，而且是5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同年11月，白云梯“随同孙中山北上，在北京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并通过李大钊和孙中山同共产国际、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联系，还与冯玉祥有了交往”。“李大钊积极同白云梯等上层人物进行磋商，参加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sup>④</sup>

1925年10月12日（一说27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土尔沟街召开。它的举行是西北地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大革命时期对内蒙古的革命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会议。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代表内蒙古蒙古族劳动人民利益的民族民主革命政党。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王仲一、江浩等4人，中国国民党的代表于右任、李烈钧等；共产国际的代表奥齐罗夫；西北军的代表张之江。冯玉祥及其俄国顾问列席会议；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丹巴多尔吉；内蒙古各盟旗分别派代表到会。会议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1人，常务执行委员7人。大会通过的第一份议案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案（10月12日），决定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组织武装，联合冯玉祥，打击北洋军阀。大会于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419—42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野津彰：《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1辑。

③④ 郝维民：《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

20日（又一说27日）制定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在宣言中指出：“1911年的革命事业还丝毫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要和与我党有着同一宗旨、使命的中国国民党联合协作，打倒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专制主义，以期真正实现五族共和的国家”。<sup>①</sup>在该党纲领中指出：“同中国民众一起共同打倒暴虐的军阀和帝国主义”。<sup>②</sup>从宣言和党纲中可以看出，它和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是一致的。这次大会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始终和西北军紧密配合，互不分离。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常委乐景涛于1925年底在昭盟克什克腾旗自己的家乡组成了蒙古骑兵队，配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林西、经棚、赤峰一带向张作霖的奉系军阀作战，在同西北军的并肩作战中蒙古骑兵队扩展到1100多人，组成两个团的兵力，编在西北军中。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在后来的发展中，所需的经费和武器也是通过冯玉祥运回内蒙的，1926年8月，冯玉祥西北军在南口失败，西撤包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也随之迁到包头。时隔不久，1926年12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又随西北军迁到银川。1926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奥齐罗夫和郭道甫到阿拉善宣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主张，同时组织武装。1927年4月4日，他们在冯玉祥西北军将领吉鸿昌的援助下，举行了起义，推翻了阿拉善旗的王公政权，建立了革命政权。总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之后，始终按照李大钊的各项指示精神，和西北军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共同打击张作霖和各盟旗王公贵族的反动统治，使内蒙古的革命斗争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岁月流逝，李大钊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但是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学院社科部）

<sup>①②</sup> 野津彰：《内蒙古赤化运动的变迁》，《内蒙古近代史译丛》第1辑。

# 李大钊与章士钊

金淑琴

李大钊与章士钊是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他们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友谊。章士钊对李大钊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研究李大钊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早期思想，不能不注意章士钊对李大钊的影响。

## (一)

李大钊与章士钊的友谊始于1914年夏。章士钊后来曾追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形：“1914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以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友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sup>①</sup>

章士钊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随流亡的革命党人来到东京，和陈独秀等人创办了《甲寅》月刊，“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李大钊1913年的冬天来到东京，1914年春、夏一直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内学习英语和日语，与章士钊相识正是在这期间。但是，他对章士钊的神往，却早在两

<sup>①</sup>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61年版。

年之前，“仆向者喜读《独立周报》，因于足下及率群先生，敬慕之情，兼乎师友。去岁南中再乱，《周报》忽焉不赓，政俗靡敝，讹言繁兴，不得说论以匡正之者数月；而戎马江南，音书隔绝，即私人问学之通讯，不得诸先生教导之者亦复数月；中情郁悒，莫可申诉。残冬风雪，迺从二三朋辈，东来瀛岛，问难无地，索居寡欢，偶于书廛，得《雅言》读之，知为率群先生所作，则喜。继得《甲寅》出版之告，知为足下所作，则更喜，喜今后有质疑匡谬之所也。”<sup>①</sup>在这封信中，李大钊称章士钊为“师友”，把章所办《独立周报》视为“质疑匡谬之所”，这些决非是客套的溢美之词。

《独立周报》是章士钊离开《民立报》之后创办的周刊，1912年9月在上海创刊。笔者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李大钊1918年4月29日捐赠给北大图书馆的《独立周报》杂志，李大钊曾保存了全套的《独立周报》。在捐赠的这套杂志里，许多文章题目上划有着重符号，重要的段落下面也都划有水波线表示。其中有两处写有中英文的眉批，据有关专家鉴定，笔迹是李大钊所写。这些足以说明李大钊当时非常认真地研读了《独立周报》。李大钊不仅是《独立周报》的忠实读者，同时也是它热心的推销者。从《独立周报》第3期起，在该刊“外埠各代派外”中就有“天津李钊”或“天津法政学校李钊”的字样。李大钊承担了该刊在天津的发行工作，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独立周刊》和李大钊任编辑部长的《言治》月刊，章士钊对李大钊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独立周报》以“不偏不倚”“朴实说理”为宗旨；《言治》月刊则“无所于党”“以群居研学为帜志”。在内容上，李大钊发表的许多文章都与《独立周报》相呼应，在一些问题上，都直接或间接受到章士钊观点的影响。《言治》与《独立周报》不仅在思想观点上关系密切，主要栏目设置、论文文体也有很多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95页。

相似之处。因此，李大钊视章士钊为“师友”，以《独立周报》为“质疑匡之谬之所”，的确是李章2人相识前关系的真实写照。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生于1891年3月20日。1903年4月的拒俄运动中，章士钊与林力山率领陆师学生赴上海，参加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章士钊还翻译了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国人始知孙中山这个伟大的名字。章士钊到沪后不久开始主笔《苏报》，发表了一系列反清的革命文章，使《苏报》名声鹊起。章士钊还与黄兴一起筹建华兴会，并担任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的副会长，组织起义和暗杀活动。1905年以后，章士钊在反省自己的活动后，志趣开始转向学术，准备走科学救国的道路。1907年赴英国入艾丁堡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放弃即将取得的硕士学位，于1912年春归国，应邀主持《民立报》，由于章士钊具有深厚的西方法律政治学说的基础，学术水平远非一般革命党人所能比拟，加之提倡朴实说理的文风，易为知识阶层所接受，在国内舆论界很有影响。而李大钊则是一名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在他与章士钊结识时，甚至还不是一名大学生（李大钊是1914年9月8日入早稻田大学的）。所以章士钊在这之前对李大钊“初不以有人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sup>①</sup>但他却从李大钊的文章中，发现了这位青年的才华，以此成为相识的契体，结为终生的挚友。

李大钊首次发表在《甲寅》第1卷第3号上的文章是“通讯”栏的《物价与货币购买力》署名李大钊，和“论坛”栏的《风俗》署名李守常，时间为1914年8月10日。李大钊在《风俗》这篇文章中从历史上旁征博引论述了风俗及国风、民风与国家的

<sup>①</sup>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关系。他对当时“将军变色于庙堂，豺狼横行于道路，雄豪自专其政柄，强藩把持其兵权”的现实痛心疾首，提出昌学“以澄清世运，纲纪人心为己任”，以尽匹夫之责，“国一日未亡，责一日未卸，我尽我责，以求亡国之后，无憾而已”。<sup>①</sup>反映出他忧国忧民，而又找不出解救办法的苦闷心情。《物价与货币购买力》是以通信形式，对康率群发表在《雅言》第5期《吾国今日物价问题与货币之关系》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章士钊为该文加了编者的话。他先是鼓励李大钊的热情“尊论极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学”，继而又耐心地解释了康率群文中所说“购买力”的具体含义，以平等、讨论的方式回答了李大钊所提的问题。在《甲寅》第1卷第4号李大钊发表的《国情》一文篇末，章士钊做了如下的按语：“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幅满，为手民仓卒抽出，未及排入，深以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历久不渝，且古氏之理论，恶果甚深，正赖有人随时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迟速为意也。”<sup>②</sup>文字间充满了对李大钊文章的欣赏，称赞之意。

章士钊这期间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政治和学术论文如《政本》、《调和立国论》、《学理上联邦论》等等，持论严正为舆论界所称道。著名记者黄远庸说：“以今日号称以言论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实”<sup>③</sup>。李大钊与章士钊相识不久便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广泛地接触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他经常到章士钊的住所讨论各种问题，而谈的较多的则是如何把中国的传统学说与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联系起来，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是他们谈的中心。研究李大钊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可以明显地看出，一是学术性逐渐增强；二是很多方面受到章士钊观点的影响。如调和立国论、养成政治的对抗力、反对好同恶异以及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93页；第110页。

③ 《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崇尚等等。章士钊广博的学术造诣，他同国民党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特殊的社会地位，使李大钊接触到北洋体系之外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关系，这在李大钊一生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于他与章士钊从相识到相知，对他后来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 (二)

1916年5月，为了进一步推动反袁斗争，李大钊回国抵达上海。章士钊已先期回国担任护国军政府的秘书长。7月初，章士钊因病住在上海白克路保隆医院，李大钊曾两次去探望，并介绍北洋法政学堂的同窗好友白坚武与章相识<sup>①</sup>。由于袁世凯病死后。黎元洪继位，恢复了国会，章士钊随后以议员身份北上，旋即转入学术界，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也在7月上旬离沪来到北京。不久，应汤化龙之邀创办了《晨钟报》，任该报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9月6日，李大钊因不满研究系与官僚强权相勾结的行为，在《晨钟报》仅工作20多天便辞职。脱离《晨钟报》后，李大钊与白坚武等人创办《宪法公言》，同时参加孙洪伊的地方自治法规起草班子。

孙洪伊是清末立宪党激烈派领袖。1913年加入进步党，二次革命后转向国民党，并积极参加反袁斗争。袁死后，孙洪伊被黎元洪任命为内务部长。李大钊早在1912年就与孙洪伊有过接触，孙欣赏李大钊的才华，同汤化龙一起资助李赴日留学。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到上海后参加了孙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应该提起注意的是，这个宪法研究会与汤化龙同年8月23日组织的“宪法（案）研究会”是两个组织。它是后来商榷系中“韬园

<sup>①</sup> 《白坚武日记》，1916年7月2日，5日。



系”的前身。《宪法公言》就是稽园系的喉舌。这期间，李大钊与孙洪伊以及稽园系关系密切。1917年1月初，段祺瑞派刺客暗杀孙洪伊，孙被迫离京。

李大钊就是这时接受章士钊邀请，参加《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章士钊也曾给李大钊主办的《宪法公言》写过许多文章，但他们的共事却是从《甲寅》日刊开始的。《甲寅》日刊创办于1917年1月28日，到同年6月停刊，共出版150期。这是章士钊在东京所办《甲寅》杂志的继续。李大钊、章士钊、高一涵是主要撰稿人。李大钊在《甲寅》日刊共发表文章70篇，占他当年发表文章的90%。这些文章内容非常丰富，有介绍欧洲和俄国革命方面的；有关于反对封建迷信和偶像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和信仰自由的；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有同情劳动人民抨击现实社会弊端的等等。其中分析世界大战原因、介绍欧洲和俄国革命运动的篇章，表明李大钊已经开始注意到了俄国革命这一重要事件的巨大意义。

1917年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思想剧烈变化的时期，是研究李大钊由崇尚西方民主政治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阶段。长期以来，研究李大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文章比较少，即使谈到这一阶段，也都认为李大钊在后来因与章士钊政见不一致而离开。此说源于李大钊一起创办《甲寅》日刊的高一涵。高文说：“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如此轮流。每人隔一天给《甲寅》日刊写一篇社论。我们在文章中攻击研究系，攻击现政府；而章士钊是维护他们的，他不赞成我们的主张。守常又只顾真理，不顾什么情面，不合心意的，他就要痛骂，章士钊不敢去和守常交涉，便托我去和他商量。……后来彼此谈妥，不谈内政，只写国外新闻。”“于是，守常便连续介绍俄国革命。我们把各报上主张较新的消息综合起来，介绍给国人，后来又遭到章士钊的反对。到张勋复辟时，我

们便登报声明,脱离了《甲寅日刊》。”<sup>①</sup>李大钊究竟与章士钊有什么不同的政见,这是我们研究章、李2人之间关系时不能不提出的一个问题。章士钊本人谈到这个问题时曾说:“一九一七年,吾发行甲寅日刊于北京,约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但此刊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所奉主义无涉。未几,彼此都觉厌倦,因将日刊停止。”<sup>②</sup>李大钊自1月28日《甲寅》日刊创刊,到5月5日因夫人生病返乡,一直是《甲寅》日刊的主要撰稿人,在故乡他曾寄过几篇文章,6月22日才返回北京,不久因张勋复辟而避走上海,而《甲寅》日刊也就此停刊了。这些还不能作为章、李2人有不同政见的依据。《甲寅》日刊是一份以时评为主的刊物,分析这样一份刊物的思想倾向自然需要看看当时的政治舆论中心是什么,以此来判断刊物作者的政治倾向。

1917年,美国准备对德宣战。2月1日美国宣布与德国断交,同时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于是对德外交问题在朝野上下引起激烈争论,成为国内会议的主题。段祺瑞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日本的支持和怂恿下,决心立即实行对德绝交,并准备宣战。黎元洪则惧怕段祺瑞在参战名义下,进一步加强对自己和国会的控制,反对参战,形成新的“府院之争”。研究系在这个问题上完全追随段祺瑞,坚决主张参战。而孙中山以及商榷系中的丙辰俱乐部、韬园系议员则主张中国保持中立国立场,反对对德绝交和参战。3月14日,北京政府宣布对德绝交,参战问题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在国会内外,朝野上下形成强烈地反对参战的舆论。

《甲寅》日刊刚刚创办,即参加了对德外交问题的争论。章

<sup>①</sup> 《回忆李大钊》第164—16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sup>②</sup>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士钊对此初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吾国既生存于东方均势主义之下”，“东方均势主义不破，吾即无发言权，两方为维持其主义起见，其所争亦必间接有利于吾。”<sup>①</sup>他主张政府要慎重考虑，不应贸然与德绝交，使中国陷入不利的地位。北京政府2月14日最后通牒发出后，章士钊发表《悬崖勒马之外交》一文，认为“美德国交尚且不必即断”，政府应悬崖勒马，据理力争，不应马上与德断交。但他又在另一篇文章表示“此等方针，关于国家存亡者至钜”，“爱国之士纵明知其不可，亦当披发纓冠而赴其难，决无余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为。其有尚能为亡羊补牢之计者，未始不可逆于政府意旨，有所主张。然只立于补救地位，而非立于对抗地位。若根本上无益非难，甚至籍此以快其攻诘政府之意者，愚期期以为未当也。”<sup>②</sup>在随后发表的《约法上宣战同意之解释》等文章中，章士钊再次申明自己“于政府所定外交政策，始终为怀疑之一人。惟若为国家前途设想，亦不肯固执己见”，他表示愿牺牲个人观点来赞成政府的意见。章士钊这时不仅主张中国放弃中立国地位对德绝交，加入协约国，而且从法律上解释“断绝国交之必纳”入宣战范围以内<sup>③</sup>为段祺瑞参战寻找理论根据。

李大钊在对德绝交问题上态度一直非常明朗，1917年2月7日发表《中国与中立国》一文，反对中国持中立态度。2月9日又发表《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国外交之曙光》两篇文章。称北京政府对德国潜艇封锁公海商船一事的抗议为“我国数十年来于外交历史上，特放一线曙光。”李大钊还向北京政府建议“迅与诸联盟国接洽，表示加入之态度，并与磋商加入办法。”他还幻想，加入协约国后我国以输出劳工形式参

① 《加入欧战问题之意见》，《甲寅》日刊1917年2月11日。

② 《甲寅》日刊1917年2月15日、16日。

③ 《甲寅》日刊1917年3月10日，4月4日。

战，这样“既能尽我职务，则我虽有所要求，亦必不致见拒矣。”李大钊还号召国民以“执铁血以为政府盾”为己任，再三告诫反对参战的商榷系议员：“转全国之视线集中于对外之关系，使趋于举国一致之一途，勿复播无谓之党争。”<sup>①</sup>并说：“似此关系国家存亡之外交问题，不惟不可资以为攻诘政府之柄，即欲利用此机会以攘取一部之政权，而因以自效，亦非爱国之士所当出。”<sup>②</sup>李大钊还考虑到中德断交后的一些具体问题，提醒政府在西北国防、安排原聘之德国人、处理德国租界及德国在华之财产等方面做出必要的准备。他对黎、段在参战问题上的“府院之争”十分忧虑，“焦盼吾仁明之总统及刚直之总理，均宜以国家体面为重，速谋转圜之道。而利外交之进行，免误事机，而生意外之支节。”“吾人不得不垂泣涕而道，以冀当局之悔悟。”<sup>③</sup>恳切之情，跃然纸上。李大钊再次告诫各在野党派，在“府院之争”中“亦肃静诚恳之度，挽回此紊莽凌乱之时局，幸勿借题发挥，施其挑拨之伎俩，以图乘时攘权而快私意。”<sup>④</sup>当然。这只能是李大钊个人良好的希望而已，参战问题所包含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李大钊并没有完全理解。笔者不准备详细分析，评价李大钊在参战问题上观点、立场的是与非，仅仅是举上述史实说明在李大钊与章士钊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如果一定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倒是李大钊一开始便明确支持段祺瑞的外交政策，章士钊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来支持段的政策。

李大钊不仅在中德外交问题上与章士钊观点相同，章的“调和”思想也仍为李大钊所推崇。从李大钊发表在《甲寅》日刊和《太平洋》杂志上的文章中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章、李2人在共事中，加深了互相了解，才能有当年11月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代他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举。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284页；第296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330—331页。

### (三)

在避居上海的日子里，李大钊反思由日本回国一年多的政治生活，思想非常苦闷。在给其好友白坚武的信中写道：“兄试澄心以思，吾等所夙夜寐兴所构求之好消息，实亦至无聊赖。放眼神州，即吾侪所谓好消息之一境，衡诸国家政治之性质品位，尚不知相去几千万里，此真所谓沧海横流人间何世也矣。”<sup>①</sup>他开始对自己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产生怀疑。在给另一位朋友李泰棻的信中，李大钊也流露出这种失望心情，他认为“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弱，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拒者，盖无闻焉矣。”<sup>②</sup>正在李大钊彷徨之际，他接到了章士钊的召唤，遂于1917年11月11日北上返京。

章士钊是1917年任北大教授，同年9月起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章士钊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继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关于此事经过，章士钊曾有过具体的回忆：“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紫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蔡子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龌龊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标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之不合理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

<sup>①</sup> 《白坚武日记》，1917年9月11日。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续）第100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之，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天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之强，其诚挚之性感人深也。”<sup>①</sup>以李大钊当时的学历仅仅是大学肄业生，而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任校长后实行“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全国学术界精英荟萃，章士钊敢于向北大推荐李大钊，有着超常的胆识。正是由于章士钊的“动议”和蔡元培的首肯，李大钊1917年11月来到北大图书馆。

进入北大，是李大钊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这一转折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李大钊只有来到北大，脱离了政客集团的政治纷争。与代表当时新思想的思想界精英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相识，正式加入到新文化的战斗阵营，在北大学术空气中接触、吸收着各种新思想，不断探索，使他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并与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支持国民、新潮等进步社团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李大钊对许多青年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史上重要人物——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1918年9月19日由湖南来到北京，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毛泽东后来曾回忆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sup>②</sup>

章士钊1918年5月应岑春煊之邀南下，任军政府秘书长。在随后的两三年中，章士钊因为政局变幻和出国考察，与李大钊很少直接交往，但是章的家庭始终与李大钊保持关系。周作人回忆：有一次，他去图书馆主任室访问李大钊，“不久吴弱男女士也进来了，吴女士谈起章行严家里的事情来，她说道：‘周先生

<sup>①</sup>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sup>②</sup> 见斯诺：《西行漫记》。

也不是外人，说也没有妨碍。’便说章家老辈很希望儿子出去做官。但是她总是反对，劝他不要加入政界。”<sup>①</sup>由谈话内容可看出两家关系非常密切。现在经常被各种书刊引用的一张李大钊的照片，是1920年1月李大钊赠送给章士钊夫人吴弱男女士的，照片上有李大钊亲笔题字，“弱男同志惠存李大钊敬赠”。这张照片一直被章家保存至全国解放。

1922年11月，章士钊回到北京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校长。这时李大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北京党组织的负责人。章士钊回忆说“守常则时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然吾之赋性，最为守常所了解，相视而莫逆者，则吾实乃一个性持重，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之人也”。<sup>②</sup>李大钊还邀请章士钊参加与苏联特使越飞的会谈。章士钊也侃侃而谈，不觉得自己不是共产党员而有所避忌。这时章、李两家的关系非常亲密，李大钊为章士钊三个孩子讲授社会政治学。每星期到东城魏家胡同的章宅上课两次，李大钊的长女星华则认章夫人为义母，李夫人赵纫兰也经常带孩子不断到章宅来，饮食谈笑，俨然如一家人。二七惨案后，李大钊曾与多年好友，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断交。但对于章士钊不仅向其宣传共产主义学说，并对章夫人吴弱男和其朋友说“行严沉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sup>③</sup>由此可知，李大钊对章士钊的感情非同一般。章士钊认为他与李大钊，“两人政见，初若相合 卒乃相去弥远。”<sup>④</sup>相合时期大致是在日本以及李大钊进入北大之前 而后李大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章士钊始终在宦海沉浮，1924年至1926年4月，章士钊先后出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长、教育总长、秘书长等职，镇压学生运动，并在三·一八惨案之后，同意签署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在政治上与李大钊越来越远。

① 《周作人回忆录》第4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③④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事前章士钊从杨度处得到消息，章夫人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到苏联大使馆劝李大钊火速离京前往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使馆到章宅暂匿。但李大钊坚持让其他同志先走，自己坚守北京。李大钊被捕后，章士钊从天津赶来营救，面见张学良、杨宇霆，甚至还直接求见张作霖，但终未能成功。李大钊牺牲的当天，吴弱男首先赶到李宅慰问李夫人。章士钊又与夫人同往长椿寺祭奠。李大钊一生助人之急，为革命慷慨解囊，自奉甚俭，身后无分文积蓄。章士钊与夫人多方奔走，为李夫人和孩子筹集到2000余元钱来安敛烈士、赡养遗属。在当时谈“党”色变的环境中，有些人避之尤不及，章士钊的举动实在是难能可贵，再次说明了他卓越的胆识以及对李大钊深厚的感情。正是从李大钊身上，章士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章士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良好关系，这与李大钊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 李大钊的社会经济思想及其发展

季 华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社会经济思想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提出来的，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本文试图从李大钊世界观和方法论发展变化的角度，分析他的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从这个侧面说明他是怎样从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

**一、辛亥革命后到新文化运动前夕时期：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及其破灭**

从辛亥革命前后到新文化运动前（1911—1917年），是李大钊革命活动的第一个阶段。从1907年起，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接触并接受了所谓新学，即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曾经“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sup>①</sup>1913年，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情，含愤东渡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继续广泛阅读和深入研究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这一时期和以后写的许多论文表明，他曾经研究了18、19世纪欧洲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

尽管这一时期后期，李大钊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且具有若干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但他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主导方面仍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改良主义的“调和论”、托尔斯泰的“博爱论”、无政府主义的“非暴力论”对

<sup>①</sup>《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

他也有影响。他于1916年写的《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再造》和《青春》三篇论文，在论述代议政治是时代前进的历史潮流，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这一客观规律等问题时，充分体现了他的进化论的发展观。用这种发展观来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既不能区分社会产生关系的不同性质，正确判断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及其矛盾，也不能提出用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来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造旧中华、创建新中华的正确方案。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建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但是，这个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社会的根本矛盾，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和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并未解决，中国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因此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

李大钊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矛盾是有初步认识的。他对辛亥革命是很拥护的，并寄予极大希望，以为中国从此获救。但不久，袁世凯窃权，革命半途夭折，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仍然如旧。对此，李大钊深感忧虑。他在1912年写的《隐忧篇》和1913年写的《大哀篇》，表达了对中国社会面临的内乱外患的忧国忧民意识。

李大钊认为统治中国这个社会的是外国的列强和国内的封建买办势力，包括他们的政治代表——军阀、官僚、政客、党棍。窃权的袁世凯则是其总代表。他尖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国家，名为资产阶级共和，实为封建专制。他写道：“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sup>①</sup>“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sup>②</sup>

<sup>①②</sup>《李大钊文集》（上）第6-7页：第4页。

从这一时期李大钊的全部言论和行动来看：他对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是坚决反对的，就这一点说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民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同时，他对推翻清王朝和建立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是真诚拥护的，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殃民和袁世凯等人的倒行逆施也是深恶痛绝的，就这一点说，他已经认识到广大民众和封建军阀势力的矛盾。但是，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他所说的那个“民”或“民彝”又包括哪些阶级，他并没有作出明晰的分析；至于国内的其他社会矛盾，如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和工人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也没有明确提出并加以具体分析。

正因为李大钊当时的认识水平处在这样的阶段上，所以他改造“白首中华”和创建“青春中华”的方案，只能向西方寻找，期望象当时欧美和日本那些列强一样，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怎样的？关于它的政治制度，他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代议政治取代当时中国的专制政治。关于这个共和国的经济制度，李大钊则没有十分明确的说明。他在《大哀篇》中只一般地提出：“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sup>①</sup>根据李大钊当时的整个思想体系和认识水平，他所说的工业、农业和商业，只能是西方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并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农业和商业。

如果说在这一时期前几年写的文章中还没有具体指明他要建立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何性质，那么在1917年4月写的《中心势力创造论》一文中则比较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篇论文的主旨是论述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的。他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中心政治势力，才能实现统一，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中国的政治势力有“零落凋谢”的三大系统。即军权系统、温和派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

政治系统和激进派政治系统。它们自成一部势力，犹如散沙乱丝。零星散灭，不可收拾，无一中心势力可以凭依。为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应该另外创造一种新势力以代替它们。这种新势力必须成为中级社会的中枢，拥有国民，命运才能永久。李大钊建议：“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sup>①</sup>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也就是有财产的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财产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此外还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可见，李大钊心目中所欲建立的共和国，乃是以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为社会中心政治势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而，在中国建立西方那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资本主义工农商企业，是李大钊这一时期的主导经济思想，尽管这种思想并不是直接明确加以表达的。然而就在当时李大钊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也是持怀疑和保留态度的。他在那篇提出代议政治主张的论述中写道：“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sup>②</sup>

后来李大钊愈来愈认识到，辛亥革命并未给苦难的中华民族带来转机，强国富民只是幻想。嗣后数年，北洋军阀政府派系斗争愈演愈烈，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亡我中华的“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废弃共和实行帝制，张勋演出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的闹剧，这一切加深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人民承受着日益深重的灾难，中华民族处于更为严峻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这表明，辛亥革命并未能挽祖国危亡之难，解人民倒悬之苦，那个强国富民的愿望，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只是志士仁人的幻想。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如此尖锐矛盾和巨大危机，李大钊百感交集，愤慨万千。他认为，民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66页；第168页。

国以还，政争迭起的真因，穷本溯源均在各谋私利的派系斗争。他写于1917年8月的《辟伪调和》，是一篇声讨中国政坛派系斗争的檄文，表明李大钊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状况在进行深刻反思，思想处于极大的徬徨和矛盾中；同时也表明，他原先想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已经彻底破灭，正在探索一条能够“创建青春中华”的新道路。

**二、俄国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时期：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俄国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时期（1918—1920年），是李大钊革命活动的第二个阶段。1916年夏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积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真理，热情号召青年和全国人民为“挽回民族之青春”、“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1917年11月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李大钊深受鼓舞，他热烈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思想。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他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为争取科学和民主进行了英勇斗争。在这一时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和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革命斗争实践，李大钊的世界观和立场实现了一次升华，完成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和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在我国进行了启蒙宣传，并运用来解决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问题。

**（一）赞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欢呼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正在徬徨中并为中国社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的李大钊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启发。他在1918—1919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诸文，是中国思想界热情讴歌十月革命

并正确评价其意义的第一批文章。

他通过比较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刚刚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正确地论述了后者的划时代的世界意义。他指出，这两个革命“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sup>①</sup>法国革命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过去，唯有俄国革命才代表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新的力量。他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sup>②</sup>“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sup>③</sup>

他通过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一征兆，预见20世纪必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代。他说，从今以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犹如滔滔滚滚的潮流，决非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在这伟大群众运动中，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历史上残余的东西，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而摧拉之。从十月革命开始，“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sup>④</sup>“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⑤</sup>

（二）宣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变革的科学方法。

1918年以后李大钊的社会经济思想有了一个根本转变。这是由他的世界观方法论从进化论转变为唯物史观所决定的。在1918

①《李大钊文集》（上）第573页。

②《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5页。

③《李大钊文集》（上）第606、608页。

④⑤《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第603页。

—1920年间，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史学思想史》、《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史观》等文中，比较全面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其中与经济学有关的主要有：（1）关于经济生活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本条件、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的思想。他写道：“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故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sup>①</sup>“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sup>②</sup>人民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sup>③</sup>（2）关于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他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的有关论述，认为它的一个要点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sup>④</sup>“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sup>⑤</sup>（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他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

---

①②③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51页；第360页；第363页；第59页；第139页。

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继起，将来到了不能与生产力相应的时候，他的崩坏亦复如是。”<sup>①</sup>（4）关于经济利益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他赞同马克思讲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的意见。在一个社会里为什么会呈现出阶级对立的现象呢？这是因为某个社会集团独占生产手段掠夺另一些人剩余劳动的结果。政治变动的“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sup>②</sup>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以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后来，他在1924年5月写的《史学要论》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sup>③</sup>李大钊是在我国宣传和阐发唯物史观的先驱，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各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等学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就李大钊本人来讲，由于他掌握了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从此他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考察就有了锐利的武器，从而逐渐抛弃了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

### （三）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李大钊写于1919年5、11月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公开宣告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扼要介绍了它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

①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59—60页：716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61、62页。



学说和经济学说。在这篇长文的最后4节（第9～12节）中，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亦即《资本论》的主要内容。

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论”有两个要点：一为“余工余值说”，即剩余价值理论，二为“资本集中说”，即资本积累理论。

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破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他认为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是从“劳工价值论”（即劳动价值理论）演导出来的。他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要点以后，着重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就在于：“维持工力所必要的物品的价值，永不能与那工力的生产的价值相等。”后者大于前者，其差额就是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余值”即剩余价值。创造这“余值”的是“余工”即剩余劳动。采取“余工价值”这种形式掠夺劳动者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剥削方式。李大钊认为，“余值论”是马克思“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sup>①</sup>

李大钊阐述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必然性。他在“资本集中论”这个题目下阐述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的理论。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这一理论时说，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勃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信用关系的发展，资本有集中的趋势，“把资本都集中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产业“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sup>②</sup>另一方面，工人丧失了一切财产，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力，为资本家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和“新样财产”，而自己却陷于贫困，沉落在地底层，成为无产阶级，是伏在资本家脚下的敌兵。因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竞争越益剧烈，“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

<sup>①②</sup>《李大钊文集》（下）第82页；第83页。

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sup>①</sup>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将是新的“集产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

李大钊在1920年写的《桑西门的历史思想》（桑西门今译为圣西门一笔者）一文中，更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发，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这一科学论断，是马克思应用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进行研究得出的客观规律。他说：“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sup>②</sup>

### 三、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特征，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21—1927年），是李大钊革命活动的第三个阶段。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了中国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启发了中国的先进分子。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从这时起到1927年牺牲的这一时期中，李大钊一方面从事繁重艰巨的实际革命工作，领导北方乃至全国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继续研究革命理论，发表了一系列宣传马列主义、讨论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文章。他除宣传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本性，指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命运这一重要问题外，其社会经济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一）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特征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不再只是一种理

<sup>①②</sup>《李大钊文集》（下）第84—85页；第334页。

想，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经济制度。在20年代，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苏联革命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前提及其特征进行了认真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论述。其中重要的有：《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另外还有：《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出来的。他比喻说：“‘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sup>①</sup>“社会主义”到了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这个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建立和实现？李大钊认为，“到了时机成熟，新生命已经发育完全，就是资本家势力发达到极点，非采用社会主义去推翻资本制度不可的时候，那就必定要用革命的手段。”<sup>②</sup>“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时期的”<sup>③</sup>，建立无产阶级多数人对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统治。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组织是怎样的？按照李大钊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对原来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组织进行“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sup>④</sup>概而言之是两条：实现生产交换机构的社会化，合理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具体说，有以下诸方面：

（1）一切重要生产资料和生产交换机构收归国有。“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由国家经营；“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544页；第631-632页；第672页；第376页。

有”。<sup>①</sup>

(2) 破除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建立平等自由联合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人民之间“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sup>②</sup>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是打破上下阶级为平等联合的组织”。<sup>③</sup>

(3) 有计划地合理地发展生产，使社会生产符合公众的消费需要。“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sup>④</sup>”“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国家要用科学方法进行计算，“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sup>⑤</sup>

(4) 物的管理代替人的统治，运用科学、协作、自然力极经济地组织生产。“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国家“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sup>⑥</sup>

(5) 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工，劳动变成一种愉快的事。到工人掌握政权以后，“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sup>⑦</sup>“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sup>⑧</sup>他并主张社会应科学地计算社会劳动时间，缩减每人过量时间，剩余时间可以用来美化人们的生活。

(6) 实行公平分配，人人享受富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

①②③④⑥⑦⑧ 《李大钊文集》（下）第611—612页；第609页；第202页；第670页；第614页；第612—613页；第504页；671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612、613页。

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sup>①</sup>关于全社会产品的分配，李大钊主张建立社会分配组织，按照社会消费需要生产出来的产品，以货币计算，按以下项目进行分配：劳动者的工资（“薪俸”）；社会福利支出（鳏寡孤独废疾者的“恤金”）；对资产阶级的赎买支出（“前资产阶级的年金赔金”）；生产成本（“农作物代价”）。至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曾提到“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到和他劳工相等的份”<sup>②</sup>，即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进行分配。

（7）社会主义国家应自主发展经济，先进社会主义国家应帮助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sup>③</sup>

（8）社会主义经济仍然要保留货币关系。李大钊没有直接论及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商品关系，但却明确认为仍需保留货币，作为交换物品的手段，并充当社会经济的计算工具。

（9）利用具有经营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实行“赔金”政策。在他看来，“工人虽执掌政权，但实际上不能指挥工师、技匠、实业家。此时阶级既废，好意的前资产阶级自当许与合作”，并对他们支付“年金赔金”<sup>④</sup>。这跟列宁讲的“赎买”政策颇为相似。

纵观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论述，虽说有若干不明确、不精当甚至个别错误之处，但绝大部分观点是正确的。

## （二）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以前，曾经指望学习西方，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富国富民愿望。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树立起在中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670页；第85页；第612页—613页；第613—614页。

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李大钊，一直在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以前李大钊的理论活动主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现在已经转向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的探索了。1924年5月，他在短文《这一周》中提出：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下救济出来。”<sup>①</sup>

首先，李大钊根据对时代发展潮流的分析，认为在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非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他在1921年写的《社会主义下的实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两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个问题。他先考察了世界经济形势：“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别的国家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并且已“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再从中国自己的情况来看，虽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但“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由这种国内外经济形势决定，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sup>②</sup>

其次，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提出中国革命两阶段的初步思想。他在1920年写的《〈国体与青年〉跋》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要求不是单求打倒一个君主的国体，而是要走向世界大同。在获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

<sup>①②</sup>《李大钊文集》（下）第711—712页；第454—455页。

“紧接着社会主义”<sup>①</sup>就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全路程中的一个进程。但是当前的任务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从“二大”开始到“四大”，已经初步形成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李大钊为制定我党的这一总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24年作的《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和1928年写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等论文中，阐述了这个问题。他特别指出，在国共合作下和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sup>②</sup>，中国革命面临反帝反军阀的双重任务，所以，要“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sup>③</sup>

为了解决国内民主革命的任务，应该首先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李大钊为解决这个问题，在1925—1926年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在搜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著名论文。他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民和土地的状况：（1）从农业和农民的地位看：“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sup>④</sup>（2）从农村的生产关系看：“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sup>⑤</sup>长期以来，中国农民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下，生活日趋艰难，流离失所。自耕农与佃农成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sup>⑥</sup>，中国农村出现了“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sup>⑦</sup>

那么，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出路何在？李大钊认为，孙中山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04页。

②③④⑤⑥⑦ 《李大钊文集》（下）第864页；第780页；第824页；第825页；第827页；第826页。

“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sup>①</sup>于是，他响亮地提出了“耕地农有”的方针，并认为这也是“民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sup>②</sup>。他阐述说：“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sup>③</sup>在这里，李大钊为我国革命规划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完整政策，包括首先实行“耕地农有”的方针，以后再实行把个体小农业“联结”为集体化大农业的政策，以及将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的方针。我党在以后革命进程中正是按照这样的方针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

（作者单位：首都博物馆）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第831页；第833页。



## 李大钊论社会主义竞争

杨 纪 元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在探索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时，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竞争问题。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且把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这就促使他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

1920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开设了一门新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为这门新课编写的讲义是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著作。当时，他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情况，以及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种种误解，明确地指出：“现在社会主义已到实行之地步，人咸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决不发生竞争。盖社会由竞争而进步，良好的竞争，是愉快而有味，无不可以行之。至于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境，此种竞争，自不可以。今社会主义毫无竞争，岂不令人枯死么？不知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不过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故认社会主义为无竞争者误矣。”<sup>①</sup>李大钊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竞争的观点，而且明确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竞争与资本主义竞争在性质、范围、目的和手段上的根本不同。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74页。

在1920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能够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是极其可贵的。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任何一个新论点的提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定的理论作基础的。在1920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竞争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李大钊认为，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指导。他指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资本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也不例外。他认为，在现时代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竞争，就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竞争。既有经济的竞争，又有政治的竞争，还有青年与老人的竞争，等等。他不仅主张人人都有一种竞争、发明、奋进的精神，而且还批评那种以为无论何物皆无竞争之价值的说法是一种“厌世主义”。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来看，李大钊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一种新的社会，其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法则，是促进社会改良的制度。那么，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达到改造社会、促进社会改良的目的呢？他说：“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个人自由的。个人是群合的原素，社会是众异的组织。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不是完成的终极境界，是进展的向上行程。真实的秩序，不是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是包蓄种种不同的机会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安排的；不是死的状态，是活的机体。”<sup>①</sup>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活的机体，而不应该是死的状态，只要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是活的机体，它能够永远保持向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437--438页。

上的进程，而竞争正是社会主义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需要。

**第二，要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正确地看待社会主义社会。**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根据的，只有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才是实在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sup>①</sup>而“社会主义又是须将现今制度，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即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此为其目的。”<sup>②</sup>就社会生产的状况来说，“社会主义是由个人生产变为社会的生产，由手工的生产变为机器的生产，其进步是一线的，故社会主义不是破坏生产，是求进步的、适合的生产，即整理生产，使归统一，免呈纷乱之象。分配平均，使生产不致过度，社会上遂现一种新的秩序。”<sup>③</sup>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竞争不仅是为社会进步而进行的竞争，而且是在保证人民最大幸福的基础上，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良好竞争，而绝不是象资本主义那种使人类陷入悲惨境地的竞争。所以，李大钊强调说：社会主义的竞争是“禁绝使社会上起极大之竞争，如现今的竞争使人犯罪等”。

**第三，要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统一起来避免资本主义的惨烈竞争。**

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但同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他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一文中就曾指出：生产品不就是为了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帐，前者则须代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142页；第376页；第375页。

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又说：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间流行的货币。李大钊不仅提出了商品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且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商品经济。按照商品经济特有的规律，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竞争。然而，这种竞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能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目的来进行。所以，李大钊说：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政府的，不能齐一努力，是一场惨烈的竞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有计划的，能够齐一努力，是一种良好的竞争。他强调：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则使人人都能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故认社会主义的竞争为资本主义的竞争者误矣。

#### 第四，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之后亦有相当的竞争。

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竞争的论点，首先是针对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而发的，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的。李大钊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现出来，但它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就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之后，要迅速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因而就会有一个相当的竞争。在政治方面，李大钊指出：“中国现在切须注重者，首宜结合最有实力之坚固团体，以为将来实际竞争之着手。”<sup>①</sup>这种政治的、经济的竞争，不仅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所必需，而且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所需要。我想，这就是李大钊所说的“社会主义亦有相当的竞争”的目的和意义。

在1920年下半年的中国，李大钊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社会主义存在着良好的竞争的论点，的确是一个创见。这不仅表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628页。

明了他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不断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而且记录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重要贡献。这些正确而透彻的见解，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大钊对这个重要论点还没有能作出系统的阐明，1920年以后也再没有论及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存在着竞争的问题，只能是一个开创性的原则阐述。对于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苛求于先驱者的。

(作者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 李大钊的文学思想

董学文

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到了“五四”运动前后，面临一次全面的质的挑战和严肃的选择。这种挑战，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衰老和危机的产物，是西方现代文学思潮带着生机和活力潮水般涌入的结果。而这种选择，则是现实需求和社会呼唤的理性行动，是中国文学思想的历史合乎逻辑的一次发展。

在这个决定中国文学和精神领域建设命运的前所未有的解体、动荡、混乱、冲突、变革、引进、创造的时刻，如何使中国的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复苏和更生，如何引导中国的文艺学走上一条正确而光明的坦途，就成了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反复思考的大课题。

李大钊正是在这个抉择的关口上，以他特有的纯朴和深刻，以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洞悉和了解，特别是以他对先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在“五四”文学革命的浪潮中，举起了自己鲜明的理论旗帜，从而影响并导引了一代乃至数代英勇的文化战士。

比起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来，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似乎没有他那样的激烈、火爆和泼辣，没有他那种“勇冠三军，不愧群雄之首”的气魄，陈独秀当时确乎“影响上比任何人更大”；比起新文化启蒙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开风气者胡适来，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也似乎没有他那样的通俗、时髦和显赫。可是，岁月的流逝冲刷着历史上的各种思想建树，也鉴别着各种学说价值“含金量”的多寡。今天，当我们以反思的心态重温七

十年前那场震撼整个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惊奇地发现，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以其深沉、成熟、扎实和深刻，呈现着独特的面貌，最本质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精华。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上，李大钊的观念，是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界碑。

## (一)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但他是1918年下半年开始接受新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思想界活动着一批骁将，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等。那是一个群星闪烁、人才辈出的时代。可是，只有李大钊为十月革命的炮声所震动，在寂寥而翻转的文坛上，呐喊出社会主义的空谷足音。这里就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文艺观——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不是别人，比如不是更有名气的急进者陈独秀，也不是那些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勇士，而是在人看来质朴敦厚、不苟言笑的李大钊呢？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宣传家的地位？

我们应该努力揭示这个“秘密”。

我同意这样的意见：李大钊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思想的前进，应用的正确和实践的勇敢”，而“能够兼这三长的，在过去思想史上，几乎只有李先生一个人”<sup>①</sup>。从总体上这样来评介李大钊是合适的。但要充分揭开“谜底”，还必须从分析大量的思想材料入手。

李大钊并不是一个圣人，也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他和当时

---

<sup>①</sup> 蔡尚思：《李大钊思想评介》，见《文汇报》1947年4月26日，5月3日。

新文化运动的许多重要人物一样，在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也是从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起步的。他和当时文化思想界的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反抗沉重的封建束缚，真是抓到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作战，甚至欧洲已经反动的个性主义，在这里也成了打破传统、要求思想自由的革命呼声。西方的文化思潮，对于干涸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有若久旱之甘霖”。我们在李大钊早期的思想横断面中，不难发现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思想观念的浸润与影响，随处可见他对海涅、莱辛、雪莱、惠特曼等诗人、作家的赞颂。

但是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在他提倡的革命民主主义理想中，一种强烈的“救人救世”精神，如奔流的血脉在呼呼地跳动。他的文学观念也和他的社会观、伦理观、道德观一样，表现了对时代“隐忧”和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1913年，24岁的李大钊就写文章，以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揭露北洋军阀的盗权辱国、侵蚀共和的罪恶行径，疾呼“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sup>①</sup>同年，李大钊撰写了《文豪》一文，相当全面地披露了他的呼唤文学“救人救世”、改造世界的文艺观并探讨了文学发展与社会、与情感、与世界观等的关系。李大钊从步入人生的征途起，就一直昂扬热情，从没有消沉过、悲观过。他从一开始就坚持将文艺作为改造人心、改造世界的武器，这就为他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铺平了道路。

当时的思想界弥漫着一股愤激的情绪，哀痛于“心死”与“亡群”的现实。1914年10月间，陈独秀曾以仇恨封建军阀的偏激之情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痛说国家的极端黑暗腐败，根本无可爱之处，甚至说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认为对“国民之智力……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

---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世纪……不能无所怀疑”，“立国既有所不能，亡国自在所不免”<sup>①</sup>。李大钊阅后，给《甲寅》杂志记者投去《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指出独秀君之言，“盖其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认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sup>②</sup>表现了强烈的救国意识和爱国决心。而这种救国意识和爱国决心，又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保守主义，而是努力改造国民性，改造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革命精神。“中国至于今日，诚已濒于绝境，但一息尚存，断不许吾人以绝望自灰。”<sup>③</sup>李大钊再次重申了文学启迪民智，唤起自觉之社会功能，认为“文学为物，感人至深”，“社会之乐有文人，为其以先觉之明，觉醒斯世也”<sup>④</sup>。

发生在1914年至1915年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的这场论战，尽管还没有集中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焦点上，尽管他们的分歧还是同人间对待救国救民态度上的差异，但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可以把它看成是即将到来的“五四”新文化论战的小小的前奏和序曲。因为它真切地预示了未来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虽然陈独秀后来也成了初具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但无疑表明李大钊的思想起点和立场是更高和更积极的。以后的事实也揭橥，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更多地强调的是学问、知识，陈独秀更多地强调的是政治和社会变革，而李大钊在承认前二者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多地强调民魂的再造，民众的觉醒，民气的张

① 《甲寅》杂志1914年第1卷第4号。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146页；第148页；第152页。

扬。这正是李大钊超过他人而透出深沉和深邃的地方。

## (二)

要成就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根本的特征是要接受历史主义基础上的唯物辩证法。在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以前，中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接近于零。朱执信等少数几个留学生的粗浅介绍并没有在中国知识界发生什么影响。李大钊是在深积垢污，层层黑幕的思想界中摸索着前进的。作为二十几岁的青年，李大钊在思想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某种曲折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动荡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局势和海外多种学说渐进涌入中国的反映。但是，由于李大钊“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是“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sup>①</sup>，脚踏实地，稳步前进，所以，他比别人会更早地靠近真理。

在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奋力宣传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主观、武断和盲从；宣传进取向上的乐观主义人生观，反对消极、灰暗、落后的人生观；热情歌颂新生力量，相信新事物一定战胜陈旧与腐朽。他在不少文章中都以不可遏止的激情，表达他那种迫切要求“青年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决历史网罗，破除旧说囹圄，站在民主自由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

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文艺和美学观念上的进展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

李大钊从日本辍学回国后即与友人办《晨钟报》，并参加《甲寅月刊》及《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晨钟报》被查封，改名为《晨报》重新出版，在李大钊倡议和帮助下创办的《晨报副刊》，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762页。

是当时国内出现的第一个“副刊”。它对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sup>①</sup>这是一段很值得注意的文字。这里不再简单讲文艺具有“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的伟力，而是把文艺视为一种文明的“先声”。尤其醒目的是，李大钊把新文艺兴旺的条件放在依靠“一二哲人”身上，而这种“哲人”又真能成为解放的领袖，精神的导师，这是颇有深意的。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李大钊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此时还未到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朦胧预见与期待。他在苦苦地寻找这样的“哲人”，一旦这种“哲人”在世界上已出现的消息传入中国，他就会率先的起而迎接，而他自己传播和弘扬这种精神的时候，也会历史地扮演中国新文艺勃兴势必赖有的“哲人”的角色。

李大钊在《晨钟报》上“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是因他认为“托氏人格之崇高，气魄之雄厚，足为兹世青年之泰斗”<sup>②</sup>；“介绍哲人尼杰”（即尼采——引者注），是因他认为“其说颇能起衰振敝，……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sup>③</sup>。在没有找到更先进的武器的时候，一切有利打破传统、战取自由的思想都可作为斗争的工具。

在美学上，李大钊鼓吹“调和之美”（应读为和谐之美），认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而出者。”“人莫不爱美，故人咸宜爱调和。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180页；第187页；第189页。

盖美者，调和之产物，而调和者，美之母也。”<sup>①</sup>这种“调和”，不是美学上的折中主义，而是美学上对立统一原则的初步表述，是为新文化的存在寻求美学上的根据。1917年4月，李大钊撰《美与高》一文，在详细征引了蔡元培有关法兰西和德意志两民族具有“美”（爱美）和“高”（强力）的特点，由美术与科学发达，因而有道德心的论述后，进一步阐述“美”与“高”的精神与道德的关系，指出我中华民族素有“美”和“高”的条件，“今而湮没不彰者，殆教育感化之力有未及，非江山之负吾人，实吾人之负此江山耳。”要使我们民族成为“美”与“高”的民族，“此则今之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感化膺育之责，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也矣！”<sup>②</sup>这种“美”和“高”的呼吁，乃是旨在光大优良传统，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信力。

李大钊思想中具有辩证法的因素，很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孔子的态度上。他较少有当时一些人“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坏”的片面性毛病。他称“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但他也看到，“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故余之掎击孔子，非掎击孔子之本身，乃掎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掎击孔子，乃掎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sup>③</sup>这种观点，显然比许多人高出一头，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李大钊始终抱着“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sup>④</sup>的观念，不孤立地提倡文化建设，不是等待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好了再去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而是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实际变革中，批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对传统文化既不一棍子打死，也不嗜痂如癖，而是坚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是李大钊又一超过同辈人而具个性的文化品格。

<sup>①②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57页；第407页；第263-264页；第273页。

### (三)

李大钊为了追求真理，是下了不怕“断头流血”的决心的。他在1917年4月17日的《真理之权威》一文中曾表示：凡是他认为确实合乎真理的，虽然社会上一时不听他的意见，甚至不容他存身，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逡巡嗫嚅”来迎附牵就社会上的看法；假如他的意见确实与真理不合，虽然社会上一时欢迎他的看法，甚至很看重他，但为了爱真理的缘故，他也绝不敢“附和唯阿”，以趋承当时的社会。“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sup>①</sup>他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他很赞佩中外历史上那些不怕说出真理而遭戮辱的人物。这种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献身精神，无疑推动了他最先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盗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

我们发现，李大钊在1917年至1918年间加快了思想迈进的步伐。他通过介绍日本的托尔斯泰热，抨击中国“文学界思想界之销沉，冷寂若死”<sup>②</sup>；他比鲁迅的《一件小事》（1919年11月写）、胡适、刘大白的诗文早得多地描写了《可怜之人力车夫》（1917年2月10日）；他倡言“新中华民族主义”，提出“今日民族之问题，尤非苟活残存之问题，乃更生再造之问题”，“于是揭新中华民族主义之赤帜，大声疾呼以号召于吾新中华民族少年之前。”<sup>③</sup>他开始探讨屡起屡仆、奋斗多年的“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列陈十二点，其中，“革命文学之鼓吹”放在第四的显要位置；<sup>④</sup>他痛斥封建的礼教和婚姻，反对文学演剧徒以艺员冰雪聪明之技能，为顽固思想的奴隶，张偶像道德之权威。“希望具有新思潮、新理想之文学家、美术家，对于演剧，宜随时以文学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第272—273页；第301页；第343、353页。

的眼光，加以严正之批评”<sup>①</sup>；他着手研究“暴力与政治”，研究已成社会痼疾的“学生问题”，研究中国外交之困境；他告诫人们“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sup>②</sup>要打破新旧不调和的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sup>③</sup>。

这其中，李大钊对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关系的研讨，尤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新的发端和永恒流淌的血脉。他指出，“俄国革命全为俄罗斯文学之反响。”“俄国犹大洋，文人其洪涛；洋海起横流，洪涛为之导。俄民犹一身，文人其神脑；自由受摧伤，感痛脑独早。”“此诗最足道破俄罗斯文学之特质。俄罗斯文学之特质有二：一为社会的彩色之浓厚；一为人道主义之发达。二者皆足以加增革命潮流之气势，而为其胚胎酝酿之主因。”他认为俄罗斯文学“既与南欧各国之文学大异其趣，俄国社会亦不惯于文学中仅求慰安精神之法，如欧人之于小说者然，而视文学为社会的纲条，为解决可厌的生活问题之方法，故文学之于俄国社会，乃为社会的沉夜黑暗中之一线光辉，为自由之警钟，为革命之先声。”<sup>④</sup>从而导引中国新文学运动走出进化论的、改良主义的巢臼，踏上一条文艺为社会变革服务，为无产者劳苦大众服务的现实主义大道。

按照胡适的说法：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到民国6年1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得更详细。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痴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陈独秀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上）第456—457页；第535页；第539—540页；第581、582页。

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sup>①</sup>然而却基本延续了他1915年便已表明“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sup>②</sup>的文学改革思路。相比较而言，真正将文学从作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工具转变成反对黑暗统治、创造崭新世界的战斗武器，真正实现文艺从和谐型形态向崇高型形态的历史性美学转换，真正推进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观念性跃进，真正完成文艺的内在要求与文艺为社会革命服务使命间矛盾的解决，应该说是从李大钊的身上开始的。是李大钊给中国新文学这个新生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李大钊，在哲学、史学、社会学和文艺学等诸领域最先走到了唯物史观的门口。他正“翘首以迎其新文明之曙光”。

正因此，他才极其敏感地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要性，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黑暗的中国时，他才比谁都早地发出震撼环宇的战叫：“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sup>③</sup>

#### (四)

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便“以矫健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使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sup>④</sup>。由于他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前期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时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启蒙运动所带有的明显的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该杂

① 胡适：《近五十年之中国文学》。

② 《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

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④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301页，1934年杏岩书屋出版。

志以新的无产阶级战斗姿态出现在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指出了中国人民奋斗的光明前景，并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去关心和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此时李大钊最鲜明的思想色彩是突出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伟力，自觉地把自已的命运、国家民族的命运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文学观念上，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更紧迫的课题。

在《劳动教育问题》（1919年2月14、15日）一文中，李大钊强调，“Democracy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sup>①</sup>。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特别希望青年“到农村去”，因为他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sup>②</sup>

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杂感《光明与黑暗》（1919年3月2日），可说是在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写成的论文，文章虽然短小，但却在现代美学与近代美学中间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光明与黑暗的分，就是美和丑的分。劳动创造了美。美总是和劳动、工作、创造不可分离。人的美，人生的美，就在于劳动和创造之中。这种美学观念的意义无疑是划时代的。

李大钊象恩格斯一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出了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样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他鼓励青年在新旧思潮激战的当口，“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sup>③</sup>。他号召热情的青年，快快起来，选定方向，“努力去作人的活动！”他说

①②③ 《李大钊文集》（上）第633页；第648页；第660页。



眼下世界上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sup>①</sup>

据许德珩回忆：团结在大钊周围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这时已经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他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他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是李大钊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直接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指《“五一节” May Day 杂感》——引者注），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并认为“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器”——引者注），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sup>②</sup>

1936年大连大众书店印行的《烈士传》一书中，关于李大钊的一篇曾有这样的记载：李大钊在《晨报》任主任编辑，“即从此将民族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即马克思——引者注）的学说渐渐的从北京晨报纸张上，灌输于一般青年，尤其是青年学生，所以当时晨报的读者突然增加数倍”<sup>③</sup>。认为“五四”“这一运动

---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566页。

②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下）第4-7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烈士传》第5页，大连大众书店1936年版。

之所以兴起，自然是中国青年学生受到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基于本国环境的变动而起的反帝反军阀的运动，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在于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些先进教授，曾以民族革命思想经常灌输于青年学生所致。”<sup>①</sup>

由此可以看出，“五四”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而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以至斗争策略，都在运动中起了主导和领路的作用。这个历史的结论，是任何怀疑都掩盖不了的，也是任何否定和冲淡所抹杀不掉的。这个结论本身，就证明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也证明了李大钊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历史功绩。

## （五）

新文学观念的发展，是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行进着的。新文学观念，既要同封建复古势力进行搏斗，又要和文学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资产阶级右翼展开论战，从而为新文学的成长扫清前进的障碍。而在这场斗争中，李大钊则做得最为坚决、勇敢和端正。

十月革命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及先进世界观指导下文学革命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国内封建复古主义者的仇视和恐慌。作为封建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林纾，首先向新文学、新文化发起猖狂进攻。他于1919年2、3月间在上海《新申报》上连续发表《妖梦》和《荆生》两篇文言小说，用影射的手法，咒骂新文艺，并向反动派献策，企图借助封建鬼神和一个维护封建道统的军阀“伟丈夫”出来，以武力镇压和消灭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对这种顽固复古势力投出的毒箭，毫不畏惧，立即回击，写出《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严厉谴责了封建复古信徒鬼

<sup>①</sup> 《烈士传》第6页，大连大众书店1936年版。

鬼祟祟的行径。李大钊还以俄国暴政为列，充满豪情地指出，青年牺牲的血，是培植革命自由之花的肥料；那暗沉沉的监狱，是青年运动奔劳的休息所；横暴的压制只能为青年增加一层革命的新趣味。直到今日那滔滔滚滚的新潮，一决不可复遏，任何摧残和压制都是阻挡不了的。表现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

在新文学阵营内部，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传播和文学革命的不断发 展也表现出强烈的怨恨和不满，逐渐撕掉“革命派”的外衣，露出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蹄脚。他对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反感，认为《新青年》几乎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杂志的汉译本了，便向同人提出停刊声明或不谈政治的办法。这个意见当即遭到一些人拒绝。陈独秀在复信中对抨击《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表示“不以为然”。鲁迅在给胡适的信中也表示，应同反动政府抗争到底，“不愿示人以弱”，“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sup>①</sup>。胡适在后来总结自己经历的《我的歧路》一文中曾说过，“1917年（民六）7月，我国国时……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但他指责当时“国内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便申明“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所以发愤要想谈政治。”<sup>②</sup>可是，我们知道，从1919年7月开始，他连篇累牍地发

① 《鲁迅书信集》（上）第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② 《胡适文存》卷二。

表的正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sup>①</sup>，污蔑“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sup>②</sup>。他还在1919年12月的《新青年》上，发表杜威的文章：《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也竭力攻击所谓“极端的唯物派”和“根本解决派”，同时卖劲推销“新旧文化汇合”、“中西道德结合”的论调。面对这种形势，李大钊针锋相对地与胡适展开了辩论，指出“主义”与“问题”的不可分离，公开表白自己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仰，并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理，重申了中国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的主张。

关于这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及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意义，我想是不必多说的。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它对新文学运动的非常直接的影响。

本来，面对一些尊奉“我国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的守旧顽固派把文学改革论称为“邪说异端”、“洪水猛兽”、“过激党”的情况下，李大钊是决心维护新文学队伍内部的团结的。他曾在“五四”前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表示：“以后我们决心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的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象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不大容易了。从这回谣言看起来，《新青年》在社会上实在是占了胜利。不然，何以大家都为我们来抱不平呢？……所以我们愈该结合起来向前猛进”<sup>③</sup>。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胡适等人一再把文学革命的任务局限在

① 《每周评论》第3期，1919年7月20日。

② 《胡适文存》卷四。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936页。

“用白话作文作诗”的讨论和尝试上，脱离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斗争。胡适曾说：“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sup>①</sup>。傅斯年也说：“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sup>②</sup>。胡适所谓的“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等八事，重点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改良。他所鼓吹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也不过是掩盖反映在文学历史上阶级与思想冲突的新面貌，脱离内容而孤立地谈文学形式的“进化”。诚然，形式的变革也是新文学的重要方面，但他们的谈“白话”、谈“形式”，谈“进化”，则是企图阻止文学革命走向正确的方向。针对胡适等人的观点，李大钊写道：“现在大家都讲新文学，都作新文学了。我要问大家：‘什么是新文学？’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造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sup>③</sup>他还说：“我们若愿园中花木长得美茂，必须有深厚的土壤培植他们。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就是新文学新运动的土壤、根基。在没有深厚美腴的土壤的地方培植的花木，偶然一现，虽是一阵热闹，外力一加摧凌，恐怕立萎！”<sup>④</sup>显然，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1919年12月8日）中对新文学的认识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充满着理想、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显然，李大钊是在批驳把文学革命看作是文字工具改良的错误论调。在他看来，文艺应该循着革命的路线，应该走向上的、进步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之路，应该是“为社会写实”的，为民众服

① 《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 《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164页；第165页。

务的，这才是新文学应有的历史走向。

当然，“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一般状况，并不完全符合李大钊的要求。这里有许多交错复杂的情形。历史总不会单线、纯粹地向前发展。李大钊在文中对当时新文学弱点切中肯綮地批评，同样令我们感到他的别具慧眼。他认为“现在的新文学作品中，合于我们这种要求的，固然也有，但是终占少数。一般最流行的文学中，实含有很多缺点。概括讲来，就是浅薄，没有真爱真美的质素。不过摭拾了几点新知新物，用白话文写出来，作者的心理中，还含着科举的、商贾的旧毒新毒，不知不觉的造出一种广告的文学。试把现在流行的新文学的大部分解剖来看，字里行间，映出许多恶劣心理的斑点，夹托在新思潮、新文艺的里边。……刻薄、狂傲、狭隘、夸躁，种种气氛充塞满幅。”<sup>①</sup>他提醒说这是适以为挑起逆动的引子，是文学界、思想界的莫大危机，吾辈应从速进行一反省。

时间已经过去了70年，李大钊的这些见解，就是今天看来仍是那样犀利，那样透辟，那样焕发着现实的活力。这不是对新文学运动的谴责，而恰恰是对新文学运动中的浊流、暗流和逆流的荡涤。这不是理解上的偏狭，而恰恰是对新事物看得深透全面的表示。“新”的并不一定是美的。时髦的东西也未必都是好货。李大钊不满意“新思潮”、“新文艺”里的种种污浊——浅薄、劣败的心理痕迹、商人气息、名利思想，正是因为他认为体现在新文学中的“新思潮”，应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意识，这才是新思潮的灵魂。失却了它，“旧毒新毒”的充塞也就自然而然了。李大钊还痛斥过颓废堕落文学，说那种文学是“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拔”，“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妇女醇酒之中”，与革命文学相比，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sup>②</sup>，足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64页。

<sup>②</sup> 参见《李大钊诗文选集》“前言”第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见李大钊新文学观念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魅力。

## (六)

“五四”运动前后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共写了135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平均不到六天就写出一篇。如果从1919年5月算到1926年末及被捕前，李大钊共写出论文203篇，尽管革命活动繁忙，仍以平均13天左右的速度写出一篇。这个数字，从一侧面也相当有说服力地反映了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中所起的巨大指导作用。

这时期，他愈益提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反复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sup>①</sup>，“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sup>②</sup>。他企盼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企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从黑暗的牢笼中打出一道光明。他认为人生的平凡发展，有时不如壮丽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sup>③</sup>他特别鼓励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第一次公开演讲会上，他热忱地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习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生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sup>④</sup>

在文艺上，此时李大钊一面继续申论文学的社会功能，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可以发扬民族和社会的感情”<sup>⑤</sup>，一面力排众议，论证社会主义将给文学艺术开辟广阔的前景。他说：“社会主义与学艺，有许多人皆谓社会主义所建设之社会，是阻碍艺术，不能有所发展。然吾等考查社会主义之一种，不但

①②③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第35页；第118页；第644页。

④ 参见《李大钊诗文选集》“前言”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不妨碍学艺，而且使之发展；至于资本主义反阻碍艺术，使之不能发展。”<sup>①</sup>他在《社会主义释疑》（1923年11月13日）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确：“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忌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sup>②</sup>

李大钊看到了社会发展与艺术发展间的不平衡关系，承认如今的艺术也有不如古来的。“艺术不分新旧，反有历史愈久，而愈见其好者”<sup>③</sup>。但古人有古人的艺术，我们有我们的艺术。“古时的艺术，固不为坏，但是我们也可以创造我们的艺术。古人的艺术，是以古人特有的天才创造的，固有我们不能及的地方，但我们凭我们的天才创造的艺术，古人也不见得能赶上。”<sup>④</sup>李大钊认为，艺术的黄金时代不是在我们背后，而是在前面迎着我们的。所以无论如何，应当努力前进。

李大钊与鲁迅的友谊，是他的文艺观的另一种升华。李大钊和鲁迅直接交往并不密，但他们却是相互支持、心心相印的。鲁迅把他在《新青年》上的作品，看作是与李大钊等人步调一致的“革命文学”。<sup>⑤</sup>把他自己的创作看作是“听将令”的“呐喊”，当知道李大钊等人是“不主张消极”的，便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恤用了曲笔”，添上一点希望，透出一线亮色。<sup>⑥</sup>李大钊则对别人说：“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都很能‘默契’。他善于‘忘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378页；第671-672页；第519页；第512页。

⑤ 《鲁迅全集》第4卷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 《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



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sup>①</sup>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李大钊非常高兴。他当即购了一册送给孩子们，并与他们讲这本书的价值。他特别赞赏《阿Q正传》，要孩子们认真阅读。1925年春，鲁迅的小说《长明灯》发表后，李大钊读过很兴奋。他说：“我看这是他要‘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还派人去看望鲁迅，并请他“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sup>②</sup>寄予无限的厚望。鲁迅听了，也表示对李大钊致亲切的问候。

李大钊的文学思想从反封建主义开始，发展到激进的民主主义，发展到宣传十月革命，最后发展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短短几年内走完了欧洲思想家由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长达二百年的路程。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一个光荣。

就整个“五四”新文学运动而言，如果沿用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它的“总司令”，鲁迅是它的冲锋陷阵的“主将”，那么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李大钊正是它的“党代表”。他自始至终忠诚而出色地履行了这支所向披靡的文化新军“政治委员”的职能。诚然，一切比喻的说法都是有限度的。但当我们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梳理出李大钊文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时候，我想这个结论是会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sup>①②</sup> 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 李大钊的宗教观

胡 顺 哉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李大钊非常重视宗教问题。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深刻地阐述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一、宗教的合理性和反科学性

“喻之建筑，社会也有基址（Basis）与上层（U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sup>①</sup>这就是李大钊全部宗教思想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指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同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相适应而产生并存在着的，因而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李大钊将原始宗教的起源归结于人类的五个“缺陷”：一是“强力的缺陷”，即社会生产力低下，人类不能支配自然却处处受到自然力的支配，绝对是必然的奴隶，人们无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246页。

法解释自然现象，常常感到自己力量的缺乏和自然力的强大，因而对自然现象产生神秘感，敬畏感或恐惧感；二是“身体的缺陷”，即“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人们又不了解患病原因，将此归于神的降灾；三是“生命的缺陷”，即“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于是人们对死产生恐怖而常常忧虑；四是“品性的缺陷”，即“罪恶的自觉，自原人时代亦既存在，惟关于简单明了的事为然，特别是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五是“运命的缺陷”，即“人之处世，祸福无端，原人于此，往往疑有主宰，操人运命而能与祸福者”。<sup>①</sup>上述五个方面的“缺陷”正是原始宗教产生的直接原因。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sup>②</sup>李大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始终肯定宗教现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决不是某人单凭主观愿望而捏造出来并流传的。

李大钊不仅充分肯定宗教现象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历史的客观的合理性，而且认为古代宗教也包含着一些辩证的科学的思想因素。他指出：宇宙万物都是“战象”（即“阴阳”）的对立统一体。“古时宗教，标帜树义，亦有谐于此理者。卓拉士特教理之源，谓有善恶之神，永事战斗，逮有创造，为其结果，以启万物，恒久之局。天竺佛说，亦云三神，合为造化。……各以其德，周流六虚，而成宇宙。神州哲理，阴阳蕴于太极。易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其生成创造者，亦莫非战象也。”<sup>③</sup>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宗教，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它，挖掘蕴含在其中的合理的科学的思想因素，用于社会进步。基于宗教产生与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宗教本身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因素，李大钊肯定了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例如各国的“犹太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67-568页；135页。

<sup>③</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73页。

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晌，亦是不可争的事实……”<sup>①</sup>

但是，李大钊始终认为，宗教从本质上看是反科学的，因而必须坚决反对。他主要从以下两个角度揭露了宗教的反科学性。

1. 唯心性。历史上的一切宗教都是运用超自然的神灵的观念，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针对宗教所宣扬的超自然的“大主宰”创造宇宙万物的荒诞说教，李大钊十分强调和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这是因为进化论是对宗教最直接的最有力的否定。他指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而自然变迁，断非神秘主宰之惠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sup>②</sup>充分肯定了宇宙万物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客观的过程，并非某一神秘“主宰”所创造的。

李大钊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深知唯物史观对宗教的强大批判力量。他紧紧抓住唯物史观的“要旨”，即“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sup>③</sup>指出宗教及其他一切精神的东西，不但不能限制和决定经济变化和物质变化，反而要由物质和经济所决定。从这一点出发，李大钊对宗教所宣扬的神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在谈到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与神之关系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从唯物史观应用观察社会，认为人非神造者，神是人造者。精神界现象，完全是人间社会物质经济情形之反映”，<sup>④</sup>宗教生活及其所宣扬的神灵观念正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派生和反映，并随着经济条件的次第发展而不断变化，从而否定宗教和“主宰”的神圣地位，并揭去其神秘的色彩。

<sup>①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61页；第139页；第382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63页。

2. 虚伪性。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鼓吹自由、平等和博爱，并且各自标榜最能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李大钊在《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一文中从理论上深刻地论证了宗教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和博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是虚伪的。

首先，李大钊认为：凡宗教必定信仰神灵，宗教这一基本特征决定宗教不仅不可能实现思想自由，而且宗教本身就是实现思想自由的障碍。因此，只有摆脱宗教，“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sup>①</sup>

其次，李大钊从分析原始宗教的五方面起源着手，指出“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sup>②</sup>由于“强力的缺陷”，形成“几分先知预见者”或“有几分抵抗力者”和一般人之间的优与劣、强与弱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身体的缺陷”，形成疾病预告者或治病成功者和一般人们之间的优与劣、强与弱的不平等关系；由于“生命的缺陷”，形成一般人民作为劣者弱者对优者强者的不平等关系；由于“品性的缺陷”，“有能功之为罪恶的改悛者”和“有能赦免罪恶的全权者”作为优者强者为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而形成不平等关系；由于“命运的缺陷”“能豫告祸至者”和“能为祷告以免祸祈福者”成为优者为一般人所敬畏而形成不平等关系。因此，在宗教社会里，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

最后，李大钊指出，虽然宗教教义大多倡导博爱精神，但没有以自由和平等作为基础的博爱不是真正的博爱。诸如基督教教义中所谓“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之说教，实质上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奇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sup>③</sup>容许资产阶级的掠夺压榨而以虚幻的天国麻痹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66页；第567页；第568页。

无产阶级的斗志。在殖民地国家则驱使被压迫民族安分守纪，甘受奴役。

李大钊和蔡元培等社会名流还在北京发起成立非宗教同盟，举行各种活动。这既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是提倡科学进步的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它特别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和唯物史观。

## 二、宗教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宗教的社会影响、历史作用和发展趋势等角度对宗教的历史地位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评述。

1. 宗教的社会影响。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绝不是孤立的。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自原始宗教产生至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段历史时期，宗教几乎对其他所有社会现象都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本文着重谈谈以下两个方面。

先看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李大钊在论及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时指出：“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sup>①</sup>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在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其政治从本质上看几乎无不是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础上的神权政治。神权与王权的统一便是政教结合，这曾经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存在的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所以，李大钊说：“政教相混，原为人类进化必经之一阶级，世界各国莫不循此轨辙，而今尚有存此遗习者也。”<sup>②</sup>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和战争也有着密切关系。宗教往往通过战争直接影响政治。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李大钊不仅例举了原始宗教种种传说经典，而且例举了许多社会史实，如“婆罗门与佛教相争，

<sup>①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574页；第248页。

则流血夷族。麻罽末二派互抗，则革命绝祀。回耶相犯，则十字军兴，劳师远伐，祸结兵连，……厥后欧洲教难，莽若乱丝，分东西，分新旧，政教混淆，云翻雨覆。”<sup>①</sup>

李大钊还指出历史上宗教和农民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是由特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他特别强调宗教对农民起义所起的重要影响。如山东河北等省的红枪会这种农民武装组织，就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太平天国运动，则正是“以民族思想及耶教观念相合所成的大运动”。<sup>②</sup>但是，太平天国的革命者们只明白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人民肉体的毒物，却不知道宗教也是帝国主义者用以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东西。因此，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观念虽然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但是还有坏的方面，就是“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的长胜军”，这正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③</sup>

再看宗教对历史观的影响。一般说来古代一切历史观皆不同程度地带有宗教性，同神灵或天命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李大钊在《史观》一文中指出：“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切相依的关系。”<sup>④</sup>这说明古代的历史观基本上都是唯心主义的，都在不同程度上渗透宗教思想观念，深深打上那个时代的宗教的烙印。于是，旧历史的方法是“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377页。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01页；第851—852页；第265页

存”，而不是看作“全为人力所造”。<sup>①</sup>李大钊认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大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sup>②</sup>从而否定了英雄史观（包括“上帝史观”），肯定一切历史都是“人力”而不是“神力”创造的自然客观过程。他批判了“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唯心史观，认为虽然宗教曾对历史进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观点夸大了宗教的历史作用，“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sup>③</sup>“宗教是进化的关键”此观点错在不是以经济为中心来解释历史进步，而是相反，将宗教解释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此外，宗教对文学、道德等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李大钊在自己的论著和讲话中都作了许多深刻阐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2. 宗教的历史作用。如前所述，李大钊充分肯定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被压迫人民就往往把宗教当作团结自己和反抗敌人的旗帜，宗教起了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的作用，例如前面论及的红枪会和太平天国运动。即使如原始宗教仪式，也可以“齐一其群之精神，统驭其群之思想”。<sup>④</sup>但是，相比较而言，宗教在历史上所起的消极作用却是主要的，这表现为宗教对人们的思想产生着极大的麻醉作用。所以，李大钊指出：“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sup>⑤</sup>宗教的这种麻醉作用，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第365页；第361页。

<sup>④</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377页。

<sup>⑤</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



通过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哲学、伦理道德规范、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社会现象，犹如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笼罩着整个社会，渗透影响着各种社会现象。并且，几乎所有宗教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sup>①</sup>宗教正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等级制度以发挥其精神麻醉作用。

李大钊还指出宗教的另一个消极作用就是妨碍人类进步。这是因为，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想依赖宗教去解决，那是一种不承认科学文明的态度。……我们只是依赖廉价的宗教幻想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为宗教不能探求真理，无论什么问题最后都说成是依靠所谓神的力量或佛的力量去解决的原故”。<sup>②</sup>“它妨碍彻底探求真理的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巨大的障碍，因而我们必须竭力加以反对。”<sup>③</sup>在人类历史上，一般说来，宗教跟科学总是不相容的。它制造愚昧和迷信，扼杀真理，反对科学的进步，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残酷地迫害科学家。中世纪的欧洲就不知有多少坚持真理的人，如女数学家希帕西亚、自然科学家布鲁诺、物理学家伽利略等等，就是惨死在宗教裁判所的酷刑之下。

在肯定宗教具有重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李大钊还认为，宗教势力的强弱及其所起作用的大小都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两者成反比。原始社会的经济生活大多数依赖现成自然物，依靠人力的地方很少。他举了南美土人的谋生例子，说他们只需伸出一张嘴，面包树和咖啡树就可提供他们吃和喝，所以他们只有宗教的感谢，没有经济的竞争。但是，“到了英国产业革命后的机械生产时代，人类脱离自然而独立，达到自营自给的经济生活，社会情形为之一变，宗教政治的势力全然扫地，经济势力异军苍头特起支配当时的社会了。”<sup>④</sup>可见，宗教作为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不仅其产生和存在是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其所起的历史

①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第555页；第556页；第68页。

作用同样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这样，宗教的社会历史作用就得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3. 宗教的发展趋势。宗教如同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现象一样，也是“历史的东西”<sup>①</sup>，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李大钊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历史唯物论者应“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sup>②</sup>肯定在任何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sup>③</sup>如前所述，他认为宗教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一切宗教活动形式及其变迁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社会经济生活上的原因。一切宗教，如同王道、王法、纲常，“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改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sup>④</sup>因此，宗教只能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可能是绝对的、永恒的。李大钊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他首先指出，宗教是在愚昧时代自然压迫的产物，原始宗教就是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况下产生的，其基本特征是“崇拜自然力”为“神灵”。当“生产技术稍稍进步”、社会划分为“治者与被治者阶级”的历史条件下，“从前是崇拜自然物的原形，现在是把自然物当作一个有力的人去崇拜他了”。随着人类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工商业出现，商品经济逐步发展，人的精神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精神实是那时商业社会人类生活的中心”，“引我们注意的只是思想上及精神上的现象”。由于人类的精神现象具有复杂奇妙之特点，“由自然界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说明，结局仍是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不统一、各国分立时代，决定了

<sup>①②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45页；第60页；第177页；第151页。

“多神及自然神”的存在。而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又决定了“唯一精神的神”取代和消灭所有的“自然神”。到了罗马帝政时代，基督教“把所有的势力归于一个精神，归于一个神”。后来都市渐渐发达，都市居民“因其工商业的关系，渐立于有权力的地位，对于贵族、僧侣有了自由独立的位置。随着他们对于社会的观念的变动，对于宇宙的观念也变了。于是要求一种新宗教”。他们认为在自己与宇宙之间、自己与神之间已经不需要第三者（即教皇、僧官和牧师之类）存在了，而可以“直接与神相见”，这就是路德及加尔文所倡导的新教。随着工商贸易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强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时的人也互认为抽象的东西，因而所信的神也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又随着社会现象复杂程度的提高，人们只能通过“内观、冥想、灵化”以求“慰安与幸福”，而“资本家的个人的表象映照于精神界，就成了一个绝大的孤立的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能力逐步提高，“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地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见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他就发生于现代了”。这个时候，也就是宗教走向消亡，最终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时候。李大钊作了含蓄而形象的比喻：“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

### 三、对待宗教的正确态度

李大钊十分强调对待宗教不能简单化，应有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1. 反对、消除宗教。李大钊虽然肯定宗教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他认为宗教本质上始终是反科学的，必须坚决反对，不仅仅是反对某一种教，而要“反对阻碍人类进步的所

有的宗教”。<sup>①</sup>他特别强调要反对基督教，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是最发达的，有最多的信徒，最大的势力，因此应首先反对这个最有势力因而流毒最广的基督教，随着必要也要反对佛教，或发动反对儒教和道教的运动”。<sup>②</sup>他强调人类要实现自我解放就必须摆脱宗教的“桎梏”和“束制”。这是因为“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sup>③</sup>这样，就把反对宗教、消除宗教的社会影响提高到人类解放的高度来认识。

李大钊高度赞扬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对宗教迷信的冲击，“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sup>④</sup>他坚信民众势力将推翻一切历史的已经失去必然性和合理性的东西，宗教同“皇统”、“军阀”、“政阀”一样，“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sup>⑤</sup>民众势力觉悟之日，就是宗教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李大钊建议知识分子、有觉悟的青年、农民运动者、教师要加入到红枪会之类农民组织中去，对农民进行无神论和自我解放教育，使他们逐步摆脱宗教的束缚。

2. 改造、利用宗教。从整体上看，宗教是反科学的，是妨碍人类探索真理，妨碍社会进步的，因而必须坚决反对，并逐步消除其社会影响；但是，宗教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不仅表现为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而且表现在宗教本身包含着某些积极因素。这正是宗教改造和利用的价值所在。因此，李大钊认为，对待宗教不能全盘抛弃，而应以辩证的态度改造利用之，例如，古代的孔子观、释迦观、耶稣观都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是古人本着迷信为孔子、释迦、耶稣作传，

<sup>①②③④⑤</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555页；第555—556页；第211页；第348页；第239页。

把他们捧为圣人、天子，神话化了。我们现在要为他们作传，就必须删除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神话色彩，还其庐山真面目。特别要注重考察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本着新的眼光，去不断的改作重作，的确是我们应取的途径了”。<sup>①</sup>李大钊还提倡采取儒家“日新”、佛门“忏悔”、耶教“复活”之方法，以“再造”中华民族。<sup>②</sup>他认为忏悔的方法很好，对培养人们情操和建设社会道德都有好处；忏悔者是“最可敬的”，因为“他是从罪恶里逃出来的，所以他对于罪恶的本体和自己堕落的生活，都有一层深严而且透彻的认识。以后任是罪恶怎样来诱惑他，他绝不会再上当了”，所以“忏悔的文字”“实在是一种神圣的人生福音”。<sup>③</sup>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者要反对和改造建立在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教。“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sup>④</sup>“将来新的经济组织亦许发生新宗教。但此宗教是适用于新的经济组织。”<sup>⑤</sup>

继承李大钊的思想观点，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利用、改造宗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以积极的态度改造宗教，使宗教从内容到形式渗透科学内容，逐步抵消其消极作用，使宗教服从和适应于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并重视通过改造使宗教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尽可能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方向上基本保持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

3. 信仰宗教自由。李大钊反复强调，宗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应该是自由的，是绝对不应该禁止的。

首先，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不必要的。他认为，任何一种学说，不管它是否与“情理”相符合，都绝对没有禁止的必要。如果它是符合“情理”的，“因为他的原素仍然在情理之中，情理不灭，

①③④⑤ 《李大钊文集》（下）第678页；第200页；第674页；第382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75页。

这种学说也终不灭”；如果它是与“情理”相违背的，“因为大背情理的学说，正应该让大家知道，大家才不去信。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最好的方法是“把这种主义、学说的真象，尽量传播，使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如果“只是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sup>①</sup>他指出，人的思想学说本身没有任何危险性可言，“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sup>②</sup>知识了、错信仰了所谓邪说异端，只要他的知识与信仰，是本于即使人们“错他思想的自由、知念的真实，一则得了自信，二则免了欺人，都是有益于人生的，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sup>③</sup>因此，禁止宗教信仰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其次，禁止自由信仰宗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方面，宗教赖以存在的客观条件尚未消失，这就决定了宗教的存在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思想是不能被禁止的、绝对自由的东西，企图禁止思想自由，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李大钊认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们，超越他们。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这些东西，在思想中全没有一点价值，没有一点权威”。<sup>④</sup>他还指出，世界历史上凭借政治权力，强迫人民信仰一种宗教，或对其他教派强行施加压制，没有不失败的。这是由于人们“信仰一种宗教，乃在求一安心立命之所，出于人类精神上之自然的要求，非可以人为之力施以干涉也”。<sup>⑤</sup>因此，宗教信仰当该是自由的，禁止宗教信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

①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8页；第7页、第8页。

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8—9页。

⑤ 《李大钊文集》（上）第248页。

总之,李大钊的宗教观是丰富而深刻的、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科学的宗教观。它对于人们科学认识宗教和正确对待宗教,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制定和实施宗教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有待于深入探讨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省瑞安市高楼中学)

## 李大钊的婚姻家庭观

吴美华 刘星星

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风尚的发展。既然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其斗争锋芒必然会指向中国千百年延续下来的封建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观，在当时，反对“三从四德”，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开始形成风气。知识分子中的青年男女对婚姻家庭制度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在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废除家庭、脱离婚姻的主张。同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股反对自由婚姻，拚命维护旧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关系的逆流。这一问题的争论和斗争，实质上是用唯物史观还是用唯心史观认识和分析婚姻家庭问题，改革还是维护孔门伦理赖以存在的旧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问题。

李大钊从反封建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在《不自由之悲剧》、《战后之妇人问题》、《废娼问题》、《妇女解放与Democracy》、《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理想的家庭》、《现代的女权运动》、《平民主义》等文章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观点，并对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以及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 婚姻首先要以爱情为基础

李大钊把“真正之爱情”列为家庭应有之条件，指出，家庭“首以自由结婚为之根据”。<sup>①</sup>他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数千年来以政治目的、家世利益为联姻决定性因素的旧式婚姻，指出：“若其家庭之建筑，不基于男女两性之自觉的恋爱，而或为门阀所限，或为金钱所动，或误信于媒妁，或听命于父母，则其婚姻之关系，不成于人而成于物，不因于情感而因于势力，男女之当事者，非为其自身而嫁娶，乃为他人而嫁娶，非为其人生之幸福而缔缘，乃为其门阀之地位而缔缘，其间不生虚伪之罪恶，必兴悲怆之怨诉，将缘而适以为孽，爱而反以成仇矣”。<sup>②</sup>他认为，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造成无数家庭悲剧的根源。针对“有发生爱，未必能结婚，结婚者未必有爱情；或结婚以后，尚有其他恋爱者”这种爱情与结婚不一致的矛盾现象，他公开主张：“吾人苟遇有如此情形，皆应彻底离婚或结婚，以实现爱与结婚一致，使一家之中，全充满爱之空气”。<sup>③</sup>这就深刻揭示了爱情与婚姻在本质上的一致性。

怎样才能做到以爱情为基础？李大钊认为，唯一的途径是自由恋爱。他说：“恋爱为人生之真境”，“其自由之权，当一操之本人，乃为天经地义不可或违”，绝不可以“以恋爱为轻，自由为妄，婚姻惟听诸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父母者，只宜于家庭教育稍加注意，示以择人寻配之准则，俾勿轻陷入情魔爱网之中，于义已足，决不可更进一步，代居子女之地位而为之缔婚，以伤其神圣，夺其自由。在社会亦当顾时代思潮之大势，可以指导之不可阻挠之，可以促其注意而不可吝其同情”。这样，青年

<sup>①③</sup> 《李大钊文集》（续）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9版。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454页。

男女才能够“循其自然之良知，秉其纯洁之真情，以自创一高尚美满之境遇，自造一温柔和乐之家庭”。<sup>①</sup>他还主张男女社交公开，广泛接触，加深了解，从众多的人中间选择，即“利用最多之机会，为丰富之交际，于千百中选一耳”。<sup>②</sup>同时，李大钊特别强调，一方面“应该让一般男男女女知道这爱的力量的伟大”，“应该慎重着些，不可太儿戏了”。另一方面，也“应该让人知道爱情是有变动的”，“爱情一有转移，婚姻关系可以自由解除与缔结”。他还说，那些因爱情转移而解除了婚约的人，“不必以此为耻辱”，因为“这与名誉丝毫无损”。至于那些失恋的人“亦要达观些”，因为“恋既不存了，那以前的痕迹都是些幻梦与泡影”，“为幻梦与泡影而牺牲而殉死太不值得了”。<sup>③</sup>

对社会上旧势力、旧思想的代表顽固抵御新思想的行为，李大钊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北京广德楼剧场演出了轰动一时的新剧《自由宝鉴》。该剧描写一对青年男女不听家庭规劝，自由恋爱，婚后误入歧途，两人临死时表示忏悔，说不该误听新说。这是一个地地道道宣扬封建旧道德的典型。李大钊听到一些朋友观剧后的反映，也抽时间去看戏。观后，他十分气愤，专门写了《不自由之悲剧》一文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以示抗议。他说：“如此剧中所陈者，允为不自由之结果，允为社会不与同情之所致，家族专制之所迫，而与自由婚姻无关。”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逆乎时代潮流之演剧，固足以代表目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而以演剧之功用言之，抑锐新之思潮而保旧腐之传说，实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许。”这个剧的“终结之的，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对于敢于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青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455页。

② 《李大钊文集》（续）第2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553—554页。

年，李大钊则是竭力支持。李大钊高度称赞为抗拒包办婚姻从家中逃出来献身革命的觉悟社成员郭隆真，说她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号召女青年向她学习。

李大钊不仅鼓励青年婚姻自由，也赞成寡妇、鳏夫有再婚自由。他在《自然与人生》中曾记叙了这样一件事：李大钊有位本家的哥哥，病死后除去欠人家的零星债务，撇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位妇女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贞守节烈，忍饥挨饿，默默拉扯着自己的儿子，耐了三年的困苦，日子实在熬不下去了，她只好带着儿子改嫁了。后来，她的儿子长大了，认为母亲的改嫁是一种耻辱，竟抛弃了自己的母亲，回到本族的叔叔家里，而且再也没有去看望过那在艰难困苦中把他养育成人的母亲。李大钊知道这件事以后，对那位寡妇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再三规劝本家侄子一定要去看看他的母亲。李大钊由此而发出这样的疑问：

“是人情的凉薄呢？还是风俗习惯的残酷呢”？他曾忿忿地对家里人说，男人死了妻子可以再娶，妇女死了丈夫为什么不能再嫁呢？寡妇生活不下去，重新嫁人完全合乎情理，这有什么不光彩的！还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鄙视“走道”（即改嫁）的寡妇，辱骂失去了父亲的孩子。

## 必须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式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方面，对于家庭的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婚姻的发展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即群婚制、对偶婚制和一夫一妻制。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即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相适应。李大钊在《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中指出：“一夫一妻之制，衡诸天理人道，最称允当，不可渝犯”。并且揭露了我国“一方则有禁止重婚之法律，一方则欲保存蓄妾之恶风”的社会矛盾现象。他在《理想的家庭》一文中，

简略考察了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发展的历史，指出：“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把实行一夫一妻制作为家庭的重要条件。

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都是以男女不平等、丈夫统治妻子为特征的，都“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sup>①</sup>，实质上只不过是对妻子单方面的一夫一妻制而已。李大钊从尊重妇女人格和实现男女平等出发，主张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坚决禁止买卖妇女，禁止纳妾。他还专门写了《废娼问题》一文，从尊重人道、尊重恋爱生活、尊重公共卫生、保障法律上的人身自由和保持社会上妇女的地位五个方面论述了废娼的必要性。他特别指出：“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社会上若许公娼存在，男女间恋爱生活的价值必然低落，恋爱的自由必为不正不当的势力所侵犯，致令一般人对于恋爱起一种苟且轻蔑的心，不在人生上求他，却向兽欲里求他，不但是侮辱了人权，而且是侮辱了人生。”他认为废娼问题，“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sup>②</sup>

## 家庭成员之间应建立民主的新型关系

“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是李大钊的重要思想之一。李大钊不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一种社会潮流，而且把它看作“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sup>③</sup>因此，他认为“平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679—680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588页。

主义”充满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包括家庭。把民主主义引进家庭，这是李大钊思想的独到之处。家庭作为在一定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由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形成的亲属间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是家庭成员之间思想感情的、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诸方面因素的结合。而以往的家庭成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压抑个性的。李大钊从小亲身经历和目睹了旧式封建家庭纠纷重重的情形，特别向往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夫妻、父子、兄弟姐妹）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民主的关系。他认为，“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精神”。家庭成员之间应是完全平等的，“无父系母系之分别，亦无男女性之界限，乃共力合作，而组织良好家庭，无有特别之权利，对于孩提，亦不宜加以压制，循循善诱，更当尊重实行民治之条件”。<sup>①</sup>

李大钊特别重视妇女解放在实现民主主义中的地位。他说：“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sup>②</sup>认为，“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因为“第一，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Democracy的精神”；第二“那真正的Democracy不是男子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这里所谓人民全体，就是包含男女两性在内。社会上一切阶段都可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sup>③</sup>他还进一步指出：“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征，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sup>④</sup>

①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604页；第102—103页；第516页。

他说：妇女“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sup>①</sup>他还把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的运动，称为“平民主义化的运动”。这就把妇女摆脱在家庭中的附属、被支配、被奴役的地位与妇女在整个社会上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把民主主义在家庭中的实行与在全社会实行紧密结合起来了。

### 家庭结构应以小家庭制度为宜

我国的封建家庭是父系家长制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中，一般都有一位年老的男性长者作为家长，家庭成员包括家长的妻子、儿子、儿媳和儿子的后代等，常常是几世同堂。这种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大家族制度，是中国封建家庭制度的一大特点。李大钊深刻分析了大家族制度产生的原因、地位与作用。他说：“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他还说：“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sup>②</sup>他还揭露了大家族制度的种种矛盾和虚伪性，预示了大家族制度瓦解的历史必然性。李大钊说：“中国古代，九世同堂之风尚矣！夫一代同堂之家族，其复杂已不可言状。兄弟也，姊妹也，嫂叔也，姑嫂也，其间自难免有间言，不应接近者，而强聚于一堂，其苦痛有难言之隐，徒表面上好看耳。”<sup>③</sup>他认为，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家庭成员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635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

③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担负，听他们去自由活动，自立生活了”。<sup>①</sup>这样，大家族制度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家庭形式总是由社会生产方式所决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的。中国近代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和大家族制度的逐步瓦解，家庭结构应采取怎样的形式呢？李大钊认为：“吾人理想所组织之家庭，除夫妇及子女未婚嫁者，可以同住，子女已婚嫁者，亦宜别居，盖子女虽为至亲，至其别有爱人，当然不如前日一片赤子之心，父母之爱，已移与夫或妻，苟长相聚，则未必感情能久维持。”<sup>②</sup>李大钊提出的建立“小家庭之制度”的观点，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不仅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避免大家庭内部因财产等问题产生的种种纠纷和感情纠葛，而且有利于培养家庭成员的个性，巩固夫妻感情。这种家庭结构小型化的观点，也揭示了现代婚姻家庭发展的趋势。

### 提倡尊敬赡养老人，主张实行儿童公 育，重视家庭卫生及美育教育

李大钊还很注意青年人与老年人的关系问题，强调要发扬中华民族养老孝亲的传统美德。他在《青年与老人》一文中，批判了轻蔑老人的“蛮戾社会之恶风”，指出：“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认为青年人与老年人各有所长，只有协调好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共促社会的发展。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伦理课时，批判了封建主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183页。

② 《李大钊文集》（续）第27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义的“孝道”，提倡要尊敬和赡养老人。他说：我们今天所以反对孝道，是因为社会的基础已经起了新的变化。孝道并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子女与父母的关系的好坏，也要看双方的感情如何，不是可以用孝道束缚得住的。我不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可是我却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不能算是孝道。当有个同学问道，要是我的老人对新思想不能接受，该怎么办呀？李大钊回答说，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急躁。对于老年人，只有用说服的方法来批判旧道德，并向他们解释新道德的意义，不要生硬地强迫他们接受新思想。<sup>①</sup>这就划清了封建“孝道”与养老孝亲的界限，在批判旧道德的同时，提倡新道德，提倡发扬那些对社会有进步意义的传统美德，而不是把一切都批掉。

李大钊竭力主张实行儿童公育，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社会学的时候，讲了不少这方面的理论和设想。他认为，中国只有大批开设托儿所、保育院、幼儿园，才能把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妇女，从封建的家庭中解放出来。192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在莫斯科参观了大约两个半月。他特别注意了解革命胜利后苏联少年儿童的情况，参观了不少工厂附设的婴儿室、幼儿园和孤儿院、儿童村等。回国后，他对子女谈起观感时激动地说，我们中国将来一定要这样做，妇女才能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sup>②</sup>

李大钊也非常重视家庭卫生及美育教育。他在《理想的家庭》中专门把“家事之研究”作为一个问题来讲，指出：“卫生须近于科学，教育须近于原理”，“审美之生活，亦属必要！如音乐及他种之设备，要以有美化为归”。

---

<sup>①②</sup>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71页；第108页。



## 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解决中国婚姻家庭 问题，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唯 心主义观点和封建伦理道德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论述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前期，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是对唯物史观从理论上作初步的系统介绍。在五四运动后期，他则着力把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对中国历史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上。他对婚姻家庭问题的论述就反映了这一特点。他把婚姻家庭问题作为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出发，揭示了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论述了婚姻家庭的基础、家庭的结构与功能等问题，并指出改造婚姻家庭制度的根本途径在于破除旧的经济制度，改造旧的生产关系。他说：“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sup>①</sup>从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维护旧式家庭和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破坏家庭的唯心主义观点。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一面旗帜，他在阐述婚姻家庭观的同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主义思想的核心——孔门伦理道德。从前面李大钊有关论述中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他坚定表示：“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变，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sup>②</sup>并明确宣布：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sup>②</sup>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sup>①</sup>李大钊比同代其他人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批判局限于其本身，而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深刻揭示了孔门伦理的本质及其在封建社会长期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必将被摧毁的历史必然性。《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些思想。

李大钊深刻地指出，道德的基础是物质，而物质是指社会经济而言，孔门伦理道德是以中国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大家族制度。他说：“中国的一切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sup>②</sup>他进一步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sup>③</sup>李大钊认为，圣道、王法、纲常、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sup>④</sup>中国近代，随着封建主义农业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全面动摇，大家族制度也随之动摇起来，“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sup>⑤</sup>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李大钊的某些观点“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sup>⑥</sup>但是，当我们考虑到当时人们正与“吃人的礼教”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正为从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精神枷锁下争脱出来而欢欣鼓舞，在这种情况下，言论上有些偏激，是

---

<sup>①②③</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82页。

<sup>③④</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79页；第151页。

<sup>⑤</sup> 鲁迅《南腔北调集》第92页。

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如此，从总的方面来看，李大钊关于婚姻家庭问题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还是相当先进的，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此外，他的论述比较全面，比较科学，并且较早地将唯物史观运用到婚姻家庭理论的科学研究上来，因此，我们称李大钊为中国婚姻家庭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还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国防大学）

## 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及其价值

韩一德 姚维斗

李大钊在为拯救祖国危亡，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座右铭。不论是在主持北大图书馆的繁忙事务中，还是领导北方党和工农革命运动中，以至于地下斗争白色恐怖的岁月里，他始终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在他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短短十几年里，写下了500多篇文章书信，计一百三、四十万言，内容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和党的建设，革命的战略策略以及诗词、通讯、杂文等等，从多角度、以多种形式反映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思考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人民、对事业、对朋友的坦荡襟怀。他的道德文章光照后人，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尊敬。李大钊的遗文是考察中国近代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财富，鲁迅称之为：“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的文稿，在他1927年4月28日牺牲于奉系军阀屠刀之下时，散落于中外各地的书籍报刊和个人往来信函中，收集起来犹如大海捞针困难重重。因此李大钊遗文的收集整理出版，经历了几代人持续不断艰韧工作的过程。早在30年代，李乐光冒着生命危险保存李大钊遗文，后来在鲁迅支持下，编定《守常文集》，收文30篇约10万字。建国前后，老一辈学者周建人、蔡尚思、万行、刘弄潮等，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故纸和余烬中”，收集李大钊的遗著。在这个基础上，1959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

《李大钊选集》，收入文章133篇计39万字。这是建国10年后出版的唯一李大钊著作集，它曾长期而广泛地为人们学习和使用，然而由于当时受“左”的思想影响，不仅已经发现300多篇文稿的大部分未被选入，而且对选入的文章又作了不应有的删节和改动，使之失去了历史的真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李大钊历史地位的恢复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兴起了李大钊研究的热潮。在继续收集和整理李大钊文稿方面，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的同志们进行了大量工作；与此同时，以张静如、刘桂生为代表的李大钊研究专家，又发现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文献，计有李大钊早年的英文《我的自传》；《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924年7月）；《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上的讲话》（1922年2月），以及李大钊于1923年12月，在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校庆会上的演说《十八年来之回顾》，和1925年开封《雷火》杂志刊登的《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等，这些文章已全部收进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李大钊文集》中，新版文集共收文448篇约110万字，它标志着李大钊遗文的收集出版进入新的阶段。

本文将着重介绍的，是在《李大钊文集》出版以后佚文收集工作的新进展，韩一德等在近5年内又发现了文章15篇，书信19件及部分题词、警句、墓志铭等，由姚维斗、杨芹同志编辑《李大钊遗文补编》一书，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发现的文章主要有发表在日文报刊上的7篇文章，即：《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北京周报》第22号，1922年3月12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北京周报》第33号和1922年9月17日），《中国今后的政治运动》（《北京周报》第74号1923年7月22日）。<sup>①</sup>以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

<sup>①</sup> 见《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新支那》1921年1月27日),《目前中国教育界的困境——就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总辞职问题发表的谈话》(《新支那》1921年5月22日)和1923年10月23日刊于《报知新闻》的《李大钊答记者问》。<sup>①</sup>还有香港大学陈万雄先生发现于《东方时论》第7卷第1号上李大钊写的《日本的武士道与国际的新伦理》等文。

1985年第1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重新刊登了李大钊1924年在苏联发表的文章和演说,除《在共产国际五大的书面报告》前已发现外,还有《中国内战烽起,经济崩溃,帝国主义者为了减轻自身困难瓜分中国》(《莫斯科工人报》1924年9月22日)、《中国的内战与工人阶级》(《红色工会国际》第9—10期)等4篇。<sup>②</sup>这些文章演说反映了1924年李大钊赴苏期间为争取国际援助中国革命所作的努力和他对中国形势和革命的战略策略的分析,为了解李大钊在苏联期间的活动和思想主张提供了新史料。

新发现的书信,主要是李大钊与周作人、袁崇礼及日本友人吉野作造、宫崎龙介等人的通信,内容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宗教同盟、北大图书馆建设和中日青年教育文化交流等,也都非常珍贵。其中致袁崇礼与吉野作造等信的原件仍分别保存在美国和日本。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绝大多数出于外文刊物和私人档案的这一事实表明,李大钊遗文的收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进了一大步,开放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为收集工作提供了条件,在日文刊物上发现的文章和书信,先后得到日本后藤延子和宫崎智雄等先生的大力帮助。

以下拟就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涉及的主要问题及其意义作一介绍。

### 一、对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行方法的考察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发生过几次大的论

<sup>①</sup>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sup>②</sup>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争。1920年底发生在上海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就是其中的一次。在以前的研究中，由于缺乏资料，对李大钊在这次讨论中的言论和作用涉及较少。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的，他于1921年3月写的《社会主义下的实业》和在这前后写给费觉天的信<sup>①</sup>；尤其1986年发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三篇文章联系起来就比较充分地说明李大钊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的主张和作用，当时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与其他人比较所具有的不同之处。

针对张东荪等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使一般人先过上富裕的生活，然后才有条件谈论社会主义”，从而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论点，李大钊指出，发展实业固然重要，但在现存制度下去发展实业，只有强化统治阶级，迫使工农民众付出更多的血汗，其结果使贫富向两极发展，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李大钊还批驳了那种靠军阀政府借外债开发致富的论调，这样去做只能进一步促进中外统治阶级的结合，强化军阀统治，带给人民的只能是更大的灾难。他主张从世界范围考察中国改造的道路，虽然中国经济很不发达，但早已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中，中国人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sup>②</sup>因而也已卷入世界“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sup>③</sup>在这种形势下还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想由人家起首的出发点，按着人家的步数走，犹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不仅“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sup>④</sup>因此，中国要真正发展实业，必须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推翻军阀统治，抵抗世界资本主义，政治上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依社会主义经营实业。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李大

① 费觉天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为题发表于《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见《李大钊文集》（下）。

②③④ 《李大钊文集》（下）第454页。

判得出了“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sup>①</sup>的结论。

在这次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特别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弄清社会主义的真正意义及其在中国实行的方法。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奋斗的目标，解决到达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是困难而又麻烦的事情。为此他于1920年12月2日，邀集北京大学“有信仰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sup>②</sup>编辑社会主义丛书，翻译各国社会主义名著，请人作社会主义的演讲，从普及社会主义知识入手，研究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方法。这与当时有些人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二十年内全国变成社会主义组合”的态度不同，他强调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困难和要对社会主义作深入的研究。与其他早期共产主义者一样，李大钊在当时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方法和道路，但李大钊这时确已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对研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观和他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中的主张，有其重要价值。

## 二、领导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工的索欠索薪斗争

直皖战争之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实权仍掌握在旧交通系手中，使刚刚上台的靳云鹏内阁的财政发生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曹錕吴佩孚却继续扩军备战，推行武力统一，收买政客走狗，为实行独裁统治加紧活动，致使本已十分窘迫的中央财政更加困难。1921年春靳云鹏内阁竟然断绝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八校<sup>③</sup>的教育经费和教职员薪俸，使北京国立八所高等学校的正常业务无法维持，教职员的生活陷入难以为继的地步。八校的教职员被迫

①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② 《北大日刊》1920年12月4日。

③ 国立专门以上八校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美术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于1921年3月14日举行罢教罢工，后来又愤于政府言而无信，无支付拖欠教育经费和教职员欠薪的诚意而决定总辞职。近年发现的《中国教育界的困境》一文，就是李大钊为这次总辞职向新闻界发表的谈话。

李大钊是这次大规模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他为争取中国的教育权和教职员生存权的斗争付出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为领导斗争而组织的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每校3人)，李大钊同时被北京大学和女高师推为代表，先后担任新闻股办事、《半周刊》主编，并在马叙伦生病期间长期代理主席职务。这次索薪斗争历时4月余，正式会议76次，加上临时会议共百余次，几乎天天有会，李大钊总是每会必到。他还数次率代表到教育部和国务院请愿。6月3日，在国务院立等7小时未得接见，代表坚行进入，遭到军阀毒打，马叙伦、李大钊等数十人受伤，马叙伦因伤住院后，李大钊再度代理主席职务，领导联席会与政府交涉并通过多方面工作取得广大学生和社会各界的谅解与支持。他对公众事业的热心及与反动当局的斗争精神深受同人的信赖和尊敬。

关于这次索薪斗争的消息，虽大量见于当时北京的主要报刊，但联席会的机关刊物《半周刊》已无处查寻，因此发现李大钊的这次专门谈话，对系统地了解这次斗争的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早在1919年他就指出，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工，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很体面很正当的事”<sup>①</sup>。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更用不着用冠冕堂皇的话去责备他们。李大钊在这次谈话中声明，教职员的罢教和辞职，出于万般无奈，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状况，除了当时的中国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国家了。因此在军阀政府统治下，中国教育完全绝了发展的希望，人民决不能再对这种政府容忍姑息，从而把教职员维持教育权、生存权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

<sup>①</sup> 《李大钊文集》(下)第175页。

统治的纲领联系起来。

最后还应指出，正是在这次索薪斗争紧张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要在上海召开，据当时出席会议的北京代表刘仁静回忆，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与他处于领导这场斗争的重要位置而不能分身有直接的关系。

### 三、对中国工人运动形势的分析

1922年1月12日香港爆发了海员大罢工，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拉开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序幕。在近年发现的《中国工人运动的趋势》一文中，李大钊以这次海员罢工为重点，全面分析工人运动形势，系统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实际经验，指出工人运动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这是李大钊亲身领导工人运动的产物，也是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步骤。

文中首先高度评价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卷入由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转变的历史潮流的标志，虽然“这一历史进程在中国虽然还很幼稚，但也避免不了受到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sup>①</sup>这次罢工能够拥有这样多的成员，具有如此坚强的集体团结力量和一旦提出斗争目标就坚持到底的决心，无疑会给全国工人团体以巨大鼓舞和支持，它预示着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必将到来。在分析这次罢工取得胜利的原因时，李大钊特别强调了全国各地工会运动的支援，当时上海的工会组织在处于小组织林立不容易取得一致行动的状况下，极力劝阻了准备取代罢工海员的工人赴港，北方的京汉铁路工会，募集了巨额捐款派代表送往香港，这些事实都促进了中国工人阶段觉悟的提高，极大地推动了他们迅速走向联合。

谈到全国工人运动形势时，他首先肯定当时工会运动的先进地区是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在广东不仅出现了部门和行业的工

<sup>①</sup>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1页。

会组织，而且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出现了印刷工人采取强硬态度的罢工。上海工人组织的特点是基层工会组织数量多且又比较分散，这种小团体的分散存在，一方面有益于联系广大工人，普及工会组织，另一方面又不利于集中统一和共同行动，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年3月初，在武汉发生电话系统男接线员为排斥女接线员举行的罢工，当时一般舆论认为，这次罢工指出了它的另一方面，即这种情况不仅说明职业妇女的出现，而反映了工人运动的幼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李大钊却针对各地发生的这类罢工指出了它的另一方面，即这种情况不仅说明职业妇女的出现，而且有益于增强妇女的强烈职业观念，培养她们的团结精神，建立妇女职业团体，这又是促进工人运动不可缺少的。至于北方工人运动，由于工业不发达，还没有形成地方性工会系统，工人运动比较落后。然而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是个例外，京汉线、京绥线的工会组织发达，工人运动达到了相当水平，必将在推动全国工人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总之他表示相信，随着工业的逐步发展，职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他们知识程度的提高，必将觉悟到组织起来的必要，从而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必然的趋势。

#### 四、关于与孙中山、吴佩孚的会谈

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出席中共中央杭州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李大钊在杭州会议之后即到上海与孙中山举行多次会谈。当时孙中山受到陈炯明叛变的打击陷入困难和苦闷之中，会谈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提到“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但这些会谈具体谈了些什么，以前未见文字材料。近年发现的《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孙中山在会谈中阐述的有关中国时局和国民党改组的意见，为研究国共合作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关于时局，孙中山首先从北上问题谈起，认为“如若能恢复民国八年的国会，又能恢复当时的非常总统，我的北京之行也许必要；但目前已把民国六年的国会恢复了，我本人就连打破这‘六年国会’、恢复‘八年国会’的一点武力都不掌握，所以北京之行既已失去必须去的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了”<sup>①</sup>。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盘踞北京的直系军阀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召集部分旧国会议员，恢复了民国6年张勋复辟时被解散的国会并邀请孙中山北上，这样做一面为驱逐徐世昌，选举曹锟当总统铺平道路，同时也将孙中山在1919年为护法建立的广州非常国会置于非法地位，孙中山当时处于失败和困难中，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因此北上也就失去了必要和可能。关于统一中国的方法，孙中山坚持“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sup>②</sup>。他还主张通过扩大县自治，用中央和县的两级权力，抵制各地军阀的“联省自治”。

孙中山在主张加强兵力于中央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进而提出组织强有力的政党，为此要改组国民党，吸收更多的工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把国民党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孙中山最后表示，企望通过短暂的统一实现中国的永久和平是不现实的，只有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依靠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群众性的改革，才是振兴中国的唯一途程。

李大钊与孙中山会谈后即到洛阳与吴佩孚会谈。在文章中，他否认了吴佩孚将移驻郑州，直奉再开战端的谣传，说吴佩孚正在实践工兵政策，每日进行练兵和植树，并有邀请孙中山出任工兵会长之意。当时的吴佩孚正标榜“民主统一”、“保护劳工”、

①② 《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4页。

“兵工政策”，李大钊这时也在谋求反对督军割据前提下的孙吴合作，建立以直系为主的统一中央政权。为此他曾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向，在争取吴佩孚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过多次接触。包括1922年5月联合胡适、蔡元培等知名学者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也是争取吴佩孚的一种努力。1922年10月他又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到洛阳继续与吴佩孚会谈。<sup>①</sup>同时李大钊利用当时有利的政治环境，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和以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北方工人运动，为大革命时期北方群众革命高潮打下了基础。

吴佩孚的暴露有一个过程，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二七惨案的发生，彻底撕掉了吴佩孚的假面具，工人的鲜血使李大钊认清了吴佩孚的反动本质，此后他开始集中全力于联合孙中山，为推翻直系为代表的军阀统治而斗争。本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这一复杂的过程，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史料。

### 五、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形势及其战略策略

1924年，李大钊率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李大钊这次在苏联期间发表的言论，过去只有1924年9月，他从苏联寄回的两封信<sup>②</sup>。近年，苏联学者整理发表的李大钊在共产国际五大的报告和其他文章演说，为考察李大钊这次苏联之行和他关于中国形势和战略的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谈到中国当时形势，李大钊说：“中国已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用来表演的大舞台”，<sup>③</sup>军阀内战不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劳动人民陷入死亡边缘。军阀集团间的争夺，反映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争夺的影响，为此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动员人民起来

① 参见《白坚武日记》。

② 即《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苏联民众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发表于《中国工人》第4期的《上海的童工问题》。

③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在这个斗争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发动一个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sup>①</sup>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的国共合作，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国共合作改变了国民党过去只“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的致命缺点，唤起民众的革命精神，使它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向大众解释清楚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团结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国民党左派力量，增强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竭尽全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进行的反帝反军阀革命战争。

在苏联的各次谈话，李大钊还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国际性质，借共产国际大会和在苏联的条件，广泛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理解，以取得苏联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援助。

这里应特别提到的，是最近发现的李大钊《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5年2月14日），是一份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件。这封信要求共产国际赠送“所有出版物”以及出版机构“准备出版的新出版物”给中国共产党。同时，要求与其他共产党交换出版物。李大钊准备建立起一个党的新型图书馆，“以馆藏与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直接关系的图书、小册子、杂志和报刊等。”1924年11月，李大钊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中国北方党组织的繁重领导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政治教育，李大钊早在四大前就开始筹办党校。党的四大召开后，为了贯彻中共四大加强群众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和宣传教育工作以适应大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的精神，他加快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他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报告说“共产党北方支部执行委员会，为了对党员进行更全面和系统的教育，任命了一个党的教育委员会”，并决定建立

<sup>①</sup> 《党史研究资料》1985年第6期。

图书馆，馆藏与共产国际有关的读物。随后，又办起了党校。

李大钊指导北方中共党组织的工作，加强了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认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结合中国的斗争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妇女出版社）

# 1924年李大钊逗留苏联期间 若干史实摭述

李 玲

李大钊1924年6月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李大钊则留在苏联进行参观、访问和考察，并通过各种机会发表讲话和文章，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呼号。这些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与此同时，李大钊在逗留苏联期间，还指导了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亲自参加了它们的活动，并决定了一些重大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至今鲜为人知，这里仅就我在查阅档案时，发现的一些材料，做点介绍和考订。

## 一、李大钊从苏联回国的日期

关于李大钊从苏联回国的具体日期，从一些文章和专著中，我们看到有两种说法：

1. 11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回到了祖国；
2.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约在本月（11月）末回到北京。

通过查档，我发现上述说法不确，实际上李大钊回国的时间应为12月。根据是旅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团书记刘伯坚所写的1924年《10至12月份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中提到：“旅莫C.P.支部和本地方团观察国内政变的形势认为，这是我们发展的良好机会，因此C.P.留莫斯科代表李守常同志暨旅莫C.P.



支部及本地方团会商决派人回国作工，故先派子贞（即袁子贞——笔者注）同守常同志即行回国，他俩已于12月3号启程了。”（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这个报告是1924年12月11日写的，属当时形成并保存下来的档案文献，是可信赖的。既然12月3口才启程回国，根据当时的交通条件，最早也要到12月中旬才能回到北京。此外，刘伯坚报告还说到，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是在7月30日与第三批回国人员一同回国的。此点，对我们弄清这段史实也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 二、李大钊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决定派人回国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各项工作都急需干部。据档案记载，中共中央曾就此问题写信给中共旅莫支部要求派同志回国工作，旅莫支部进行过讨论。后经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决定，派25人分三批回国。回国人员名单如下：

### 第一批（6月25日起程）

- |        |         |
|--------|---------|
| 1. 萧子璋 | 6. 任 岳  |
| 2. 华 林 | 7. 胡世廉  |
| 3. 尹 宽 | 8. 谢文景  |
| 4. 红 鸿 | 9. 萧劲光  |
| 5. 蒋光赤 | 10. 许之桢 |

### 第二批（7月23日起程）

- |        |         |
|--------|---------|
| 1. 郑超麟 | 7. 李仲武  |
| 2. 林可亦 | 8. 任弼时  |
| 3. 薛世伦 | 9. 任 理  |
| 4. 汪泽楷 | 10. 于履中 |
| 5. 陈延年 | 11. 傅大庆 |
| 6. 周兆秋 |         |

### 第三批（7月30日起程）

- |        |        |
|--------|--------|
| 1. 赵世炎 | 3. 彭述之 |
| 2. 彭泽湘 | 4. 蔡支华 |

以上回国25人中，除任理和蔡支华系因病自请回国外，其余同志皆由中共代表团指派。此次回国人员，以成份论，皆系学生出身，以性别论，百分之百是男子。前两批是自己回国的，后一

批是与中共代表团的代表（李大钊除外）一同回国的。

### 三、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做《中国最近的政变》报告

1924年9月12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做了《中国最近之政变》的报告。该报告没有找到原件，这次发现的是中共旅莫支部大会的记录稿。主持这次支部大会的主席是袁子贞，记录是李季达。旅莫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也参加了这次党支部大会。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剖析了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军阀间的相互勾结，军阀之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二）逐个分析了诸军阀的历史和势力情况；（三）提出了这个时期的党的任务。报告的记录稿全文如下：

#### 中国最近的政变<sup>①</sup>

（1924年9月12日）

中国各个军阀后面都紧紧的依靠着帝国主义，而且不仅仅是只有一个简单的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者方面，他只是根据他的利益作他与中国的军阀勾结标准。吴佩孚所依靠的是美国，同时英日也是与他有关系的，不过以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主要的就是。譬如在去年吴佩孚打四川时，曾托日轮运军火入川，最近又有向日借款的消息。这些勾当，明明的表示他是以美国为主要靠山，而同时又与日本英国有关系的。美国是在欧战后新起的在中国强有力的帝国主义者，自然与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范围是冲突的。日本助段祺瑞，被美国帮助的吴佩孚打败了，日本就掉方法去助奉张，促成直奉战争去扑灭美国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结果美国的吴佩孚又胜了。在去年，日本又经过地震的灾乱，于是在中国的侵略政策就形

<sup>①</sup> 本文根据档案材料整理，与《李大钊文集》（续）所收同篇文章，略有不同。

成和缓的保守的态度了，美国就成了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当中的主要份人。（原文如此——笔者）英法意比等都正在争先恐后的竞争时代。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大略情形。

中国的军阀比较大一点的，是直系的北洋派，东三省的张作霖。直系现在可以说是全胜时代，在他之下又分几派，名义上是曹錕为首领，其实就是吴佩孚在左右一切。萧耀南、张福来等都是与吴秀才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现在来分析分析他们各个的历史。

吴佩孚——他是曹部下的一个小军官，他自来都是反国民党的。第一次在四川打革命军蔡松坡，他攻下衡州不接受段祺瑞的命令（进攻），并在酒后的话表明他反抗段的命令的用意，过后段果然不满意他反抗命令，于是吴佩孚就利用民众对段“卖国贼”的口号去打段，结果打胜了。直奉战争又取得胜利，接着打川攻湘，一直到现在他公然形成直系中的主要力量了。

冯玉祥——基督教徒，张绍曾部下的军官。辛亥革命时，吴禄贞、张绍曾都在北方有起革命的动机。因武昌较先爆发，他们就没有作革命的先导线。此时袁世凯出世了，袁看清张吴等在滦州天津等，与他不利，于是把吴暗杀了，把张赶走了（因张吴是国民党）。这时冯玉祥也还是在奔走于张绍曾部下。当直奉战争时，冯有功于吴，所以他得着河南督军的位子。因他不忠心替吴佩孚抓钱，于是河南的地盘又被张福来占去了，把他赶到北京虚悬起（陆军监查使与西北边防督办的虚衔），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同时王怀庆又忌妒他。在这时候，王正廷替他在黎元洪那里讨着一个西北边防督办。王怀庆就跑到保定报告，说冯玉祥要反了，已经投降黎元洪了，于是曹吴就有不满意于冯的表现，而冯又自告奋勇去赶黎出京……冯玉祥是半途投降直系的，他没有地盘，只想侵略蒙古，一边从内蒙（察哈尔之特别区）攻王怀庆，一边又

好躲开将来的直奉战争的责任，而那一面吴秀才早已知道他的心病，始终不许他得地盘，把他放在北京虚悬起以备先锋之用。

王怀庆——他很忠孝于曹吴，他是个保皇党，他在滦州杀过吴禄贞部下的革命党，他打蒙古失败后，已经是湮没下去了的。过后徐世昌登台时，因气味相投，又把这个保皇党找出来，作北京卫戍司令，把徐世昌赶走时，他就投降了直系（将来直系打奉张大致分两路进攻，以王怀庆、王承斌两人走热河去，冯玉祥走山海关去）。

王承斌——他是个满人，本名承斌，后来才加上一个王字。他是奉天人，也是个秀才，不及吴的手段高，所以还在吴秀才之下找饭吃。吴佩孚令他打过奉天，使他与奉天人的感情完全破裂，而给他一个空虚的直督。

齐燮元——也是段的学生，李纯当江苏督军时他任师长。李纯是反对段的。后李死，吴佩孚说是齐主谋刺主。因此，吴齐不睦。齐曾想谋副座，于是吴防齐用诡计予卢，结果齐不得势仍守江苏。何丰林是卢的部下，何驻上海听浙卢的命令，而使上海实际属于浙江了。

卢永祥——段系，与齐不和。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都是因他是齐部人，与卢何不方便的原故。齐卢之战早就要爆发的，江浙此次决裂，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吴佩孚把川湘弄好了，转过头来注目浙江，最后才去对付奉天，再最后就去打广东。奉张见江浙起事，而马上出兵，也是意中事，暗中奉浙或许一定有联络，云贵也要注意江浙的势力。所以江浙战争，不是一回简单事，而是牵连全国的，牵动帝国主义者美日的。

国民党——三角联盟的关系（孙张段）恐怕还是有一点，这次中山不免要出兵于江西福建去牵制牵制。

总括起来说，这次战争的时间一定是较长的，且结果军

阔还要分化，帝国主义者更要伸张他们的势力。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也必更烈。总之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我们的责任是要拿出很正确的口号，到民众中去宣传。

此外，广东的局面，商团的首领，英国的走狗，汇丰银行的买办，他私运军火想来推倒国民党在广东的势力，已被国民党发觉了，中山将要使工人武装起来，此时还正在分化之中。

#### 四、李大钊曾任审察委员会委员

1924年10月25日，旅莫党团两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出席者为两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成员。这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之一是：“审定编辑委员会的计划”。会议议决编辑委员会委员有：陈乔年、刘伯坚、庆云、王陵汉和李求实。他们的任务是：整理学校的功课，党的报告，翻译，向国民党的机关报投稿。此外，这次会议还议决设立一个审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审察编辑委员会的一切工作。审察委员会的委员有李大钊、罗觉、王若飞和启修。

#### 五、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做《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

1924年10月30日，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支部大会上做了《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的报告。这次大会的主持人是袁子贞，记录是杨介臣。旅莫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参加了大会。

旅莫党团支部，为对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进行实际问题教育，尤其是进行中国问题教育，学校添授了中国问题课，由李大钊主讲。李大钊这一报告，我认为就是东大新开的中国问题课程中的一课。

李大钊在《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报告中主要讲了三个

问题：（一）江浙战争的历史背景；（二）党的任务；（三）在莫斯科训练的意义。报告的记录稿全文如下：

### 中国的事变和本团的训练<sup>①</sup>

（1924年10月30日）

同志们！中国最近发生的政变，就是中国大乱的开始！这次变乱，就是大的军阀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我们要考察他的历史，直系的祖宗是北洋派，就是这派十几年来统治中国。北洋派内分直系皖系，但自直系得到政权以后，天天有战争，如西南的反抗，渐由西南到长江流域。北洋派内的争斗，打仗，日日压迫人民。这种战争的影响，对于经济上，财政上，都起了极大的恐慌，如北京财政非借不能度日，而人民被军阀的压迫和剥削，都贫而变成土匪，兵。尤其贫苦的，就是工人和农民。知识阶级也不能安生求学，因为各种学校，都因缺经费而停闭了。除了内政以外，还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初到中国的时候，首先由广东广西进来，因而两广人民感到生活的贫困，于是就有洪秀全之流借基督教之名，煽动失业的农民起来反抗满清。但不数年就扑灭了。

然而，帝国主义由此乃发展由南方而至北方。于是鸦片战后，又有英法联军，甲午之战。中国的门户洞开，墙垣尽拆。而中国的贫弱乃大示于天下。然中国的官僚不知此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使然，而以为科学老旧，乃改科举为学校，又以为外国的强，乃其火器的厉害，于是改骑射为洋操。这就是中国改良的起源。而下层的人民更贫困了，农民的失业，教士的蛮横，于是这些贫困而受压迫的农民，乃起唱“扶清灭洋”的口号，起了极大的暴动，可是不久就扑灭了！自此以后，中国的地位乃更危险，外人日日唱瓜分共管之调，人民日日有生活的困苦，于是先觉的知识的资产阶级乃起唱民主

<sup>①</sup> 本文根据档案材料整理，与《李大钊文集》（续）所收同篇文章，略有不同。

革命，至辛亥而爆发了。可是这次革命又受帝国主义的阻障，于是中国的革命至今不能成功，而成这样的乱七八糟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内乱。这次江浙战争，又是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弄成内乱的一幕。这个时候，负有这时革命的责任的就是我们。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志，应时时预备回国的决心。

但此时，负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就是国民党，然而国民党中又因分子的复杂，又有帝国主义的走狗商团，他们不但不做革命，反而要做反革命——破坏革命的事业。这样看来，国民革命的真正分子，除了中山外，只有一二人，其余只有我们了。然而我们的党，又很幼稚，人数又很少，如何能负这种重大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得不择其最要的工作和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工作重心地大约有四：1.广东，2.上海，3.汉口，4.京津。

在广东方面，有一点活动的自由，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广东。在此，应注意工人和农民，尤要注意军队。所以我们注意军官学校中活动。

上海是中国工业的集中地，我们同志也多，那里不必多说。

汉口，也是工人集中地，兵工厂都在那里，但因直系压迫之下，所以我们没有大活动。

北京人口有40万，但工厂很少，所以工人只有非生产的洋车夫，大粪夫，印刷工人而已。但北京同志太少活动，所以虽少的工人也没有吸收，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之下，也不容易做工。天津也是工业区，但我们去工厂中运动，就遭“曹家”的压迫，所以也没有成绩。

但我们过去的工作，大半在表面上，结果只是空虚而没有基础。我们并不是不做表面的工作，不过这种工作，只要我们的党中央发出一种口号，指定少数人去做就够了。我们以后要做的，特别是基础上的工作，主要的：1.铁路工人，2.矿

山，3.海员，4.纺织。这些无论在政治上，财政上，均有很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此地的训练的意义：

1. 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团体。我们的团体是全被压迫的民族的先驱，我们的革命是为全人类的，所以我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因此，我们来此，是学习革命的，并不是留洋留学求博士的。我们的责任这样的重大，所以我们应以团体就是自己，自己就是团体。

2. 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党和党纲。我们的同志，在党中做过多年工作的，然而有许多不明白我们的党和党纲，这是很危险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党纲是科学的，很自然的，很合乎人道的，因此我们的党是光明正大的。

## 六、李大钊参与拟定了向第三国际东方部中国问题研究会提出的问题

1924年11月19日，旅莫党部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将派同志参加第三国际东方部所组织之中国问题研究会。11月24日，旅莫党部执行委员会再次召开全体会议，为11月26日参加中国问题研究会讨论中国问题准备材料。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他亲自指导下拟定了关于向第三国际东方部中国问题研究会提出的问题：

1. 第三国际对中国目前的政治主张；
2. 第三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关系的主张如何？
3. 目前中国共产党之政治行动应当如何？
4. 中山来沪后所应采取之政策如何？
  - (1) 是否应弃广东；
  - (2) 是否对于中华国民军取联络态度。

以上主要介绍了李大钊逗留苏联期间在党内活动的一些情



况。在整理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深深地感到，目前我们对于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研究还很薄弱，档案文献的发掘尤其不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举出以下几点：（1）刘伯坚在其对莫地同志的训练计划报告中曾经提到“学校添授中国的功课，由守常同志主讲”，既然是新增加的一门课程，不可能只讲一次；（2）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回忆在东方大学学习时也提到“我还听过几次李大钊同志讲授历史课”，他还提到李大钊同志“对东大培养的这批中国学生很重视，亲自找我们谈话，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中苏关系史和国内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3）李大钊逗留苏联的日期是“1924年6月至12月3日”，可是，这次我所查到的档案仅是9月12至11月24日期间的；（4）根据王若飞同志的工作报告，仅在1924年6月至8月，中共代表团就做过三次报告，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次报告。

我相信，随着中国和共产国际档案的逐步开放，有关李大钊的档案资料会得到进一步深入发掘。这也是我们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 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

李 玉 贞

1986年笔者访问荷兰时，见到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李大钊等五人致孙中山的信。该信藏于荷兰皇家科学院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斯内夫利特档案中，原文为德文。荷兰拟将这部分档案及其英译本编辑出版，现参照英译本编者安·塞奇教授的英文手稿，将该信全文翻译如下：

### 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 谭平山和毛泽东同志致孙中山的信

(1923年6月25日)

北方的政治危机正处于最后阶段，很快即可见端倪。公众舆论表示出日渐增长的积极性，这给我党的发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时机，我们万不可坐失，我们以国民党身份要求您裁决下列两个问题：1. 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为此，应特别注意北京、湖北、湖南、上海和广州等地。如果这些中心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整个工作就会肤浅分散。2. 最近的北京危机不是这几天来事态发展的结果。早在黎元洪在北京出任总统前，曹锟就觊觎政权。安福系（段祺瑞）不能与直系和解。吴佩孚、冯玉祥与曹锟的关系和黎元洪、张作霖与段的关系实质相同。甚至即使派系内发生什么变化，其斗争也仍将在北洋军阀头目曹锟和段祺瑞之间进行。这场斗争与民

国的改进并无关系。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10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起初，我们的力量不会强大，但我们会发展成一支劲旅。列强每天都在处心积虑剥削我们，并寻找一个强有力的人作他们的代理者。用空话央求他们的承认来壮大我们自己，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运动，而且会丧失革命气节。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议会在全国人民眼中一钱不值。北庭议会是曹吴豢养的。如果我们试图让国会议员来穗，那么人民怎么能把我们看得比吴和曹锟好呢？

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入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即令我们用一切办法把这些将领们联合起来，那么南北方之间的斗争依然存在，而绝不会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争。我们岂能让千百士兵为此丧生并把沉重的负担加于百姓身上？这样也还会有危险，即因为我们在这一隅的地方主义而把国民革命的速度减缓下来。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

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您是4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我们深知中国尽快获得解放和我党获得发展的必要性，特致函先生，望能采纳我们的建议。盼复。

(译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80号)

这封信写于1923年6月25日，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准备时期。当时，孙中山虽然看到了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重要意义，为实现国共合作做了积极的准备，但是，却还没有完全放弃在军阀间的樽俎上做工夫。1923年6月北京发生政变，直系军阀曹錕伺机而动，准备拉拢和收买国会议员选举他当总统。孙中山一方面于6月15日发出《致护法国会议员函》，希望在北京的参加过护法的国会议员进行抵制；一方面频繁派人赴奉天，与张作霖商洽联合反直。同时，孙中山也寄希望于以军事力量尽快平定广东，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行动上，6月1日他亲临前线督师，把改组国民党、开展国民革命运动这一根本大计放在一边，这对于实现国共合作，开创国民革命的新局面是不利的。

为了加速国民党改组，动员人民力量，尽快形成国民革命统一战线，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国民运动和国共合作。大会闭幕后4天，即6月24日，李大钊和其他4位中央委员一起开会，讨论北京政情。决定“1. 发表一个对于时局的主张”。这就是7月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2. 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联合致函孙中山，要求他在华南停止军事行动，到上海去，组织工商学的国民会议，把现有的各〔农民〕联合会组织成为农村自治政府；3. 尽快在上海召集一次劳动大会；4. 指示各地方支部组织学、工、商参加的游行以支持国民会议的要求”。<sup>①</sup>

6月25日，中共三大新选出的中央委员拟出致孙中山的信。

<sup>①</sup>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264-26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年版。

马林也于同日把这封信译成德文，寄往莫斯科，并在信上附言道：“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五名委员，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今天就中国政治危机事致孙中山信的德译文寄给你们。李大钊和陈独秀同志仍在设法同孙中山谈一次话尽快做出一个决定。关于这一点，我也经常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人谈过。如果这些左派和孙中山一起都不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因为他们至今还不相信能够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群众性的政党），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同志在别的城市就要着手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去实施党的新策略”。

从这封信和马林的附言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在国共合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 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张静如 侯且岸

1984年以来，在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的拓宽，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和论文，填补了一些研究空白。这标志着李大钊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本文拟对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一评述。

## 一、研究工作的进展

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 1. 重视李大钊早期思想和活动的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李大钊早期思想和活动的研究一直是李大钊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几年，史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对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使之逐渐成为李大钊研究的一个“热点”，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据不完全统计，自1984年至1988年，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已有13篇，内容涉及李大钊早期思想和活动的诸多方面。1989年7月，为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成甲的专著《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

朱成甲著作的一个鲜明特色就在于：注重把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和活动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尊重历史，不回避象李大钊这样的先进人物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关

李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李大钊的民彝思想及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李大钊的调和思想及其对伪调和与伪国家主义的批判等问题，朱成甲在其著作中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当中，对于李大钊如何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李大钊是从资产阶级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还有的看法是：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就是一个成熟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此，刘桂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发表的《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政论试析》中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李大钊还不是一个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只是一个满怀爱国热忱的有志青年。他有着一般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一心一意希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以便‘一力进于建设’”。为此，作者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把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言论与同盟会激进、温和两派的言论加以比较，证实自己的结论。作者还专门分析了传统看法形成的原因。他指出，传统的看法之所以存在问题，主要是由于很多研究者对于李大钊的早期文章中的用词理解有误。“这样就牵一发动全身，把整个李大钊早期思想的性质弄错了”。

由于李大钊早年曾经主办、编辑了很多刊物，以刊物为阵地发表政见，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一些研究者注意考察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和活动与《言治》、《甲寅日刊》等刊物的关系。韩一德在《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发表的《〈言治〉时期李大钊思想管窥》、吴家林在《齐鲁学刊》1984年第5期发表了《从〈甲寅日刊〉看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分别对李大钊在法政专门学堂和北京时期，在《言治》杂志和《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言论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探讨了这两个时期李大钊思想的特点。

对李大钊早期思想和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李大钊研究乃至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具有不容忽视

的学术价值。对此，李新和刘桂生在为《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所作的序中论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李大钊既不同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也不同于孙中山，他是一场新的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首先发难带头举旗的人。但是李大钊的思想历程又不同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其他一些人。在中国共产主义者中，也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曾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那么多的、那么经久不懈的探讨和追求，并且对封建专制主义那么深恶痛绝，在理论上进行最彻底无情的有力批判。另一方面，在中国也还没有第二个曾经信奉过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人，象李大钊那样率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率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因此，“在他一个人的经历上，我们既可以通过对他的研究，看到20世纪初期的改良主义，又可以研究与之相互制约进而代之而起的革命民主主义，更可以研究究竟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转化的环节和途径，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又毅然地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当然，对上述一些看法也还有不同意见，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2. 加强对李大钊在北方地区革命活动的研究。

李大钊在北方地区长期从事的实际革命活动，是其整个革命生涯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一部分内容，不仅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李大钊的革命业绩的认识，也会使我们对整个北方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然而，多年来，主要是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资料，研究者论及这个问题，往往显得比较空泛，不够具体，亦不够深入。1984年以来，随着李大钊遗文的发现和一些历史见证人提供的历史资料的增多，党史界在加强资料整理工作的同时，探讨了有关的几个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比较一致的看法。

首先，关于李大钊与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近年来研究者非常关心并且产生浓厚兴趣的问题。自1984年



以来，已有一部专著和多篇论文问世。它们着重分析了李大钊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认识、改造过程，探讨了争取冯玉祥国民军在北伐战争中的战略意义，评价了对冯玉祥及其国民军进行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还需要提及的是国民军与“三·一八”运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一种看法是：国民军参与了对群众的屠杀，国民军将领李鸣钟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另一种观点是：国民军对惨案的发生没有责任。对此，李善雨在《河北学刊》1986年第2期撰文《“三·一八”运动与国民军》提出质疑，他依据当时邵飘萍的文章和李泰芬的《国民军革命史》以及普里马科夫的《冯玉祥与国民军》提供的史料，认为“断定李鸣钟和国民军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之一，尚缺乏历史根据”。李葆华关于国民军部队担任段祺瑞执政府卫队的记忆“可能有误”。李善雨还指出，国民军发动倒段政变，“自觉策应北伐战争，参加国民革命，三·一八运动也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其次，关于李大钊在北方各地的建党及革命活动问题。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为党的创立作了大量的工作。建党以后，他又在北方各地从事重要的革命活动。近几年，研究者集中研究了他在河南、河北等地的活动，从而丰富了我们李大钊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认识。

《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发表了张绛的文章《李大钊与河南党组织的创建》。这篇文章对李大钊与马列主义在河南的传播、早期工人运动的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河南党组织的创建等几个问题都作了阐述。作者指出：1921年春，李大钊亲自到郑州铁路工人夜校讲课，宣传马列主义。同年11月，他还派人组织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揭开了河南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并且分析斗争形势，派罗章龙迅速奔赴河南，指导工人运动。1922年秋，李大钊又帮助创建了开封地区的第一个工人党支部。1925年1月，中央决定建立豫陕区委，负责领导河南、陕西党的工

作，在筹建过程中，李大钊和经他派到河南工作的共产党员付出了巨大心血。李大钊多次到开封、郑州亲临指导。在他们的努力下，豫陕区委于1925年10月成立，党的活动迅速开展。在北方地区，河南党的活动首屈一指，就全国而言，河南党的领导力量、党员的数量也占第4位。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作者还在文章中谈到李大钊三赴洛阳与吴佩孚进行会谈的时间问题，纠正了一些文章根据回忆所形成的“不尽一致”的说法。作者依据1922年10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的文章《吴佩孚拉拢教育界》、《白坚武日记》，以及李大钊于1922年9月17日在日文版《北京周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统一的方策和孙吴两氏的意见》，经过考证，认定李大钊三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的时间分别为1922年7月、1922年9月8日、1922年10月上旬。

河北是李大钊的故乡，这里也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近几年，唐山等地的党史工作者以李大钊在冀东地区的活动为重点，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出版了《李大钊在河北》，发表了多篇论文。

李大钊除了具体指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还对南方一些省份的革命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方面问题过去研究不多。王世儒在提交给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李大钊与江西初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中，介绍了李大钊通过北京大学学生袁玉冰等人对江西革命运动兴起的影响。

### 3. 拓宽研究领域，全面研究李大钊的思想。

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学术成就却极其辉煌。他对哲学、历史、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律等众多领域均有所涉猎，诸多创见，起到了马克思主义拓荒者的作用。因此，全面地整理和总结李大钊的思想文化遗产，是李大钊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以往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学术界对于李大钊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的研究比较集中。相对来看，对他的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社会伦理思想、法律思想、史学思想等几乎没有什么研究。1984年以来，随着研究视野的展开、研究领域的拓宽，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初步弥补了上述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大约有20篇，其中涉及史学思想的最多，有8篇。今年，为了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北京大学和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分别编辑出版了两校近年来关于李大钊研究的论文集。这两本论文集所收的文章涉及到李大钊的法律思想、教育思想和新闻思想。

#### 4. 努力挖掘、整理李大钊的遗文，进一步扎实地做好研究的基础工作。

不言而喻，努力做好李大钊遗文的挖掘、整理工作，是推动李大钊研究深入的关键一环。应该说，学术界始终重视这项工作。建国以后，经过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曾先后出版了丁守和编《李大钊选集》，张静如、马模贞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韩一德、杨树升等撰写的《李大钊年谱》。1984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上下两卷本、110余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文集”的问世，有力地促进了李大钊研究的深入。近几年，韩一德、吴家林、李玲、吴美华等同志又相继发现了一批李大钊的遗文，共有文章、书信等近20篇，多数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近代史研究》、《河北学刊》、《武汉大学学报》、《党史研究资料》、《北京党史研究》、《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等刊物上公开发表。这些文章、书信等史料已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成《李大钊文集（续集）》，于1989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由姚维斗、杨芹编辑的《李大钊遗文补编》。另外，由北京李大钊研究会、北京大学图书馆合编的80余万字的大型资料集《李大钊史事综录》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预料，这几本资料书的出版，将为李大钊研究奠定更坚实的史料基础。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谈一下新发现的李大钊遗文的史料价值

问题。

新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一些尚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和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佐证。比如，1921年1月27日《新支那》发表了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行方法的考察》（原文系日文，由韩一德发现并翻译）。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绝非易事；社会主义是奋斗的目标，而解决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则是困难而又麻烦的事情。他指出：“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从这篇文章说明，李大钊已经开始注意到要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探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李大钊在早期社会主义论战中的作用，全面研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1922年9月17日《北京周报》发表了李大钊的《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原文系日文，由韩一德发现并翻译）。这篇文章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孙中山在与李大钊会谈中阐述的有关中国时局和国民党改组的意见，从而为李大钊研究和国共合作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此外，这篇文章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认识过程。“二·七惨案”发生前，吴佩孚曾一度标榜“民主统一”、“保护劳工”、“劳工神圣”。李大钊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向，作争取吴佩孚的工作，包括1922年5月联合胡适、蔡元培等知名学者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的宣言。在吴佩孚的反动面目暴露以后，李大钊认清了其反动本质，集中全力联合孙中山，为推翻直系军阀的统治而斗争。再如李大钊发表的演讲《理想家庭》，载于1921年12月19日北京《益世报》副刊《女子周刊》第53号第1版（吴美华发现）。在这篇讲演中，李大钊提出，“家庭与人生甚有密切关系”，“不可不切研究理想之家庭”，以“去其阻碍”，改造旧式家庭。为此，他列举了理想家庭的五项条件。他认为：“理想家庭

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之精神。”“对于孩提，亦不应加以压制，循循善诱。”他积极提倡改变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九世同堂之风尚”。实行“小家庭之制度”，“子女已婚嫁者，亦宜别居”，避免使“不应接近者，而强聚于一堂，其苦痛有难言之隐”。他主张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之间要建立真正的爱情。要注意“家事之研究”，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崇尚科学，家庭中要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对于研究李大钊的社会思想、民主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

#### 5. 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李大钊研究不仅得到国内史学界、理论界的重视，也引起国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其中苏联、日本、美国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并且取得较大的学术成果。因此，李大钊研究已经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一项国际性的学术课题。1984年以来，虽然我国学者与日本、美国学者，在李大钊研究方面进行过交流，但仍局限在极小的范围之内。1989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和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我国的一些刊物陆续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近年来日本等国学者对李大钊研究的状况和主要观点。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丁晓强、单冠初、姜庆明翻译的日本学者近藤邦康的专著《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该书共三章，其中有一章详细探讨了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北京市委党校谢荫明、侯且岸、姚桓翻译的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的专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我们可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译著的发表，无疑会帮助我国学者了解国外李大钊研究的状况及动态，有力地促进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开展，推动李大钊研究国际交流局面的早日形成。

## 二、研究工作中急待改进的若干问题

总的来说，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并不是说就不存在问题，在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指出，当时李大钊研究的成就，低于它所能够达到的水平。今天看来，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很好地解决，尽管学术界同仁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那么，究竟是哪些问题阻碍着李大钊研究深入开展，达到它应有的学术水平呢？这个问题需要广泛讨论，深入研究，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出若干急待解决的问题，与大家共同讨论。

### 1. 关于李大钊研究的科学性问题。

应当承认，从整体着眼，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纳入科学的轨道，感情色彩比较浓。这样，就使得研究工作难以深入。我们所接触到的不少文章甚至专著非常空泛，往往是满足于大的结论，重复一些已经定型的观点，毫无新意，更谈不上学术深度。还有的专著文章水份极大，歪曲历史事实，任意夸大、拔高李大钊的思想和活动。而这些专著或文章又常常被一些不大重视核对史料真实性的研究者所引用，以讹传讹，乃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的恶劣影响一时很难根除。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几年李大钊研究的领域有所拓展，面确实宽了，但我们还没有看到真正具有深入、细致分析的文章。更何况，有些文章单纯为了追求新意，只是根据李大钊的某篇文章或一两段话就立论，大加引申，说李大钊具有什么思想，以至于使人无法辩认是李大钊的思想，还是作者本人的思想。李大钊研究的科学性问题不解决，李大钊研究的深入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 2. 关于李大钊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这里所说的基础性工作是指史料的整理、编订工作。不可否认，李大钊研究有一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即研究在先，而整理史料在后。这种弱点，在我们充分意识到以后，已经做了大量有成

效的工作进行弥补。但是，要真正克服这个弱点，恐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们还必须花费更大的努力，加强史料的搜集、整理、校订工作。目前，对李大钊遗文的挖掘、整理工作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至今未开展对李大钊文章的注释工作，百余万字的《李大钊文集》没有注释，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很大的憾事。由于没有必要的注释，妨碍研究者深入领会李大钊文章的背景和真实涵义，尤其是对于许多初入李大钊研究领域的同志更是一个困难。因此，尽快组织力量编写出比较详尽和准确的文集和文集续集注释本，已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 3. 关于李大钊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白。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李大钊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历史人物。这种特殊具体表现为他的社会联系相当广泛、社会关系异常复杂；他同近现代史上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有过交往，创办过多种刊物，组织过多种社团。然而，我们对李大钊与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社团、刊物、思潮之间的关系的专题性研究显得十分薄弱，有质量的论文少得可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李大钊研究尚待填补的一项空白。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共识，即应把李大钊放在近现代社会的大背景当中进行研究。如果真正这样作的话，那么，填补这项空白就更为迫切和必要了。

### 4. 关于李大钊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问题。

如前所述，近几年，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翻译外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和有关的纪念活动。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工作仅仅是刚刚起步。今后，我们需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有计划、有目的地翻译国外的学术著作，并多创造中外学者共同交流的机会。同时，加强对译著进行评介、评论工作，既指出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优点和值得借鉴之处，又指出他们的不足。这样做，对双方都将是有益的。

## 5. 关于李大钊的研究与宣传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对李大钊的宣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的宣传基本上还停留在较低的层面上，大体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应该说，这种落后状态与我们的研究跟不上有很大的关系。学术研究和宣传虽有区别，但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学术研究的水平提高了，宣传上给人们以有价值的、有启发的东西就会更多。当前，我们正在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我们也应该考虑怎样把关于李大钊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宣传上很好地体现出来。

## 6. 关于加强李大钊研究的学术队伍建设问题。

目前，从国内学术界的基本状况来看，在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学术队伍构成方面，实有青黄不接的征兆。我们接触到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大多出自中老年同志的手笔，年轻同志的有一定份量的文章不多。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加强对年轻同志的帮助和引导工作，以使他们尽快地在学术上成熟起来。

总之，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有待认真地解决。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正视存在的问题，并且花大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扎扎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就一定能够把李大钊研究真正引向深入，进一步开创李大钊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 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概述

1989年10月29日，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诞生100周年。经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北京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北京大学、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等7个单位，于1989年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学者百余人。苏联、日本、蒙古、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6名学者也应邀出席了讨论会。

会议召开前，全体中国代表和工作人员于10月28日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李大钊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并受到了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彭真、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

10月29日上午，学术讨论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内老同志、中央、北京市和河北省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京的党史、革命史专家学者、报刊、新闻单位的有关同志及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近300人出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致开幕词。中顾委常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作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的学术报告。

这次学术讨论会主题是：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展开热烈的讨论。有20位中外学者在全体会议上介绍了他们提交会议的论文提要。在分组讨论中，代表们对李大钊的生平业绩和思想理论贡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涉及的主要问题有：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的情况以及留日对他的影

响；李大钊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因和时间；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及其理论贡献；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法律思想、史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和宗教观、婚姻家庭观等等。

会议期间，筹委会学术工作组还邀请到会的外国学者与10余名中国李大钊研究者就开展李大钊研究的学术交流等问题举行了座谈。与会全体代表曾前往李大钊烈士陵园，向李大钊烈士雕像敬献花篮，表达了对他的深切怀念与敬仰。烈士陵园负责人向代表们介绍了有关李大钊牺牲后的安葬情况。

11月1日下午，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大学闭幕。

这次学术讨论会采取向学术界广泛征文的办法。会议筹备委员会于1988年10月发出《征文启示》，提出了17个方面的征文参考题目，其中包括：李大钊的早期思想；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李大钊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李大钊与五四运动；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李大钊与北方革命运动；李大钊与国民军；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李大钊的学术思想；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李大钊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的比较研究；李大钊与青年；李大钊的革命精神、学风和品德等。到征文截止时，共收到应征与特约论文近200篇，入选论文69篇。一些单位还向会议赠送了新近出版的研究李大钊的论著、译著和工具书共14种。与会学者认为，这次会议全面检阅和交流了近几年来李大钊研究的学术成果，对李大钊学术研究的提高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薛 惠）

## 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入选论文目录\*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更高地举起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                           | 朱乔森        |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奠基人——李大钊                           | 丁守和<br>李义彬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 正确理解和评价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                      | 朱成甲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 |
| “自信独守的坚操,容人并存的雅量”——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学说的科学态度浅议 | 杜恭民        |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
| 李大钊与现代化意识                                   | 张静如        |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
| 论李大钊的自由观                                    | 高力克        |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
| 摒弃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先驱                              | 王秀鑫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 李大钊爱国主义思想特质探析                               | 王沛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 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索                           | 朱慈华<br>谷琳生 | 解放军郑州高炮学院政教室  |

\* 目录编排大体按文章内容归类,排名不分先后。

续表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卓越贡献          | 王林涛 | 中国计量学院社科部     |
| 试论李大钊对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贡献            | 谷幼农 | 中共兴化市委党校      |
| 李大钊关于中国工人阶级历史地位认识的发展        | 张秋生 | 北京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  |
| 李大钊关于中国土地与农民问题的卓越见解         | 王德京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 李大钊对我党早期农民问题理论的贡献           | 宋 越 | 解放军郑州测绘学院政教室  |
| 谈谈李大钊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的思想          | 周忠瑜 | 青海民族学院马列教研室   |
|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史上一面旗帜——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初探 | 蒋为一 |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政教室   |
| 李大钊是中国青年的良师益友               | 马横贞 | 北京医科大学马列教研室   |
| 李大钊与青年运动                    | 吴汉全 | 江苏盐城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 |
| 李大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彭 明 |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
| 李大钊留学日本和留日对他的影响             | 杨树升 | 北京大学历史系       |

续表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留学日本对李大钊一生的作用和影响         | 董宝瑞        | 河北省昌黎县文联        |
| 试论李大钊对“大亚细亚主义”的批判        | 黄德林        | 中国地质大学社会科学系     |
| “宗彝”故训与“民彝”新诠            | 刘桂生        |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
| 李大钊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考察           | 刘民山        | 天津市社会科学学院历史所    |
| 李大钊早期资产阶级制宪主张述评          | 王纯新        |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
| 早期李大钊对改良派和革命派态度的演变       | 杨洪章        | 山东省滨州师范专科学校政治系  |
| 李大钊与“少年中国”之理想            | 张 化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室     |
| 革命青年的思想导师——五四前后的李大钊同志    | 宿忠显        | 中共锦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   |
|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                 | 贾天运        | 洛阳建筑材料工业专科学校马列室 |
| 李大钊对日本侵华行径的揭露为五四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 李兆荣        | 北京建工学院社科部       |
| 走向新文明——五四前后李大钊文化思想发展史论   | 肖超然<br>晓 伟 |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
| 论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中的李大钊         | 谭双泉        | 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       |

续表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        | 王桢林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 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与时代思潮          | 朱志敏        |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
| 李大钊——中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团体的创建者 | 于恩书        |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室 |
|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 李 隼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 李大钊建党思想初探                | 唐振景<br>朱文通 | 河北省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
|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                 | 向 青        |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
| 李大钊与苏联、共产国际              | 黄修荣        |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    |
| 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 张振寰        |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      |
| 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 谢荫明<br>赵秀德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 李大钊与北方国民会议运动             | 黄小同        |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办公室    |
| 李大钊同志在西北地区的革命活动          | 乌尼日        | 内蒙古工学院社科部      |
| 李大钊与北京两师大                | 王淑芳<br>麻星甫 |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    |

续表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李大钊与山西早期革命运动的发展           | 王建寅<br>王秀文 | 中共山西省党史研究室编研二处  |
|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                  | 吴家林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 李大钊与北伐战争                  | 胡文澜        |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
| 李大钊对冯玉祥策应北伐的历史功绩          | 李敦送        | 武汉第二炮兵指挥学院历史教研室 |
|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李大钊与阎锡山          | 任振河        | 山西矿业学院社会科学部     |
| 试论李大钊与吴佩孚——兼述吴佩孚的“保护劳工”通电 | 张 锋        | 中共开封市委党史办公室     |
| 李大钊与章士钊                   | 金淑琴        | 河北省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研究所  |
| 李大钊的社会经济思想及其发展            | 李 华        | 首都博物馆           |
| 李大钊论社会主义竞争                | 杨纪元        |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
| 评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几个问题             | 邹北辰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
| 李大钊的文学思想                  | 董学文        | 北京大学中文系         |

续表

| 论 文 题 目                     | 作 者        | 工 作 单 位                    |
|-----------------------------|------------|----------------------------|
| 李大钊的宗教观                     | 胡顺哉        | 浙江省瑞安市高楼区中学                |
| 试析李大钊的法制思想及其活动              | 吴家林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 李大钊法律思想的民主精华                | 谷白英        | 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系                 |
| 试论李大钊的美学思想                  | 张文泰        | 哈尔滨大学文秘法律系                 |
| 李大钊伦理思想初探                   | 郑云德        |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
| 李大钊的婚姻家庭观                   | 吴美华<br>刘星星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br>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
|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记李大钊的新闻活动与新闻思想 | 余三乐        |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党校教学》编辑部          |
| 李大钊的革命教育思想                  | 张兰馨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
| 妙手文章炳千秋——李大钊文章之文章学研究        | 汪庆成        |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                   |
| 近年发现的李大钊遗文及其价值              | 韩一德<br>姚维斗 |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br>中国妇女出版社       |
| 李大钊遗文佚事概述                   | 李 玲        | 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               |



续表

| 论文题目           | 作者  | 工作单位        |
|----------------|-----|-------------|
| 新发现的李大钊信件      | 李玉贞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 苏联对李大钊的研究      | 李玉贞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
| 1984年以来李大钊研究述评 | 侯且岸 |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
|                | 张静如 | 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   |

### 应邀到会的国外学者及其提交的论文或提纲:

|                            |       |                  |
|----------------------------|-------|------------------|
| 李大钊与十月革命                   | 谢宁    |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 从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                 | 加鲁尚茨  | 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室  |
| 李大钊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 达木丁苏伦 | 蒙古党中央社会科学学院      |
|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即席发言)      | 斋藤道彦  | 日本中央大学           |
| 李大钊的人生观、社会观和历史观(即席发言)      | 后藤延了  | 日本信州大学人文学部       |
| (小组会发言)                    | 库白什娃  | 捷克查理大学哲学系亚非教研室   |
| 论今日对李大钊的评价——中国革命的主意主义经济决定论 | 横山宏章  | 日本明治学院(提交论文,未到会) |

## 为纪念李大钊百年诞辰出版的有关书籍

| 书 名            | 著 译 者                             | 出 版 单 位             |
|----------------|-----------------------------------|---------------------|
| 李大钊文集(续)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
|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 梁柱等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
| 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      | 许全兴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
| 李大钊遗文补编        | 姚维斗 李芹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
| 革命先驱李大钊        | 杨树升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
| 李大钊与中国革命       | 阎稚新 李善雨 肖裕声                       | 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
|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 (美)莫里斯·迈斯纳<br>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br>译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
| 李大钊研究论集        |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研处                       |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
| 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   | 朱成甲                               |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

| 书 名         | 著 译 者               | 出 版 单 位           |
|-------------|---------------------|-------------------|
| 李大钊在河北      |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   |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
| 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 北京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
| 李大钊史事综录     | 北京大学图书馆<br>北京李大钊研究会 |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
| 李大钊的军事活动    | 肖裕声                 |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 |
| 李大钊与冯玉祥     | 阎稚新                 |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

## 后 记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于李大钊生平与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89年10月29日适逢李大钊百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七单位在京联合召开了李大钊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先后收到应征论文近200篇，入选论文69篇，百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了会议。为满足广大研究者的需要，我们从会议入选论文中选取了30篇文章，并将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李大钊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胡乔木、胡绳同志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一起汇编成集，以飨读者。

本集所收文章由这次讨论会的筹备委员会学术工作组沙健孙（组长）、张静如（副组长）、萧超然（副组长）、朱乔森、吴家林、李义彬、马模贞、李樾、王朝美负责评选确定。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局王朝美（主编）、姚鸿、王维仁、董存发、唐筱菊、黄俊杰等同志承担了本书的文字编辑工作。

编 者

1990年10月